

导言

清朝，盛世终于乾嘉，晚期始于道咸。晚清，概约地说，是 1821—1911 年，与近代中国 1840—1919 年大体重合。晚清政治与文化实际上亦是近代政治与文化。

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其定义有人作过大略统计，约 161 种。从广义来说，凡是人类创造的都可以说是文化。从狭义来说，一定的文化是指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从儒家思想来解释，文是文德，化是教化。文，甲骨文为 wqu，为花纹、图样，类似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彩陶器上所绘的一种编织花纹的图案，这就是经过人为艺术加工的意思。化，教行也，物纵横无隔阂，引导人向善。文化是经过教育而获得的东西。英文文化为 culture，这个字来源于拉丁文，原义是耕耘，在自然界劳作，从中取得收获物。这个字还有练习、居住、留意、敬神、教养的意思。法文的文化有训练、修练的意思。还有一个词 civilization，原为文化，和文明混用，后译为文明，有文雅、城市、政治的意思，文明是文化发展较高的阶段。所以，文化不是人类的遗传的本能行为，而是人类有意识地用行动改造环境的学问和方式，文化是超脱动物的一切，是人类力量的体现，是人类存在的方式，人类历史就是文化史。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对文化下过一个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的整体。”这一定义所包含的意义是：（一）强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和掌握的东西，它和人的本能的生物学遗传或先天行动方式区别开来；（二）文化的社会性，不是单指个人的，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三）文化不是简单的、孤立的要素的堆砌物，而是诸要素复杂的纵横交错的统一的总体。20 世纪初，西方学者认为文化是群体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一切人群可观察的特色，也是不同社会相区别的模型，不论是文明人和野蛮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只要是人群生活的表现。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胡适说：“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梁漱溟说：“文化是生活的样法。”综合来说：文化就是社会的生活方式，是创造，是民族精神。

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的方式，文化的结构有三层面说。外层，物的层面，即对象化了的劳动；中层，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自然和社会理论，社会组织制度；内层为核心层即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社会风气、道德规范等。本书稿所讲的文化，着重是思想、理论等，而不是更广泛意义的文化。

文化既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的形态，有时代性，每个时代有它自己的文化形态；又具有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的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因此，文化带有连续性、传承性，是带有稳定的性质。

《原始文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第 98 页。

《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第 14 册，中华书局 1936 年，第 97 页。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第 3 集，东亚图书馆民国 11 年，第 1 卷。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3 章，商务印书馆 1987 年。

但是，文化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它本身有一个演化的过程。而且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往接触，互相之间会发生影响，文化形态在民族交往中和其他地区的其他文化相接触中会发生交融的过程。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中国本身产生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变动，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西方文化的输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一部分中国人看到西方文化有某些长处，主张向它学习。另一部分中国人则竭力维护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形成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和冲突。又有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中西文化有它相同的部分，或者说可以融合，试图将东西方文化相交融。一方面，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哲学社会科学学说输入中国，另一方面，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作出重新认识，重新估价。中国近代民族文化由于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由于新旧思想的斗争和更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政治影响着文化。

文化形态本身，哲学、史学、文学的观念也发生着变化，甚至文学形式，如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也发生着极大的变化。它们由古典的传统样式发展为近代的样式，为近代政治服务。文化形态适应着政治在起变化，它既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传统之中，又浸染着世界现代思潮的薰习而加以改变，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态。

中国幅员辽阔，山川阻隔，加上封建自然经济影响，一省内有几种方言，各地民性、民俗各不相同，形成了地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三家各是齐鲁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宋朝理学分濂、关、洛、闽四派，也是按地域来分的。明朝王阳明的王学分浙中、江右、泰州、南中、闽粤、北方、楚中等派别。地域文化有延续性、传承性。近代西学东渐，地域文化又发生了变异。按地域可分巴蜀、湖湘、江浙、闽粤、燕京等地区。京剧分京派、海派，经学、史学、诗词各有派别，亦多以地区来划分。近代交通发达，信息传播迅速，商品经济发达，又使各地域文化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趋势。

文化的载体是人，人有各个阶层，因所接受的文化程度不同，形成雅、俗文化。封建社会等级森严，雅俗分得较严，随着近代社会世俗化发展，通俗文化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发展很快。雅俗文化相互影响，互相渗透，呈现一种奇异的格调。

新旧文化思想的冲突和更替，中西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各地区文化的对峙和交流以及雅俗文化的分野和渗透，构成了晚清文化绚丽多彩的图景。

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政治影响着文化。但是，文化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对待文化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绝对化、简单化。例如传统文化是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不等于传统文化全是封建文化，全是反动、落后、愚昧的，应当抛弃。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最高统治者帝王利用它来进行统治，不等于说儒家思想全是糟粕。儒家思想中仍有精华，具有人民性的东西。何况传统文化除了儒学外还包含极丰富的内容。又如西方文化即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资本主义优于封建主义，因此资本主义文化也优于封建文化，要求全盘西化，全部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改造中国。这种结论也是犯了简单化绝对化的毛病。西方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各民族各国家文化极不相同，我们要经过细致的消

化过程，吸取其有益部分，排除其有害的部分，形成自己特有的新的民族文化。

本书介绍清朝的儒家思想统治和清朝的文化系统结构，这是一个概貌。一言以蔽之：旧学笼罩。嘉庆道光年间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改革思想，龚自珍、魏源为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是对正统文化的一种逆向文化，他们的思想闪耀着明亮的光辉，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咸丰同治年间是地主阶级经世派的经世思潮，代表人物是曾国藩、王闿运。他们的思想是正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同治光绪年间是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洋务思潮。早期维新派以王韬、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为代表，他们的思想进步性强。洋务派代表人物为张之洞，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使新学与旧学达到了初步妥协，保守性强，是正统文化的复兴和延续。从甲午到戊戌是维新派的维新思潮，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他们突破封建保守思想，引导人们进入新的境地。康有为主张中西会通论，在儒学中塞进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内容，即“援西入儒”。谭嗣同是英勇无畏的殉道者，他的哲学思想糅合中西，融会佛儒，相当庞杂。杨文会是佛教的弘道者，他的思想在晚清有较大的影响。严复是西学的播火者，他着重翻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林纾的翻译偏重于西欧的文学作品。他们两人所运用的文字语言是桐城派的古文，呈现出思想内容新颖和表现形式陈旧的矛盾。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传播西学，掀起了文体、史学、小说、诗歌革命。文体他创造了半文半白的新闻体，后来，报刊上又兴起白话文。史学他主张用进化论贯串研究历史，夏曾佑以此思想撰写了中国古代史。小说他论述其社会功能，随后出现了一批社会谴责小说。诗歌他主张“铸冶新思想入旧风格”，其杰出代表为黄遵宪。旧诗仍以陈三立、沈曾植的江西诗派为主，旧词则以谭献、朱孝臧、况周颐为代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革命思潮勃兴，这一思潮也反映到文化的各个领域。诗歌方面出现了革命团体南社，代表人物为柳亚子。他的诗有浓厚的反满情绪，是革命的号角，他对江西诗派的诗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戏剧方面，京剧吸取了各剧种的长处，在内容和表演技巧上不断革新，涌现出像谭鑫培和王瑶卿那样的表演艺术家。京剧还不断上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时装剧和西方剧目。中国话剧刚刚开始，以欧阳予倩和李叔同为代表。章太炎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在文化上他主张保存国粹，用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来宣传爱国主义，从而提高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王国维在史学和美学理论方面有深邃的研究。鲁迅早期的思想比较注意国民性改造的问题。总的来说，晚清文化思潮处在一个新旧杂糅、酝酿变革的时期，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近代中国文化思潮才掀起了巨浪，呈现出崭新的格局。

桑咸之，浙江上虞人，1931年12月生。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1995年4月去世。去世前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合著）、《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合著），并发表《论康有为的儒学和近代化》等论文。

序

王汝丰

桑咸之教授的遗著《晚清政治与文化》即将付梓了！这是一位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文化史领域数十年勤奋耕耘，执著探索和追求的赤诚学者心血的结晶。咸之生前多么盼望他的这一成果能够问世，以回报他毕生从事的教育事业。然而，猝发的心脏病，使咸之早早离去，成为终身之憾。当我从咸之的几位高足处得知书稿已送交出版社的消息时，心里不觉怦然一动，百感交集，一时竟不知是喜，是悲；是惋惜，还是欣慰。

咸之 1953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同年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攻读中共党史专业。我们是同届不同专业的研究生，三载同窗，从此相识。1956 年，咸之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后，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何干之教授在人民大学倡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从此，咸之便追随他所敬仰的这位老前辈，锲而不舍地献身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直至去世，整整 37 度春秋。咸之为人谦逊厚道，治学严谨，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都卓有成绩。他撰写或参与主编的主要著述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等，还发表了不少有关思想文化史的学术论文。

晚清政治与文化，是咸之新开的课程。记得 1989 年一天上午，我在校园路遇刚刚下课回家的咸之同志。他说正在给本科同学讲授这门新课，当时题为中国近代政治与文化，并随手送了我一本打印的教学大纲。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我们便在路边就这个题目谈了起来。我为他的思路所吸引，建议他改题为晚清政治与文化，在讲课基础上，写成专著，提供给《清史研究丛书》。之后不久，我就将这份大纲送交丛书编委会的王俊义同志。当时，编委会正在编制选题计划，咸之此题亦列入其中。

1990 年 2 月，咸之突患心肌梗塞住进海淀医院。病情严重，经抢救才得以转危为安。他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写书的事停了下来。

1991 年 2 月，我收到咸之病后给我的一封信，看到他那清秀飘逸的字迹，倍感亲切，十分高兴。他在信中谈及写书的事说：

昔曾讲晚清政治与文化课，意欲写成一书，承你对我的鼓励，我也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可惜一场大病，乃至辍笔。何日重新写来，尚不可知，心中惦念，在医院中成诗五首，出院回家，续成共十六首，录下赠给老兄，请欣赏把玩，不吝指教批评。只要微躯尚存，大脑健全，一待有机会，仍想完成宿愿，将此工程竣成。

我翻开录赠的诗十六首，跃入眼前的第一首，竟是《〈晚清政治与文化〉序》：

欲为近代设坐标，思想轨迹细画描；
欧风美雨渗中土，新旧嬗递起狂飚。
雅俗纷呈态各殊，南北对峙异格调；
湘蜀浙粤诸家出，论坛文苑领风骚。

此下，便是以近代思想文化名家“定庵”、“滌生”、“南海”、“任公”、“又陵”、“左庵”、“观堂”（王国维）、“亚子”、“仁山”（杨文会）、“迅翁”、“实庵”（陈独秀）、“欧阳翁”（予倩）、“琴南”、“曼殊”、“太炎”为题的十五首。现都已附于书中。

咸之学识广博，很有才华，我常向他问学讨教，但我并不知道他长于诗。诗十六首是我第一次读他的诗，自然分外欣喜。可是我又不懂诗，尤其是旧体诗。但是诗的平实清新和真挚的感情，我是深深感觉到了的。“诗言志”，其中可见其志向，见其见识，见其治学的根柢。更令我为之一震的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竟如此执著于对学术的探求，若非对事业怀有炽热的追求和忠诚的责任感，是绝不会如此“痴情”的。

当时，我以为如信中所述，咸之一时是不会再执笔写书的。清史研究丛书此时也因经费困难，不得不压缩选题。《晚清政治与文化》又与早先选定的另一同类选题相重，因而暂时搁置起来。

1992年12月，咸之又一次因心脏病住了医院。1993年1月18日，他出院不久，又给我寄来一信说：“住院前已完成23万多字，全书计十章，已完成九章，本来计划到年底，第十章3万多字亦能完成，不料病了，只好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搁置起来”。

这封信令我又一次受到震动。原以为他会停止写书计划的，何曾想到他竟以病弱之躯，“发奋执笔”（信中语），完成了十分之九的书稿。这需要何等坚韧的毅力啊！也许，咸之太不重视自己的健康了。然而，在我们身边，许许多多皓首教学与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何不是如此默默无闻甘于献身事业，忘我地置身于“拼搏”之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咸之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户外朔风撼古槐，幽香水仙簇簇开。
诗由闲适自然出，学从困勉锤炼来。
休纵春光隙间过，留得青山总有柴。
推石峰顶永不歇，成败毁誉岂能猜。

“推石峰顶”出自西西弗的神话故事。据说，诸神罚西西弗推石上山顶，巨石不断从山上滚下，他重新把巨石推上山顶，一遍又一遍，永不停歇。这也许就是咸之的自况。在完成《晚清政治与文化》书稿的过程中，他经受了病痛的磨难，却仍然不断推石上山。他推的也许不是西西弗所推的那样的巨石，但他奋力在推，不停地推，多么可亲可敬的精神啊！

1994年6月25日，我收到咸之的第三封信。他说：“三年以来，因心肌梗塞，大病缠身，几经努力，将晚清政治与文化课讲三遍，书稿写成，经你和胡先生审阅，力争出版，不巧，遇到困难，未能付梓”。他知道当今出书太难，心里既期盼又很坦然，特别提了一句：“书稿出版，从长计议，急躁不得，待机再说。”

在此之前，咸之已经将未完成的最后一章完成，他曾将前九章书稿交我一读，又送请胡绳武教授提意见。绳武同志是咸之很尊敬的大学本科时的老师，80年代受聘到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执教，因而有缘又与咸之同校共事，师生而兼师友，情谊甚深。我和胡老师先已读过九章，继而又通读全部书稿，前后两遍，我们几乎都是一口气读下来的。这是因为，晚清政治与文化，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变化发展不可或缺的课题。政治与文化，都是一定社

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二者虽然各有其自身特质的规定性，然而又有着极为紧密甚至不可分的联系。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急剧变化发展的每一阶段上，政治风云的激烈变幻，中西文化的尖锐碰撞和冲突，新旧文化的矛盾和嬗递，政治与文化的这种急剧变化发展以及相互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都因时代的特点而显得十分突出。而以往的研究中，常常重此略彼，或是重彼略此，未能专门地全面地加以探索。咸之此题，立意在此，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一读不能释手。此外，咸之的文笔本来就很流畅，加之他对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积累很丰实，又熟悉近代历史文化掌故，深入浅出，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读来很吸引人，是一本颇值一读的好书。

书稿虽然完成了，但此时清史研究丛书经费仍极困难，选题计划已经改变，书稿出版几乎完全陷于停顿。但直至咸之去世前，出版的事也还断断续续仍在进行，虽然都未能落实，咸之和不少热心的师友仍都抱有希望。不料，1995年4月9日清晨，咸之又一次突然心肌梗塞，竟至不起，安详地永离“静园”的书斋而去，我们为失去这位辛勤的园丁和益友而哽咽。

现在，咸之的书稿终于要出版问世了。这要感谢咸之的几位硕士研究生黄小玲、陈日发、王世理、周亚权、阎润渔、杨国华等同志，是他们在咸之去世之后，多方奔走，甚至自己筹集出版所需费用，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才能使咸之的宿愿得以实现。这是他们对老师真情的回报和纪念，我为他们的诚挚深情深深感动。他们要我为书稿写序，我惶愧不敢当此，然而又义不可却，想到咸之为撰写此书给我的三封信，正是咸之最后五年学术探索历程的记录，展现了咸之生前顽强地“推石上山”，对学术兢兢业业，执著追求的精神。我把这种精神作为对自己的激励，于是写了如上的话，表达我的哀思、敬意和怀念。

1996年1月26日于北京西苑

第一章 清朝的文化系统结构

满族贵族入关，赶走了李自成，进入北京，建立了封建统治。明朝经过明末农民战争的急风暴雨，李自成打进北京，明亡，南明维持了一阵子，又亡了。王夫之称其为天崩地解的时代。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斗争，满族贵族和汉族的民族斗争接连不断，终于，清王朝站稳了脚跟，清兵入关，征服南方，闯关屠城，剪发留辫，血腥镇压。等到全国平定后，便考虑用什么思想做统治思想，清朝皇帝考虑仍用儒家思想，这表示满族贵族与汉族统治者在文化这一点上有共识，儒学适合于统治人民，而且可以解除汉族知识分子的恐惧心理，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清朝是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需要吸收汉族封建士大夫来为其皇室效力。吴伟业（梅村）、钱谦益（牧斋）降清。吴为国子监祭酒，钱为礼部尚书，招这些人来做官，对稳定清朝统治有好处。但吴、钱内心很矛盾，被斥为降臣，史书列入贰臣传，至死惭愧。而有人保持气节，不投降，不为清朝的官，江苏昆山顾炎武、浙江余姚黄宗羲、湖南衡阳王夫之，顾是经学家，黄是史学家，王为哲学家，他们学问好，有名望，坚持抗清，隐居不出。清朝便想一些办法。一、尊崇孔子，提倡读经。二、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三、聘请士林学子，开馆修明史。四、编纂大部头类书，将一大批学者集中京都，钻研学术，保存文化。这些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经书，是指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典籍。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设五经、九经、十三经。易经、书经、礼经、诗经、春秋为五经。礼分仪礼、周礼、礼记。春秋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加上孝经、尔雅、论语、孟子共十三经。经书是专制政府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治的工具，也是专制政府培养提拔统治人才的主要准绳，知识分子读着它，只能理解，不能怀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中解释的内容，也只能背熟记住，不能怀疑，更不能发挥自己的见解。这种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使人思想僵化，狭窄，经书成为人们思想的紧箍咒。

康乾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而文化上则大兴文字狱，帝王存在着一种猜忌心理，害怕士大夫知识分子反满情绪的潜在滋长，于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罗织罪状大加惩罚，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恐惧万分，造成一种压抑心理，只好远离现实政治，埋头于故纸堆中。晚清文化结构系统的形成和这一特定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第一节 理学

理学是义理之学，又叫宋明理学。明朝中叶，王阳明心学大盛，清朝是恢复宋代的程朱理学，故又称宋学。王阳明心学是理学的一个流派，讲即心是理，理不用外求，返观内心便行，其极端便变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发展到民间，成为“狂禅”，“满街都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如李贽。有的学者没有什么真实的学问，欺名盗世，空谈心性。明亡，顾炎武总结明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认为空谈心性，整天置四海穷困不言而专讲危微精一是要亡国的。因此，他讲“舍经学无理学”，学术上要务实，提倡实学。一是贵创，读书要贵于创新，勤奋读书，学识广博，考证，不要抄袭古人，模仿古人，要有自己的见解。二是博证，博瞻贯通，有根有据。三是致

用，经书的学习要和时务结合起来，通经致用。顾炎武还有抗清的思想。后来清朝的学者将其博证一点加以发挥，形成考据学，而致用一点被淹没，未得到发展，直到晚清，通经致用思想才逐渐提倡，至于排满反清思想更成为潜流，直到革命派才又将它提起。

清初，反王学成为主流，清朝皇帝选中了朱熹的理学，用它来统一人们思想。康熙为《朱子全书》作序，说朱熹理学裨益政治，是内圣外王之学，又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下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一家。”¹朱熹的牌位进入孔庙大殿列于十哲之次。满族贵族子弟也学习汉族语言文字、儒家经典以及书法，接受儒学文化。这里皇帝的着眼点是以理学统一全国思想，使各民族思想上有共识，使之有凝聚力。皇帝在上面提倡，社会上便形成风气。当时著名的理学学者有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王懋竑，名臣兼名儒有汤斌、李光地、魏裔介、魏象枢、张伯行、熊赐履、张玉书等人。

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进士，当过知县和御史，耿直而淡恬，推崇朱熹的理学为正宗，极力排斥王阳明的心学，由于他尊朱黜王的宣传，被后来的理学家推崇为清初理学传道的首要人物。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浙江桐乡人，所居曰杨园里，故学者称杨园先生。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他们都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明亡后没有做官。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号敬庵，河南仪封人。康熙进士，累官礼部尚书，辑有《正谊堂全书》。陆、张、陆、张四人，被后来的理学家推崇为清初理学传道者。

首先，这批学者反对讲学。他们认为明朝讲学太盛行，结果成为清谈，误国。陆世仪说：“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张履祥说：“近见时流讲学之风，始于浮滥，终于溃败，平日所深恶也。”他们认为讲学聚众易闹事，便倡著书，如纪昀也如此。其次，讲稼稿。他们主张一边读书，一边耕种田地，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务农，有农业、家园作为基础，能吃得苦，甘于过朴素贫困生活，才能做堂堂正正的人。张履祥说：“学者舍稼穡外别无治生之道，能稼穡则无求于人而廉耻立，知稼穡之艰难，则不敢妄取于人而礼让兴。”他又说：“人知作家计须苦吃苦挣，不知读书学问与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吃苦挣。”所谓吃得菜根，百事可做。第三，这些学者讲道德品行，行为拘谨，值得人敬佩，有些名臣还有政绩。但有的学者便学问不多，做事能力差，他们只背诵朱子的话，以博得帝王的欢心。更差的便是一批“乡愿”，甚至是空谈性理的假道学了。

第二节 汉学

汉学是考据之学。清朝恢复东汉考据学，故称汉学。汉学从经学派别上讲是古文经学，从研究方法上又称朴学。

朝廷崇尚程朱理学，学术界知识分子则钻研考据学，造成清朝学术思想

¹ 《朱子全书·序》，《朱子全书》卷首。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7册，第99页。

《饮冰室合集》第17册，第96页。

《饮冰室合集》，第97、96页。

极兴盛的局面。汉学的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学者认为理学偏重讲道德修养，伦理哲学，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而汉学包括音韵、训诂、考据、校勘等学问，其中大有用武之地。二，承平日久，城市经济发达繁荣，社会生活安定，创造了一个安静读书的客观环境。龚自珍得到一本康熙年间的旧本制举之文，感慨得很，写了一首诗：“红日柴门一丈开，不须逾济与逾淮，家家饭熟书还熟，羨杀承平为秀才。”说明那时的气氛很适宜于做学问。三，清朝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康熙朝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朝吕留良、曾静案，查嗣庭案；乾隆朝胡中藻案、沈德潜诗案等等，都遭到杀头、流放、家属没籍、开棺戮尸等种种惩罚，吓得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不敢议政，只好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汉学，诠释故训，究索名物，这样与世无患，与人无争，找到了一个逃避现实政治的避风港。四，江浙皖一带出版业蓬勃发展，有钱的淮商，出资刊刻学者的书籍，给考证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印行条件。五，当时还有一些身居要职的学者如毕沅、阮元等人的奖掖提倡，聘请学者修纂大型书籍，对促进汉学研究起了积极作用。这些学者出现在乾隆、嘉庆两朝，称乾嘉学派。

汉学分为两派：一为吴派，另一为皖派。

吴派的代表人物是惠栋。惠栋（1697—1758）字定宇，江苏吴县人。惠氏世代传经，书香门第，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是康熙进士，著名学者，家中藏书丰富。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饱读经书，日夜讲诵。中秀才后，考举人未中，便没有做官，闭门读书，钻研经术，著作有《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九经古义》等。他对易学尤为精通。他的治学方法，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音韵训诂，以求经书的原义。他认为汉代学者都是学有师承的，训诂由经师口授，古字古训，非经师不能辨，而魏晋以后，治经者随使用俗字代古字，使经书的原意尽失。所以他便从文字音训以求义理，在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这是一种科学的、严谨的方法，使经籍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惠栋推崇汉学，便尊信和固守汉儒的经说，甚至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实，汉儒解经并不都是正确的，完全株守汉学，在学理上没有新的、更精辟的见解，这实是惠栋汉学的局限性。

吴派还有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等人。

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别号西庄，江苏阳湖人。他继承惠栋的学风，信古尊汉，述而不作，著《尚书后案》专门发挥东汉郑玄一家之说，东汉其他的经说都放在次要地位。他还以治经的方法治史，著有《十七史商榷》一书，对史迹、职官、制度都有校勘和考证。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人。淹贯经史，博通群书，他精通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词章等，有《潜研堂集》，其中《二十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元史艺文志》尤为有名。他对音韵学研究造诣很深，发现古音无轻唇音、舌上音等，对历史学的研究也颇有成就，《二十二史考异》一书对浩繁的正史作了系统和详细的考证，清代学者对此书极其推崇，评价很高。

皖派的代表人物是戴震。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出

《吴市得旧本制举之文，忽然有感，书其端》，《龚自珍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457页。

这样一类的书还有赵翼编著的《二十二史札记》，连同上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清代学者推钱书为最高，王、赵次之。参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7册，第291—292页。

身小商人家庭，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举，后参加进士考试，未中。晚年以特召充四库全书纂修官。他治学方面广，包括音韵、经学、天文、历算、历史、地理、哲学等。皖派的治学特点是断制谨严，条理密察。他也是从文字、训诂入手考证经义，但是，他的考释不是以汉儒为准，而是要求“求是”。因此，他的研究突破了吴派尊汉的局限，获得很大的成就。他精通名物训诂，又从训诂入手探求古书的义理。他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是一部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著作，其中否定了朱熹理学的“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观点，说理存于欲中，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斥责理学家是“以理杀人”。这部哲学著作具有很大的战斗性。但是，当时学者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遭到保守思想学者的攻击。皖派后来的发展在音训考据之学方面有很大的进展，而义理方面的探索则没有坚持反宋学的传统，即使讲论义理，议论也比较平和，有汉宋渐趋合流的态势。戴震的门人有段玉裁、王念孙，属于皖派的还有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人。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一字懋堂，江苏金坛人。师事戴震，精通小学。著《说文解字注》，是注解、研究《说文解字》的巨著。《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的著作，是后人阅读古文献和研究古文字的最重要工具书，段玉裁给此书详细作注解，更重视客观的归纳，“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用这些条例去读古籍，解决了音韵、文字、训诂、词汇等方面的许多重要疑难问题。王念孙称誉这本书是千七百年来未有之作。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学者称石臞先生，江苏高邮人。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撰《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是对汉朝张揖《广雅》一书的校勘和训释。前人的语文研究往往重字形而不重字音，训诂上拘泥于字形去解释。王念孙提出训诂之骨，本于声音的论点，把古音和语音转变理论运用到训诂上来，发前人所未发，在训诂学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儿子王引之，继承父学，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这些著作学术价值也相当高。

汪中、凌廷堪、焦循承继了戴震反理学传统，他们重视音韵、考证，同时也研究义理，讲究致用。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他用考证的方法指出《大学》一书不是孔子之作。他反对程朱理学，认为妇女殉节、守节都是不合人道的。他还校勘考释《老子》、《墨子》、《荀子》，注意诸子学的研究，开拓了研究古代思想的范围。凌廷堪（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县人。他精研礼学，作《复礼》三篇，认为理学袭取了佛道思想，背离了儒学正统，主张以礼来代替理，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他还著《燕乐考原》，是研究古代音乐的专著。焦循（1763—1820）字理堂，江苏甘泉人。他擅长易学，著《易通释》、《易图略》和《易章句》，称为《雕菰楼易三书》。他精通数学，用数学知识来解释易经，获得了新的成果。他写的《剧说》、《花部农谭》，是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专著，他对当时为士大夫所鄙视的“花部”甚为推崇。

清初朝廷崇尚理学，民间学者则钻研考据，汉学初兴。吴派出现，便和宋学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皖派的出现，则使汉学有压倒宋学的趋势。乾隆中期，汉学盛兴，成鼎盛时期。朝廷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馆，集中了全国的著名学者，单编纂人员达360名，几百名学者济济一堂切蹉学问，考证、校勘、精审，费了九年时间，于乾隆四十六年（1782）初稿完竣编成。梁启超曾评论说：“露骨的说，四库馆就是汉学的大本营，《四

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也可以说是，朝廷所提倡的学风，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风压倒”。汉学注重考证，强调证实，反对宋学的空疏。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由此，《总目》对汉学的讲求文字、音韵、训诂、考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后来阮元曾评论说：“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响风。”这就是说，清朝朝廷采取了“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兼容并包政策，使宋学、汉学两个流派都为清朝现实政治服务。因为知识分子白首穷经的钻研方式对于清朝的社会安定也是有益的，汉学便盛兴起来，成为清朝学术的主流，梁启超描述道：“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许，许慎，是《说文解字》的著者；郑，郑玄，马融弟子，曾编著群经；贾，贾逵，专攻《春秋左氏传》；马，马融，东汉经学大师，设帐讲经，授徒千数。“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就是说当时知识分子都埋头钻研汉学，汉学上升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学术并且很快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成为一种潮流，一种学风。

汉学盛兴，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推动了各门专科学术的发展，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但是，这种考证的学问，脱离现实政治，比较繁琐，偏枯，缺乏思想的创新，这是封建社会保守封闭停滞特征的反映，不能适应社会急剧变动的现实。当时有些学者也看到了其弱点。方东树著《汉学商兑》站在理学家立场攻击汉学，未免有些偏见，但有些观点也确是击中了要害。到了晚清，汉学便走向衰落。

第三节 桐城派古文

中国古代很重视文章，曹丕便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章分散文和骈体文。骈体文是一种介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文体，以对仗、骈偶、用典、有一定的音律、讲究藻饰为主要特征。人们常说“六朝骈俪”。著名的文章有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和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等。到了唐朝，骈体文还很流行，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和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等。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编过一部《文选》，里面收集了许多骈体名篇。清朝李兆洛编过一部《骈体文钞》。

和骈体文相对的是散文，唐朝韩愈曾发起过一次古文运动，即排斥骈体，要求写古典散文，不讲究四六对仗，排比典故，而讲究文章气势、神韵、简练，要朗朗上口。他提的口号是“文以载道”，“唯陈言之务去”，要言之有物，旨在创新，“文从字顺各识职”，文字流畅，反对矫揉造作，纠正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7册，第22页。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卷首，中华书局1981年。

《拟国史儒林传·序》，《研经室一集》，卷二。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第53页。

曹丕：《典论论文》，《文选》（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71页。

六朝以来浮华柔弱的文风和形式主义的偏向，史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评价很高。后来散文写得好的有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人称为唐宋八大家。明朝还有一位归有光，散文成就很高。名篇有《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到了清朝，先后有方苞、刘大櫟、姚鼐等人提倡古文，形成一个派别，因他们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称桐城派。这一派在清朝影响很大，成为配合道统的文统，有人曾惊呼：“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可见影响深远。这种文风的崛起是和清朝的政治密切相关的。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在青年时代便崇拜程朱理学，言“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柳之间”。他的文论讲究义法。义就是内容，内容要表达程朱的理，法就是“言有序”，指文章取材、布局、段落的概括能力、表达能力，他要求文章要文从字顺，简约雅洁，清通严整，清澄无滓，自成一家。方苞的文风是在维护程朱的道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为和硕亲王编了一本《古文约选》，是供八旗子弟诵读的示范读本。乾隆初年，乾隆帝诏颁各学宫，此读本成为清朝文坛上的正宗，得到了正统的地位。方苞的作品如《狱中杂记》，深刻揭露了清朝治狱的黑暗状况，使人触目惊心。另一篇《左忠毅公逸事》，记述明朝东林党左光斗和阉党恶势力之间的斗争，表彰明朝名臣的气节。他的文章带着明末清初时代转变的痕迹和烙印。对清朝的政治弊端还时有指责，民族意识也间有流露。方苞对雅洁朴质的认识也有偏颇之处，如说：“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他认为一用这些词汇，便失去了雅洁。这里显出桐城派古文的保守性，排斥一切新起的、生动活泼的文学体裁和文学语言，显然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刘大櫟（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人，诸生，雍正时两举副贡生，晚年在安徽黟县做教谕数年，后归里，一生很不得志，个人牢骚极多。他虽然是方苞的门人，但遭遇不同，政治地位不同，因此文章也和方苞不一样。方苞对散文创作讲“法”，但涉及内容不多，刘则专门探讨散文创作的规律，着重研究散文创作中鉴赏的审美问题。他认为行文解事中，有四大审美要素，即神、气、音节、字句。神是风神、神韵、神气，是文家之宝，是作家精神品质的体现，是文章支配全局，最易打动读者心灵的审美特征，是作者高超技能手法的表现。气是气势、力量以及人们对它产生的审美感受。文章以神为主，以气辅之，那么，神气的最精处如何表现出来呢？则是用音节和字句来表现，他又具体分析探讨了怎样运用音节、字句才能达到美的境界。他的这种对散文审美规律的探讨是对方苞文论的一种发展。

姚鼐（1732—1815）字姬传，字梦谷，号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充四库全书编修官，中年弃官，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历主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讲学40多年，门生弟子遍及大江南北，由于他从事古文写作和宣传，桐城派得以形成。乾隆时期汉学大盛，学界扬汉排宋，姚鼐挺身而出，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程鱼门、周书昌语。

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

沈连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语。

者不可偏废的主张。汉学家、宋学家都是重理轻文、重道轻文的，辞章家则只重辞章，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兼长者为贵。他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调和汉宋，兼采考证的长处，以考证充实理学的空疏，以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他是把义理、考证、词章三者作为文人所具备的才能的合理构成来看待的。三者之中，义理仍是首要的。“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考证是文章的材料，论证“义理”，助成文章之美的手段，故云：“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在文章的风格上，他强调阳刚、阴柔兼备者，他说：“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则必无与于文矣。”他在如何写作上提出要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是文之精，格、律、声、色是文之粗。神是作品的意气、精神、神韵，是最本质的审美特征。理是作品的脉理、思理、文理，指艺术整体的思维规律。气是指行文的气势、作品的力度。味是指滋味、韵味，能激发读者的审美感受。以上是指作品中高层次的审美要素。格是规格，不同文体有不同的规范。律是法则，如虚实、详略、字法、句法。声是声韵节奏。色是辞藻的色彩，即对语言文字的加工修饰。这四者是属于较低层次的审美要素。姚鼐这套文学理论比方苞、刘大櫟更为系统，更为完备了。

姚鼐在乾隆四十四年编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共75卷，是古文辞赋选本，分13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这种分类是按照文章的应用分的。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櫟等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体现了桐城派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推崇，有很广泛的影响。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了一本《古文观止》分12卷，是按时间先后排列的，未分类，文章选得比《古文辞类纂》少，而这本集子则影响更大，作为普及读物广为流传。

姚鼐生活的时代和方苞不同，方苞文章还反映了反清意识，姚则反清意识已经淡薄了，他和刘大櫟也不同，刘大櫟文章还有浓烈的文人牢骚，姚则急流勇退、纯然学者，他的文章醇正严谨，清通自然，简洁明快，但是，内容显得贫乏，形式拘谨，缺少风采。如《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善于描摹，色彩鲜明，但是较少心胸的寄托和对现实人生的感慨。这是和方、刘文章的不同之处。

他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等，都成为桐城派的重要作家。

第四节 诗、词

诗歌，反映时代的风貌和气息。清朝初期，有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称江左三大家。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明末马士英拥福王，他为礼部尚书，清时投降，为礼部侍郎，

《复汪进士辉祖书》，《桐城派文选》，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第79页。

《与陈硕士》，同上，第80页。

《海愚诗钞序》，《桐城三家散文赏析》，巴蜀书社1986年，第172页。

后来他告退回乡，是几十年东南文坛的领袖。他崇拜白居易、苏东坡、陆游，格调近晚唐和宋诗，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将他放在卷一第一名。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时官少詹事，投降清朝，为国子监祭酒，一年后以母病还乡。他的诗才华艳发，辞藻绮丽，有些诗反映了明清之际的政治动乱的状况，如《圆圆曲》很有名，其中“冲冠一怒为红颜”，是对吴三桂莫大的讽刺。晚年心情忧郁，多悲凉之作。龚鼎孳，号芝麓，字孝升，安徽合肥人，明朝官至兵科给事中，清时历任礼、兵、刑三部尚书，很爱人才，其诗作比钱、吴稍逊一筹。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诗分四派，他们是王士禛、沈德潜、翁方纲、袁枚。

第一派是王士禛的神韵派。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他出身于世宦之家，诸父辈多能诗，顺治十二年中进士，累官至刑部尚书。他创“神韵”说，神韵即诗中所含的风度、气韵。“韵”具体指冲淡悠远的意味，诗要有清幽淡远的意境。他追求这种情趣、意味，便推崇唐朝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的诗，讲究诗的创作要神韵天然，自然浑成，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的话，即“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他又引严羽《沧浪诗话》中的一句话，即诗要写得好，无斧凿痕迹，便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为此，他对诗中发议论、讲道理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诗便不能以“美”见称，至使风雅扫地，下劣得直可喷饭。他探求诗的精神，诗的内在的审美性质，认为物境清幽，心境淡远，这种天成自然的兴会神到的诗才是有神韵的诗，才是美的意境。他自己的诗也是在实践他的诗论，均是范水模山，批风抹月，以咏帝力，点缀太平之作。这种作品在康熙年间盛行，他自己也被推崇为诗坛领袖。明末清初，战争频仍，人民国破家亡的苦难场景，在诗文中有突出的反映。而此时，这一切都慢慢淡漠和遗忘了，性情柔和典雅的诗，显示出社会政治的稳定平和，对清朝的统治极有益处。这和巩固清朝政治的统治是极有关系的。带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最清高、超逸的神韵说诗歌理论，都带有最露骨的政治功利目的，起着对清廷粉饰太平的作用。

第二派是沈德潜的格调派。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雍正四年中进士，在乾隆朝，受乾隆帝赏识，累官至礼部侍郎，经常与乾隆帝讨论诗歌，互相唱和，甚至代写御诗。编过《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古诗源》等书。诗论倡格调说，代表乾隆时期诗歌理论的官方意志。格调说，是正统的儒家诗论，作诗首先要讲宗旨，追求诗教的本原，写诗的宗旨首要的是思想感情是否正确，要以温柔敦厚为标准，宗旨之正，格调之高，这是至关重要的。他强调诗的社会功能在于“教化”，发挥孔子诗教的思想“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兴、观、群、怨”等。他也讲风格、神韵，但放在第二位。关于神韵，他又认为王士禛的淡远的意境只是其中的一种，雄浑壮阔的意境也是美的，如杜甫“黥鱼碧海”、韩愈“巨刃摩天”的风格意境，也应予以提倡。因此，他崇尚唐朝，推崇李白、杜甫的诗。他提出古体诗崇汉魏，近体诗崇盛唐。沈德潜的诗论实际上纠正了王士禛神韵说清闲淡远的偏颇，强调孔子的诗教，使之直接有益于封建名教，使正统的封建文学更加规范化。

第三派是翁方纲的肌理派。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大兴（今属北京市）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他精通金石、考据

之学，善书法。他的诗论是肌理说。他说：义理之理，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意思是义理、文理密不可分，理要植根于六经，诗歌要将六经的义理写进去，体现出来，才叫诗。那么，写诗必须有学问，懂得义理之学，考证之学，只有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才有资格写诗。他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失之太虚，而沈德潜的格调说温柔敦顺又太拘束，要以学问的理以实之。于是，他强调宋诗，崇拜黄庭坚的诗。他说“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南渡以后，如武林之遗事、汴土之旧闻、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莫不借诗以资考据”。用诗来讲哲理，把诗作为发议论的手段，诗理化，已离开诗的本质特性相当远了。但是，翁方纲还沉醉于黄庭坚的诗“荟萃史事，巨细不遗”的特点，说学即才矣，将有学问代替了有诗才能。这种诗论和当时乾隆年间考据学大兴盛的学术空气有关，而且，这种诗论导致了清朝诗由崇尚唐诗到崇尚宋诗的转变。

第四派是袁枚的性灵派。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中年隐居江宁小仓山的随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任江宁知县，30多岁便弃官不仕，隐居江宁。他的诗论倡导性灵说，诗歌必须写出诗人的性情，性情应当是真实的，要有灵性，即要有个人的才气，要有个人独立的见解和精神，要追求创作自由与艺术个性的宗旨。他从诗言志，引申到诗是由情而生的，有不可解之情，便能产生不朽的诗篇。诗既然是个人情性的表露，那么诗可以反映男女爱情。儒家诗论讲义理，讲道学，强化封建名教，存天理，灭人欲，袁枚对这种道学理论猛烈抨击之。灵机是诗人的天分，是对自然的领悟，对人生的领悟；神悟是一种直觉，不是逻辑推理，他说：“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物情相通，便成佳诗。在真（情）的基础上，表达上达到美，是真与美的统一。诗要“著我”，是个性的表现，要师古人，但不要为古人所囿，要有变化，有创新。他认为抓住了性情这一点，即抓住了诗的本质，给诗歌领域带来了活力。他认为翁方纲的肌理说是“误把抄书当作诗”，诗是艺术，不是学问，“何也？空诸一切，而后能以神气孤行；一涉笺注，便趣味索然”。他说考据之学离诗最远。这些见解相当深刻。他认为王士禛的诗太假，诗中无人，无人的真实性情，曾评论道：“一代正宗才力弱，望溪文章阮亭诗。”对方苞桐城派的文章、王士禛神韵派的诗歌都不满意。袁枚的诗论对儒学传统诗教有一种叛逆的思想色彩，这种诗论，上承明朝李贽的童心说，下启龚自珍的宥情说，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

词是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乐府诗。隋唐时有一种燕乐，在宴会时演奏胡乐和民间音乐，配上曲子，便是词。所以词是胡夷、里巷之曲。后来文人倚声填词，渐渐脱离音乐，形成了富有音乐性的新兴诗体，与诗并行发展。词兴于唐，流衍于五代，而极盛于宋。历史上有各种流派，一

《石洲诗话》卷四，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遣兴》，《袁枚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第131页。

《仿元遗山论诗》，全诗是：“天涯有客号吟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选《袁枚诗学述论》，黄山书社1986年，第85页。

《随园诗话》卷七。

《仿元遗山论诗》，《袁枚诗学述论》，第85页。

般分作二大派，一是婉约派，以温庭筠、周邦彦为代表；另一是豪放派，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而南宋的姜夔（白石）和张炎（玉田）是属于婉约派的。元、明两朝，词学中衰，到清朝词有中兴之象，人才辈出，流派纷呈。清朝词分三派。

第一是阳羨派。代表人物陈维崧。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人称陈髯（留胡须），江苏宜兴人。其父陈贞慧是明末复社的四公子之一，重气节。他幼承家学，少负盛名，明亡，家道衰落，客游四方。文学上有多方面成就，政治上不愿和清廷合作，长期穷困潦倒，故国之思、身世之感、幽忧悱愤、缠绵芳洁之情，都寄托于词中，风格沉雄俊爽，浑厚沉郁，效法苏轼和辛弃疾，属豪放派。他的词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也有人说他的词浅露粗疏，还不够深刻。他的著作为《湖海楼全集》，后人称湖海楼派，他的家乡宜兴古称阳羨，后人也称阳羨派。如他在《贺新郎·秋夜呈芝麓先生》中写下了“恨吴盐，只点离人发。家何在，在天末。……白雁横天如箭叫，叫尽古今豪杰，都只被江山磨灭”的诗句，那种怀才不遇、奋飞无力，人却又步入老年的知识分子的心情，读来沉痛感人。他的词深刻地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家国之恨、兴亡之感的历史画面，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他的词在清朝词坛长期处在非正宗、被压抑的地位。

第二是浙西词派，代表人物朱彝尊。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金风亭长、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人。明亡后，以“布衣”自尊，名满天下。后来，清廷对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放宽了，他便于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职翰林院检讨，入值南书房，后因事罢官，归里专心著述，有《曝书亭集》、《经义考》、《日下旧闻》等，所编《词综》一书影响很大。他的词学主张，在《解佩令·自题词集》中有所表露。词曰：“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这时候，清朝统治已经稳定了，知识分子对于明朝亡国之恨也渐渐淡漠，或者更深层地埋在心底了。不屈服，怕招来灭门之祸，虽屈服，又不甘心趋炎附势，这种矛盾心理，只好把“恨”，化为歌儿檀板，装点太平曲子，“几曾围燕钗蝉鬓”，不是单纯寄情于声色者。要使词归于雅正，合乎清廷清真雅正的文学规范，便宗姜夔和张炎婉约派的一路，所以称家白石而户玉田。这种雅正醇厚的风格与阳羨派的叫嚣犷悍便迥然不同了。他的词讲究声律词藻，细致绵密，圆转浏亮，风格崇尚空灵，清丽高秀。如《雨花台·卖花声》一首，沉郁凄清，流畅可诵。但是缺点是追求形式美，有的作品不免碎巧，学他的词，其末流则每致意旨枯寂寒乞。

到了嘉道年间，出现了第三派常州词派，代表人物张惠言。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翰林院编修，精通易学，著《周易虞氏义》等经学著作。他和他弟弟张琦编了一部《词选》，在序言中发表了词学理论，开创了常州词派。他认为“词”近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他这一定义将词同诗经中的变风、变雅及离骚一类作品相比拟，改变了词是“小道”、“艳科”的传统观念，虽然词是一种抒情为主的文学样式，但也应有丰富深刻的历史内容，是道出

龙榆生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第 52 页。

《词选·序》，中华书局 1957 年，第 2 页。

“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意内而言外，应有所寄托的。在表达上，“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各有所归”。上句说物是激发人的感情的本原，感物生情，引类表旨，下句说表达意旨，又须借助与情意能相比的具体事物，比物连类，寓意于象。这样才能将作者的情表达得好，不仅仅“苟为雕琢曼辞”。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批评了浙西词派意旨枯寂，内容贫乏，单纯追求形式之美的倾向。他的后继者周继则说，词应反映史，说“诗有史，词亦有史，进乎自树一帜矣”。“感慨所寄，不过盛衰。”反映的是个人的感情，这种感情需要有社会政治历史内容作为基础，才是有价值的。词力图表达有社会政治历史内容的思想感情，这便是有“寄托”。

张惠言的常州词派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乾隆后期，清朝政治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政治腐败，经济趋于停滞，土地集中，吏治贪污成风，各级统治机构糜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发了农民起义，社会总危机已暴露出来，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要求社会改革，将学术、文艺重新纳入经世致用的轨道。他们对浙西词派的空寂，阳羨词派的浅率叫嚣的形式主义倾向颇不满意，便要求词发挥反映时代、社会政治内容的思想感情，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综上所述，清朝 300 年学术的变迁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清初，属草创时期。学者多为明朝遗老，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经历了明亡的流离战乱之痛苦，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们的学术特点是博大，对哲学、史学、经学各方面都重新思考、审视，其学术和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多经世治用之学。第二时期是康乾盛世，是中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这时天下大定，纲纪大张，经济恢复，生活稳定，给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哲学上，理学为指导思想，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等人推崇朱熹，传理学之道，维护纲常名教，使清朝统治更为巩固。学术上，汉学大兴，惠栋、戴震从事音韵、文字、训诂、考据之学，学术研究有很大成就，涌现出煌煌巨著，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则脱离，学者不问政治，埋头故纸堆中，有遁世、避世趋向。文风是姚鼐桐城派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以理学为基础，以文统维护道统。从诗风上说，王士禛的神韵说追求闲淡悠远的意境，沈德潜的格调说追求温柔敦厚的诗教，要有助教化；一个以美为中心，一个以善为宗旨。词学则以朱彝尊的浙西学派归于雅正醇厚的风格。虽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但是在大兴文字狱严密文网的控制下，学术特点是专、精，与政治现实的关系是遁世。第三时期是清朝的衰落时期，嘉道咸以降，清朝内部政治腐败日益严重，经济上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经济衰退、停滞，外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西方文化的输入，这就引起学术上的追求新颖，要求变革，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密切起来，经世致用思想也活跃起来。经学方面，今文经学兴起；史学方面，兼治辽金元史；地理学方面，边疆地理、外国地理研究兴趣浓厚；文风诗风方面，对桐城派、神韵说、格调说并不满意，袁枚的性灵说逐渐有人响应，如龚自珍；词学方面，张惠言的常州词派讲究有所寄托，寓意现实政治和历史，写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些都是要求变革的反映。

《词选·序》，中华书局 1957 年，第 2 页。

《词选·序》，中华书局 1957 年，第 2 页。

《介存斋论词杂著》，人民出版社 1959 年。

晚清，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中开始的。第二章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改革思潮

第一节 嘉道年间政治腐败的显露

清朝在其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多年间，从中央到地方，很出了一些名臣、清官，在中央敢于直谏，地方为官以清廉著称，如汤斌、尹继善、于成龙、张伯行等。乾隆后期，以宠臣和珅为代表的中央大官僚们，受贿勒索成风，大臣们都明哲保身，如泥塑菩萨，端恭稳坐，碌碌无为。为了保住自己的高位，常以顺从、谄媚为事，对皇帝“多磕头少说话”。地方官吏则欺压百姓，敲骨吸髓，激起民变。嘉庆元年（1796）湖北襄樊地区发生白莲教大起义，蔓延到四川、陕西、甘肃、河南四省，长达九年，这是清朝由盛到衰的标志。白莲教农民大起义便是以两湖总督毕沅、巡抚福宁、布政使陈准三人朋比为奸、敲诈勒索为主要原因的。洪亮吉上疏指出这是“官逼民反”。

曹振鏞，累官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正。他给道光皇帝出主意，教他“中外奏章皇上无庸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道光帝就照着这样做，臣下有一极小错误，便严斥罚俸降革，弄到后来大家都矜矜于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及洪秀全、杨秀清起义，还互相隐讳，莫敢上闻。下面报喜不报忧，上面皇帝自然闭目塞听。这种吹毛求疵的风气也延及科举考试，考试讲究卷子的书法，曹振鏞挑剔破体帖字，不问文之工拙，但作字整齐无破体者，即置上第；若犯一帖字，即失翰林。这种重书法，不重真才实学的选拔人才的风气使末学滥进，豪杰灰心。

一批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聚集在京师，对国势日益衰落、政治腐败黑暗极为担忧，常以文会友，诗酒唱酬，议论国家大事，抨击时政，成为风气。其中的人物有程恩泽、苏廷魁、朱琦、陈庆镛、何绍基、吴嘉宾、梅曾亮、宗稷辰、潘德舆、臧纡青、江开等，“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他们的议论使京朝当权的贵族大官僚也畏惧三分。他们敢于直谏，最著名的是黄爵滋道光十八年（1838）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要求严禁鸦片。陈庆镛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申明刑赏疏》，参劾琦善、奕经和文蔚，“一疏劾三贵人，九重为之动容，天下想望采风”，直声震天下。这种名士议政的风气说明乾嘉以来万马齐喑的沉寂空气已经逐渐冲破，封建士大夫中要求改革的政治势力相对增强，这也是经世致用思潮推动的结果。在文化思想方面，有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今文经学自东汉以后沉寂了千年之久，清朝提倡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庄存与。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号养恬，江苏武进人。乾隆时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行走，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时，宋明理学，高踞庙堂，

《曹振鏞之误清》，《清朝野史大观》第7卷，上海书店1981年，第2—3页。

《曹振鏞之误清》，《清朝野史大观》第7卷，第2—3页。

《水窗春呓》，《鸦片战争》第1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338页。

梁章钜：《陈颂南给谏》，《浪迹丛谈》，中华书局1981年，第45页。

东汉考据学，如日中天，庄存与以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认为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需要以经术有补益于时务，便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研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他不守汉宋门户，兼采汉宋，剖析疑义，发挥微言大义，是为了取法致用，重在经世。他仅是提倡揭橥今文经学，内容还未充分发挥。刘逢禄、宋翔凤是他的门人。刘逢禄（1776—1829）江苏武进人，庄存与的外孙，他将今文经学中的大一统、张三世、统三统、辨名分、定尊卑、明外内、举轻重等公羊义例，直接援以论政，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就更为明显。龚自珍、魏源都受教于刘逢禄，都用今文经学讲经世致用，讲夏商周因革损益，讲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变革，为政治改革而阐发经义的治经方法更进了一步。士大夫以志节相砥砺，要求士人有廉耻，积极参与政治，寄希望于中枢大臣有作为。同时他们又拿起笔，议论时务。道光六年（1826）建慈仁寺为顾炎武祠，原来祭祀礼的祠堂是祭祀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这一改动也是晚清士林风气变化的一种迹象和征兆，说明人们正在颂扬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传统。在学术研究方面，人们开始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尤其是外国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鸦片战争后，出现了一大批书籍，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夏燮的《中西纪事》、梁廷枏的《夷氛记闻》等。还有包世臣论述漕运、盐政、银荒、鸦片等问题的作品，魏源为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编》等，究心于水利、漕运、盐政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这都是学术研究经世的新倾向。

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改革派涌现出来，其中思想敏锐、言论激烈的首推龚自珍，著述丰富、视野开阔的是魏源。他们两位是晚清思想界闪耀明亮的双星，史称龚魏。下面我们逐一加以描述和评论。

第二节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字璚人，号定庵，更名巩祚，又号羽山民，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父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亲丽正，官至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母亲段驯（淑斋）是著名经学家段玉裁的女儿，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出生于杭州东城马坡巷，7岁时，母亲便在帐外灯前教他背诵唐诗和清吴伟业的诗。12岁时，便受外祖父段玉裁指点，学习音韵训诂之学，为研究经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6岁到北京，常到住处附近法源寺中去游玩，叔外祖父段玉立（字鹤台）跟踪而至，一老一少，僧人戏呼为一猿一鹤，说明他少年性格豪放，不受拘束。21岁父亲任徽州知府，随行，在地方上看到政治腐败的现象，23岁便写了一组《明良论》文章揭露政治腐败，抨击专制，锋芒逼人。25岁时，父亲任苏松太兵备道，随父上任，以诗文一册请教苏州王岂孙，王说：“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担心他“口不择言，动与世违”，加以劝告，龚不为所动。27岁中举，随后五次会试均落选，考场遭遇使他深受精神上刺激，说“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他说：“气寒西北何

《定庵先生年谱外记》，《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48页。

《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65页。

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以落月自比才气被埋没，非常自负，又异常沉痛，对科举制度录用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极为不满。30岁任内阁中书，熟悉内阁档案，了解清朝典章制度演变沿革，著《东南罢番舶议》、《西北置行省议》。又任国史馆编纂校对，和徐松、程同文等地理学家研究西北地理。29岁时和魏源拜刘逢禄为师，研究今文经学，曾为清朝今文经学创始人庄存与写过碑铭，同宋翔凤、庄绶甲等结识友好，可见他同常州学派（今文经学派）的关系之深。

龚自珍38岁中进士，仍留京任礼部主事，主客司主事等闲散官职，提过一些改革政治的建议，不被人重视。他和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同为禁烟派，议论激烈，得罪权贵，受到排挤。1838年，叔父守正在礼部做官，按例要回避，便借此辞职归里。他从北京出发到杭州，中经9000里，写成《己亥杂诗》315首，将他的一生经历全吟成诗，别具一格，是自传体的诗歌。他回到杭州任紫阳书院讲席，又到丹阳云阳书院教书，想到梁章钜那儿去参加抗英斗争，未成行。1841年暴卒于丹阳。他相信佛教，拜江沅（铁君）为师，深研佛理，崇天台宗，佛教哲理对他思想影响很大。

哲学

龚自珍在哲学方面基本上是相信天命的。他说：“儒家之言，以天为宗，以命为极，以事父事君为践履。”这是儒家的思想框架和理论体系，认为富贵和贫贱是命定的，是人力难以违抗的。而天道是变化的。“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一匏三变，一枣三变，一枣核亦三变。”“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这里说的是事物是变动、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动是一正一反，相辅相成，变到后来又和开始时相同，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其规律为立一反一初。这种立一反一初的规律是一个合的命题，这是受《老子》、《易经》思想影响的，也和《春秋公羊传》治乱三世说有关。至于这种规律是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还是螺旋形上升，他尚未表达清楚，因此，可理解为朴素辩证法思想，也可理解为历史循环论。他还认为人们要认识事物变动的规律，掌握它，运用它，这是君和圣人的事，君和圣人要用主观努力来适应客观变动着的世界。“天用顺教，圣人用逆教，逆犹往也，顺犹来也。”他解释说：“生民，顺也。报本始，逆也。……乱，顺也；治乱，逆也。”这里又强调了人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在这天人相交相承的顺逆合一的运动中演进的。治理的原则是：“教王者上勤天，教子上勤父，教臣上勤国君。”这仍是儒家的忠孝伦理原则。而国君应当如何？他说：“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实欲以自售其学；欲吾君之烛万物之隐，实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赏罚予夺，不爽于毫发，实欲以自偿其功。”这就是要求皇帝通古今之故，烛万物之隐，在礼乐刑政赏罚予夺方

《秋心三首》，《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79页。

《尊命》，《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3页。

《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6页。

《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6页。

《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6页。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7页。

《尊命》，《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4页。

面，即要明察秋毫，又要做得适当。这样，君便是懂得天命了。而对臣子和民来讲，又当如何呢？他说：“其言有嫉焉，有慝焉，抑亦有歆歔焉，抑亦有憾于无如何之命而卒不敢悍然以怨焉！”人民可以有嫉妒、愤慨、感叹万分的时候，但是最终还是不敢有怨恨。因为这是命定的啊。他用天命束缚住了臣民的思想，可提意见但不准造反。传曰：“发乎情，止乎礼义。”龚自珍套用此话说：“夫我也，则发于情，止于命而已矣。”

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奉天而法古。龚自珍相信今文经学，继承儒家正统文化，相信天命，相信天人感应说。但是，他则强调变化的规律，谈到人们用逆教来对付天的顺道，要求君要适应事物变动的规律进行政治改革，这无疑是在进步的。他未敢突破忠孝伦理思想，不敢犯上，这是他的思想局限性。他只是一个改良派，是补封建主义之天的补天派。

历史学

龚自珍对史学有很深的研究，在史学理论方面也有卓越的见解，对人类社会发展以及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有很清晰而深刻的见解，这是对清朝历史学长期停滞在考据学阶段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他认为孔子是历史学家，编写《春秋》，是史官。史官的社会职能，是保存历史掌故材料，对历史事件作出解释并加以评论，评论中包括褒贬品评人物，以为史鉴。而国君在治理国家时最需要懂得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因此，前朝后代，朝代可以变迁，礼乐刑法这一套经验不能割断，这样君主对前朝的史官应当十分尊重，待他们为上宾，要听取他们意见，由他们来讲史，解释历史的精神实质，历史的精髓。他说了一段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他是从反面来说明历史学的重要性。历史学对于国家民族的兴衰、道德伦理的培养，人才的教育、家族的延续都有着极重要的关系，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道德规范、人们的品德情操气节，都是靠研究历史学而来。

龚自珍提出一个观点：六经皆史。这个看法并不是今文经学的看法，而是浙东史学家章学诚的观点。龚自珍说：“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素王，他的政治理想全倾注在“经”中，经是孔子之道的理论依据。龚自珍六经皆史说，降低了经书的神秘性，把它还原为“史料”，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

历史学有什么用？他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即是说要懂得真理，一定要研究历史。而史官是有独立的人格，不是谄媚朝廷的奴才，而是谏官，阐发历史规律，公开议论，供皇帝借鉴，皇帝不能将史臣看为奴才，史臣本身也不能沦为仆妾、俳优狗马那样，“仆妾色以求

《尊命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5页。

《尊命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5页。

《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2页。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1页。

《尊史》，《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1页。

容，而俳优狗马行以求禄，小者丧其仪，次者丧其学，大者丧其祖，徒东厕于仆妾、俳优、狗马之伦，孤根之君子，必无取焉。”这就是历史学学者的史德。应当“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难御侮，而不死私仇。”事君，但君主不能随便将史臣呼来喝去当奴隶，也并非为满族贵族一家私姓而效力尽忠。

龚自珍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有过细致的描绘和分析，他认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这个论点是很惊人的。他描述第一阶段是倮人、毛人、羽人、角人、肖翘人，群居群婚，后来为配偶婚，人与人处于平等地位。第二阶段，群体公选自己的领袖，氏族首领又是宗教首领，他和天相通，执行天的意志。氏族以图腾为崇拜，有的以龙为官，有的以云纪官，有的以鸟纪官。这是人神相通的阶段。第三阶段政事败坏了，人神不通了，“比其久也，乃有大圣人出，天敬降之”。这时候才回到君权神授说。他的这一段研究说明国家不是自来就有的，而是有一个由无国家到有国家的过渡阶段，这些探索更加接近历史真实，剥去了君权神授的神秘外衣。

他又对中国文化发展史作了概述：“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人们文化生活的发展，先是物质生活的安排，其次是政治制度的创建，然后才是人生哲理的领悟。从文化角度来看，物质生活是文化表面层次，物的层面；政治制度的创建是文化的中间层次，是物与心相结合的层面；人生哲理的探求是文化核心层次，是精神思想层面。人们的生活是天赐的，在大自然中谋食谋货，经济生活使人能活下去，有了基本的保障。人们延续地生活下来，便要感谢神，感谢父母，因此，有祭天，祭祖宗。祖宗去世了成了鬼魂，要祭鬼，以上便是礼仪。社会生活组织国家，百官俱备，政治生活中有管理者，还要有宾师，对人们进行教育，培养道德品质，使人知道怎样做人。兵刑礼法的产生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国家由内到外，由夏到夷，达到大一统。他将人类文化生活的发展描绘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朴质到文明，由乱到治，刑法由轻到重、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从中探索许多特点和规律。

他在历史研究中，从宏观角度，探索出一些历史发展的规律，既能说明历史，又能指导现实政治生活，将学术和经世紧密结合起来。譬如他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提出土地分配状况一开始君、臣、民各得一份，大体平均，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发展下去，便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他说：“原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这成为朝代兴衰的标志，一个朝代临到后期在农民大起义中崩溃败亡，成为封建社会周期性政治经济危机总爆发的一种必然的表现。又如他认为对士的尊重与否，也是一种朝代兴衰的测量器。他说：“士气申则朝廷益尊，士业世则祖宗益高，士诗书则民听益美。其言如是，

《古史钩沉论四》，《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29 页。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27 页。

《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3 页。

《五经大义终始论》，《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41 页。

《平均篇》，《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78 页。

是善觐国哉。”对士尊重，提拔人才，这是国家兴旺的标志。如果士人都跑到四野，远离朝廷，那么，这是国家衰落的征兆。再如，他认为法需要改革：“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认为历史发展有三个阶段：据乱，升平，太平。倒过来即有盛世、衰世、乱世。这种发展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君主制大前提不能变动，在此大前提下，政策要随时代发展相应地改革，如礼法要由繁改得简一些，科举制度考八股文的办法也得改一改等等。他在嘉庆道光朝人们都在文恬武嬉沉醉太平之时，便告诫最高统治者说：种种迹象表明，现今已到衰世了，发出“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的哀叹，可见他的史识之深邃。

文学

龚自珍在文学方面最有成就的是诗歌和散文。他的诗歌和散文与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他政治上揭露清朝政治腐败，关心和同情人民的疾苦，反抗外国的侵略行为，向往未来理想社会，因此，在诗歌和散文中贯穿了他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批判的思想，极富有战斗性。他的诗歌和散文都是对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鞭挞和控诉，是对人民痛苦的关心和同情，对民族反侵略的斗争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由于封建专制文化的高压政策，他的诗文表现出一股傲骨和奇气，一种讽刺和尖酸泼辣刻薄的严厉口吻，一种真挚的感情流露。

35岁时，他写过一组诗，其中一首为：“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圣者胞与言，夫岂夸大陈？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宗周若蠢蠢，嫫纆烧为尘。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他引用宋代哲学家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类都是同一天地父母所生，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特别同情人民的遭遇和苦痛。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在人们饮酒宴乐之时发出了国家衰落，遇到民族危机的信号，寓意很深，发人猛省。

龚自珍的散文，一类是议论文，他将丰富的经学知识、史学知识、政治见解结合起来，引用公羊义例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文章锋芒锐利，常常引得顽固派切齿痛恨。另一类是散文记叙文、传记文等，他的笔调清新，用词华丽，富有联想，情景交融，作者思想感情流露很真挚，有极大的感染力。如《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一文，是他晚年重过扬州的记述文，一开始写道：“晓雨沐屋，瓦鳞鳞然，无零髻断髻”，这还是乾隆盛世繁华盛况的遗迹，依稀可寻。他笔锋一转，一面写朋辈欢聚应酬的热闹场面，居然嘉庆中故态，一面用冷隽的笔触描画出“惟窗外船过，夜无笙琶声，即有之，声不能彻旦”。透露出乾隆盛世一去不返了。扬州已处于初秋，清朝已走入衰世，作者已进入老年，一种对清朝衰落的感慨和对个人境遇的凄凉心境自然流露出来。另一篇《病梅馆记》说梅以曲为美，其曲都是人为地绳缚使其曲，以至于病。作者毁盆，解绳缚，埋在土地上，让梅自由伸展，恢复它的自然的美的姿态，

《乙丙之际塾议第二十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2页。

《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页。

《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册，第7页。

《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85页。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85页。

以疗其病。文章表达了他对封建礼教束缚人性的痛恨和厌恶，全文用的是比喻，立意新颖，议论思想深刻。还有一篇《杭大宗逸事状》，杭大宗即杭世骏，杭州人，是一位经学家、史学家，上疏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被部议处死，赦放归里。一年乾隆下江南，大宗迎驾，过了几年，乾隆又下江南，大宗又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全文短小精悍，不到六百字，全用冷笔，曲笔，只有记述，没有评论，却让人们体会到乾隆帝的凶狠和残忍，揭露了专制制度的罪恶。还有一篇著名的散文《尊隐》，将清朝进入衰世描绘得细致、精确，比喻生动、恰当，富于联想，他写道“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鼯声，夜之漫漫，鷓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其中情景十分形象，对比强烈，有声有色。

龚自珍的词写得非常好，有人评价是：“词胜于诗”。他的词宣泄了自己的忧郁感、孤独感，也流露了才气。他经常用箫剑来寄托自己的志向，如《湘月》：“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这首词是作者21岁离京到杭州泛舟西湖写的，反映了作者的理想和抱负，“侠骨幽情箫与剑”是豪爽胸怀的写照。另一首《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漠漠春芜芜不住。藤刺牵衣，碍却行人路。偏是无情偏解舞，濛濛扑面皆飞絮。绣院深沉谁是主？一朵孤花，墙角明如许！莫怨无人来折取，花开不合阳春暮。”

这首词说明嘉道年间，时代衰落了，有了人才也显示不出来，不能为人们发现、提携，表露了作者的一种孤独之感。

在当时的文坛上，桐城派古文、江西派的诗、理学很盛行。龚自珍对桐城派作文讲究义理很反感，认为诗文写作要讲究“情”，表达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他写了《宥情》一文，说古人将情欲放在一起，许慎曰：“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一讲情便联系到欲。宋儒讲存天理，灭人欲，情欲受到压抑。龚自珍认为应当宽恕情欲，正当的感情应自然地抒发出来，他说：“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

他一反宋儒压制情欲，而宽恕情，甚至尊重情欲了。他还强调要治人情，就要关心民情、国情，关心民众的文化心理状态，所以龚自珍论“情”不单单是个人的感情，他认为：“凡声音之性，引而上者为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于旦阳者为道，引而之于暮夜者非道；道则有出离之乐，非道则有沉沦陷溺之患。”这里强调文学作品要抒发个人情感，而这种情是能引导人们向上向前的，而不是使人沉沦陷溺的。

要有情，便要崇真，有独创性，不是模仿、抄袭、千篇一律。龚自珍讲

《杭大宗逸事状》，《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61页。

《尊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8页。

《湘月》，《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64—565页。

《鹊踏枝》，《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59—560页。

《宥情》，《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0页。

《长短言自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32页。

《长短言自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32页。

究“真”，甚至认为儿童的童心才是真性情，这和袁枚性灵说及上溯到明朝李贽的童心说，是有相似和继承关系的。在龚自珍的诗句中能找寻到许多赞扬童心的句子。

在艺术表现方法上，龚自珍吸取了屈原、陶渊明、李白的风格，出入仙侠，体兼庄骚，儒侠道结合，富有浪漫色彩，形成一种奇异瑰丽、生涩冷峻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是在封建专制文化高压政策下迫不得已的表现形式，所以，他的诗文寓意含蓄，甚至比较晦涩，表达时用象征、暗喻、曲笔、借古喻今、借经论政种种手段，都是有苦衷的。他对那种琐碎的考证文章，空谈性命的理学说教，春晨秋夜的套体词赋、游戏之言，清之官的书法康诗，以及万喙相因、如山如海的八股时文，都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些文章是误人子弟的。

从上章我们叙述的清朝文化系统结构来看，龚自珍对正统文化有一种立异的倾向。他反对崇拜朱熹理学，认为“千古论晦庵者，当以陈同甫对孝宗之言为定评定讫，此外不足较也。”陈同甫即陈亮，他是主张功利，反对朱熹空谈理性的。汉学崇尚考据，龚自珍很尊敬段玉裁、王引之（段玉裁是他外祖父，王引之是他座师）。他的古文经学是有相当深厚的功底的，但是，他不满足于仅仅解释经义，而要进一步探索“微言大义”，用今文经学的治学方法，将经、史的研究同当世时务结合起来，研究现实问题。桐城派的文章讲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结合，龚自珍和他的朋友魏源、汤鹏等摒弃桐城派古文的条例，冲破它的束缚，而创造一种新体散文，不信文法，贵写真情。当时流行江西诗派，而龚自珍则倾向袁枚的性灵说。以上的特点综合起来，便可看出他的文风与正统的迥然不同，与时下流行的各异，他提倡一种议政的风气，一种学术为经世服务的风气，倡导一种慷慨激励、志业才气、凌轹一时的风气。这种士林风气的转变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是晚清文化思想的新征兆，是士大夫有识之士的一种负有历史使命的责任感的表现，龚自珍提倡的这种风气呼唤着新时代的到来。当时诗人张维屏评论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后来梁启超评论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由此可见他的思想影响的深远。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诗人柳亚子、高旭、苏曼殊都崇拜龚自珍的诗，柳亚子吟诗道：“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只愁孤负灵箫意，北驾南舫到白头。”对龚自珍的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第三节 魏源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后易名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生于湖南邵阳隆回之金滩村一地主家庭。父亲邦鲁，在江苏担任过嘉定县巡检、

《语录》，《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34页。

《国朝诗人征略》。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9册，第54页。

《定庵有三别好诗，余仿其意作诗三截句》，《磨剑室诗词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2页。

宝山县主簿。家道中衰，家境困苦，他从小沉默寡言，嗜好读书。1819年考试不第，与龚自珍同师刘逢禄学今文经学。1822年中举，向著名理学家归安姚学 请教宋学。曾就馆于直隶总督杨芳家，考察古代历史遗迹、山川地势，与著名地理学家徐松相识，研究西北地理。1825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邀请，辑《皇朝经世文编》，提倡经世之学。1829年任内阁中书，广泛阅读内府档案典籍，为研究清代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和林则徐、龚自珍、黄爵滋等人一起议论时政，主张严禁鸦片，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曾在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幕下，参与盐政、漕运、赋税、治水等政务，提有许多建议，有些被采纳实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841年在两江总督裕谦幕下当参谋，亲身参加了浙东反抗英国侵略军的战役，英军攻陷镇海，裕谦投水自杀，他感慨万端，埋头著《圣武记》，用清朝武功激励人们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他又受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所编《四洲志》基础上，广泛搜集外国史地书籍，编成《海国图志》一书，主要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并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抵御外侮的战略和策略。1842年两书同时完成。1845年他已52岁，始中进士，任江苏东台县知县、兴化县知县和高邮知州。1849年兴化县遭水涝灾害，他领导人民护堤保收，得到群众赞扬。1853年在高邮办团练，参与镇压太平军，后因延误驿报，被革职。晚年皈依佛教，继续完成《古书微》、《元史新编》等著述，1857年歿于杭州，葬于西湖南屏方家峪。

魏源和龚自珍是好友，世称龚魏，他们都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具有爱国主义思想，都主张严禁鸦片，积极反对外国侵略，政治上要求改革，议论时政，共同研究经学，宗今文经学，研究历史、西北地理，又都喜好佛学哲理。但是，他俩又有许多不同之处。一、魏源出身于一般地主家庭，家境较困苦，龚自珍出身于三世百年的官僚家庭，是贵公子，性格孤傲，放荡不羁，言行不拘细节，放言高论毫无顾忌。魏源则行为谨慎，沉默寡言，对人宽厚、质朴。二、魏源社会经历和龚也不相同，龚长期在京都任职，没有处理过什么大事，魏源则任陶澍、林则徐、贺长龄、裕谦幕僚，参与治理政事，办理政务，躬身履践。龚自珍中进士后，也外放到地方当知县，但他没有去，仍滞留京都。三、龚自珍爱发表议论，常有奇思，抨击权贵，不留情面，魏源曾劝他与人相交，要收敛锋芒，温和一些，以免惹出祸患，龚不为所动。四、关于政治改革，龚自珍提的意见往往是政治制度、大政方针一类的，如君权与宰辅之间的关系、军机处和六部职权范围、土地分配方案、西北置行省议、礼部礼仪方面的改革、科举制度的改革等，魏源偏重于地方行政，如漕运、盐政、赋税、水利等方面的治理和改革方案。五、在学术方面，龚自珍长于理论分析，如经学理论、史学理论，却没有留下巨著。魏源则埋头从事大部头的经学、史学专著。六、龚自珍的诗声情烈沉，如万玉哀鸣，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而魏源的诗冲夷秀旷，宕逸入神，温钝质朴，现实主义的气息较浓。可见两人的个性与风格又如此不同。

哲学

魏源的哲学思想比较复杂，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进化的思想是其主流，还夹杂着唯心主义的思想，晚年相信佛教哲理，唯心主义的思想则成为主要倾向。

在知行观方面，他强调实践，主张行先知后，这是唯物论的认识路线。

朱熹理学认为知先行后，王阳明心学知行合一，以知代替行。魏源则强调认识必须有实践经验，才能获得知识。他曾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海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这一思想直接和孔子所说的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思想相对立。他认为聪明不是天生的，而要靠后天专心致志勤奋学习，才能达到通神。他认为求学就要问，要虚心向人请教，勤问，群智胜于独智，要吸取大家的智慧，说：“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

根据这一思想，他便说古代经学、政事、文章三者是合一的，即道、治、文的合一，后来，学术和治术分开了，学术脱离了现实政治，便形成汉学和宋学，他提出问题：“浮藻短订可为圣学乎？”又问：“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因为宋学空谈心性，汉学文字考证都不足以治天下，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只能称为腐儒。于是他用今文经学的观点，说学习经书要发现它的微言大义，用来治理国家，将经书的学习同治理国家联系起来，经术与治术合一，而读书的目的是要济世救民，即通经致用。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重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何耶？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这种看法是很卓越的辩证法思想。事物在矛盾斗争中发展，这种斗争他称为“逆”。“真人逆情以反气，圣人逆情以复性，帝王逆气运以拨乱反治。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大哉易之为逆数乎！五行不顺生，相克乃相成乎！”根据这种思想，国难出人才，忧患出智慧，魏源要人们处在国家内忧外患的环境中，更有充分的信心和毅力，奋斗拼搏，扭转乾坤。矛盾要转化，这要看条件是否成熟，时机是否到来，这就要等待，时机一成熟，要抓住时机。“禾未熟而登场，获者弃之矣；果未熟而登盘，食者吐之矣。”这就是条件尚未成熟，条件不成熟急于去做，就要失败，遭到挫折。“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乱；化未熟而急变俗，俗必骇；虑未熟而急图功，功必阻，德未熟而急知名，名必辱。”因此，要提倡改革，而这种改革又要考虑各种条件，不能蛮干，不能超越条件，“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用人太骤，听言太轻，处已太峻，亦有能发不能收之者矣”。他是相信人定胜天的。“人定胜天，……祈天永命，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岂天所拘者乎？”自我造命，掌握自己的命运，发挥主观能动性，冲击了天命论的思想枷锁。

魏源批判老子和庄子的将历史倒退到上古社会去的思想。老子主张“小国寡民”，庄子主张与世无争，过恬静的生活。魏源说：“庄生喜言上古，

《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 1976 年 3 月，第 7 页。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 35 页。

《魏源集》上册，第 37 页。

《默觚上·学篇十一》，《魏源集》上册，第 26 页。

《默觚下·治篇二》，《魏源集》上册，第 39 页。

《默觚上·学篇十三》，《魏源集》上册，第 31 页。

《默觚上·学篇十三》，《魏源集》上册，第 31 页。

《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册，第 45 页。

《默觚上·学篇八》，《魏源集》上册，第 21 页。

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粃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因为，“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客观形势在不断变化，原来的制度便发生了变化，古时是上古时代的具体情况，后来有了战争，有了礼法，开阡陌，废井田，选拔人才由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为考试，租税制度由租庸调变为两税法，又变为一条鞭法，这些变化都有它的道理在。魏源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因此，“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得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结论。有了战争，只有“以兵甲止甲兵”。有了犯罪行为，只有“以刑狱止刑狱”。有力地驳斥了顽固派的复古思想，坚信后胜于前，今胜于古。

魏源谈变革，只是除掉封建社会的法律弊病，而不触动根本大法的本身。“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如初矣。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由此可见他变法思想的局限性。至于历史变易的原因和动力，他归之于人的“心”力；朝代兴衰的规律，他又归之于“气运”，这些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解释了。

历史学

魏源在道光六年（1826）完成《皇朝经世文编》共120卷。这是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清朝硕公庞儒、俊士畸民之言而成的集子，有奏议、论文、书札等，内容主要是有关军国大政、国计民生等切合时务的文章，分为八类，即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这八类便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思想各个方面，实际上是具有史志的性质。在编选的原则上，他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总的精神是要联系实际，这就是他通经致用思想的具体表现。这一思想后来又又延伸到研究外国史地，学习西人长处，以反抗外来侵略。他在编选标准方面考虑到实用，如天文历算、音律等务非当急，人难尽通，便略焉勿详。这部类书引起了国内士人的重视，以后的学者仿此体例又续编了这类书，计至民国初年上海经济文社编的《民国经世文编》，共16种。在《皇朝经世文编》中，共收魏源的文章17篇。

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先后完成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两本巨著。这两部巨著的写作都是和鸦片战争后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魏源受到很大的刺激，出于爱国主义的极高度的热情，他发奋著书，以示国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抵抗，并了解世界情势，振新政治，改革政治，以图国家强盛。

《圣武记》共14卷，约40万言。魏源撰写《圣武记》的准备工作始于道光九年（1829），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的时期。他能看到内阁收藏的档案、典籍，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又遍读士大夫的私人著述，故老传说，对于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9、48页。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页。

《默觚下·治篇十四》，《魏源集》上册，第72页。

《默觚下·治篇四》，《魏源集》上册，第46页。

《皇朝经世文编·叙》，《魏源集》上册，第156、157页。

清朝前期以及国初数十重大事件，了解得比较清楚，并且从中探求到国家的兴衰，人才风俗的进退，多年积累的史料为撰写《圣武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失败，他感慨万分，想撰写一本有清一代武功的历史来激励人们意志，抵御强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强盛的国家。“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骋驰往复”，写成全书。全书用记事本末的体裁，将清朝军事武功逐一叙述，后一部分是作者的议论，就练兵、整军、筹饷、应敌的策略等，发表了积极的建议。书中写了《道光洋艘征抚记》上下两章，是鸦片战争史。这是当代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忠实记录，具有极宝贵的史料价值。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高度赞扬了林则徐的反侵略行动，说他不愧为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他又深刻地指出战争失败是内政腐败的结果，鞭鞑了顽固派的畏敌妥协思想。“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他又描述了广州三元里人民聚集起来反抗侵略者的正义行动，书中对此作了肯定的评价。《圣武记》的出版受到了全国人民的重视和欢迎，激发了人们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这部巨著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在苏州居住时经过一次修订，道光二十六年扬州居住时又经过一次修订，成为定本。道光三十年此书流传到日本，在日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龚自珍手写楹帖题《圣武记》一书，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

《海国图志》成书亦在1842年。是年冬，在扬州完成了50卷。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增订为60卷，刊行于扬州。到咸丰二年（1852）又增补成100卷，刊行于高邮州。先是林则徐在广州时，曾请人译述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辑整理为《四洲志》。1841年林则徐因鸦片战争获罪被革职，发配到新疆，途中经过江苏江口（今镇江）与魏源相晤，魏源曾写诗道：“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林则徐将《四洲志》稿子给魏源，希望他能扩编成书，魏源没有辜负林则徐的嘱托，以《四洲志》为蓝本，又搜集了大量的记载西方国家的史书和地图集，于1842年冬天便在扬州完成了50卷的初稿。他说明此书编辑的性质属于“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工作，因为此前还没有人做过研究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工作。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闭关自守，八方之外，存而不论，眼界很狭隘，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中国以外都以夷蛮视之，很轻视四夷。结果，鸦片战争失败。他认为盲目骄傲或盲目蛮干都不行。一方面要有爱国热情，另一方面要有西方各国的知识，才能对付外国，战胜侵略。所以，魏源说此书编写宗旨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痍，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才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

《圣武记叙》，《魏源集》上册，第166页。

《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魏源集》上册，第187页。

徐琦：《清稗类钞》第28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0页。

《江口晤林少穆制府》，《魏源集》下册，第781页。

《海国图志》，《魏源集》上册，第207页。

《海国图志》是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和地理的书籍，又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加以介绍，实是一部内容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更是一部反抗侵略、谋求祖国富强的政治哲学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中国封闭自守状态即将结束，中国的先进分子已开始自觉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适应新时代到来的要求。

关于《海国图志》这部书的影响，王韬曾誉为是“谈海外掌故”的“嚆矢”，钱基博称为“国人谈瀛海故实者之开山”。梁启超评论说，魏源所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赞誉此书“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智识，实自此始”。洋务派根据魏源提出的加强海防的建议创办了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维新派康有为反复阅读《海国图志》，并以此书为讲西学的基础。这部巨著和《圣武记》于1850年随船传至日本，日本先后出现了《圣武记》的三种译本，《海国图志》摘译翻刻共20多种版本。当时日本正处在幕府末期，一些维新爱国志士如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横井小楠、梁川星岩等读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等书籍后，加强了海防观念，获得了世界历史地理新知识，促进了革新变法思想的产生。《海国图志》输入日本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是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的一桩值得大书特书的佳话。

魏源撰写的最后一部历史著作作为《元史新编》。此书完稿于咸丰三年（1853），总计95卷，100多万字。他去世以后，魏光燾请人整理补订，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印发行。《元史新编》的撰写动机有二，一是道光咸丰年间，外国侵略加剧，英国从东南海上侵扰，俄罗斯在西北边疆兼并，这样便引起学者对西北边疆地理和蒙古历史研究的重视，成为风气。近代元史学的兴起，实是外患刺激在学术上的一种反映。二是《元史》在明时编撰成书，史料疏缺，错误极多，受到史学家的指责和批评。魏源在撰写《海国图志》时，发现蒙古史西北疆域写得特别芜蔓疏陋，便“旁搜四库中元代文集数百种，及《元朝秘史》，芟其芜，整其乱，补其漏，正其诬，辟其幽，文其野，讨论参酌数年”，完成了《元代征伐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西北疆域沿革图》等篇。因此，他在完成《海国图志》增订工作后，便开始《元史新编》的工作。魏源编写《元史新编》，也有总结元朝兴亡的历史教训以告诫清朝统治者的用意在内。

魏源在分析元朝一代兴亡的原因，认为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民族分为四等，蒙古贵族重用蒙古人、色目人，排斥汉人、南人。魏源说：“《礼运》言：三代之治天下为公。公则胡越一家，不公则肝胆楚越。”希望能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胡越一家，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国家便能强盛。元朝初期在用人上还不分畛域，中叶以后，民族歧视政策的结果造成“贫极江南，富归塞北”之怨，招致韩山童农民起义。“天道循环，物极必反，不及百年，

《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第207、208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273页。

钱基博：《近三百年湖南学风》第1卷，岳麓书社1985年，第3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7册，第323、324页。

《拟进呈元史新编序》，《古微堂集外编》，选自精刊《魏默深文集》卷三，光绪四年淮南书局刊。

《拟进呈元史新编序》，《古微堂集外编》，选自精刊《魏默深文集》卷三，光绪四年淮南书局刊。

向之混一者，复成辐裂，乘除胜负，理势固然哉！”这里，他含蓄地告诫清朝满族统治者不要排斥、倾轧汉族地主官僚，消除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以挽救时艰和政治危机。因为清朝的民族矛盾和元朝的民族矛盾有相类似之处，而且，这时，国内已燃起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火了。魏源对元朝末年形势有一段描述说：“如外强中干之人，躯干庞然，一朝痿木，于是河溃于北，漕梗于南，兵起于东，大盗则一招再招，官至极品，空名宣敕，逢人即授，屯膏吝赏于未炽之初，而曲奉骄子于燎原之后，人心愈涣，天命靡常，二三豪杰魁垒忠义之士，亦冥冥中辄自相蚌，潜被颠倒，而莫之所。若天意，若人事焉？乌乎，孰使然哉！”他用元朝溃败的景象告诫清朝统治者要有危机感，不要一意孤行，重蹈覆辙。

魏源撰写的《元史新编》是研究元史的重要著作，在史料上有所增订、补正，在编撰体例上有所创新，在研究方法上也为研究元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即在研究国史时，大量运用外国的史料记载。后来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便是使用外国记载的史料，使元史更充实，更准确。后来王国维、陈寅恪研究元史更掌握了外语，考证研究便更细致，更精确了。

魏源史学研究的概况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总结。一，古与今。过去史学研究的热点是古代，清朝是禁区，很少有人去研究。魏源历史研究重点在今，《圣武记》讲的是有清一代武功，又用两章篇幅讲鸦片战争，是当代的历史。二，中与外。过去史学者对外国茫然无知，了解国外情况太多，怕有通番嫌疑，闭封的对外政策使人们不屑于去了解国外情况，把外国看成蛮夷、落后民族、野蛮民族，一谈海外，便是谈山海经，尽是奇闻逸事，既不可考，也不追究真实与否。魏源面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把目光转向世界，将人们视野开拓到认识全球。人们开始研究世界历史和地理，史学扩大了范围。三，考证与创著。清朝考据学发达，有人认为考据即史学，其实考据只是史学的一个方面，史学应包括史学理论、史学观点、史学著述。魏源也重视史料编纂，史料考据，而他更重视史学著述，充分运用史料，按照自己的史学观点，创制成史著。四，朝廷与社会。旧史书是帝王的家谱，是将相王侯的列传，社会上的各种问题的研究便相对地不太重视。魏源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学术思想各方面都很重视，对其沿革、变迁、兴衰、得失都加以探索，以总结历史经验，《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便为研究社会史提供了重要的丰富的资料。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晚清史学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和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人们从钻故纸堆的繁琐考证方法中解脱出来，从宏观角度进行论著；从崇古、迷恋过去，陶醉于过去辉煌历史到正视当代史，描述清朝历史，追寻晚清历史的轨迹；从闭封自守的状态中惊醒，放眼看世界，了解、认识西方各国的历史发展的概貌。凡此种种，都蕴藏着新的信息，新的趋势，值得我们注意。魏源在史学开拓新的风气方面有巨大的贡献。

文学

文章怎样才算写得好？魏源主张有一种“逆”的精神。他在评论龚自珍文章时说：“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

《拟进呈元史新编序》，《古微堂集外编》。

《拟进呈元史新编序》，《古微堂集外编》。

则所复愈大。”逆就是不同于随流，不同于时尚，充满叛逆革新的精神。魏源对什么叫文也有一种独特的看法，他把“人”放在首位。人的主体是最重要的。他说：“百物之生，惟人能言，最灵贵于天地，有笔诸书矢为文字之言，即有整齐文字以待来学之言。”在另一处说：“己之灵爽，天地之灵爽也。……是故人能与造化相通，则可自造自化。”人是有灵性有感情的，言记录下来的文字是一种文化的表现，一种文明的表现。他由此得出六经皆文的观点和结论：六经自易、礼、春秋，姬、孔制作外，诗则纂辑当时有韵之文也，书则纂辑当时制诰章奏记载之文也，礼记则纂辑学士大夫考证论议之文也。因此，六经都是“一时诗文之汇选，本朝前之文献而已”。他的文学是杂文学的概念，认为古代是“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强调文章要通经致用，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后来文学与政治、经学（哲理）有分离的现象，他强调要回到以前经术政事文章合一的那种局面。

他批判晚清的文风，一种是“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一种是“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再一种是“浮藻诂订可为圣学乎”？这三种人总的讲便是经术、治术、文章的分离；具体讲，一为文章家，二为宋学，三为汉学。他认为这种流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史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他深感文章需改革，提出写文章的原则有两条，一是要言之有物，二是要言有心得，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不是抄袭、模仿，装腔作势。

他强调写诗是真实感情的流露和表达。他说：“诗有三要：一曰厚，肆其力于学问性情之际，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所谓万斛泉源也。二曰真，凡诗之作，必其情迫于不得已、景触于无心，而诗乃随之，则其机皆天也，非人也。一曰厚，重者难也，蓄之厚矣，而又不以轻泄之焉，真矣。而天机又极以人力。于是人之知与不知，后之传与不传，听之耳。”这一段诗论主张无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显示自己的才能和个性，其余的可以不予理会。

魏源的诗作丰富，大体有三类：一类反映嘉道年间国困民疲，社会矛盾尖锐，如江南吟、都中吟，是仿白居易的新乐府，揭露了清朝实行的各种政策的弊端和人民痛苦的情状。第二类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描绘、抒怀，他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他自己说：应笑十诗九山水。他的山水诗有的写得气势磅礴，浑浩流转，跌宕起伏，如《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贵溪象山龙虎山诸诗》；有的写得秀丽恬静，清苍幽峭，充满浓郁的诗情画意，如《湘江舟行》、《三湘棹歌》等。第三类是表现人民反侵略的爱国诗篇，如《寰海》、《寰海后》、《秋兴后》、

《定庵文录叙》，《魏源集》上册，第238—239页。

《国朝古文类钞叙》，《魏源集》上册，第228页。

《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5—6页。

《国朝古文类钞叙》，《魏源集》上册，第228页。

《刘礼部遗书序》，《魏源集》上册，第242页。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6、37页。

《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集》上册，第163页。

《简学斋手书诗钞》魏源的题辞。转见于王家俭：《魏源年谱》1816年条目。

《普陀观潮引》、《钱塘观潮引》、《秦淮灯船引》。

当时还有许多诗人写下了大量的反侵略爱国诗篇，如张际亮、张维屏、贝青乔、朱琦、陆嵩等人，还有一位林昌彝辑了一本《射鹰楼诗话》，搜集了反侵略爱国诗篇，并有精当的评论。魏源是这群诗人中的一员。

龚自珍、魏源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进步趋向，他们的文化表现出一种叛逆精神，是正统文化的逆文化。为什么他们能表现出这种特征？

政治上，清朝腐败，引起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连嘉庆皇帝也下罪己诏，士人议论纷起，而乾嘉以来文化高压政策有所松弛，于是，士人慷慨陈词，抨击弊政，龚自珍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各大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商人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实力，城市文化也随之繁荣。龚自珍关心农业经济生产，提倡雇工，将农产品投入市场变为商品以致富，他不耻言富，富能殖德，富又能殖寿。他又不讳言私，写《论私》一文，通篇批判封建社会大公无私的荒谬，论证私的必要性、合理性。写《阐告子》说明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是后天才有的。这种论证实际是推动和促进商业资本的发展。魏源在盐政、漕运诸方面的建议都对促进商业资本的发展是有利的，他主张在赋税征收方面要保护有土地的富户和无土地的富商，保护富户便能使国强。他反对禁欲主义，认为主张俭是对上而不是对下的，“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魏源提出寻找发现人才，选拔提携人才要到城市中去：“圣王求士与士之求道，固不于野而于城邑也。城中曰都，人萃则气萃，气萃斯材藪焉。”商业城市经济发达促进了人才的涌现，促成了文化的繁荣。他批判贵族垄断社会地位和文化，说：“虽古人教育有道，其公卿胄子多通六艺，岂能世世皆贤于草野之人？”贵族政治由优势要转成劣势，草野的士人则随着会由劣势上升为优势，他便建议帝王要听取下层民众的意见，“瞽吏、百工、庶人、刍豢皆得进言”，以供治理国家之用。

文化思想上，虽然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新鲜的意见，但是，仍然冲不出封建主义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网罗，他们仍是尊君、崇道、信奉儒学，因此，他们只能用“复古”、“复性”，来表达他们改革的愿望。龚自珍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开的仍是古代的药方，这样，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这是时代所决定，不能加以苛求的。

第三章 地主阶级经世派的经世思潮

第一节 咸丰同治年间的政治形势和文化趋向

《陆彦若著书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96页。

《默觚下·治篇十四》，《魏源集》上册，第73页。

《默觚下·治篇九》，《魏源集》上册，第61页。

《默觚下·治篇九》，《魏源集》上册，第60页。

《默觚下·治篇十二》，《魏源集》上册，第68页。

《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13页。

咸丰共 11 年（1851—1861），为文宗；同治共 13 年（1862—1874），为穆宗，加起来不过 24 年。这一时期，社会上发生了大的变动。咸丰帝所遇到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席卷 17 省，长达 14 年，比白莲教起义波及面积广，延续时间长。清朝政府的军队八旗、绿营日显腐败，不堪一击。汉族地主阶级官僚所训练的武装湘军、淮军兴起，同太平军对垒，挽救和维护了清朝政权。曾国藩、李鸿章是近代封建军阀的始祖，又是洋务运动的首领。同治帝年龄很小，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1864 年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1860 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清政府同外国资本主义签订了《北京条约》，1861 年清政府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国半殖民地程度加深。虽曰同治中兴，其实清朝衰落景象更加显露出来，清朝颓局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了。一方面，在朝廷内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斗法，奕訢虽然是洋务派首领，但处处受慈禧的制约，发挥不了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汉族官僚地主集团力量增强，地方上洋务派的经济、政治、军事都具有实力，却遭到满族贵族最高统治者的猜忌，因此，采西学、制洋器虽已起步，但阻力重重，进展缓慢。

从全国文化学术界来看，理学还是主流，咸同年间，理学有中兴的趋势。当时清王朝遭到双重夹击，一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一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儒学受到极大的冲击，官僚士大夫阶层感到要挽救严重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便要提倡明道。明道就是用伦理道德来激励士大夫的气节，维护封建秩序，压制农民起义，同时，用伦理道德来整顿吏治，刷新吏治，革除封建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理学讲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个人道德修养，外王就是用好的道德来治理政事。政治腐败、士林无耻的颓风需要以提倡理学来纠正。代表人物有倭仁、唐鉴。从地区来看，各个地区都涌现出一批代表人物，如陕西贺瑞麟，河南李棠阶、刘廷昭，安徽吴廷栋、方宗诚，湖南曾国藩、刘蓉、罗泽南。这些地区，陕西是关学的发源地，河南是洛学的家乡，安徽是桐城派的故乡，湖南是晚清理学发达的地区（湖南是周敦颐的家乡，周敦颐是道州人；朱熹、张栻、王阳明都在湖南讲过学；岳麓书院在清朝由罗典、欧阳厚均等主持，都崇奉理学），相反，汉学考据学在湖南则影响较浅。唐鉴为湖南善化人，他著《国朝学案小识》一书，表彰程朱理学，贬斥陆王心学，巩固程朱的正宗道统地位。类似这样的著作还有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和刘廷昭的《理学宗传辨正》，都黜王尊朱，提高朱熹的地位。当时的理学分两派，一派是主敬派，以倭仁、吴廷栋为首，主要讲究内心修养，另一派是经世派，以曾国藩为首，既讲内圣，也偏重事功。同治年间，理学名臣受到朝廷的重用。1862 年倭仁从工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升到文渊阁大学士，掌管翰林院。李棠阶以左都御史入军机处，参与枢府机要。吴廷栋应诏入京，任大理寺卿、刑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则在 1860 年署理两江总督，节制江南四省兵权，后任武英殿大学士。朝廷又将已故去的理学名臣从祀文庙，重刊理学名臣的著作，中央和各地封疆大吏又刊印各代理学家的名著，造成崇尚理学的风气。

另一个文化现象是上海、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在钻研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机器制造，这是对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积极回应。李善兰（1811—1882）字壬叔，浙江海宁人，他曾是曾国藩的幕僚，后任同文馆总教习，是著名的数学家，他和外国传教士合译的棣么甘的《代数学》和罗密士的《代微积拾级》是西方近代代数学、解析几何学和微积分学在我国最早的译本。他译的

《谈天》是英国约翰·赫歇尔宣传哥白尼日心说的通俗名著。徐寿（1818—1884）字雪村，江苏无锡人，他和来华外国人合译了许多化学方面的书籍。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金匱人。数学家。和外国传教士合译许多数学教科书，如《代数术》、《三角数理》、《微积溯源》、《决疑数学》等，对代数、三角、微积分和概率论作了系统介绍，被当时的学堂选为课本。他们还从事机器制造工程和轮船的制造，对西方的应用技术有浓厚的兴趣。钻研技术，仿制机器，蔚然成风。他们所传播的近代自然科学学科知识启迪了新一代的读书人，使他们了解到除了儒家经典和科举八股文以外，还有崭新的科学知识天地。但是，这种新知识的学习风气也只是局限于一隅而已。

国际形势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一步一步加紧，它们从东南沿海各省打破了缺口，建立了一些商埠以后，又从东北、西北、西南边疆渗透进来。日本侵犯台湾，英国制造马嘉里案，俄国占领伊犁，法国吞并越南，将魔爪伸到我国的领土上来。随着各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紧，李鸿章、奕訢等人执行着对外妥协的政策，办着割地赔款的外交。而我国军事工业的建设、国防力量的增强却还迈着蹒跚的步伐。

第二节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祖上没有什么功名，祖父、父亲希望后代有个做官的，以荣宗耀祖。曾家拥有土地，曾国藩勤奋地从事农业耕种，又不放弃读书，半耕半读，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报效国家。他年幼时读四书五经，喜读《史记》、《文选》、桐城派的古文。考中秀才后，23岁曾在长沙岳麓书院学习了一年，受到湖南学风的熏陶。一次会试落榜，回家途中他买了一部二十三史，父亲说，你花这个钱，不怪你，只是要读完它。他订计划每日读史、标点不间断。27岁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到37岁的10年间，身跻六曹，官至二品，任礼、工、刑、吏、兵部侍郎，像这样的迁升朝中无第二人。他向同乡太常寺卿唐鉴请教，唐鉴指导他读《朱子全书》，又说理学不是空讲修身养性，要躬行履践。这是要纠正理学空谈性理的偏颇，强调修养德性，同时也要讲究事功。曾国藩攻读理学，而对桐城派古文仍感兴趣，两者兼学。他又向理学大师蒙古籍倭仁请教，倭仁是主敬派，教他静心打坐，反身自问，这是一种心理的、精神的自我调节。曾国藩由于身体较弱，坐久了耳鸣，不习惯，心静不下来，便没有深入地去做，还是读书。他又结交了一些朋友，如汉阳刘传莹，是攻考据学的。曾国藩也了解到王念孙、王引之在考证方面造诣很深。他并不小看考据，对于汉学，也不排斥，采取调和汉宋的态度。但在这方面也未下功夫。他下功夫的是在经史方面，讲究实学，如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秦蕙田的《五礼通考》，还有《明会典》、《清会典》，这些书籍他读得很用功，这对他后来治国、治军、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以至水利、漕运、厘金、田赋、盐政诸大项目的改革和治理关系极大。10年京官他把功夫用在治学上，而他的治学又是与经世致用思想相联系的，所以他是理学经世派。可以说他的思想反映出湖湘文化的特点，即崇奉理学，重视经世之学。近代王夫之的思想、魏源的思想都强调经世，曾国藩的思想深深烙上了湖湘文化的印痕。

1851年他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批评皇上苛于小节，疏于大

计，骄傲自满，言行不一，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应去骄矜之气。疏上，差一点遭来横祸。多亏大臣祁藻、季芝昌为他苦苦求情，才免于处分。曾国藩看到清朝的衰败气象，但是皇帝仍端着架子，自视甚高，很难听进意见，他也有点心灰意懒了。

1853年丁忧在籍，太平军势如破竹，攻下南京，曾国藩奉命以在籍侍郎办团练，组织湘军。1853—1864年这十多年，一直紧张地和太平军农民起义队伍搏斗。湘军这支武装是地方团练，但成了一支独立军队，横冲直闯，到他省迎战。曾国藩要处理与地方各省官吏将领的关系，处理与中央的关系，处理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关系，处理与太平军的关系，四面八方，矛盾重重，绞尽脑汁，用尽心机。他一面对太平军残酷镇压，对老百姓造反严刑峻罚，另一面对中央、对地方是委屈求全，以柔克刚，以求得满族贵族对他的信任。这里他运用了先秦诸子的思想：勤俭是学墨子的，齐民严整是学商鞅、管仲的，严刑峻罚是学法家的，虚静、退逊是学老、庄的。可谓集传统文化思想之大成，杂糅各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

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预感到将会功高震主，引起众妒，应早早抽身退守，便撤散部分湘军。以后，清朝政府又派他去镇压捻军，但因为裁撤了湘军，主要用淮军剿捻，淮军将领不听指挥，不能取胜。曾国藩晚年办了几件洋务。一是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的建立，制造洋枪洋炮，次年委派徐寿、华蘅芳等主持仿制轮船工作。1865年制成黄鹄号小轮船，曾国藩嫌其“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二是1863年他派容闳携款6万两去美国购买“制器之器”，容闳机器购回上海，便设立江南制造总局。这是洋务派军事工业的重要基地。三是1871年他同李鸿章共同上奏派幼童赴美留学。他认为“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而军事工业需要学理工学科，“画图、算法、步尺、测海、造船、制器，无不与用兵相表里”，关心军事便要关心科技，便建议派幼童赴美留学，开创了一代风气。他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政策和方针是以妥协为主的，尤其表现在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时，他忍辱求和，严惩天津府县官员，遭至全国舆论大哗，他自己也引咎自责，1872年3月，心情郁悒，病死于江宁两江总督官署。

他的幕僚王闿运为曾国藩写了一副挽联：“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

有人将曾国藩比作汉臣诸葛亮、唐臣陆贽、宋臣司马光，但是末世不会有真正的中兴。君主的气度不行了，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清朝的危亡，但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对汉族官僚大臣并不信任，他始终未能成为中枢重臣。上联实际上是批评清廷没有重用曾国藩。他在学术上有很大抱负，也有很深的修养，由于投身镇压太平军，20年瞬息而过，军务政务繁忙，无暇从事学术研究，没有留下经史专著。这说明事业、学术不能兼顾。有人建议将曾国藩从祀文庙，清廷下礼部议奏，礼部以无学术著述驳回，事遂中止。这不过是清廷不肯抬高他的文化学术地位，找一借口，有意压制而已。

《新造轮船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光绪二年，卷27。

《新造轮船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

霍子孟：霍光，西汉昭帝时宰相。张叔大：张居正，明朝穆宗，神宗时为相。纪河间：纪昀，《四库全书》总编纂官。阮仪征：阮元，曾编《经籍纂诂》、《国史儒林传》等。

哲学

（一）天道论

曾国藩相信理是主宰世间万物的精神，也可叫性、命。天命是决定人间事物的，是不可违抗的。“尝谓性不虚悬，丽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是故皇降之衷，有物斯以有则；圣贤之学，惟危惕以惟微。”

天地是气，“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縕，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钧耳”。

道学有三派：气学、理学、心学。气学是张载，理学是朱熹，心学是王阳明。曾国藩思想受王夫之的影响很大。王夫之作张载《正蒙》注，发挥了气学。王夫之认为世界万物是由气、由物质形成的，先有气，后有物，有物斯以有则，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曾国藩对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都有所评论。他认为人对天命的态度是尽性知命，尽性，要以自己主观努力来做，不是消极的态度。他相信朱熹的理，理是讲仁敬孝慈，仁义礼智，“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这里强调本分，尊卑等级秩序不可颠倒，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至于富贵功名，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曾国荃打下南京，曾国藩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以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耶，以后每日当从乐天知命四字上用功。”但是，他也重视人为，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地步？就要勤，忠诚，强调主观努力，勉强自己去做，“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情，惟勤者可以遏其流”。他又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董仲舒、朱熹强调人的气质是不能改变的，讲上智下愚、性三品论、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要克制欲达到理；曾国藩则强调在社会实践中促使事物转化，包括陶铸成才。

（二）认识论

曾国藩的认识论遵循着朱熹的格物致知的路子。他认为理一分殊，理是一个，而万事万物的理是有着不同的体现。要对事物进行观察、研究，得出

《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133页。

《答刘孟容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6页。

《答刘孟容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6页。

《喻纪泽》，同治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复刘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4，第39页。

《曾国藩未刊稿》，第377页。

日记，同治八年七月十八日。

《求阙斋日记类钞》，《曾文正公全集》卷2（上），第21页。

《笔记十二篇》，《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92页。

《劝诫浅语十六条》，《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1页。

其认识的理来。(1)认识离不开具体事物。他说：“《大学》：致知在格物，谓吾心之知，必与事物相丽，相交，不可离物以求知也。”“至大学格物之说，聚讼千年，洎无定论。国藩以为人心当丽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这一认识规律是符合唯物的路线的。他又说：“朱子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究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至殊之分，只有认识具体事物才能认识到抽象的事物的理。(2)认识是无穷无尽的。朱熹将“知”归结为“理”，理像一颗珍珠，如珠在浊水中，格物致知，就是在浊水中揩拭此珠，一旦用力之久就能豁然贯通，达到“众物表里精细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的境界。曾国藩认为认识过程到此仍然没有穷尽。“自维此生，纵能穷万一之理，亦不过窥钻奇零，无由底于逢原之域。然终不敢弃此而求他捷径，谓灵心一觉，立地成圣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这里，他不同意朱熹浊水中揩拭宝珠，一旦豁然贯通掌握绝对真理的看法，认为认识还需要深化。(3)认识的范围愈来愈广。曾国藩重视经世致用，他说：“天下之大事宜考者凡十有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表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他很喜读秦蕙田《五礼通考》一书，但是，根据晚清治理国家的需要，还需要扩大知识领域和范围，他评论说：“秦树澧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惜其食货稍缺，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传于秦书之次。”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使曾国藩认识到这是千年来的“奇变”，要应付西方的侵略，必须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延伸为洋务思想，得出了“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的结论。这样，认识的范围更扩大了，实学通向了洋务，他打破了夷夏之防的界限，翻译西书，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组织创办安庆内军械所，试制新式船炮，派遣容闳到美国购买制器之机器，开办江南制造局，后来又设立兵工学校，培养人才，以至于派遣幼童出国留学，学习西人擅长之技。这一系列活动是他经世思想的延伸，是提倡实学和学习西方的结合点，适应了我国走向近代化的时代要求。

(三)辩证法思想

曾国藩说：“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又说：“一则生两，两则还归于一。一奇一隅，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物无独，必有对。”“国藩亦看得天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

《笔记二十七则》，《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67、368页。

《答刘孟容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6—7页。

《大学》：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7页。

《答刘孟容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7页。

《治道》，《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上，第50页。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6页。

《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

《答刘孟容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6页。

《送周荇农南归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62页。

他运用辩证的思想分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争论，厚程朱而薄陆王，又用此思想分析骈体文和桐城派的散文，崇古文而非骈文，他用历史分析方法说明王阳明心学和六朝隋唐骈偶之文都有极盛的时期，但是，物穷则变，理固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便发生了变化，从中阐明他崇尊的程朱理学、姚鼐桐城派古文的理由。

他也把辩证的思想运用于战争。他打仗以谨慎著称，不打无准备的仗，规划精严。在战略战术方面，对动与静、强与弱、主与客、稳与险、战与守有精密的论证，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又能在战争中选拔贤将。在用人方面，对德与才、智与勇，衡才不拘一格。对士兵恩威并济，对德与刑、教育与纪律、奖励与批评、严格与宽松这些关系怎样处理，才能收到良好效果，积累了一套经验。

（四）道德观

曾国藩提倡理学，首先在宣扬儒家的“仁”，他说，“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幽以究民物之同原，就是内仁，显以纲维万事，就是外礼，内用仁心，外用礼制，使封建社会秩序稳定。他提出要自立、自强，以诚为本，“窃以为天地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

他认为风俗厚薄在于一二贤人提倡，有人提倡便能使社会风气转移。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响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这里明显地反映了他的英雄史观，把芸芸众生都当作群氓。认为一两个英雄便能主宰历史，把精神、意志的作用过分夸大了。但是，他提出朝廷的当权者，士大夫的有声望者真正地带头做，试图转移社会风气，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的时期，如果认真去做，是会形成一股力最，而且也能够产生一定的成效的。

历史学

曾国藩强调经世致用，特别重视历史学。阅读历史书籍，能够增长治理国家的知识，总结古人的历史经验，在参与政事中作为借鉴。他很重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通考》这几部巨著。他曾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臣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

《题方友石书后》，《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第5页。

《王船山遗书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78页。

《曾文正公全书·书札》。

《湘乡昭忠祠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04页。

《原才》，《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81—182页。

外不刊之典也。”这名分、风俗、正闰、名实，便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的义理，这兵事得失之由，兴家败家之故是从历史中得出的规律性经验，很值得人们深思、借鉴。

他还对清朝的历史发展过程加以研究，寻找前期和后期的不同特点，他论证道：“顺治之时，疮夷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鹜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颛预。”

“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尚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故臣常谓：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以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狗步，昌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

他从清朝初期、中期、近期的风气变化窥测出三个问题。一是朝廷皇帝执行的政策，使风气形成。嘉庆道光年间，皇帝无所作为，在细小的地方特别认真，大作文章，以至朝臣都谨小慎微，看皇帝脸色行事，为保全自己高位，报喜不报忧，敷衍塞责，不敢提尖锐的批评意见使朝政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和局面。第二是中央地方的官僚、官吏，贪污腐化，民不聊生，以至官逼民反。第三是士大夫风气，曾国藩痛斥为是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的世界。士人苟且偷安，攻读无用无实的文章醉心科举，追求功名利禄，不激励气节，道德废，廉耻丧，甚至于兼商兼吏，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畏之若虎狼。这种社会风气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吏治，一是士林风气。曾国藩为了挽救晚清社会危机，提出怎样选拔人才，怎样整顿吏治，怎样收拾民心以及怎样使用刑罚，这些建议和主张主要得力于他对历史学的勤奋攻读和思考借鉴。

他对传统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也进行过研究和考查。清朝初期，崇尚理学，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大兴，汉学鼎盛时期，宋学（理学）受到排挤、非难、冷落。到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理学中兴，又有人攻击汉学，这种汉学宋学之争是一种文化现象，如何对待这场论争呢？曾国藩总结文化思想史发展的经验，崇奉理学，不薄汉学，采取了调和汉宋的态度。他叙述道：“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垢。闻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这段记载说明了汉学鼎盛时期对宋学的攻击和非难。汉学有缺点，是破碎之学，“考一字、辨一

《与罗少村》，《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

《应诏陈言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7—8页。

《敬陈圣法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32页。

《复龙翰臣》，《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第38页。

《朱慎甫遗书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22—223页。

物，累数千万言不能休。”而宋学也有缺点，则是性理空谈。大家尊汉而黜宋时，曾国藩是站在理学这一边的，他表扬了姚鼐：“独桐城姚鼐，恪守程朱，孤行不惑，宗主义理，不薄考据。”他自己所处的时期，正是尊宋而黜汉之时，他却并不跟从，认为汉学攻宋学，宋学攻汉学，“皆有识者所深悯也。”首先，他认为汉学的文学训诂是攻读经学的基本功。求儒家经典之道，先还是从文字训诂开始。“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精研文字为要务。”所以，汉学有它存在的价值。第二，他认为汉学的考证是有它的功用的。说：“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也。”许慎、马融、杜佑、马端临的考证起了考先王制作之源和辨后世因革之要的作用。第三，从治学方法来看，汉学讲实事求是，宋学讲即物穷理，两者是相通的。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古训，本河间王实事求是之首，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这里，他说“事即物”，“是即理”，事为客观事物，理是对客观事物观察而得出的规律。他用历史的眼光追溯朱熹的即物穷理是传统儒学所固有的。“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他在这里将宋学的治学方法即物穷理和汉学的治学方法实事求是两者胶合起来了，认为都体现了传统儒学“力行”和“致用”的务实精神。因此汉学和宋学是可以调和的。第四，他将汉学、宋学都认为是孔门四科中的一项具体学科，能够并行而不悖。他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阙一不可。”第五，他认为汉学、宋学都研究礼经。他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之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曾国藩调和汉宋，兼容并包的结语。

曾国藩对汉宋采取调和的态度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的。他认为汉学宋学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他崇奉理学，不薄汉学，便不主张两种学派互相争论，消耗内部无穷的精力。另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西学东渐，儒学受到冲击，因此，儒学内部流派的分歧，只宜调整，不宜冲突，以便使儒学更能适应维护封建秩序，凝聚民心。

《重刻茗柯文编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23页。

《海宁州训导钱君墓表》，《曾国藩全集·诗文》卷3，第343页。

《汉阳刘君家传》，《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21页。

《答刘孟容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12页。

《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0页。

《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66页。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65页。

《问学》，《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上，第8页。

《复夏弢甫》，《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7，第9页。

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典籍丰富。面对着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只有惶惑、兴叹。曾国藩主张要“慎择”，他选择了古今圣哲 32 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他选择的 32 人是：

“文周孔孟，左庄马班，葛陆范马，周程张朱，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文王、周公、孔子、孟子是圣贤。司马迁、班固、左丘明、庄子，前三人是史学家，著《汉书》、《史记》、《左传》，庄子是哲学家、文学家，著有《庄子》。孔门四科中属文学（文学实际上是古代史著典籍的著述）。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是政治家，孔门四科中属政事，偏重于功业。周敦颐、程颐、朱熹、张载是哲学家，孔门四科中属德行，偏重于义理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是文学家，文章写得好，孔门四科中属言语。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是文学家，诗写得好，孔门四科中属言语。许慎、郑玄是东汉著名经学家，许慎撰《说文解字》，郑玄遍注群经，杜佑撰《通典》，马端临撰《通考》，孔门四科中属文学。顾炎武是经学家，秦蕙田撰《五礼通考》，姚鼐是桐城派文章家，王念孙是经学家，以考据学著称。若按照曾氏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四项来分类。曾国藩自己说，文周孔孟是圣，左庄马班是才，不能以一方体论。葛陆范马属经济，周程朱张属义理，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属词章，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属考据。我们看到，曾国藩所选择的圣哲 32 人以及他们的著作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些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是著名的人物，体现出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他们的著作实际上是国学必读书目，也是应当精研的范本。

“文”，这个词的含义很广泛。曾国藩解释：“文字者，以代语言，记事物名数而已。其流别大率十有一类。”这十一类是：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牋、哀祭、传志、杂记、九者、叙记、典志。其中前九类和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分类相同。从这种分类来看，他所说的文学是杂文学。他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从份量上比姚鼐的选本少一些，而从内容来看，包容的更为广泛。文章加进了儒家经典，史传的叙记和典志，有兼容情理、包含骈散的趋势，开拓了桐城派古文的新局面。

关于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文章中有所列论。曾国藩不同意理学家、汉学家重道薄文的偏见，他把道比作人心，把文字比作人身的血气，两者是不可分的。说：“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绩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他在另一处则说：“国藩窃以为维道与文之轻重纷纭，无有定说久矣。朱子读唐志，谓欧阳公但知政事与礼乐不可不合而为

《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48 页。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52 页。

《笔记二十七则》，《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373 页。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64 页。

《致刘孟容》，《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第 5 页。

一，而不知道德与文章尤不可分而为二，其讥韩欧裂道与文以为两物，措辞甚峻。”可见他重视道，但也不薄文，而且将文章提得很高。他说：“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薛福成曾在他的幕下，听过他论文之旨：“以谓圣门四教冠以文。文者，道德之用，而经济之舆也。故其尚论古今，与求贤之法，一以文为之。”“盖自两汉至于如今，识字之儒，幼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为最大，义理明则躬行为要，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在这里他将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者关系讲得很清楚了。他是以文卫道，以卫道者自任，“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要使文章起着维护道的社会效能。

曾国藩文宗桐城派古文，诗效江西诗派。桐城派古文自姚鼐之后，又传承了百年。但是，经过百年流传，其弊至于浅弱不振，有文敝道丧之患。曾国藩“出而振之”。他继承了姚鼐的文论，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思想原则又加入“经济”一条，用经世致用思想扩大了文章的范围。他的文论探究了文章的体与气，情与理，风格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骈体与散文等。他自己偏爱阳刚健美的文章，用阳刚之气贯注文中，给桐城派古文带来了活力。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个幕僚群体，其中如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都是桐城派散文的高手，称为曾门弟子，桐城派古文也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曾国藩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这里讲的阳刚、阴柔是指气质的不同，不同的气质形成不同的气势，不同的气势要用不同的文字行气的方法表达出来，喷薄而出之，则气势浩瀚，吞吐而出之，则韵味深长。这番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寓意深刻。他赞赏阳刚之气的文章，说：“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褐裘而来，绝无齷齪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这是对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一文的后记。王阳明的心学是曾国藩所批评的学理，但他并不排斥王阳明写的经国安邦的文章，而且对他文章光明俊伟的风格也大加赞赏，这里可见他不立门户，有包容百家的胸襟和气魄。

《致刘孟容》，《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5页。

《复刘霞山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4，第39页。

《季弟遗集序》，《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1页。

《致诸弟》，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十七日，《曾文正公全集·家书》。

《与江岷樵、左季高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寄龛文存序》，《薛福成选集》，第239页。

《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第6—7页。

《鸣原堂论文》，《曾国藩全集·诗文》，第554页。

曾国藩的诗宗黄山谷，属江西诗派，是晚清诗坛宋诗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影响很大。试举岁暮杂感一首为例：“为臧为否两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万事拼同驹母视，浮生无奈蚕丝多。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鼉。”这首诗反映了作者有大志而未得伸展的心情。另一首赠梅伯言：“隘居萧萧劣过车，蓬门寂寂似空虚。为杓不愿庚桑楚，争席谁名扬子居？喜泼绿成新引竹，仍磨丹复旧仇书。长安挂眼无冠盖，独有文章未肯疏。”他仍表达了要建事功，不赞成庄子楚桑庚以有功业便有害的观点。

曾国藩提倡理学、桐城派古文，并为其注入了活力，使传统文化中的正统文化有延续的趋势。但是，由于清朝政治腐败，理学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并不能挽救晚清政治上的颓势，西方文化愈来愈强烈的冲击，又使完全保持传统文化的优势已经不可能了。曾国藩的理学、桐城派古文的提倡只能成为衰落总趋势中的回光返照而已。

第三节 王闿运

我们论及湖湘文化的著名人物，除了上节所论曾国藩外，还有一人，即王闿运。曾国藩是士子，成为通儒、名臣，在朝派，王闿运则是名士、幕僚，在野派，社会地位不同，而在文化上是另一种类型，颇有影响，值得述及。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室名湘绮楼，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七年（1853）中举。在北京，曾在肃顺府中任家庭教师，很受尊敬。后来肃顺被杀，他对肃顺仍有感情，曾著《录祺祥故事》，成为一篇清朝珍贵的掌故资料。他治经，对《礼经》、《春秋公羊传》都有研究，是今文经学家，但是，他也兼采古文经学，他很重视辞章，对当时只重视训诂的状况不满意，写文章追摹汉魏六朝，写诗亦然。他到曾国藩幕下，曾国藩对他很是尊敬，奉为客，常听取他的意见，不久辞职。四川总督丁宝楨聘他掌成都尊经书院，他在书院中讲授《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以及《昭明文选》，弟子有的攻《礼经》，有的攻《春秋公羊传》，有的攻《书经》。他的一大批弟子都成著名学者，称“蜀学”。后来他又在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江西大学堂讲学，弟子数千。清末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民国以后任清史馆馆长。他思想保守，卫封建主义之道，痛恨革命。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又敢于标新立异，对有权势的官僚甚至最高统治者，敢于揶揄讽刺，讥弹嘲弄，无所不至。辛亥革命后，士大夫争剪发辫，改装西服，王仍不改旧装。湖南总督谭延闿，会王八十寿辰，前往贺寿，王顶戴花翎，衣袍裘褂，拖辫发而出，谭则着大礼服，见王惊愕，不得已而屈膝。王说：“子毋詫，吾胡服垂辫，子西服髡首，皆外国制也，有何文野？若能优孟文冠，乃真睹汉官威仪矣。”相与一笑，带有辛辣的讽刺意味。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谈，王闿运写一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用嘲笑口吻谈论民国总统。民国时他还写过一对联：“男女平

《岁暮杂感十首》，《曾国藩全集·诗文》，第77页。

《赠梅伯言二首》，《曾国藩全集·诗文》，第85页。

本节取材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1987年等，不一一列注。

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写新旧文化冲突和并存的现象：颇为风趣。他的著作有《湘绮楼全集》、《湘军志》、《庄子注》等。他自撰一自挽联：“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未就，空余高咏满江山。”上联说明他从事的学术研究，幸有儿孙传承其学业，下联说明他有一套权术本领未能充分施展出来，是表达一种遗憾的心情。

处世哲学

王闿运研究《春秋公羊传》，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所谓纵横之术。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务，即辅助谁，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术使据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乐。

王闿运满腹经纶，想报效国家，将一套经世安邦之策，付诸实现。他在肃顺馆内，曾国藩幕下，曾发表一些意见，而且，肃顺、曾国藩亦采纳了他的意见，但是，总没有时机大展雄图。乱世奇才，未遇良主，只好装狂装傻，深藏不露。恭亲王奕訢向王问政，王闿运说：“国之治也，有人存焉，今少荃之洋务，佩蘅之政事，人才可睹矣，何治之足图哉！”少荃即李鸿章，佩蘅即宝鋆，在奕訢眼里，这些人是国家栋梁之材，而在王闿运心目中还没有什么地位，奕訢以为王是处士大言，没有什么实际本领，再也不请教他了。而王则认为奕訢没有真正看出自己才是诸葛亮式的人才，既然不受重视，也使用名士风流的姿态嘲弄恭亲王一番。表面上看，王是略施智谋，傲笑王侯，实际上王心中是悲愤，悲乱世无人识人才。王闿运常常量才评估天下事，臧否人物得失。如他常对弟子杨度评论时局。据《杨度日记》记载：“已丁，师论中兴诸臣，曾子早岁、左之中年、胡之晚节，合之可为一完人。……王师论古今才分不甚相远，胡文忠闻一知二，子贡之流非曾文正所及也。又谓午诒（夏寿田）似曾而余（杨度）似胡而非敢望也，然合乎事实，知必有济”。这样师生纵谈国事，月旦人物，有朝一日出山便要有把握地指挥政事。但是，没有机会，则不可妄动。王森然评论说：“昧者不察，或以为滑稽玩世，或以为高远不中世情，莫知微妙玄通，薪传之所自来，徒赏其文辞，目为文士，而经世致用，悲天悯人之衷，自弱冠以至耄耋期无一日而或息者。”说明在王玩世不恭的风貌下掩藏着一颗积极参与政治的炽热之心。

历史学

王闿运写了一本《湘军志》。1872年曾国藩去世。1875年曾国荃要写一部湘军志，请王闿运执笔，七年后初稿完成，时王闿运在四川，将稿送到湖南，曾国荃、郭嵩焘看后大为不满，认为史事失实，甚至认为是谤书。因为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表彰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使家乡增光添彩。但是王闿运要自成一家言，秉笔直书，对湘军、淮军将领的弱点也直言不讳地

记录下来，甚至带着责备口吻，使湘军将领气愤。对于曾国藩写了他的军“苦”，对他的军“功”宣扬不够，而且，王闿运自负知兵，好谈大略，以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凌驾于战争之上，妄加评论。另外写到曾国荃攻克南京一段，说是“罕搏战”，又说太平军“比于初时衰矣”。而且整个战争过程写得很简短，曾国荃认为是贬低军功，尤为愤怒。王闿运知道这情况后，便将木版交给郭嵩焘，嘱其毁版，以平息众人的非议。他自己又作了一些检讨，认为直笔非私家所宜，承认此书实亦多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但是他认为这部书是奇作，并不像明人的著作；可以和《三国志》、《后汉书》等著作相媲美。他是力追古贤的仿古派。当然他也说明他的本意并没有对曾国藩有什么恶意中伤，还是对曾国藩很尊重的。曾国荃又请王安定编一本《湘军记》，这本书写得比王作要详细，而且在讲到曾国荃攻克南京一战役时则大肆渲染，写得有声有色，烘托出这是一场军兴以来未有之苦战，极古今之恶战，以辨正王闿运“罕搏战”的论断。在这一点上，使曾国荃的遗憾心情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虽然如此，后人评论，仍对王作评价甚高，一是振笔直书，蔚然成一家之言，不讳避事实，真实性强。二是文章雅健雄奇，使读者感到浓厚的兴味，留下深刻的印象。

黎庶昌编《读古文辞类纂》，将《湘军志》中几章选录，标题为《湘军水陆战记》，评价为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代良史也。评价颇高。

王闿运的《湘军志》是时人记载见闻，是第一手史料，和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撰《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撰《夷氛闻记》的性质相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它又是最早的一部。后来王安定的《湘军记》（1889），今人著名史学家罗尔纲的《湘军新志》，近期还有龙盛运的《湘军史稿》，对湘军研究从战史、兵制、政治史各种角度论述评论，有很大的进展，回顾起来，王著首创之功，是不可湮没的。

文学

王闿运是一位诗人。他在青年时期便同武冈邓辅纶、邓绎、长沙李寿蓉（字篁仙）、攸县龙汝霖相友善，组织“兰林词社”，自标为“湘中五子”。乾嘉以来，考据学大兴，学者重视文字训诂而不重视辞章，王闿运对此现象极为不满，说：“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以信后世，人赖以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俗且反乎混沌。况乎孳乳所积，皆仰视俯察之所得，字曰文，言其若在天之星象，在地之鸟兽蹄迹，必其灿著者也。今若此，文之道或几乎息矣。”对于诗，他议论说：“诗有家数，有时代。”又说：“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情。虽仍其名，其用异矣！故余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诗主性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所感则无诗，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则不成诗。”他强调诗贵有情，以发抒个人的感情为主，这点和传统儒家的诗教原则不同，儒家诗教原则强调直接为政治和教化服务，以正得失，以教谏为本，发乎情，止乎理。理学家更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王闿运则强调托兴为本，乃为己作，主养性情。针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说：“宋人以性善情恶，彼不知善

恶皆是情，道亦是情，血气乃是性，食色是情”。冲破了理学家的思想束缚。

诗有家数，历史上的诗怎样分派，应当学习哪一家？他说：“汉初有诗，即分两派，枚、苏宽和，李陵清劲，自后五言，莫能外之。”“苏诗宽和，枚乘、曹植、陆机宗之；李诗清劲，刘桢、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乃李之别派，潘岳、颜延之，苏之支流。陶、谢均出自阮，陶诗真率，谢诗超绝，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这里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诗歌汉魏便是最好的。五言至上，魏晋达到顶峰。唐宋则不必学，不可学。这种理论和晚清流行的宗唐诗派和宗宋诗派迥异，别树一帜，自成一格，是诗苑中开放一朵奇葩。但是他的理论的复古主义倾向比宗唐宗宋派更加厉害，看法也太片面了。

王闿运认为“以三四十年之工力，治经学道必有成，因道通诗，诗自工矣。”他写的诗，各体皆佳，试举几首为例。

《从大孤入彭蠡望庐山作》：“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窅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招；扬帆挂浮云，拥楫玩波涛。昔人观九江，举月望神霄；浩荡开荆扬，濛濛听来潮。圣游岂能从，阳岛尚嵯峨；波灵戏桂旗，仙客叹金膏；委怀空明际，傲然歌且谣。”再举一首《雪霁午登日观》：“圣观齐山毫，天境分清烦，方外非轻肆，人间苦垢喧。余怀凛凛志，遂造峻朗巅。长风万里举，冰雪浩天门。皎日光正午，八方被阳恩。青青燕吴树，覆彼下土温。独此肃寒冽，尘想不可存。草石皆晶玉，明照莹我神。洗心在退让，况及更蹇翻。凡夫自阻绝，既至何险艰。观者徒睇仰，攀龙从轩辕。”

他还写过一首七言古诗《圆明园词》。同治十年（1871）春，他游圆明园遗址，百感交集，归作此诗。作者追记了圆明园的富丽繁华，申斥了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罪恶，表达了国势艰危的感叹。这是一首史诗，显示了诗人深厚的功力。因诗太长，兹截录一段，以窥全豹。此诗后半段谓“敌兵未雍门萩，牧童已见骊山火，应怜蓬岛一孤臣，欲持高洁比灵均。丞相避兵生取节，徒人拒寇死当门，即今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丹城紫禁犹可归，岂闻江燕巢林木，废宇倾基君好看，艰危始识中兴难。……”诗出，辇下争写流传。

近人对王闿运的诗评价很高，说有步兵、太冲之风，即能和阮籍、左思抗衡。

王闿运的弟子在学术上有成就的有廖平，他的今文经学学术思想影响了康有为。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有杨度，他在清末成为立宪派重要人物。在艺术上有成就的是齐白石，是著名的画家。

《湘绮楼日记》，1915年9月25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6年。

《论汉唐诗家流别》，《王志》卷2。

《论诗法》，《年谱》卷5。

《答陈深之》，《王志》卷2。

《湘绮楼诗集》卷8，上海广益书局。

《湘绮楼诗集》，卷12。

《湘绮楼诗集》，卷8。

第四章 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的洋务思潮

第一节 同治光绪年间西学东渐和国民心理趋向

1864年至1894年共30年。同治三年（1864）湘军打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这一阶段是洋务派从事洋务运动的时期。这一时期以下的文化现象。

一、汉学的衰落。汉学的衰落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原因。太平军打到南京，江南大片土地处于战乱之中，太平天国首领早期反孔，“敢把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火烧。”文物图书遭到极大的损失，江、浙、皖公私藏书荡然无存，使从事考据的研究受到极大的影响。二是文化继承的原因。著名的老一辈的考据学家先后谢世凋零，如：章学诚，1801年去世。钱大昕，1804年。纪昀、段玉裁，1805年。洪亮吉，1809年。孙星衍，1818年。焦循，1820年。王念孙，1832年。王引之，1834年。阮元，1849年。而年轻的一代学者没有来得及接上来，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由于北方发生了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圆明园烧毁，北方回民起义、捻军起义，南方太平军战争，使知识分子的安静的读书生活被打破了，常常流离转徙，没有一个安定的读书的环境。如马建忠，为逃避太平军战争，随家转徙，凡十八迁而抵上海，东南沦陷，考试无由。这样，做文字训诂考据的学问已经不行了，要另辟门径。咸丰、同治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人民感到奇耻大辱，人们扼腕切齿，要从故纸堆中自拔，学术上要研究边疆地理、外国史地方面的学问。

二、西学的介绍。西学的介绍有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外国传教士。1843年外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这是一个印刷所。麦都思、伟烈亚力、艾约瑟等聘请了李善兰、管嗣复、王韬等人翻译和介绍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如《几何原本》、《谈天》、《重学》、《代微积拾级》、《地理全志》等。还有英国医生合信著《全体新论》、《西医略说》、《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内外科新说》五种医书，由管嗣复翻译。这些医书传播了近代西方医学知识。1887年11月上海成立同文书会，后改为广学会，由韦廉臣、李提摩太主持。此会宗旨是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基督教及一般知识，译书70种。还有中国教会出版《万国公报》，1868年创刊，从1875—1883年出了750期。这些书籍和刊物多为介绍基督教教义，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情况，包括议会制度等等。第二个途径是洋务派办的江南制造局。该局附设翻译馆，1871—1879年翻译书刊达90种，其中自然科学47种，工艺军事45种，共83000册。第三个途径是中国的外交使节，他们出国多半写了日记，如曾纪泽、郭嵩焘、薛福成等，他们在日记中将在西方的所见所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眼界大开。

三、仇洋心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略中国，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视外国为敌国，由此牵连到对西学、西教的态度。有一士子问大学士阎敬铭：“今世正士，谁善外交？”阎答：“焉有正士，而屑为此者。”郑观应说：人们一谈西学，便被目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学外语，便嘲笑为“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同文馆是学习外语的

地方，孔门弟子竟请洋鬼子当教师。要不要学习科学技术？有人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也很先进，为什么要学西欧。倭仁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直隶知州杨廷熙奏：“丧师辱国最为可耻，而羞不知星宿之士，忘大耻而务于小耻。”他认为学天文何必学外国，找外国人？“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术机巧而在政治修明。”要不要修铁路？大臣回奏，外国传教士传教流毒城市，尚有穷乡僻壤还未到达，若修建铁路，四通八达，“则愚妇村氓不难尽被煽惑，冠裳化为鳞公，礼义必至消亡，是有害于风俗也。”这样，有人奏：“朝廷深知铁路一开，不啻开门揖盗。”有人说设电线、修铁路，是破坏风水，惊动了祖宗墓丘。郭嵩焘是出使英国的外交使节，他在日记中承认西方有胜过中国的地方，便遭到攻击、诽谤、围攻。

四、洋货在中国市场的畅销。西方的食品、日用百货商品倾销到中国，充斥市场，引起了人们生活的变化和社会习俗风尚的变化。中国各大城市市民爱好洋货，以用洋货为体面，讲究气派。如酒，外国的香槟、葡萄酒、白兰地、啤酒，国人“初疑之，继而试之，终乃甘之，大餐酒馆，遍于通商名埠，综计入口之酒，岁不下千万金。又如卷烟，烟草生于吕宋，厥后推广，卷烟出于南洋，比来四海风行，无人不嗜，近日纸烟入口，约不下数百万金。英人日人，均在上海设厂，收储制造，就地发卖。饼干：华人嗜之，尤胜于彼，铁盒包装，友朋投赠，视为珍宝，腹地通行销售尤广。咖啡：一物始自非洲，西人分种，西欧各国，人咸嗜之。西人嗜之，与茶相同。华人嗜之，又过于西人”。据陈炽记述，当时西方进口的日用商品还有玻璃、油蜡（煤油和洋蜡）、自来火（火柴）、钟表、肥皂（香皂）、刀针、磁漆、西药八大项目。他曾描述：“西绿洋红，皆成巨款，笺纸签筒之文具，石印铅字之汽机，面粉、口脂、藤床、钢榻，种种洋物，触目皆然。中国虽强安得不弱，中国虽富安得不贫，天下有心人所为蒿目而忧攘腕而起也。”这种西欧商品潮水似地占领中国市场，冲击中国市场，逼迫着中国商人也要适应市民的心理，将食品工业，日用百货业的各项指标都要改进提高，跻身于近代的行列，与外国资本主义竞争，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洋务派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和倾向的地主官僚集团，早期维新派是代表正在转化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愿望和倾向的知识分子群体。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关系密切，有些人即是洋务派幕僚。他们曾是洋务运动的参与者、追随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所经历的政治生涯不同，他们的认识与洋务派发生了分歧，甚至对洋务运动提出了温和的批评，他们维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利益，认识更加深化，认为单纯科学技术不能使国家富强，政治改革涉及到商会、教育、议会制度的试行等等。早期维新派是洋务运动中比较进步的一股力量，代表着一种舆论和思潮，但是，他们并不掌大权，仅仅是舆论鼓吹，而且也是各自为政，在社会上舆论趋向，从个别具体

《大学士倭仁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奏折》，《洋务运动》第2册，第30页。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杨廷熙奏折》，《洋务运动》第2册，第43页。

《河南道监察御史余联元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八日奏折》，《洋务运动》第6册，第206页。

《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光绪十年十二月一日奏折》，《洋务运动》第6册，第174页。

以上记载采自陈炽：《饮食之工说》，《续富国策》卷3，载《西政丛书》第30册，光绪二十三年。

陈炽：《器用之工说》，《续富国策》卷3。

的人物来看，当然也各不相同，总的趋向是他们要求改革，但是呼声尚是零星的，态度亦是软弱的。他们的舆论是在上述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早期维新派人物较多，时间跨度亦较长，我们只能举出一些人，提出一些共同的问题来探讨，至于政治、经济主张便从略，偏重于文化思想方面。我们选择王韬、马建忠、郑观应、陈炽四个具有代表的人物，分析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洋务派我们选择张之洞，他在文化思想方面具有代表性。

第二节 王韬 马建忠 郑观应 陈炽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又更名瀚。字兰卿，又字懒今。后更名韬，字仲弢，号紫铨，自号天南遁叟，又曰弢园老民。江苏长洲人。出身于苏州城外长洲之甫里村。家境较贫困，父亲是一塾师。1849年到上海受雇于墨海书馆，担任翻译工作，历13年。1862年探亲回乡，曾化名黄畹给太平军苏州当局写信提过建议，信为清军查获，清政府通缉王韬，他逃到香港。在香港他帮助翻译各译书，1867—1870随理雅各到法国、英国，看到了许多新鲜事物，还在英国牛津大学做过讲演。回香港后，1874年办《循环日报》，鼓吹变法思想。1879年游历日本，受到日本学术界人士欢迎。1884年回到上海，主持格致书院，热心宣传西学，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王韬的贡献是他传播西学，著作有《火器略谈》、《西学图说》、《西国天文源流》、《西学原始考》、《重学浅说》、《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等，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和军事制造方面的知识，同时，又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方面的知识。他的另一大贡献是将中国古典典籍介绍给西方读者。理雅各翻译一套《中国经典》，共28卷，其中包括《书经》、《诗经》、《春秋左氏传》、《礼记》、《易经》等，而这些书的翻译得力于王韬。理雅各说“抑译者亦不能不感激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之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博通中国典籍者。”这样才使译著有较高的质量。王韬在中西学的双向交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少时在上海学习拉丁文、法文、英文和外国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长期任李鸿章的幕僚。1875年留学法国，学业成绩优异。回国后在李鸿章手下参加外交活动、经济活动。1882年回家，从事著述。马建忠的著作有《适可斋记言》、《马氏文通》等。《马氏文通》是同他哥哥马相伯合著的，署名单列马建忠。

郑观应（1842—1922）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罗浮山人。广东香山，买办出身，在英国宝顺、太古洋行办事30多年。后来参与洋务派兴办的企业，协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办过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厂、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等。他的著作有《盛世危言》、《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他是一个实业家，有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政治主张是改良的，还有一些道家思想。

陈炽（1855—1900）字次亮，原名家瑶，后称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1879年游历各地，到过福建、广东，并到香港、澳门考察，阅读西书很勤，

转引罗香林：《王韬在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之关系》，《清华学报》（台）1961年6月号。

陈炽胞弟陈焘编《白溪陈氏十一修族谱》载：“（陈炽）清咸丰乙卯四月初七日吉时生，光绪庚子五月十三日午时歿于京都赣宁新馆”，据此当为1855—1900。见《争鸣》（南昌），1987年第2期。

在京师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军机处章京等职，曾参加北京强学会，为提调。他的政治建议受到户部尚书翁同龢的重视。戊戌变法失败后抑郁不得志。他的著作有《庸书》、《续富国策》。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入侵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很关心，对农业、商业、工业如何发展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中肯的建议，希望中国走向经济繁荣，国力增强。

哲学

王韬对西学认识较深。1873年曾撰文介绍《英人培根》，介绍他的《新工具》一书。培根是16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经验主义创始人。他反对神学，冲破经院哲学，提倡科学。王韬介绍说：“盖培名著《格物穷理新法》前此无有人言者。其言务在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他所说《格物穷理新法》即《新工具》一书，说明两点：一、他的方法是归纳法，用归纳法论证事物得出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二、反对偶像崇拜，不为古来经典所囿。培根反对神学，以经验实验为准绳，格致之学是实事求是之学。

西方的科学是实事求是之学，当时也有其他思想家得出共同的认识。如郭嵩焘说：“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使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郑观应说：西学“无论一材一艺，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

王韬看到西方科学比中国发达，致使船坚炮利，其应用技术尤比中国强。他敏锐地看到世界形势的发展，六合将混为一，道同而理一。六合是上下东南西北，即全世界。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引起交通事业的发达，铁路、轮船，四通八达，把各大洲、各国、东西两半球，都沟通、联系起来，建立了世界市场，商品输送到各地，世界各地人的足迹无所不至。这样世界“合一”的征兆便出现了。他说：“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盖人心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将见不数百年，道同而理一，而地球之人，遂可为一家。”他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出现圣君贤相上面，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发挥国人聪明才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都能“窥其奥而擅其长”。这样：“凡今日挟其长以凌制我中国者，皆中国之所取法而资以混一土宇也。”

怎样才能赶上西方呢？王韬认为必须变通，学习西法。道贵乎因时制宜，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样变通是形势所迫，变通是合理的。他说：“盖至此时不得不变古以通今者，势也。”“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也。”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西学可不可以学？二是西学

《瓮牖余谈》卷2，清上海申报馆刊印，第6页。

《郭嵩焘日记》卷3，第731页。

《考试上》，《盛世危言》卷1，光绪二十一年，第13页。

《原道》，《弢园文录外编》卷1，中华书局1959年，第2页。

《地球图跋》，《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280页。

《六合将混为一》，《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38页。

《变法上》，《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2页。

《变法上》，《弢园文录外编》卷1，第11页。

与中学是不是器与道的关系？早期维新派的回答是：一、西学中源说；二、道器统一不可分离论。

第一，西学中源说。

对于西学能不能学？学习西学是否合理？一直存在争论。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是文明古国，周围国家是蛮夷禽兽之国，文化落后，因此，只能是以夏变夷，从来没有听说过：“以夷变夏”。向外国人学习，便是以夷变夏，这是荒谬的，不合理的事。西学东渐，西学是科学技术，光学、电学、机器物理、化学、矿学，由于这些学科的发达，又引出一系列新的机器、轮船、火车、大炮等。这些学问中国知识分子都很陌生，他们从小专攻四书五经，研究道德伦常，与西方科学知识内容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认为中国擅长的是道，西方擅长的是器。中国原来也包括器的，但是后来这套科学技术“器”的研究没有被重视，失传了，传到西方去了。早期维新派便编造一个有志之士抱器西行的假说，这就是西学源于中学说。他们说：礼失求诸野，我们现在又向西方学习，学的即是我们传过去的东西，中国古已有之，传到西方，现在“天将器还中国”，我们又学习，这是合理的，必要的。

西学的内涵，随着人们的理解，时间的推移，逐渐有所扩展。早期维新派对西学的“器”的部分，（从文化角度来讲即物质部分）来源于中学，举了许多例子。

王韬说：“祖冲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造；杨么之轮舟，鼓轮激水，其行如飞；此非欧洲大轮战舰之滥觞乎！……电气则由试琥珀法而出者也，时辰钟则明扬州人所自行制造者也。此外，测天仪器，何一非由璿玑玉衡而来哉！……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不因此而益信哉！”

薛福成说：“如《尧典》之定四时，《周髀》之传算术，西人星算之学，未始不权舆于此。”“《墨子》一书导西学之先者甚多，……如第九卷《经说下》篇，光学、重学之所自出也。第十三卷《鲁问》、《公输》数篇，机器、船械之学之所自出也。”“《庄子·外物》篇云：‘木与木相摩，则燃；金与火相守，则流。’此电学、化学之权舆也。《齐物论》篇云：‘一与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秋水》篇云：‘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也，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此天算之学，与地之学之滥觞也。”

他们说西方的光学、重学、化学、算学、天文学、机器制造、医学等，中国古已有之，得出结论：“所谓西学者，无非中国数千年来所创，彼袭而精究之。分门别类，愈推愈广。所以蒸蒸日上，青出于蓝也。”西学来源于中国，不过，制造更加精巧，超过了中国。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他们认为西方的政教符合中国的《周礼》。陈炽在《盛世危言》序中说：“公法睦邻，犹秉用礼”。汤震在《危言》中说：“大氏西人政教泰半本之《周官》。”宋育仁在《采风记》中说：“其上院则古世卿，《周礼》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朝士掌治朝之世，有众庶在焉，然则，

《原学》，《弢园文录外编》，第2—3页。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68页。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191—192页。

《续出使日记》，《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20页。

《周礼》并有上议院在。”薛福成说：“《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西国之设上议院，颇得此意。”又说：“《淮南子·主术训》曰：‘众智所为，则无不成也。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西国各学各事之所以能胜人者，率用此术，即其用人行政之有议院，工商诸务之有公司，亦合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所以鲜有败事也。”这里牵涉到议院、公司，这是文化的心物相结合的层面，这意味着西学内涵的扩展和学习西学范围之推广。郑观应将西学分为三类：一类是天学，以天文为纲，算学、历法、电学、光学诸艺包括在内。二是地学，地舆为纲，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包括在内。三是人学，以方言文字为纲，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包括在内。他说这都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并非奇技淫巧。这种分类方法并不科学，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政教”亦列在西学，也应学习。按他的理解，“议院”也是“器”，可“用”。这倒是他与洋务派的不同之处。不变者道，道是三纲五常伦理观念，以及这种观念指导下的君主制度，这是不能变动的。但是，早期维新派比洋务派只吸取西方机器（物质层面）部分推进了一步，他们想输入西方机器之后，也想将机器背后的西方政治制度加以部分采纳，将政教纳入“器”的范畴之中。

早期维新派的西学中源说是为学西学找到一种合理的根据，为学西学创造一种有利的条件，而且证明学西学是刻不容缓的事，将它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在列强环伺的条件下，不学机械枪炮轮船火车及其商务、外交知识则无法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无法在世界市场立足，那种重道轻器，重理论轻实践的观念和社会风气已不能适应物质发明创造日新月异的年代了。西学中源说第二个作用，是为了对付顽固派的一种策略，顶住社会守旧思想的压力。学习西学实际上是恢复中国古代重视技术的优秀传统，使人们在心理上找到了平衡。

第二，道器统一论。

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道和器，一是本，一是末，重道轻器。而早期维新派则认为道和器是统一的，两者不可分离，孰轻孰重？轻视器也是不对的。王韬说：“道以成器，而器以载道，二者无相离也。”又说：“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郑观应说：“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

郑观应在这里引用两个范畴，一是“道体器用”，另一个是“器体道用”。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191页。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190页。

《西学》，《盛世危言》卷1，第8页。

《格致书院课艺》（己丑卷），序。

《原道》，《弢园文录外编》，第2页。

《道器》，《盛世危言》卷1，第2页。

他的意思是道和器两者是不可分的，因为规律是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存的。只有通过具体事物的研究才能发现其规律，而规律（道）是在具体事物（器）中才体现出来的。器载道，体现道，促进道通。这种思想，实质上，说明西方的“器”是一种媒介，可将西方的“道”传播到中国来。它的意义是要求人们重视西方的“器”，将道与器放到平等、相辅相成的地位上，重视西方物质上的器，也为进一步学西学的第三个层面（思想、学说、精神）创造条件，作了很好的准备。

早期维新派的西学中源说、道器统一论，使人们解放思想，冲破传统观念，敢于学西学，为学西学争一席之地，打破了重道轻艺的传统观点，接触“实学”，去从事实际的学问，寻求真理。但是，这种理论确有它不科学、不正确的地方。西学有它自己的来源，有些发明创造是由中国传到西方，这也是事实，但不能以一概全，这样的说法便抹煞、混淆了中国古学和近代西学的本质区别。要从中国古书中找根据，说西学中国古已有之，这实是一种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的方法。严复说：中国士人有一种“意欲扬己抑人，夸张博雅”的心理，便在“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并无新奇。”这样的说法其危害之一，是更加崇古，“必谓事事必古之从，又常以不及古为恨”。其危害之二，是造成学术研究的一大思想障碍。“于是武断支离，牵合虚造，诬古人而厚自欺，大为学问之障碍。”严复的这种评论和分析可谓击中要害。

历史学

王韬在 1870 年编撰了《法国志略》，1873 年编撰《普法战纪》。这是两部历史著作。

1867 年冬到 1870 年，王韬随理雅各到英国住了两年多，途经法国，两次在法国逗留，到过马赛、里昂、巴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知道了法国，便可知道欧洲，知道了法国的盛衰之理，便可为中国提供史鉴。于是他应江苏巡抚丁日昌之邀请，编了一部《法国图说》。在这部书基础上，搜集文字资料，扩编为《法国志略》，共 14 卷，15 万字。1890 年增订为 24 卷，共 23 万字。内容从古代历史一直讲到近代，近代则详细叙述，对法国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法国大革命历史，拿破仑第一帝国兴衰史，拿破仑法典都有介绍和评论，书中又介绍了法国财政、通商、外交、教育、军事等状况，比魏源的《海国图志》要更详细、完备、精确。

《普法战纪》是一部欧洲当代战争史。王韬此时在香港，他根据英国邮传电报中对普法战争的报道消息，译编成册，并加以论述。当时有张宗良（芝轩）和陈蔼廷帮助他翻译（张芝轩是广东南海人，精通外语，熟悉欧洲形势，曾著《驭外刍言》一书。陈蔼廷是广东新会人，曾在英国衙署中任职，深知法律，当时为《西字日报》编辑）。他又搜集其他的资料，汇编成书。他说：“余摭拾其前后战事，汇为一书，凡十有四卷，大抵取资于日报者十之四、五，为张君芝轩所口译者十之四，网罗搜采，得自他处者十之二、三。”

王夫之的道器观，讲“道体器用”，同时，又讲“器体道用”。他说：“天下唯器而已矣。”“尽器则道在其中矣。”“实道而器虚”。参看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卷 5。

以上引文均引自《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52、51 页。

《普法战纪·前序》，弢园王氏藏版 1895 年，第 1 页。

初稿于 1873 年在中华印务局出版。后来，他又参考了《日耳曼史》、《法国图志》以及美国麦吉雅撰的《普法战纪》等书，将 1872—1874 三年的大事都编进书内，增订为 20 卷本，1875 年出版。现在通行的版本是光绪乙未（1895）重刊的弢园王氏刊，遁叟手抄本。

王韬在《普法战纪》中综论国家强盛和衰落的规律，普法战争的性质和起因，战争双方胜负的原因，以及欧洲和世界情势变化发展的趋势。他认为中国要仔细观察欧洲形势、世界形势发生的变化，制定我国的外交政策，借此时机制定我国的内政方针。王韬表示：“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此羁臣之职也。”“恒思得当以报国家。”

在《普法战纪》第 16 卷，王韬详细记述了巴黎公社史。不过，王韬得到的材料是英国邮传报道，是站在官方立场的，所以王韬把梯也尔作为正面人物，把巴黎公社的民众看为乱贼。他对巴黎公社无产者掌握政权的性质并无认识，也不理解。即使这样，整个历史过程叙述基本是真实的。

对于梯也尔从凡尔赛率军回到巴黎，镇压屠杀巴黎公社民众，其屠杀之残忍，王韬在记述中寓含了批评之意。他记述说：“法军之剿贼也，过于残酷，所擒无论妇女童稚，苟持械之手者，立置死地，无一毫怜悯心，乱党既平，匪徒尽戮。”他对巴黎公社的妇女战士英勇斗争给予了高度赞扬。

普法战争、巴黎公社的历史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王韬用敏锐的历史眼光将其历程记载下来加以评述，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珍贵的史著。

王韬的史著研究从崇古的气氛中挣脱出来，转向近代史的研究，从封闭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转向世界历史的研究，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范围，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对人们思想有着启迪的作用。

文字语言学

马建忠于 1895 年撰《马氏文通》一书，33 万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汉语语法的理论专著。

中国语言文字学旧称“小学”，清代研究成绩卓然，分三部分，一是文字，篆、隶、正、行、草，字体的演变流源；第二是音韵；第三是训诂，讲字的意思。惟独对语法没有系统的研究。刘淇《助字辨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讲静字、动字。王引之《经传释词》讲到一些语法现象。但是，这些都是零散的。马建忠懂拉丁文、希腊文、英文、法文，懂拉丁文语法，使用西语语法来分析中国古代汉语的语法，实属首创。为什么要进行这一项研究工作呢？马建忠感到中国人从小识字，读书，懂古文，会写文章，靠的是一种背诵的办法，“书读千遍，其意自现”。“文选烂，秀才半。”“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亦会吟”。对中国古文的结构，字词的用法，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习古文花去了许多时间，但也不一定懂得了作文。西方人读书明理过文字这一关便容易多了，他们掌握了运用语言文字，便进一步掌握科学知识。他们掌握语文靠语法，从语法中了解其意义。马建忠认为，中国人民如果也掌握语法规律，便能缩短学习语文的年限，便能腾出时间来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用的知识。这样，在和外国竞争中，便不会显得贤愚优劣之不齐。他将学习语法作为国民提高素质、富强国家的需要，

《普法战纪·代序》。

《普法战纪》卷 16，第 15 页。

也作为中西文化的结合点和中西文化沟通的联结点。中国知识分子掌握语法规律引起了中国人学习方法的重大变革。

《马氏文通》全书分十卷。第一卷是大纲，字分实和虚，实字分名、代、动、静、状五种，虚字分介、连、助、叹四种。卷二是代字，卷三是位次，卷四是动字，卷五亦是动字，卷六是状字，卷七是介字，卷八是连字，卷九是助字，卷十是句读。其中静字，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形容词，还包括了数词，量词在内。在卷三中分析。全书广搜例句达 7326 例，相当详尽。他用分析、归纳的方法，用西方语法，分析中国古代汉语的特点，寻求其规律，创立新的完整的体系，自成一家之言，使汉语语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他自己说：“爱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盖将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奥秘，后其緘滕，启后人以先路。”他的开创性的劳动开创了中国汉语语法学，为中国汉语语法（包括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他的书出版以后，黎锦熙撰写《新著国语法》（1924 年），杨树达撰写《高等国语法》（1929 年），吕叔湘撰写《中国文法要略》（1942 年），王力撰写《中国现代语法》（1943 年），这些书籍都在汉语语法学中有极大的贡献，他们都是继承了《马氏文通》的成就进而拓展了语法学的，达到了新的水平。马建忠先路开创之功，不可泯灭！杨树达评价说：“自马氏著《文通》而吾国始有文法书，盖近四十年来应用欧洲科学于吾国之第一部著作也。其功之伟大，不俟论矣。”信哉斯言。

西学东渐引起了传统观念的哪些变化？洋务派认识和了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是通过三件事：用兵、交涉、商务。西国用兵的目的仍在商务。开辟商埠，商品输入。中国人对商务并不理解，争利而已。中国是礼仪之邦，重仁义而轻功利。人们逐渐认识到商务的重要意义。第一，商务打通了内外隔绝的关系，闭关锁国的格局被打破了，世界连成一体。马建忠说：“夫处今之世，轮舟铁道梭织寰中，而欲自囿一隅，禁绝外往来，势必不能。”陈炽说：通商六十年以来，“无古今，无中外，无华夷，无物我，人而已矣。……无町畦，无畛域，无边际，无端倪，一而已矣。”对于“政与教，善者取之，不善者素之，有益于国者行之，否则斥之。”第二，重农还是重商。商这个词很笼统。商人，近代概念则商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都包容在内。早期维新派观察结果，外国重商，以商立国，而且“工者，商之本也。”

商业的繁荣要有工业作为基础和后盾。商民富有，国家便兴盛，马建忠写“富民说”。要让民族资本家富起来。中国重农，手工技术操作，产品自给自足，商品农产品较少，农业水平很低，农业需要机器来装备它。陈炽说西方讲究农学，是科学种田、兴修水利，蚕桑、葡萄、烟叶、咖啡、果树的种植，加上机器制茶、榨糖、制烟，这样，农民便富有起来。第三，如何看待“利”。陈炽说：“天下滔滔，大抵皆中人耳。惟有利而后能知义，惟有义而后可以获利。圣人立身行义，舍生取义，而治国平天下之经，不讳言利。且日亟亟

《马氏文通·序》，《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11 页。

《马氏文通刊误自序》，《马氏文通刊误》卷首，第 1 页。

《巴黎复友人书》，《适可斋记言》卷 2，中华书局 1960 年，第 43 页。

《续富国策自叙》，《续富国策》卷首，载《西政丛书》第 30 册，光绪二十三年。

《续富国策自叙》，《续富国策》卷首，载《西政丛书》第 30 册，光绪二十三年。

《考工》，《庸书内外篇》卷 5，载《西政丛书》第 29 册，光绪二十三年。

焉所以利之者，圣人之仁也。即圣人之义也。盖为天下之中人计也，公其利于天下，溥其利于万民，即以食其利于国家，享有利于后世，故天下之工于言利者，莫圣人之若也。”马建忠说：“西人以利为先。”“西洋政治，大都重利以尚信。”他们不讳言富，不讳言利。一方面说西国是如此。另一方面说明利己而同时也利民、利国，不违背圣人的本意，使论点合法化。第四，尊君和重民。尊君与重民并不矛盾，早期维新派要求君主对“民”要重视，这个“民”实际上是官绅。而民的政治权利只是提提意见而已。他们看到英国有女王，便认为君主威严仍是最高的。所以，他们对议院的议论很多，最突出看重的一点是上下相通，上下团结一致，国家强盛，而对民主意识则论述相当简略，民主学说则尚未涉及。以上所述：打破封闭状态、重商、言利以及重民，这是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先进的部分，这些思想已经向传统观念发动了严重的挑战，然则，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是走向近代化的序幕刚刚揭开而已。

第三节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直隶南皮人。生于贵州省兴义府，父亲张瑛任兴义府知府。咸丰五年（1855）张瑛镇压斋教首领杨凤发动的农民起义时，张之洞18岁，对此事印象深刻。同治三年（1863）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的考官、四川学政等职。门生中多为著名学者，如袁昶、许景澄、孙诒让、谭廷献、王棻等。他在湖北建立经心书院，在四川创尊经书院，聘请通才宿士如缪荃孙、樊增祥、王懿荣、蒯光典、左绍左、易顺鼎等教育士子讲学，颇有成就。光绪五年（1879）授左春坊中允，上书弹劾崇厚签订《里瓦基亚条约》的妥协罪状，要求治罪，成为清流派的首领。当时北派清流派以李鸿藻为首，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被称为翰林四谏。张之洞驳斥李鸿章妥协投降言论，很有力量，得到慈禧太后赏识。光绪七年（1881）任山西巡抚，凡三年。在山西整顿吏治，严禁鸦片，创办令德堂，遇见了传教士李提摩太，读其《救时要务》小册子，参观机器仪器，对洋务发生兴趣。光绪十年（1884）调任两广总督，凡六年。在此期间，他筹划抗法，加强防务。1885年他请出前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援桂，驻镇南关，打了胜仗。他筹饷军械，支援战争，成绩卓著。在广东他设缫丝局、枪炮局，开矿务局、制铁厂等，这是他经营洋务企业的开始。在广州他又继阮元办学海堂后，设广雅书院，聘请朱一新、梁鼎芬主讲。光绪十五年（1889）冬他调任湖广总督，凡18年。其间曾调任两江总督一年零四个月，后又回到湖广总督本任。在这期间，他兴办了洋务企业，计汉阳铁厂。这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十个。炼炉两座，工人三千，采煤工人一千，为近代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重工业。他还办了湖北织布局、纺织局、缫丝局、制麻局等四局，还有湖北枪炮厂等，还修筑芦汉铁路。这样，他便成为后起的著名洋务派。

《分建学堂说》，《续富国策》卷4。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记言》卷2，第31页。

《玛赛复友人书》，《适可斋记言》卷2，第45页。

在他任湖广总督期间，湖北各地反教会侵略运动此起彼伏，有的规模浩大，哥老会、大刀会等秘密结社成为组织者领导者，掀起了武装斗争和农民起义。张之洞采取维护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利益，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方针，派军队残酷镇压。包括宜昌教案（1891）、麻城教案（1893）、宜施教案等。但是，人民群众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清朝政府腐败统治的力量是蕴藏得很深的。张之洞愈扑火愈烈，他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

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张之洞对维新派的革新运动是支持的。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已是北京强学会成员，促成上海强学会成立。回到湖广总督任内，他赞成湖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陈宝箴在湖南推动新政，也得到张之洞的赞同，《湘学报》发行也推广到湖北省各州县。但是张之洞对民权思想并不赞成，对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也不赞同，尤其对以孔子纪元纪年，孔子改制那一套表示不满。康每有过激的言论发表，他看了后便加以训斥、规劝，采取措施加以限制。随着戊戌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维新派同张之洞的意见分歧也愈加明显。1898年3月他便起草《劝学篇》，稿成，进呈皇帝。他说此书主旨在正人心开风气。正人心是提倡“三纲五常”，维护君主制度，开风气是学西方铁路、商务、矿务、学堂等，并没有越出洋务运动的范围。此书和维新派民权思想截然不同。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奉旨调京。据说朝廷准备委职让张之洞来主持维新变法大政。25日到上海，得到通知，说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返回湖北原任，处理教案。但因翁同龢的阻挠，使这一调动任职未能实现。

戊戌政变后，凡是与变法运动有牵连的官吏都受到惩处，惟独张之洞免议。其原因就是《劝学篇》成了他的护身符，保护他安然渡过了这一关。

光绪二十六年（1900）张之洞镇压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之洞和刘坤一共同上了三个奏折，史称：《江楚三折》，提出了新政的建议。光绪二十九年（1904）清朝政府批准了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兴办学堂，自1906年始，全国停止科举制度，兴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7）张之洞由协办大学士升为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但是这时张之洞已70高龄，精力远远不行了。清政府也更是危机重重，颓势无法挽回了。中央政府内部党争激烈，满汉矛盾尖锐，张之洞便努力“调停”，竭力为清政府补苴罅漏，亦无济于事。1909年去世。汪充甫挽联：“匡时头白调停策，绝笔伤心讽谕诗。”说张之洞像宋朝大臣范尧夫（纯仁）那样，以博大开上意，忠笃革士风，调停头白。张之洞写一诗：“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须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这首诗写于宣统元年六月，成为他的绝笔。

张之洞是后起的著名的洋务派，他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有所不同。第一，他自己没有一支自编的军队，没有指挥过战争，未成为军阀集团的首领。第二，他重视办教育，他着手经办的学堂很多，山西令德堂、广州广雅书院、四川尊经书院、湖北经心、西湖、江汉书院以及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南京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制定了学制改革方案，废除科举制度，在全国兴学校，实现了近代教育体制改革。在对外态度上他主张抗御外敌。在文化上，他正

张达骧、李石孙：《张之洞事迹述闻》，《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按：张达骧是张之万的孙子，张之洞的侄孙。此诗载入陈衍编《近代诗钞》第8册，张之洞，第12页。

统保守思想比较浓厚。而对西学在技艺、商务、外交知识方面比较开放，主张学习。在维护“三纲五常”和君主制方面，则和顽固派的态度无甚区别。可以说，张之洞的思想是正统传统文化思想的延续。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很具有代表性。

哲学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论断最早并不是张之洞提出来的。早在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便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早表述。洋务派李鸿章发展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仿造机器，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成社会实践。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及铁路的兴建，为社会发生巨大变动准备了物质基础。

1898年孙家鼐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定立宗旨，说：“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为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这里讲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指的教育方针。

张之洞的《劝学篇》著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他一开头便说，“图新时者言新学，虑言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他说得不偏不倚，貌似公正，实际上政治倾向是反对维新派，维护封建君主制。

体用这一对哲学范畴，一种理解是指同一物体本身结构及其外部的效能，本身结构为体，其外部效能为用。另一种理解是指两种事物相比较，一主一辅，一本一末。张之洞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沆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从静态来看，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张之洞讲清了物质的内部层次和外部层次，明确了位置。由此，从动态来看，有变动的部分，有不变动的部分。他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从文化角度来看，思想意识道德伦理是属于文化的内核层次，这是不能变动的。政制、机械、工艺属于文化的中层和表面层次，则是可以变动的。

中学是什么？张之洞认为是儒家思想，圣道就是“三纲五常”。他独尊儒术，排除诸子百家，认为诸子学说都不可相信，相信便会走上歧路。申不害、商鞅、韩非等法家不讲诚德，废孝弟仁义，惨刻寡恩，是不能学的。老子庄子空疏、墨子狂悖、荀子后学亦非儒学正统。他严格遵循董仲舒所解释的天道—三纲—君主制，而反对康有为所解释的今文经学，聚众保教、托古改制那一套学说，他认为保国就是保大清，保教不必聚众结成团体，遏止维新变法运动的推行。

《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津河广仁堂校刻本，清光绪九年，第8页。

《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政要》第22卷，上海崇义堂，清宣统元年，第21页。

《序》，《劝学篇·上》，《张文襄公全集》卷202，北平文华1928年，第1—2页。

《会通》，《劝学篇·下》，《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48页。

《变法》，《劝学篇·下》，《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19页。

西学是什么？张之洞把西学分为三部分，一是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都包括在内。二是西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三是西史，西方国家的历史。洋务派从事洋务活动所需要掌握和具备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的知识，通商、外交、军事、国际公法知识，办教育的经验和知识。除此以外，他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学说、哲学思想是不需要也不能学的。他说：“两国哲学流派颇多，大略与战国之名家相近，又出入于佛家经论之间。大率皆推论天人消息之原，人情物理爱恶攻取之故。……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假使仅尚空谈，不过无用，若偏宕不返，则大患不可胜言矣。”他认为泰西哲学和中国佛、老、墨、法诸子学说相似，不是空谈，便是狂想，容易引起祸患，不能学习。

晚清学西学有五个阶段，属三个层次。第一阶段学船坚炮利，这是技艺，第二阶段，学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这是自然科学。以上为文化第一层次（物的层面）。第三阶段，学军制、商务、外交、财政、学校、议院，这是政制，是文化的第二层次（物与心的结合层面）。第四阶段，学民主、自由、平等学说，这是政治学说，所谓“教”，第五阶段，是进化论、唯物论、实证论等，是哲理，以上为文化第三个层次，属“心”的层面，是文化的最深层面。洋务派停留在第三阶段，维新派已进入第四、五阶段，盖学西学的理解并不相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观念，在封建思想笼罩一切时，是封建正统文化面临西学的第一次撞击时的一种反映，它基于中华民族的优越感，又要有接受西方文化的承受力，于是找到了一种心理平衡状态，把西学纳入，成为“西用”，为学西学争一席之地。洋务派又坚持着一条阵线，就是维护君主制，“三纲五常”。早期改良派强调道器统一论，想突破内学和外学的分别，经济上以工为本，政治上君民共主，接纳议院制度，实际上，西学的内涵已有突破洋务派的趋势。

随着维新派变法运动的展开，张之洞提倡“中体西用”理论，已经从洋务派对付顽固派的攻击，争取学习西学的合法权利的理论武器，转化到同顽固派站在一条阵线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同维新派作斗争的思想武器。历经三十年，学西学进入了更深层次，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以及哲理。洋务派则仍停留在“中体西用”上，反对民权观不遗余力，因此，在政治思想和立场方面都趋于保守了。

以上我们从政治方面来看，“中体西用”在三十年不同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

从文化教育方面来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仍然起着积极作用。洋务派办了许多学堂，为了培养专业人才，他们一方面制定教育方针，仍要为专制政体服务，灌输“三纲五常”道德准则。另一方面，在课程的安排上，西学所占比重约在80%左右。这样，实际上保证了对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培养成为有专长，有实际学问和能力的人。

从文化上来看，中国人在吸取西方文化知识时，仍不应忘记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这是对的。但是，对于传统文化如何吸取精华，去其糟粕，

则是一个较复杂、较困难的问题。因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种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人们一下子不能站得高，看得远。而且，各个时期，对精华糟粕的理解也不一样，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易于为保守的人抓住这一点保留较多的旧学，以巩固其统治。

史学

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在任四川学政期间，编了一本《书目答问》。这是一本目录学的专著。目录学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读书，该读哪些书？《书目答问》是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目录。此书张之洞委托著名学者缪荃荪帮助他编辑，他总其成。目录学，古代的书籍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可以参看。到了清朝，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了一万多部书，太浩繁，学者读时比较困难，仍有不知怎样入门之叹。张之洞考虑到这一点，想“以约驭繁”，他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这里，要为初学者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哪些是比较重要的书，第二，哪些是比较好的版本。于是他做了几步工作：（一）“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二）“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三）“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而选目的标准是：“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这样，初学者读书查找起来比较方便。张之洞把近一世纪以来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都搜集进去，读时更为精确。

陈衍记述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著《轺轩语》、《书目答问》教士。道咸以来，士溺于陈腐时艺，愈益不学；自是后进乃略识读书门径。有诋《书目》不尽翔实，稿非己出；然不害其励学爱士勤勤意也。”很公正、恰当地评价了《书目答问》所起的积极作用。《清史稿》记述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所取士多隽才，游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途径。”所记相同。康有为指导学士读书，“当知目录之学。……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版本最佳。可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张之洞关心教育，这本书是为考科举的士子们编辑的，而他治学眼光又偏重于经世致用，因此，在编辑时其范围又广了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一次整理，开了一个总帐目，全书选了书目二千多部，是晚清目录学的一本较好的书，直到现在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学

晚清诗坛分三派，一派是湖湘派，王闿运、邓辅纶为代表，他们提倡魏晋的诗。一派是江西诗派，陈三立、沈曾植为代表，他们提倡宋诗。还有一派便是张之洞为代表，他们不分唐宋，并咀英华，主张融宋意入唐格，弟子樊增祥、易顺鼎倾向晚唐诗。张之洞的诗，陈衍对之评价甚高，说：“相国

《书目答问略例》，《书目答问》卷首，上海古籍 1983 年，第 1—2 页。

《书目答问略例》，《书目答问》卷首，上海古籍 1983 年，第 1—2 页。

陈衍：《张之洞传》。转引自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 1986 年，第 260 页。

《张之洞列传》，引自《张文襄公全集》卷首。

《桂学答问》，《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 1988 年，第 38 页。

生平文字以奏议及古今体诗为第一，古体诗才力雄富，今体诗士马精妍，以发挥其名论特识。在南北宋诸大老中，兼有安阳（韩雄）、庐陵（欧阳修）、眉山（苏轼）、半山（王安石）、简斋（陈与义）、止斋（陈传良）、石湖（范成大）之胜。”张之洞对维新派谈改制，谈今文经，并不满意，诗中也时有流露，如《学术》一首：“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自注：“二十年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用诗表达了一种思想，认为维新变法的风气是从讲公羊，误入迷途成为邪说，龚自珍是轻浮的士子，王安石变法造成了混乱，政治上动乱由于学术上风气不正。所以他总认为康有为谈孔子改制是野狐禅，提倡魏晋文章，提倡北魏书法（碑学），甚至于学英文，唱乱弹（京剧）都是不正派的歪风邪气，他以正统卫道者自居，攻击不遗余力。举《哀六朝》为例：

古人愿逢舜与尧，今人攘臂学六朝，白昼埋头趋鬼窟，书体诡险文纤佻。上驷未解昭明选，变本妄托安吴包。始自江湖及场屋，两汉唐宋皆迁祧。神州陆沈六朝始，疆域碎裂羌戎骄。鸠摩神圣天师贵，末运所感儒风浇。玉台陋语繄袴斗，造像别字石工雕，亡国哀思乱乖怒，真人既出归烟销。今日六合幸清晏，败气胡令怪民招，睢水祆祠日众盛，蜡丁文字烦邦交，笛声流宕伶欢乐，眉髻愁惨民兴谣。河北老生喜常语，见此蹙额如闻泉。政无大小皆有雅，凡物不雅皆为妖。愿告礼官与祭酒，轺轩使者颁科条，文艺轻浮裴公揆，字体不正汉律标。中声九寸黄钟贵，康庄六达经途遥。宝篆绵绵亿万纪，吾道白日悬青霄。

这首诗反映了他的文化观。他维护正统文化结构，凡是与正统文化系列结构相异的，他都抱排斥态度。学术思想上，他反对今文经学，曾说：“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至光绪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说以煽乱，至今为梗。”文学思想上，他反对六朝骈体文。说：“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本无根底，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字强凑成篇者出黜之。书法不谙笔势结字，而隶楷杂糅，假托包派者亦然。谓此辈诡异险怪，欺世乱俗，习为愁惨之象，举世无宁宇矣。”这段话可为此诗作注解。他不喜秦腔、乱弹等，认为这是俗，俗能伤雅。俗文化起自民间，盛行社会，冲击及宫廷文化，雅文化，他便感到忧郁。有一注解：“今俗乐多秦声，噍杀羽音，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总之，他是维护正统，维护雅文化，反对革新风气和俗文化的流行。

1897年春，张之洞写了一组连珠诗。连珠是一种文体，始于汉章帝时，班固、贾逵、傅毅受诏作之，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彻悟，欲使历历如贯珠，故谓之连珠。据张之洞自己的说明是由晋朝陆机开始的。“陆士衡创演连珠，后世多效之，庾子山并用韵，然骈

《张文襄公全集》卷 227，诗集四。

《张文襄公全集》卷 227，诗集四。

《张文襄公全集》卷 225，诗集二，第 32—35 页。

《抱冰堂弟子记》，《张文襄公全集》卷 228，第 27 页。

《抱冰堂弟子记》，《张文襄公全集》卷 228，第 27 页。

《哀六朝·注释》，《广雅碎金及其他一种》，商务印书馆 1939 年。

终不能尽意。今以其体为诗，务在辞达而已。”这种诗是寓言诗，把一些意思含蓄地表达出来，而且还暗含时事都有所指。由于意思晦涩，他的门人沈善云、谭廷献、樊增祥、王棻、孙诒让、易顺鼎为他核刊，并作了一些解释，使诗意稍能猜测。我们举第一首：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知远心多危，知近心多偷。微生只须臾，苟乐且嬉游。所甘露头草，所便丛棘幽。霜寒即埽迹，潦至亦随流。宇宙固不问，谋身且不周。贤惜没世名，圣为百世谋。宣尼日栖皇，公旦思绸缪。天高可倚杵，海深或断流。阳乌畏仰射，六鳌妨重钩，吾闻尧与舜，日为天下忧。注释解释说：“此章切戒处高位者，无事时盘乐怠敖，必至于酿乱。故明君良相，常制治于未乱，曙戒于几先。”这一组诗共33首，其中有讲为学，为人的品德，作文，对名利态度，对求贤才，性格器识锤炼修养等各个方面，语重心长。这组诗含有深邃的哲理，凝结了张之洞饱经沧桑的阅历和处世哲学，又运用了丰富的历史上的典故，读起来较困难，寓意不是明说，细细揣摩真意，很难切贴，诗意不太浓，但有咀嚼的味道。

张之洞很重视古辈贤人。在广州立三君祠，祭祀虞翻、韩愈和苏辙。在湖北巡署内立十贤祠，祭祀诸葛亮、杜预、陶侃、张九龄、岳飞、卢象升、胡林翼等。他曾撰一对联：“不合时宜苏玉局，事多天成霍骠姚。”苏玉局指苏轼，他曾任玉局观提举，故名。霍骠姚指霍去病，他曾任骠骑将军。这联有自况之意。他的案头常放张居正的全集不时翻阅，并以张居正一诗“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的意思，自号无竞居士。

张之洞一生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思想正统，比较保守，对新时代的新思潮迎面扑来总抱着排拒态度。当然，他同封建的顽固派比较起来，是开明一些，而在文化上，他和曾国藩一样，是正统文化的延续者。但是，潮流总在前进，他那一套思想无疑是陈旧了，越来越显得不能适应现实社会了。

《张文襄公全集》，卷226，诗集三。

《张文襄公全集》，卷226，诗集三。

《广雅碎金及其他一种》。

《抱冰堂弟子记》，《张文襄公全集》卷228。

第五章维新派的维新思潮（上）

第一节从乙未到乙巳的文化思想趋向

从乙未（1895年）到乙巳（1905年），即从康有为等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到孙中山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一段是戊戌维新思潮时期。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思潮还在延续，革命思潮逐渐兴起，这一段维新思潮同革命思潮交错重合。同盟会成立则标志着革命思潮成为主流。

戊戌维新变法时期，有如下的文化现象：

新型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他们是由封建士大夫阶层逐渐转变而来的。他们第一个特点是群体意识加强。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他们勇敢地冲破了清朝严禁结党的条规，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组织群众团体，为拯救国家而奔走呼号。清朝接受明末的经验教训，统治者三令五申严禁结党、集会、讲学。龚自珍诗中表白：“但开风气不为师”，即表示无结党聚徒的政治野心，王韬要求广开言路，但是告诫士子不能“结党援立门户”，可见他们战战兢兢，深怕触犯清朝的陈规。而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有意培养改革之士子。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培养士子也继承了乃师的办学方针，北京强学会成立，继之各地学会纷纷成立。学会、学堂、报馆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形成一股潮流，说明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加强。第二个特点，是其领导人物在学术上自成理论体系，成一家之言。早期维新派对政治上的见解仅是提出具体的建议，对西学只是片断的介绍，始终没有融会贯通，成一家之言。康有为便吸取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就，改造传统文化结构，促使中西会通，构建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对政体改革到个人道德修养均有一套自圆其说的体系，颇能吸引士子。而且他身旁还有一群弟子为之鼓吹学说，造成舆论，形成风气。这样推动了政治变法运动。第三个特点是他们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投身于政治运动之中。龚自珍、魏源直至王韬、郑观应，他们是从事舆论宣传的，实际政治活动便参加甚少。而且，由于早期维新派多半是幕僚，他们只是处于协助洋务派的社会地位，并没有独立地领导政治改革。人们总有一种陈旧观念：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非常明白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不敢僭越。维新派则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虽是举人，但却上书议政，而且提出一套政治纲领，要求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教育上废除科举制度提倡西学，兴办学堂，军事上实行军事现代化，使中国以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他们企图让皇帝采纳他们的政治建议，用皇帝的上谕体现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又团结各阶层的官绅、学界、商界，形成一股社会改革的力量。可见他们比早期维新派更富有参政的色彩。第四个特点，他们思想中旧意识比较浓厚。这是因为他们刚刚转化为新型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原来都是地主阶级出身，或是官僚家庭，或是书香门第，他们都倾向仕途，企图以此报效国家，封建的“三纲五常”思想比较浓厚，旧思想转变比较缓慢，新旧思想矛盾交错。其时由地主、官僚、买办、商人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正在形成中，社会力量还不够强大，新旧思想杂糅，旧思想残存较多便不是奇怪的了。到了20世纪初，新型近代知识分子正式形成，它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现代化交通工具设施和文化新闻出版事业的发达。甲午战争后，各资本

主义国家在中国开设工厂，继之而来的是交通运输业的发达，火车、轮船、通信信息网络，将各大城市连结起来，将工厂和原料生产的销售市场联系起来，许多人汇集上海，来做工，做生意，使上海经济繁荣，交通四通八达，上海的商品运到各中小城市，同时，也将文化信息传播到各地。电信局业务繁忙，迅速传递信息。如苏州到上海，过去民船旅途要两、三天，《申报》隔两日才能到达。后来有了小火轮只要 15—16 个小时，《申报》传送便快些了。1902 年沪宁铁路建成，报刊杂志传送便更迅速了。商务印书馆 1897 年成立，夏瑞芳为总经理，1902 年张元济加入，任编译所所长。他们致力于发扬传统文化，又介绍西学，沟通中西文化。《东方杂志》1904 年创刊。报纸、刊物出版迅速，数量增多，这些大众传播媒介使人们广开智慧，消息灵通。由于读者文化程度的不同，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俗文学应运而生，白话报纸，白话刊物出刊，使知识得到普及和流传。经济的发展催促着文化的繁荣，上海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

传统文化体系结构发生变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动。这表现为今文经学的勃兴。明末遗民思想的复活和佛学、诸子学的兴起。从儒学内部来看，汉学是古文经学，偏重考据。今文经学偏重“微言大义”，谈公羊三世的历史变动说。廖平 1888 年撰写了《知圣篇》、《辟刘篇》，批评了刘歆篡改经书，惠栋、戴震的古文经是沿袭了刘歆的伪经，而真正的微言大义是孔子改制。这些思想影响了康有为，康有为将这些思想撰写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成为议政的专著和变法的理论著作。其次，表现为明末遗民思想的复活。这就是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思想被人们重视，重新提起。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学风上求实和经世之风，政治上“非君”的思想以及哲学上“道不离器”的观点等等。维新派发掘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是为了反对空洞的理学和繁琐的汉学，是为了推动政治改革。而且，将这些思想同西学比附，企图加以会通。所以复古是为了解放思想，革新政治。再次，是佛学思想研究兴趣的浓厚和诸子学的兴起。佛学思想在近代不绝如缕，一些思想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其影响。思想家研究佛理，一方面是发扬佛教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另一方面是阐发普渡众生的哲理，使之同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因此，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对诸子的思想，清朝学者已有人研究，如汪中之《荀卿子通论》、《墨子序》、《墨子后序》，毕沅之《老子道德经考异》，俞樾的《诸子平议》等，他们开了研究诸子学的先河。到了晚清，西学东渐，人们逐渐打破了“独尊儒术”的格局，又加上诸子中的思想有些又能与西学比附，他们便更加致力于诸子的思想探索了，如老庄的超越人生的处世态度、墨子任侠和兼爱思想，以及墨经中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关于名学的思想，都引起学者的兴趣。以上所说的思想都是与传统文化的正统思想立异，而与西学某些方面的认同，企图构建新文化系统。

第二节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生于南海西樵银塘乡，又称苏村，附近有西樵山，风景幽美。离西樵山七、八里简村有陈启源 1872 年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是民族工业较早的企业。叔祖懿修，任七县团练。叔祖国器，是左宗棠湘军的重要将领，

与太平军作战，辗转江西、广东、浙江等省，官至广西巡抚。归乡后建澹如楼，藏书万余卷。祖赞修，连州训导。父达初，候补知县。11岁父亲去世，随祖父读书，深受程朱理学的熏陶。他年轻时在澹如楼读书，广泛翻阅，达十多年，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1876年从师朱次琦。朱次琦，新会九江人，又称朱九江先生。朱是广东著名学者，是祖父赞修的好友，父亲达初的老师。朱次琦调和汉宋，重视程朱理学，兼采陆王，又重视史的研究，探求历史沿革。康有为从师三年，思想受其影响。在学习时，他爱独立思考，时发己见，如对韩愈认为学问浅薄，被师生斥为狂妄；偏喜王学，认为阳明学问活泼有用。他学习期间，便以经营天下为己任，有很大的政治抱负。1878年离师往西樵山白云洞坐禅两年。西樵山古木参天，繁花遍地，峰峦叠秀，飞瀑流泉，烟雾环绕，有一种神秘感。面对白云、明月，耳听松涛、虫鸟鸣唱，真如入神仙佳境一般。康有为在这种景色秀丽的环境中参悟佛理，探求人生道路，遇着京师回乡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会晤长谈，了解到京师风气和早期维新派的政论，极感兴趣。他又途经上海、广州、香港，到过租界参观，感到那里治国有法度，秩序井然，认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以蛮夷视之。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他进一步对旧学发生怀疑，而转向西学。在上海买了一大堆西书译本，回家钻研，天文、数学、物理、制度、西国地理，什么都看，深受教益，眼界大开。1888年上京乡试，第一次上书皇帝，提出“今之法例，虽云承列圣之旧，实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对封建专制制度挑战，大学士徐桐斥为狂生，书竟不达。康有为留下了“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的诗句，返回广州。

直接批评君主专制制度无人理睬，他便从学术上向旧思想挑战。1890年与廖平相晤于广州，交谈中受启发，看了廖平的文章，倾向今文经学。1891年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一般学堂讲理学、考据学、时文。他则致力于培养维新人才。他崇拜陈献章（白沙），崇尚道德，笃志力行，独立思考，议论政治，培养学生的参政意识。他用今文经学反对程朱理学的空谈性理，讲究王阳明心学，激励气节，保持精神，冲破“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束缚，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学生，认为治学莫大于救国，纵横回顾，有澄清天下之志。他用西学、史学、今文经学，贯通中西，纵论古今，广求智慧学问，以经世致用，为投身政治改革作好准备。他组织弟子门人编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搜集史料，选择排比，抄录校对，由他批注成书，使弟子们懂得怎样在编书中了解老师的理论体系。他的办学特点一是与旧思想体系相抗衡，建立新思想体系，二是他将学术研究同政治改革密切结合起来，学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学生中有陈千秋、梁启超、徐勤、韩文举、区槊甲等。

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发动“公车上书”的请愿活动，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提出了变法纲领。但是，“公车上书”，又称上清帝第二书，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光绪帝仍没有看到。会试，康有为中了进士，为工部主事而未到任。他接着上第三书，光绪帝看到了，表示赞同。这给康有为增加了信心和勇气。他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办《中外纪闻》，但不久学会被查封。他又回广州万木草堂讲学。

《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8页。

《感事》，《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2页。

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民族危机严重，康有为赶到北京，上清帝第五书。1898年1月，上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了维新派政治改革的纲领，要求制定宪法，实行西方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度，同时组织保国会，推动政治维新运动。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下诏变法，一直到9月21日，史称“百日维新”。康有为在此期间，不断向光绪帝献计献策，具体规划改革政策。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杨深秀等人入军机处任章京担负具体职务，推行新政，光绪帝连续下了60多道上谕，颁行新政，但是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新政效果甚微。慈禧太后9月21日发动政变，绞杀了新政。光绪帝被幽囚，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弟、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害。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康有为自戊戌政变后，长期流亡国外，转徙于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香港、印度，最后成为保皇派，拒绝与孙中山革命派合作，思想趋向保守。辛亥革命后，1913年回国，他在上海当上了孔教会会长，创办《不忍》杂志，提倡以孔教为国教。1917年到北京，为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帝制，这次复辟帝制几天工夫便被粉碎，康有为的政治生涯便结束了。1927年3月病逝于青岛，临终前他还起草奏折向清朝皇帝谢恩，可见他思想的顽固不化。

综观康有为的一生，在戊戌变法时期，他是个革新派，站在时代的前列，学术思想上敢于怀疑、立异，提出新看法，促使人们思想解放，推动学术前进，促进政治改革，丰富民族文化。他不仅在政治上参与维新运动，而且提倡社会上移风易俗。1883年他在家乡南海创不裹足会，女儿康同璧、同薇率先不缠足，开风气之先。他又提出辫子最好剪掉，机器操作容易裹缠辫子，发生危险。他还提出长袍不如西装短衣方便，他说跪拜匍匐在地，脑血倒流，不符合生理卫生，应以平等互相尊重观念代替尊卑等级观念，废除跪拜礼节。还有以君纪元，无益人道，建议用圣人孔子出生日纪元等等。但是，康有为的思想到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便趋向保守，保皇，他周游世界各国，眼界更扩大了，思想却不再前进。他到国外游览得出外国弑君频繁发生是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民国以后，他办孔教会，要人们拜天，拜孔子，说不拜天，不拜圣人，天给人生了膝盖又有什么用处呢？张勋复辟帝制，他成了帮凶，拉着历史车轮后退，成为人们的笑柄。在后期他是思想与行动充满矛盾的思想家。

哲学

一、本体论。世界是怎样形成的？康有为坚持唯物论观点。他谈哲学运用的是中国传统概念，内容却包含了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他引用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康德的星云说，拉普拉斯考证出的天王星、海王星，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物理学界的以太说等等。用这些学说来说明宇宙的起源、生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他运用的词汇仍是太极、太一、气、理、性等古典范畴，说：“若积气而成为天，磨励之久，热、重之力生矣，光、电之力生矣，原质变化而成焉，于是生日，日生地，地生物。”世界起源于元，元由气组成，气构成以太、星云、电，构成物，构成人。“凡物皆始于气，有

《理气篇》，《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992年，第195—196页。

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所以能生人生物者理也。……朱子谓理在气之先，其说非。”他非常明确地不同意朱熹理在气先的命题，是坚持了唯物论的提法。

他又有非常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说：“盖太极两仪之理，物不可不于一，有统一，而后能成；物不可不对为二，有对争，而后能进。”他认为天地万物内部都包含有对立统一的两面；气（冷、热）、力（吸、拒）、质（凝、流）、神（魂、魄）、形（方、圆）、光（黑、白）、声（清、浊）、体（雄、雌）称为八统，拒与吸两力是宇宙进化的动力。

他的这一理论，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断，天体是变动的。天圆地方、天尊地卑、天上地下，这些看法由于西方自然科学天文学的传入都发生了变化。天体在不断变化，地球围绕着太阳运行，无所谓上，无所谓下，因此，也无法区别天尊地卑，物体在无数层次的天空中演化发展。他28岁时，便用望远镜观察天空的星辰，“因推诸天之无量，即亦有无量之人物、政教、风俗、礼乐、文章焉，乃作诸天讲。”这种理论形成了他的社会发展论、社会改革论，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近代哲学的开始。

二、人性论。人的本性是怎样的？康有为认为人性是一种天赋的自然生理本能，可概括为爱恶二字。“人之生也，惟有爱恶而已。”爱指欲、喜、哀、乐。恶指惧、怒。欲是天性，人人都有欲。只有爱恶，无所谓“善、恶”。善恶是后天的标准，人性是善？是恶？孟子提性善，荀子提性恶，康有为倾向告子，无善无恶，后天学习，才能知善恶，所以可称康有为的人性论为“自然人性论”。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把理说成是天理。康有为反对，说：“理者，人之所立。贾谊谓立君臣，尊上下，此非天之所为，乃人之所设。故理者，人理也。”其次，他不承认有天理之性，只承认有气质之性。说：“实则性全是气质，所谓义理自气质出，不得强分也。”再次，他不承认有三品、贵贱之分，而认为应人人平等。“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他总的思想是：欲望是天生的，人应该有自主之权，精神方面的喜怒哀乐，物质方面的食色需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人性自然的流露，是积极的，合理的。封建社会的“善”，正好是压制人欲，而自然的人性正常的发展反而加上了“恶”的罪名，因此，康有为一反朱熹的论断，争取个性的自由，肯定世俗的欢乐，去苦求乐，群乐，是幸福，是一种人生的追求目标。

当然，不能纵欲，在满足欲望时不能损害他人。因此，需要“礼”，用人的理性加以限制和节制。怎样调节呢？其外部表现是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睦、姻、任、卹等。表现在内部为个人内心修养，用君子、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涵养性情、砥砺意志，人的最高欲望是拯救人类，必须放弃自己欲

《万木草堂口说》，《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第65页。

《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34页。

参看《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诸天讲》，中华书局1990年，第3页。

《爱恶篇》，《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73页。

《理气篇》，《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7页。

《长兴学记》，《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第3页。

《长兴学记》，《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第3页。

望的追求，尽量满足他人的欲望作为自己的使命，用博爱之心，常常想着天下百姓的疾苦，思考民众贫困的原因，寻求途径加以解决。为人类献身，为人类至善奋斗不息。这是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人生理想境界。

人和禽兽的区别在于“智”。人有爱恶，这是人性，也是物性。人有智，即概念、推理的思维能力，这是人和禽兽的区别。康有为是重智论者。智愈广，爱恶便受智的指挥、节制、调度，这样，便产生政教、礼义和文章。“夫约以人而言，有智而后仁、义、礼、信有所呈。而义、礼、信，智以之所为，亦以成其仁，故仁与智所以成终成始者也。”有智，仁义礼信才能表现出来，而义礼信智的作为，终于成为仁。人和人的差别在于学习。人所处环境、受的教育不同，气质素养便相异。人本来陋学，通过努力学习，成为博学，再用功学习，成为通人天，通百业，异于常人。仁、义，仁是爱，义是爱的限度、范围。智增长，爱为我，扩大为爱人，小我进一步变为兼爱，“人道以智为导，以仁为归。”他分析历史发展分四个阶段，“上古之时，智为重；三代之世，礼为重，秦汉至今，义为重；后此之世，智为重。”讲义、礼的阶段，人民受益太少，后此之世，“昼夜竭其耳目心思以为便民，仁之至也，故智为上。”他预计近代又是以智为重的时代。

义理是行为规范，要遵守。但是，“智”增长以后，会发现其义理之不合理处，需要改变，要加以变通。“中国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崇良抑贱，所谓义也。”但是，这是一种极端的压迫。“物理抑之甚者必伸，吾谓百年之后必变三者：君不专、臣不卑，男女轻重同，良贱齐一。”他预言将来这些义理是会改变的。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君臣平等、男女平等、良贱齐一的现象，思想受到启发，便得出如上的结论。

三、人生观。这里应该说是士的历史使命。康有为看到种种痛苦组成了人生的图景，认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是要救民、觉民。他说：“人之责任谁使之然？……一在觉民，一在救民，此乃天生人道之公理也。”知识分子要将知识教给民众，使他们有觉悟，摆脱贫困灾害愚昧，过幸福的生活。知识分子要能自立，忠信，力行。他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教育学生有德行，万木草堂学纲据于德，是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他用佛教普渡众生的思想，发宏心愿，拯救民众，常住地狱，历无量劫行，以救国救民为事。他以极大的热情敢与二千年之学者，四万万之时流挑战、决斗。他的信仰是：“从知天下为公产，应合民权救我疆”。这里，民主政治和后来大同世界的理想都有了表露。

康有为的经世救国和地主阶级经世派并不相同。地主阶级经世派是维护封建统治，而康有为则是改革政治制度，将国家推向新的阶段。地主阶级经

《仁智篇》，《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1页。

《仁智篇》，《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1页。

《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2页。

《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2页。

《人我篇》，《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89页。

《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0页。

《孟子微》，中华书局1987年，第13页。

《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88年，第166—167页。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42页。

世派所用的学术内容和思想武器基本上是传统文化，而康有为则介绍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包括民权、平等、博爱的内容。

四、学术研究方法：实证精神。康有为了了解到中西学术研究方法的不同，说：“中国人向来穷理俱虚测，今西人实测。”他对中西学术的差异分析精辟入微。中国传统的学习方法是读经、注经，解释经文不敢越雷池一步。经学的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新思维、新知识无从发生，窒息了自然科学、民主政治学说的产生。人们不能自由思索，这种模式使跨入近代有着极难逾越的障碍。康有为为了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写了《实理公法全书》，用实理—公法—比例的规格论证事理，相当于几何学中定义—公式—证明的一套规格。这种三段式推演逻辑性极强，对封建主义的神秘性，经学笺注的形式是一种否定。这种推理得出许多旧儒家经典中根本得不出来的结论。例如“天地生人，本来平等”，“人有自主之权”等。以此对三纲进行批评。君是民选举的，议院“今此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圣不秉权，权归于众。古今言论以理为衡，不以圣贤为主，但视其言论何如，不得计其为何人之言论。”这种思想对尊君崇名教和尊经崇儒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根本的否定。但是，康有为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就又用注经方式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用今文经学和孔圣人作为挡箭牌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远没有早期著作那么大胆了。当然，其思想实质未变，所以顽固派攻击康有为无君无父，疑经非圣，把他比作少正卯，要将他杀头。可见这种改革思想仍贯穿到他后来的著作中去了。

发现人的价值、发扬实证主义学风、否定专制制度，这是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任务，康有为接触到了这三大课题，成为向西方探索真理的伟大思想家。

历史学

怀疑精神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中世纪神学斗争的一大特色。西方有两位思想家，一为英国的培根，二为法国的笛卡儿。他们以怀疑精神，摆脱神学，冲出中世纪。中国古代学者也有对经书持怀疑态度的，东汉王充在他著作《论衡》中问孔、刺孟，提出了不少怀疑的问题。明朝李贽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这两位思想家的思想被正统派认为是异端邪说，而近代对这两位思想家的思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晚清充满怀疑精神的思想家便是康有为。

他在历史进化论理论体系的构架上，第一步便提出一个论断：“六经皆伪”。认为现在流传下来的六经是经过王莽篡位时刘歆加以篡改了的，把孔子原来的词意给湮没了，只停留在解释经文的词意上，古文经学、宋明理学都停留在考证、义理上，其微言大义（孔子寓意在经书中的政治涵义）却没有流传下来。康有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政治腐败的原因即在于此。这种推论确有夸大之处。他的任务是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找出孔子政治涵义的真正内容。

《万木草堂口说》，《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第90页。

《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90、279页。

《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88—289页。

《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87页。

第二步他又提出一个观点：《上古茫昧无稽考》。这是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这部著作的第一章的标题。他怀疑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认为那都是传说。为什么有此传说？他认为是孔子托古改制，为了现实政治改革的需要，拿出上古圣贤作典范，孔子托尧舜来改制，而且先秦诸子都用托古改制这套办法，如老子托黄帝、墨子托大禹、许行托神农。孔子向往文王周公以至尧舜时代不是复古，而是要求改革，使政治达到礼治（文王、周公），达到仁治（尧、舜）。这样一来，敬天法祖的孔子成了因时而损益的孔子，孔子也由保守派变成了改革派。荀子传经仅讲礼，是小乘，孟子讲仁，讲大同，是大乘。

第三步构想历史发展模式，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改革的社会达到君主立宪制，未来的社会达到大同世界。这样，整个历史进化论的公羊三世说形成了。这就是他的历史理论体系。

这种历史理论体系产生了两个后果：

第一，上古茫昧无稽便是疑古思想，这一思想启发了后世学者，顾颉刚受此影响形成了疑古派。他们认为三代以上的历史是不可靠、不可信的，三代以上的历史是堆积文化，愈上古堆积的传说愈多，神话色彩愈浓，用这一研究方法探索古史，编辑了《古史辨》七大册。这是近代历史学研究开辟的新途径、新流派。

第二，对孔子的研究，说孔子是托古改制。本来是想抬高孔子，结果是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都托古，冲淡了孔子的神圣性，降低了孔子至尊至上的地位。于是，诸子学随之兴起。这也是康有为始料所未及的。

康有为撰写历史著作完全是为改革政治服务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表面上是历史考证的著作，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理论著作。1898年他又向皇帝呈上一部《日本政变考》。这部著作他呈了两次，第一次是10卷本，在1月。第二次是12卷本，在4月。12卷本全书约15万字，其中他自己按语、序、跋占4万字，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这是一部讲日本明治维新变法的历史书，而上呈给皇帝，其目的是要中国仿日本明治维新，采纳西政，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本书中康有为的指导思想是全变，要从政治制度改变才算变法。这便和洋务派的小变区别开来了。其目标是三权分立的立宪政治。为了达到此目标，他提出了几项建议。第一，设立制度局，这是一大关键，改革官制，重修会典，大改律例，即准备制定宪法。尊民权便要设议院，但又要尊君，两者怎样统一呢？康有为解释：议院是变法的大纲领，维新的始基，一方面兴民权，另一方面尊君权。他引日本伊藤博文的话说君等于脑，行政司法等于四肢五官，议院等于心，脑有所欲必经心，心斟酌合度，然后复于脑，发令于五官四肢。因此，制宪不是减削君权而是辅助君权。他用伊藤博文这段话是为了解除光绪帝的顾虑。第二，破格提拔草茅之士参与政治。皇帝要革新政治，而皇帝身边的大臣，思想保守，年纪大了，便需要选通才以备顾问，这些通才可从草茅才俊中破格拔用，采纳其言。康有为从日本明治维新历史中列举了许多人来说明这一问题。意思是让光绪帝提拔像康有为一批维新志士参与政治改革。第三，废科举、兴学堂。兴议院要开民智，立国以议院为本，议院又必以学校为本，学校要有学制，要有译书，要有游学，要有学会。译西方政治、学术、法律方面的书，有博物馆供人参观，有图书馆供人阅读，有实验室仪器供人实验，能出国留学，国内有学会组织，合群以开民智。

康有为在讲民权时谈到立宪，这是维新派认识所达到的深度，早期维新派讲议院并没有认识到议会的立法权利，说明他们的认识还停留在浮层。康有为借明治维新史谈政治改革是进步的。但是，全部按语透露着一种思想，就是仍要保住皇帝的尊严、社会地位和威信，而且怕乱，再三叮嘱要渐进，不能骤然实行，步骤不妨多一些。这是他改良主义本质的表现和反映。

康有为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比较重视，有许多卓越、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讲课记录《万木草堂口说》中。由于记录简单扼要，便显得粗糙。但是，其脉络仍清晰可见。他分析了先秦思想：孔子、荀子、孟子诸子，汉晋六朝唐宋学派、宋元学派、明国朝学派，对一些重要典籍，重要思想家都有评述和评价。还追寻学术源流，将各种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作用作了分析。可惜全书只是一个框架。可以说康有为是晚清对中国古代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开山祖。

文学

康有为在政治上是个改革家，在文学领域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与时俗所流行的文风迥异。在文章方面，当时人们崇拜桐城派的散文。诗歌方面，人们崇拜宋诗，形成江西诗派。他则文章骈散各体兼备，不拘一格，而且在教学时，一般从《文选》和骈体文入手。他说：“辞章之学。先读楚辞集注，次读文选，则材骨立矣……。文选当全读，学其笔法、调法、字法；兼读骈体文钞，则能文矣。作骈体兼看徐庾集及四六丛话。国朝骈体中兴，以胡、洪为最。……散文读古文辞汇纂，韩、柳集，则有法度矣。……桐城派薄，不足师也。”（胡指胡天游（稚威），洪指洪亮吉。）在另一处则说：“学文者，宜先学骈文，后学散文。”他自己的文章分政论文、杂记、科学论文、游记等类别，文章强调战斗性，说理透彻，逻辑性强，文体上骈散杂糅，散文中忽用排句偶语，显出声调音节之美，不受桐城派义法的拘束，是“新文体”的雏形。

康有为一生写了一千五百多首诗。在诗歌理论方面，也有所建树。他说：“诗者，言之有节文者耶！凡人情志郁于中，境遇交于外，境遇之交压也瑰异，则情志之郁积也深厚。”他认为诗是有音节和文采的语言。人的内心有一种情绪，遇到外界的景，便激发为诗。“夫有元气，则蒸而为热，轧而成响，磨而生光”，诗人有蓬勃的元气和感情。诗是诗人的思想、经历、情感同现实社会、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相遭遇、冲击、结合，而发出的一种浑然一体的艺术作品。诗人的生活体验愈多愈深，则其精神产品诗就愈能够得到提炼和升华。康有为谈自己的诗：“然性好游，嗜山水，爱风竹，船唇马背，野店驿亭，不暇为学，则余事为诗，天人之感多矣。……灵均之行吟泽畔，骚些多哀；子卿之啮雪海上，平生已矣，河梁陇首，游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阔。嗟我行迈，皆寓于诗。”都是在这种种情境下写出来的。“抑以写身世，发幽怀，哀乐无端，咏叹淫佚，穷者达情，劳者歌事，《小雅》、

《桂学答问》，《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39—40页。

《万木草堂口说》，《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241页。

《诗集自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40—641页。

《诗集自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40—641页。

《诗集自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40—641页。

《国风》之所不弃也。”这就是他的诗论，偏重于诗写情者也。

康有为的诗追求一种雄健的风格、瑰丽的形象、深沉的思想和新奇的意念。诗风元气淋漓，感情豪放，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1884年他在家乡澹如楼读书，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三年不读南朝史，琐艳浓香久懒熏。偶有遁逃聊学佛，伤于哀乐遂能文。忤除绮语从居易，悔作雕虫似子云。忧患百经未闻道，空阶细雨送斜曛。”这里反映了他久读古书，极力想探索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的人生理想和抱负。1888年他在居庸关写诗道：“城堞逶迤万柳红，西山峒 霁明虹。云垂大野鹰盘势，地展平原骏走风。永夜驼铃传塞上，极天树影递关东。时平堡堠生青草，欲出军都吊鬼雄。”这首诗境界宏阔，语意豪迈，抒发了诗人阔大的胸怀和抱负。1891年他送门人梁启超入京，赠诗三首。第一首是这样的：“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詆荡上天门。”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对弟子梁启超抱有殷切的期望，表达了他对黎民百姓的疾苦的同情。“公车上书”是康有为领导的一次轰轰烈烈的请愿活动，他也用诗加以描述：“海东龙泣舰沈波，上相轺轩出议和，辽台割山河。抗章伏阙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联轳五里塞巷过。台人号泣秦桧歌，九城谣谍遍网罗。扛棺摩拳，击鼓三挝。桧避不朝，辞位畏诃。美使田贝惊士气则那！索稿传抄天下墨争磨。呜呼椎秦不成奈若何！”这里康有为写了群众抗议，扛棺摩拳，美使震惊的悲壮场面，大气磅礴，堪称史诗。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亡海外，作全球环游，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此时他已不是站在潮流的最前头，诗歌的进步性也受影响。但是，他的诗仍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对祖国的眷恋，使他的诗更加悲怆，他的人生态度仍是积极的、乐观的。如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戊戌政变入狱的徐致靖被放出来，康有为远在新加坡，写了一首诗：“冤狱两年悲党锢，维新元老记春秋。惊闻西狩摩燕阙，忽喜南冠出楚囚。天下咸知城北美，人间解尽海南忧。苦忆哀歌宋玉宅，何时把酒仲宣楼。”全诗倾注了对知己朋友深情的怀念。1909年他又写一首诗赠梁启超：“又为党锢号康梁，廿载齐飞揽大荒，同入虞渊援坠日，共思宣室泣先皇。神州沉矣哀哀劫，吾道非耶莽莽伤，共笑屠龙宁误学，殊方饿死可悲凉。”康有为的诗哀叹自己的政治努力并没有得到清廷谅解，便只好放出悲凉的哀叹了。

康有为认为做诗要吸取欧美和亚洲的精华，熔中西于一炉，才能创造出新声来。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方面，要超过李白、杜甫，不能专门模仿唐人格律和意境，要飞腾作势，奇变令鬼神惊，这样才能使近代诗歌面目一新，超越时代，千载流传，为人们所喜爱。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推动并促进了清末的“诗界革命”。

《诗集自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40—641页。

《澹如楼读书》，陈永正编注：《康有为诗文选》，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0页。

《过昌平望居庸关》，《康有为诗文选》，第143页。

《送门人梁启超任甫入京》，《康有为诗文选》，第173页。

《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康有为诗文选》，第187页。

《京破后，狱囚皆放。闻徐子静侍郎即奉赦免，喜倒泪下》，《康有为诗文选》，第238页。

《己酉除夕前二日，酬梁任公弟寄诗，并电问疾六章》，《康有为诗文选》，第339页。

康有为于 1890 年写过一部专著，为《广艺舟双楫》（见《康有为全集》第 1 集）。这是一本书法理论著作。1888—1889 年他在北京第一次上清帝书不达，便住在南海会馆，友人沈曾植劝他研究书法，他购买了上千种碑版拓本仔细观摩研究，写成草稿。1889 年冬将书稿完成。后来他又将此书改名为《书镜》。

康有为分析书法的特点，字体有形，形有势，千姿百态，反映了时代精神，作品受到时代政治思想、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制约，因此格调随着时代演进，也发生变化。康有为赞扬魏碑，认为魏碑字体结构严谨，笔画苍劲，气势雄强，有一种崇高美和雄壮美。他欣赏这种苍劲豪迈的书法艺术。他说晋人王羲之的书法，崇尚清虚，笔札雅工，和那时的士林风气谈玄清高有关。到了清朝，“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香光是董其昌，子昂是赵孟頫，率更是欧阳询。赵孟頫和董其昌是元、明最有名气的书法家，皇家很欣赏，帖本宝为收藏、临摹，大家喜欢这种字体，上下形成风气。中国人评论书法又带有道德伦理观念在内，康有为对赵、董颇有贬词，说赵的字姿媚多而刚健少，董其昌的字“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说他的字“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认为不能学他们的字，“更勿误学赵、董，荡为软滑流靡一路。”总之，说他们的字不雄伟，没有骨气，也寓有贬其人之意。康有为对世俗观念敢于立异。皇帝喜爱的字体，大臣、僚属一股风地摹仿跟从，为的是想讨主子的欢心，而康有为却敢于立异，提出批评意见。其次是欧阳询九成宫体，方方正正，有棱角，但是较为呆板，没有生气，称馆阁体，科举八股文要写这种字体，规矩，上奏折也要写这种字体，整齐，实用性强，但谈不上什么美。康有为说字帖被损坏了，笔画模糊失真，临摹受到影响，不易学到字的真正精神。碑，则近年来出土很多，非常清楚、完好，都可作为上品、神品，提供临摹。而且魏碑，上距汉隶、草体很近，下启唐正楷，承上启下，可以看出字体演变的痕迹，便于琢磨书法功夫。康有为对龙门造像评价很高，说：“龙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劲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其次是墓志，他评《刁遵墓志》“如西湖之水，以秀美名寰中”，称此碑为虚和园静之宗。评《张黑女碑》为质峻偏宕之宗，“雄强无匹，然颇带质拙。”碑碣甚赞《张猛龙碑》，评为“为正体变态之宗”，称“如用公制礼，事事皆善”。赞《爨龙颜碑》“下笔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称为雄强茂美之宗誉为正书第一碑。摩崖赞《郑文公碑》“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赞《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疎宕，翩翩欲仙”，为“飞逸浑穆之宗”。他总结此碑有十大优点，说是“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志奇逸，六曰情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这些分析对魏碑真是推崇备至了。

康有为在书中有《缀法》一章，专论方笔、圆笔。他论证从魏碑中可以体会出哪些碑是方笔，哪些碑是圆笔，哪些是糅合起来的。他说：“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他讲究“势”，要达到“新理异志，变出无穷”，

才能体现美。他说：“故先贵存想，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郁豪放之间。像物于飞、潜、动、植、流、峙之奇，以疾涩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新理异志，自然佚出。”这就要靠书法家对客观世界事物观察体会，用自己深沉的情感体验，再用书法表达出来，这样才能形成佳作神品。

晚清提倡学碑者有阮元，他写《南北分派论》，便首倡魏碑，后来包世臣著《艺舟双楫》也加以提倡。邓石如、赵之谦、张裕钊在书法上攻北魏碑版极有成就，受到康有为的称赞。康有为的书法亦自成一体，专用圆笔，肆意逞豪，不避粗率。字的风格雄奇奔放、苍劲浑朴，流露出他强烈的个性。画家刘海粟曾评论康有为的书法，称其“书法雄强逸宕，气势夺人，藏丘壑于庄严，见经纶于尺幅，清峻洒脱，别成一家。先生书简手稿，随手写成，个性流露，尤为亲切。观之如坐春风，如沐秋月，以巨斧雕花，举重若轻，功力自见。”

康有为的书法理论集中体现在尊碑卑唐，这是资产阶级改革派革新精神的反映，表现了一种崇尚雄壮的美，对清朝皇家推崇赵、董字体，考科举需用的馆阁体贬抑、轻视的一种反映。康有为提倡碑学，使晚清临摹气势雄伟的魏碑，取代了妩媚纤弱的帖学，出现了一大批造诣很深的开拓型的书法大家。康有为对书法的形式美、意境美的探索，丰富了我国书法艺术的美学理论。

第三节 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是维新派的激进分子，晚清思想界的慧星，英勇无畏的殉道者。他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父亲谭继洵，累官湖北巡抚。从小母亲去世，继母待他很坏，备受纲常之苦。1876年染白喉，他昏死三天后才苏醒，更名复生。从师欧阳中鹄先生。欧阳很尊敬王船山、黄宗羲，经常讲王、黄的思想，这对谭的思想影响很大。1883—1893年十年漫游，行程八万里，走遍了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广交朋友，了解风情，增长见识，体受民间疾苦，常常周济急难，看到祖国山河遭受蹂躏，又异常痛心。“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当时是革命低潮，各地酝酿着斗争。他喜好武术、骑马、击剑、练武，1883年在甘肃曾在西北大沙漠漫天风雪中奔驰七昼夜，两腿血肉狼藉，仍不以为意。甲午战前，他埋头于中学，对西学不感兴趣。甲午战败，对他思想震动很大，写下了“世间何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诗句。1893年他在南京为江苏候补知府，与杨文会相识，向杨学佛学。又向英人傅兰雅学西学，读《物类宗衍》接触进化论思想。他很钦佩康有为，甲午战后，曾到京师，想寻访康，不巧，康已回广东；遇见梁启超，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1897年他受湖南

《广艺舟双楫》，《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93页。

刘海粟：《读〈康有为先生墨迹〉》，《人民日报》1986年4月26日。

《三十自记》，《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7页。

《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下册，第540页。

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全集》下册，第543页。

巡抚陈宝箴邀请，回到长沙。参加南学会，办《湘报》，参与新政活动。

1898年春，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因病到上海就医，时务学堂学生春节回家过年，家长看作业，大为惊骇，地方士绅出来反对，王先谦、叶德辉领头，鼓动一伙人掀起一股逆流。谭嗣同、唐才常顶住这股风，毫不退缩，与之斗争。徐仁铸密告父亲徐致靖，请求父亲将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荐达于朝，于是，徐致靖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等人。8月，谭抱病进京，参与军机，官四品衔章京。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谢天下，谭嗣同大怒，奉皇帝旨意批驳，和杨锐、刘光第、林旭联名誓保康、梁忠诚无二心。后政变方作，有人劝谭逃走，谭不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9月25日被捕，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在菜市口被杀，世称六君子。

哲学

谭嗣同写有一部《仁学》，共5万多字。《仁学》是一部哲学著作，它的思想来源大体来说：经学提倡今文经学，宗《易经》、《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书，不提古文经学。理学提倡王阳明、陆九渊的心学，反对朱熹、程颐的理学。佛学提倡禅宗、华严宗、唯识宗，西学攻格致、算学、社会学、《圣经》。诸子学提倡《庄子》、《墨子》，反对荀子、老子。明末遗民的思想崇拜王船山、黄宗羲。他所赞成的学派与康有为极为相

《仁学》有一个极庞大的哲学体系，哲学概念当先解释清楚，各家所释不同，莫衷一是。其实，谭的哲学思想本身即充满了矛盾，我们解释时只能求其相似，不可现代化。

以太 Ether，是一个外来词，17世纪笛卡儿提出来的。太空中虚无微妙的物质，弹性至大，一旦微有振动，即生横流，以传达于上下四方，光、热、电、气，皆由此物变化而生。哲学家认为心理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动力。当时物理学认为光的传播必须有一种媒介，这种媒介便是以太。严复讲：“设有圆赤石子一枚在此，持示众人，皆云见其赤色。……虽然，试思其赤色者，从何而觉，乃由太阳，于最清气名伊脱者，照成光浪”。伊脱，今通称以太。反映那时候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传来中国，谭便认为以太是万事万物的本源。

仁，“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郑玄中庸注：“仁者，人也。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意。”古代朴素的礼节，面对面互相观顾，偶视而先俯，互相作揖，弯腰，屈腿，作揖。这是站揖，这是跪揖，表示一种平等的亲爱之情，致意问候无尊卑上下之分。这是一种夷俗，夏时便有，商、周，传到孔子之时。

“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他将仁提升和抽象为客观世界的总规律。仁是万事万物之原，仁以通为第一

《谭嗣同全集》下册，第546页。

《天演论》卷下，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0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89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卷下，第291页。

义，仁的基本要素是通，以太是促成通的实体。可以说，仁是体，以太是用。心力“人之所赖以办事者也”。心力比以太更精微，更根本。

这里讲了四个概念，以太、仁、通、心力。以太是物质，也有抽象实体的作用和性质。仁是客观精神实体，哲学范畴。心力是主观主动力，是精神。世界宇宙形成运作的状态是通，怎么会通的？由于以太、仁、心力的作用。

仁是仁爱，要通，要平等。通，分四个方面：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人我通又是最基本的。

中外通：主张开放，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西方达到中外平等。学西方是全面地学，通商、通学、通教。通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中外通是打破闭关自守的格局。外国人到中国来通商，引起了一系列观念的变化。

（一）中国好古而守旧，西人好今好新。我们也要日新又新，经常变动，才能追上时代。他说：“欧、美二洲，以好新而兴；日本效之，至变其衣食嗜好。亚、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国动辄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犹栖心于榛狫未化之世，若于今熟视无睹也者。”

（二）中国好静，西人好动。老子学说，言静而戒动，言柔以毁刚，饱食暖衣逸居，这样生活暮气沉沉，人们为了保持其职位，无所作为，国家安得不亡。西人“为通商以招之，为传教以聒之，为报馆译书以诲之，为学堂、为医院以拯之，至不得已而为兵戈枪炮水雷铁舰以大创之，然而中国则冥然而罔觉，悍然而不顾，自初至终未尝一动也”。那样便不行了。“以太之动机，以成乎日新之变化，夫固未有能遏之者也”。因此，要动，要竞争。他要求善于学佛的人都能像狮子一样，成为震动奋厉，雄强刚猛的人！中国也应如雄狮奋起，使全世界吃惊。

（三）中国以俭为德，节流，西方以奢为乐，开源。谭嗣同崇拜墨子摩顶放踵救天下的思想，但对尚俭思想不以为然，说：“惟其尚俭非乐，以未足进于大同。”俭是积蓄财富，藏起来不用，不放到生产、流通领域中去，这样，仍是人民生活贫困。如果“富而能设机器厂，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流通，己之富亦赖以扩充而愈厚”。因此，要开源。所以他认为守旧、居静、居俭都不合乎当代社会的节奏和规律。

（四）通商的仁我和仁彼。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外国人将中国辟为商品推销地，是向我求通，仁我。但是我们中国商业不发达，工业不发达，仰仗别人。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蓄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提高竞争能力，以达到“庶彼仁我，而我亦有以仁彼”。在未达到此目的以前则“自仁，亦省彼之仁我”。进一步，“仁人”，再输出商品。在这一问题上，他没有认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实质。对待帝国主义有认识不清的地方，甚至建议将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大而寒瘠的国土，卖给俄、英两国，博其欢心，我可坐获厚利。

《谭嗣同全集》卷下，第363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19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21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21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89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24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28页。

这种建议是极其错误的。

上下通：通过兴民权、改民主，达到政治上人人平等。主张自由、民主，建立君主立宪国家。

上下指君臣、父子，上下要通，便是用仁。原来孔子提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相互对等的。而发展到宋朝理学，便成为君要臣死，臣不得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便是绝对服从。谭嗣同对此很反感，说完全是用名教来压人罪人。“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造成了“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的局面。君与臣的关系应当怎样呢？从国家起源来探讨：考察历史，上古本无君，民不暇相治，便共举一民为之君，因此，君亦一民也。既是共举之，则是民择君，民本君末。君是为民办事的，若办得不好，民可共废之。既然是这样的性质，君相当于乡社举的会长一样。忠，即是中心的意思，执中，心无偏袒便是忠。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双方都像个样子，平等要求，如果是独夫民贼，是纣是桀，那么，不能助纣为虐，“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为辅桀助纣者几希！”所以，人们不必愚忠，不要为个人而死，要忠于事。

男女内外通。通过破除封建礼教达到男女平等。封建社会严男女之防，隔绝男女平等交往，将淫乱的罪名归之于妇女。严男女之防，男女便不平等，男女不通，不仁，与仁学的宗旨相违背。谭指出：中国将妇女“直于室家施申、韩，闺闼为岸狱”，任意打骂，鞭笞，妇女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为了防止淫乱，妇女不能随便出去，男女不能平等相处，甚至连妇女的基本做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重男轻女，男子可一妻数妾，可嫖妓女，女子则一淫即判死刑。妇女婚姻不能自主，缠足残害身体，无受教育的权利，没有自主的权利，受三从四德道德规范的束缚，“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有如此矣”。连精神上也受到禁锢，不敢自由思想。宋明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把人欲正当的要求说成是淫欲，要防范。谭嗣同说人性无所谓善恶，只有仁爱。“天地间仁而已矣，无所谓恶也”。“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善、恶是人加上去的，“淫固恶，而仅行于夫妇，淫亦善也。杀固恶，而仅行于杀杀人者，杀亦善也”。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断了人欲，人类便不能延续下去了。他说男女应当平等，“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只是妇女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使她们的才能智慧无法施展和发挥出来。淫乱是性生活太神秘，如果进行性教育，对性生活看得很正常，很平淡，便不至引起淫杀了。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 299 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 299 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 340 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 349 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 348 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 301 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 301 页。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 304 页。

这一分析有些道理，但并不是全部原因。谭嗣同认为男女应当平等，妇女要有做人的正当权利，当受人尊重，要禁缠足，婚姻自主，夫妻应像朋友一样关系平等。谭嗣同的解放妇女思想是近代这一思想的高峰。

人我通。通过人心的沟通，实现人人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佛说：众生平等，人我无别，法无我，人无我。但是，人有私心，分别生于我相，我相又生我执，我识，我相，这样又产生机心，于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妒忌猜疑，产生出种种意念，便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物体，便产生不通。这就违背了天心（仁），违背了仁爱原则，造成了人间隔阂，演出了社会不平等罪恶的事情，甚至于造成劫象。谭嗣同说要破除我执，我识，以慈悲为怀，视敌为友，爱人如己，人人相诚相爱，心力相通，人我间沟通（灵魂、思想、感情），这样才能达到“平等、自由、博爱”的至仁理想境界。而且人我通是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的基础。世间不平，不通不仁是由其客观经济基础产生的，谭嗣同将佛学道理都归之于精神，产生的原因未找出来。这一部分他看到人民群众缺点较多，认为各省、州、县毁教堂打洋人，湖南阻矿务、破坏电线，都是人民愚昧造成的，对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潜在力量估计很低。因此，他没有找到政治改革的真正可依靠的社会力量。心理描写未能加以科学的解释，未能说明其心理产生的社会原因。

谭嗣同的《仁学》，从横的方面是四通，从纵的方面是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如何达到升平，太平？在学的方面，提倡致格，使之统一。在政的方面，提倡民权，使之一致。在教的方面，提倡佛教，使之一致。学、政、教都一统了便可发展演化到太平的大同理想世界。他重灵魂轻体魄，对未来理想社会规划相当粗糙，具体实施方案也提得很笼统，空想的成分居多，可见是很难实现的。

道器论：

在《仁学》一书中谭嗣同没有论及道器论，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论述道器。洋务派的总命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是道，西学是器，器可变而道不可变。谭嗣同发挥王船山的观点。王船山的观点是运用两个范畴，一个范畴是道体器用。另一个范畴是器体道用。谭嗣同认为：一、道与器是统一的，道，必有所丽也，“无其器则无其道”。二、器是体，道是用。“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三、“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这是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谭嗣同认为学西方，最初阶段是学器，而西方亦有道，器变，道亦可变，君主可变为民主，家族可分为小家庭，各自自主，没有兄弟骨肉争产之讼、夺嫡争继之讼。夫妻之间无置妾侧，其子孙无嫡庶相猜忌之患。朋友之间讲信修睦，通财忘势相赴难。西方伦理同中国“三纲五常”不同，但亦合乎道，此道亦不是不可学，不能学，它反而符合中国上古的礼仪。这一分析打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说，使学习西方进一步学政治制度、哲学理论制造了舆论根据，可说是思想认识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文学

谭嗣同不仅是政治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对文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写过《论艺绝句六篇》阐述他的文论和诗论。其一写道：“千

年暗室任喧，汪魏龚王始是才。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他认为文章写得好的清朝要数王船山，“下此若魏默深、龚定庵、王壬秋，皆能独往独来，不因人热。其余则章摹句效，终身役于古人而已”。他对龚自珍、魏源、王闿运的文章都是推崇的。对骈体文家汪中评价也很高。但是对桐城派古文则有贬词，认为古文束、迫人们为文，规范很狭，不能放辔驰骋，只好墨守章句，局促辕下，于是，鸿文硕学，耻其所为，便不愿为其桐城派古文了。他说：“骈散分途，而文乃益衰”。他自己的文章也不局限于古文，有时亦杂以骈偶，增添色彩。他在一首论诗中说：“斋微意瓣探，王邓翩翩靳共骖。更有长沙病齐已，一时诗思落湖南。”瓣是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先生。王是王运，邓是邓辅纶，两人以诗齐名，更有长沙病齐已指诗僧寄禅。他评论清朝诗美不胜收，但还是较低层次的，他更期望有哲学家、思想家的诗作出现。而且也自负使命，希望能为湖湘文化增添光彩。

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六盘山转谣》：“马足蹩，车轴折，人蹉跌，山岌嶻，朔雁一声天雨雪。舆夫舆夫，尔勿嗔官，仅用尔力，尔胡不肯竭？尔不思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呜呼，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诗的形式像唐诗的《孤儿行》，写转运粮饷途中舆夫的辛苦情状，又衬托东南人民遭受的惨重的剥削。另一首为《儿揽船》写泛舟衡阳，遇风，舟濒复，船上刚十岁的小儿，拉纤入港，救活了一船人的性命。场景写得极为生动，写出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也称颂了拉纤小儿的可贵品质。

他的写景的诗亦特别精细，风格恢阔豪迈，气象万千，充满积极的精神。如《邠州七绝》：“棠梨树下鸟呼风，桃李溪边白复红。一百里间春似海，孤城掩映万花中。”把陕西邠县的“春深如海”的景色写得十分动人。反映了诗人心情的愉快。又一首《夜泊》“系缆北风劲，五更荒岸舟。戍楼孤角语，残腊异乡愁。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窅然万物静，而我独何求。”写出了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色，流露出诗人无限的惆怅。他的写怀诗则是另有一种风格和气派。如《夜成》“苦月霜林微有阴，蹬寒欲雪夜钟深。此时危坐管宁榻，抱膝乃为《梁父吟》。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心。摊书兀兀了无睡，起听五更孤角沉。”诗里表达了他救国救民的愿望。另一首：《和仙槎除夕感怀》：“年华世事两迷离，敢道中原鹿死谁。自向冰天炼奇骨，暂教佳句属通眉。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阴曩此时，有约闻鸡同起舞，灯前转恨漏声迟。”全诗透露了作者练就奇骨，准备干一番大事业的宿愿与抱负，充满着爱国热情。

梁启超很推崇谭嗣同的诗。认为他的诗有新意，诗人具有雄伟的气魄。

《论艺绝句六篇》，《谭嗣同全集》上册，第77页。

《论艺绝句六篇》，《谭嗣同全集》上册，第77页。

《论艺绝句六篇》，《谭嗣同全集》上册，第77页。

《论艺绝句六篇》，《谭嗣同全集》上册，第77页。

《六盘山转谣》，《谭嗣同全集》上册，第67页。

《邠州七绝》，《谭嗣同全集》上册，第87页。

《夜泊》，《谭嗣同全集》上册，第61页。

《夜成》，《谭嗣同全集》上册，第62页。

《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并叙》，《谭嗣同全集》上册，第79页。

梁启超回忆，1895年他在北京和谭嗣同、夏曾佑住处距离很近。他们经常见面，讨论学理，写诗赠答，酝酿一场“诗界革命”。他们经常争论，思想相当活跃。他们喜欢将佛典语、欧洲语，杂用在诗中，错落可喜。梁启超说：“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如《赠梁卓如诗四首》、《似曾诗》都可归入这一类。《似曾诗》是和夏曾佑的诗，其中一首是：“同住莲华证四禅，空然一笑是横阡。惟红法雨偶生色，被黑罡风吹堕天。大患有身无想定，小言破道遣愁篇。年来嚼蜡成滋味，阑入楞严十种仙。”此四首诗亦称《感怀四篇》，梁启超评论此诗：“沉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不知其何所指也。然遣情之中，字字皆学道有得语。”这一类诗，运用了佛典语汇，富有人生哲理，但不甚解，连他的好友梁启超都说不知其何所指，难以索解，这样的诗是一种尝试，但总以懂的人太少，是不易流传、普及的。和这一类诗相同的有《金陵听说法诗》，其中一首颇有名的是：“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颂言。一任血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桎以嗜私德，法会极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菴摩罗果掌中论。”这首诗将儒典，佛典，欧洲词语，融合诗中，这也是诗界革命酝酿时期的一种实践，后来梁启超回忆，用嗜私德、巴力门等词语入诗，“今日观之，可笑实甚也”，不过，“其不以此体为主，而偶一点缀者，常见佳胜。”这里记录着维新派诗人寻求新境界、新语句，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的诗歌创作实践。

谭嗣同在牢狱中留下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张俭、杜根是东汉人。他们的遭遇和维新派有相似之处，便相类比。最后一句“去留肝胆两昆仑”，似指谭嗣同和康有为一去一留都是肝胆相照，光明磊落，顶天立地如昆仑那样巍峨高大。这首诗表达了他虽然身陷囹圄，依然有维新变法的坚定信念，蔑视和憎恨顽固势力，愿为自己理想而献身的英雄气概。

谭嗣同是激进的维新派，他的行动并未跳出维新改良的范围。他猛烈批评君主制，甚至有排满思想，但是他仍维护光绪皇帝，为其推行变法效力。他猛烈地抨击“三纲五常”，封建名教，但是，他对孔子不能否定。他站在英雄史观立场，看不到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他虽然同情农民运动，同情哥老会、在理教等秘密结社，但是他仍是一个贵公子。他对帝国主义入侵痛恨，但对帝国主义分子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其本质认识不清。在哲学上，他继承了王船山唯物主义的元素，借用“以太”物理名词加以论证，但又认为万物有知觉，有灵魂，混淆唯物唯心的界限，总的理论体系又是唯心主义的。还有很浓厚的佛学思想，庄子的相对主义，使《仁学》一书带有一层神秘的色彩。他的有些思想和革命派思想相吻合，他英勇就义的行为深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第7册，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第190页。

《似曾诗》，《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45页。

《似曾诗》，《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46页。

《金陵听说法诗》，《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46页。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第7册，专集之二十二，第190页。

《狱中题壁》，《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87页。

另一种解释是梁启超曰：“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狱中题壁》，《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87页，注释。

得革命派尊重。所以，他的死不是维新改良的继续，而是宣告改良的无望，是近代革命的信号。他的死表明谭嗣同是革命的先驱，他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浇灌了革命的土壤，使之开花结果。继他之后，他的朋友们纷纷投入革命的行列，他的著作和品德在革命队伍中广为流传。

余论

本章分析了康有为和谭嗣同。康有为代表岭南文化，谭嗣同代表湖湘文化。粤湘两省相接壤，粤湘两省人士也互相交往结识。广东地处沿海，与外人接触较早，商业发达，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影响较多。湖南地处内陆，比较闭塞，民俗勇武刚直，性较慁悍。理学影响较深，思想保守。谭嗣同描述道：“近年两省士夫，互相倾慕，结纳情亲，迥非泛泛。”1895年“公车上书”时，是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超首先提倡，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裘等联名相继响应，既而联络其他各省举人，同上一书。这次政治活动粤湘人士便有密切的配合。谭嗣同对康有为的思想和品德都十分敬佩，读过他的《新学伪经考》、《长兴学记》、《广艺舟双楫》等书，自称私淑弟子。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湘省推行新政，聘请了梁启超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带来的教员中，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都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弟子，都是广东人。梁启超广东新会人，韩文举广东番禺人，欧榘甲广东归善（今惠阳）人，叶觉迈广东东莞人。还有一位黄遵宪，广东嘉应（今梅县）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南方的广东给湖南带来了新的学说和思想，这便是岭南文化对湖湘文化的影响。谭嗣同描述道：“自南海康工部精探道奥，昌明正学，其门人克肩巨任，于斯有光。一洒俗儒破碎拘挛之陋，而追先圣微言大义之遗。湘人闻风，争自兴起，喁喁胶序，怀德慕思。几有平五岭而一逵之心，混两派而并流之势。”这里谭嗣同具体说明康有为的弟子到湖南来传播新思想和新学说，已使岭南文化和湖湘文化得到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一股新的潮流，一改乾嘉学派考据的旧学风。梁启超的教学讲中学与西学的会通，中学是今文经学，讲孔学的微言大义，治国治世的大经大道。西学是西政，西方的制度和宪法，中西对比，中西会通，以复古为解放，说明中国上古典籍中的思想与西学的政治制度思想有相通之处。复古就是批判现实政治中的弊病，复古就是与西方的制度思想相吻合。这种思想痕迹，比比皆是。如梁启超说：“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此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他把孟子民贵和西欧民主相比附。皮锡瑞说：“西人见君不拜跪，茶会并坐，有若朋友，颇与古礼相合。……盖尊君卑臣，尊夫卑妻之义，皆昌于秦而盛于宋。”上古时代君臣平等，男女平等和西方是一致的。皮嘉祐说：“昔者唐虞之朝，颺拜一堂。盘庚迁都，厥民登进，大询万民。戴于周官。谋及卿士，纪于洪范。未闻等级之分之严也。然则等级之分果始于何时哉？曰始于秦始皇、宋太祖、明太祖也。”上古有民主，等级森严是

《治事篇》第十，《湘粤》，《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44页。

《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45页。

《读孟子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18页。

《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八次讲义》，《湘报》第57号，中华书局1965年6月。

皮嘉祐：《平等说》，《湘报》第59号。

后来之事，复古是复上古，和近世西欧相同。湖南魏源、王闿运、皮锡瑞都讲今文经学，和康、梁讲的今文经学找寻到了共同点。

岭南文化输入湖南，使西学和新政播及湖南，影响了湖南的激进派，这一冲击波触发了湖南新旧思想的大激战。湖南士绅分三派：一、保守派，叶德辉、王先谦、苏舆为代表；二、温和派，陈宝箴、熊希龄、黄遵宪、皮锡瑞为代表；三、激进派，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为代表。陈宝箴主持新政，整顿吏治，发展实业，包括开矿、设机器制造局、创办内河小轮船公司、修粤汉铁路、开设学堂等，这些项目并未越出洋务运动的范围。后来创办南学会，办时务学堂，办《湘学报》、《湘报》，则逐渐走上维新运动轨道，涉及到政治制度的改革，涉及到旧传统观念的变革，甚至深入到种族、婚姻、伦理价值观念，这样，便引起了思想上激烈的争论。激进派提出君臣平等、男女平等、满汉平等、禁缠足、婚姻自主、女子有受教育权利，允许外国人通商、传教，吸取外国人的科学、技术，这些思想对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及君主至尊的观念是一个大的冲击。而且，下层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也是不能接受的。如一个读者给《湘报》去信反映他读了梁启超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认为“世变之大则有天焉，吾不敢知，吾知吾君之不可弃而已，变君主为民主，将置我君于何地呼？”他的这一段话便反映出“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又有张翼云撰文描述湖南民间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动态，说：“语以保国，保种，保教，诸事，则瞠目吐舌，谓何至如此。……又若乡里中细民，乍见新政，即传为洋人来，当努力击之。语以化学、电学、光学诸端，掩耳疾走，俨尘垢之污人。曾见一冬烘先生，阅报章用浓墨涂抹殆遍，视其眉批，则大书此等字眼，阑入文中，殊不合于阳湖桐城。曾见一识字老农，读告示猎猎谩骂不休，询其意见，则遽曰：此等官示要我学洋人，我怕天主教来剖我心，挖我目。”从这里所反映社会的众生群相，我们可以看到千百年来旧的传统习惯势力积淀之深，新思想的传播使人接受之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造成了复杂的现象，开埠、传教、技术引入、修铁路、通轮船，都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仇外反抗情绪，增加了改革政治的阻力。

湖南维新运动确实引起了思想界很大的变动。梁启超说：湖南新政：“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当时有人描述：“今吾湘立南学会，每次宣讲，官绅士庶列坐其中，休休乎无畛域之分，上下一体矣。噫，平等之事原不仅如此，而此殆为湘中诸事之起点欤！湘中诸事之起点，尤为他省平等之起点欤”。这就是说，他们亲身体会到平等的气氛了。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他说：“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笥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这样使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思想日益进步，造就了一批人才。”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

《南学会答问》杨敦问，《湘报》第28号。

张翼云：《论湖南风气尚未进于文明》，《湘报》第57号。

《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30页。

皮嘉祐：《平等说》续前，《湘报》第60号。

《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序》，《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卷首。

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

虽然，在全国推行百日维新运动以前，湖南封建顽固势力已经发动对新政、新学的围攻。《湘报》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压力，删去报首议论，改组领导层，一度被迫停刊。南学会第十二次讲学以后，以天热为辞，停讲，南学会邵阳分会会长樊锥被地方势力驱逐出境，南学会学长皮锡瑞被迫离开湖南，前往江西。王先谦领衔向巡抚衙门呈递《湘绅公呈》，请求整顿时务学堂，所有中文教习予以解聘。但是，先进的、进步的思想是压抑不住、禁锢不了的，它仍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六章 维新派的维新思潮（下）

第一节 严复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号癸塾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曾祖父焕然，福建松溪县训导，祖父秉符、父亲振光是医生，母亲陈氏是平民的女儿。14岁时，父亲去世，有两个妹妹，母亲为人洗衣服、做女红养家糊口，生活艰辛，无钱读书，便考福建船政学堂。船政学堂分前、后学堂。前学堂学轮船制造，学习法语。后学堂学驾驶，学习英语。他是后学堂，学驾驶，即海军。他考中第一名，月有津贴补给家用。他读的课程是几何、代数、三角、微积分、静动重学、光学、电磁学、地质学、天文学、英语、航海术，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开设的课程。当年校舍未盖好，借定光寺读书。那时，他刻苦读英语，伊毗之声和寺庙里的僧侣念诵经文（梵呗）互相呼应，而后来人们仍重视科举出身，轻视洋务学堂，他心中非常痛苦而发出自嘲的感叹：“当年谈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

1867—1872年他在船政学堂学习，还在扬武舰实习，出海黄海、南海，到日本横滨、长崎各地，日本国民聚观者万人空巷。在他毕业时，舰长英人德勒塞对他说：“君今日于海军学术，已卒業矣。不佞即将西归，彼此相处积年，临别惘然，不能无一言相赠。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業为终点矣。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

严复终身记住此话，求新知不已。

1877年被派往英国留学，进朴茨茅斯和格林尼次海军大学读书。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萨镇冰都是同期的同学。日本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也在英国学习。严复学海军战术和炮台建筑，考试成绩优等。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年届59岁，严复24岁，常去使馆与郭嵩焘交谈，比较中西政制，很有见解。郭嵩焘赏其才识，成为忘年之交。英国是19世纪以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昌盛，当时，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诸翁均健在，著作流行，严复读了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名著，探索如何救国的真理，经常在脑中思索。对西方政治制度、政治学理尤感兴趣，对西学的认识层次更为深刻了。

1879年回国，先到福州船政学堂，沈葆楨不久去世。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物色人才，郭嵩焘推荐严复，遂任总教习（教务长），因不是科举出身，升迁很慢，当总办（校长）已是1890年的事了。

日本伊藤博文等回国后被重用，而且将琉球夺去。严复少年气盛，发牢骚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纆我如老纆牛耳！”李鸿章听了这种议论，嫌太激烈，便对他疏远了。严复受到冷遇，“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他慨叹说：“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

《送陈彤甫归闽》，《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61页。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6页。

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1页。

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1页。

《与四弟观澜书·四》，《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甲午战败，他受刺激很大，对洋务运动提出了批评，说洋务运动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原强》、《辟韩》等论文，对专制制度猛烈抨击。一年以后，梁启超办的《时务报》转载了《辟韩》一文，张之洞授意屠仁守写一篇《辨〈辟韩〉书》，严加批驳，使严复吓了一跳，请人说情，缓解。此后他行动上便更加和缓了。光绪帝召见他，询问政见，他回家起草万言书，里面并没有什么激烈意见。不久，政变发生，未涉及他。他痛哭：“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表达了他悼念六君子的沉痛心情。

他后来从事翻译世界名著，在北京、上海、福州几个地方活动，在上海演讲政治学、逻辑学，人们听了眼界大开。他认为革命派的行动太鲁莽，粗暴，无济于事。民国初年，杨度拉他加入筹安会，助袁世凯称帝，他勉强同意，没有做什么事，但声名大减。他思想更加趋于保守，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政治上互相争杀，便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反过来又说儒学传统好。在给熊纯如的109封信中这种思想时有流露。这说明他晚年思想倒退更加厉害。晚年患气喘病严重，1921年秋在家乡逝世。

哲学

严复的功绩是向国人介绍西学。其影响最大的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历史进化论是他的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达尔文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他的进化论理论是自然科学界理论的一次飞跃。将进化论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是达尔文的好友赫胥黎。而进一步运用到人类社会并创造理论的是斯宾塞。严复到了英国，广泛地阅读了他们的书。这时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在英国已取得胜利，家喻户晓。而严复关注的是中国需要富强，怎样才能富强。达尔文的著作未涉及人类社会历史，斯宾塞的九卷本《综合哲学》又篇幅浩繁，他便选中了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一书。这本书是演讲集，篇幅适中。他在翻译中是按照译佛经的格式，佛经有龙树造论，玄奘达谥的字样规范。他使用赫胥黎造论，严几道达谥。达谥便是表达其内容，做了一番解释的工作。他的解释一面介绍西学流派，从古代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培根、笛卡尔、牛顿、哈维。一面又对比中国古代哲学以及译者自己的见解，引导读者了解进化论。因此，这种译本也成了严复自己政治哲学思想表达的一种方式，有人说这如其说是译，不如说是在“做”。

严复翻译《天演论》是为了自强保种，出发点是爱国主义思想。说“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天演论》说明宇宙天体运行、世间动植物生长繁衍以及人类社会历史都有一个演进过程。Evolution天演是个中性名词，即变动的意思，相当于change。包含进步progress或退化degeneration两种趋势。在物与物的竞争中，强的生存下来，弱的被淘汰。生物物种有些因素退化，有些新因素萌生并遗传下代成为新物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人类社会又如何呢？这是严复所关心的。人类社会的竞争和生物界的竞争是不是相同？也是优胜劣败。赫胥黎认为人类社会人与人之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8页。

《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2册，第414页。

《译〈天演论〉自序》，《天演论》卷首，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页。

间，和禽兽不同，有伦理问题，人性向善，人与人互相帮助，互相尊敬，达到善境，因此持人定胜天主张。斯宾塞持论不同，他认为人与人竞争也与自然界相同，亦是优胜劣败，人对此规律表现得无能为力，只有任天为治。这样，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譬如非洲黑人只有受帝国主义殖民者的蹂躏、宰割，这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辩护。严复在两种论点之间，自有选择。他一面说，人与人之间也是自然竞争，而互敬互爱是社会进化的结果，并不是人类进化的原因，赫胥黎的说法是倒果为因。自然进化规律是适合于人类社会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同意斯宾塞的任天为治说，而认为人能恃天，人定胜天。只要人们努力是可以胜天的，能够求生存求发展的。这是一个出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欺侮侵略而具有爱国心的思想家所得出的结论。

国家富强依靠什么？要靠民众。从治者与被治者关系来讲，治者是智者，“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不然，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这里讲的是国家富强要靠民众的气质。

人类和大自然作斗争，要合群，合群以后，生殖繁衍，人口愈来愈多，人们欲望愈来愈大，土地物产有限，人们欲望无穷，人间便发生争执甚至战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智力关系甚大。民的巧力才智发挥得好，进步便快，“必智进而后事进”。如十顷之田，今之收获，倍于往岁，靠的是什么？农民通化学、水利。工人、商人、物理学家想方设法提高生产力，加强管理，流通领域加快流转，这样才能使社会进步。“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

民智、民力、民德，这提法来源于斯宾塞的《明民论》。严复介绍说：“《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修德三者为之纲。”“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所以，严复讲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开拓市场，开拓殖民地，便造成一种现象：“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他举了几个例子：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白令海峡堪察加半岛的土民，旧的人种土族居民渐渐稀少被淘汰，严复感叹地说：“区区人满，乌足持也哉！乌足持也哉！”用这一形势来警告中华民族。

人类社会变迁的快慢受着外界环境的影响。外界环境催逼愈紧，则人类

《导言八乌托邦》，《天演论》，第 22 页。

《导言十五撮旨》，《天演论》，第 36 页。

《导言十五撮旨》，《天演论》，第 37 页。

《导言十五撮旨》，《天演论》，第 38 页。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 1 册，第 17 页。

《严复集》，第 18 页。

《导言四人为》，《天演论》，第 13 页。

《天演论》，第 14 页。

社会的变迁速度愈快。“以欧洲政教、学术、农工、商战数者而论，合前教千年之变，殆不如挽近之数百年，至最后数十年，其变弥厉”。这是一种趋势，数千年变化缓慢，近几百年变化迅速，近数十年则又飞速发展，中国不能慢腾腾地演变，要急起直追了。

结论是：“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进化论观点输入中国，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国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下，要变革，就要发挥全国民众的聪明才智，使国家富强。君主专制主义愚民政策不行了，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不行了，空谈仁义不求功利不行了，救亡图存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需使国富民强便要改变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着眼点在民智、民力、民德，集中来说，是科学与民主。

历史进化论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严重的条件下宣传鼓吹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重视，而且使朴素的变易论提到了哲理高度，对传统的亘古不变的天道观是一次冲击，成为维新派变法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政治哲学，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19年五四运动。

中西文化观的比较

严复对西学的理解和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他所受的教育，接触的书籍，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等。他到英国留学期间，又广泛阅读了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对哲理方面的书有所理解，他又亲自到英国法庭旁听审案，对英国社会政治状况有亲身体会，因此，他对西学的了解已经进入了哲理的领域，而且，他冷静、全面地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比一般人的认识又较细致，深刻了。

第一，从历史观上讲，中国主常，西方重变；中国好古而忽今，西方力今而胜古；中国是历史循环论，西方是历史进化论；中国怀旧，西方恋新；中国好静，西方爱动；中国停滞衰老，西方猛进壮精；中国知识重述古，西方知识重创新。

第二，从学术观上讲，中国学术以述古为深奥，西方学术以创新为珍贵。中国崇拜圣人孔子，背诵四书五经，实行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便是四书五经，八股文。学术上流行的不是理学，便是考据学。西方重视的是科学。科学是欧洲崇拜英国培根的唯物主义的实验论和法国笛卡儿的怀疑精神。古代西欧崇拜亚里士多德的哲理。严复说：亚里士多德是古代哲学家，相当于中国的孔子。到了近代，“洎有明中叶，柏庚（培根）起英，特嘉尔（笛卡儿）起法，倡为实测内籀之学，而奈端（牛顿）、加理列倭（伽里略）、哈尔维（哈维）诸子，踵用其术，因之大有所明，而古学之失日著”。培根讲究归纳法，事事用实验证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失；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笛卡儿提倡怀疑精神，提出“我思故我在”。说：“吾所自任者无他，不妄语而已。理之未明，虽刑威当前，

《导言十六进微》，《天演论》，第41页。

《导言三趋异》，《天演论》，第11页。

《论十一学派》，《天演论》，第80页。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5页。

不能讳疑而言信也。……今者吾生百观，随在皆妄，古训成说，弥多失真，虽证据纷纶，滋偏蔽耳。”他不相信古训成说，要经过自己独立思考，验证才求得真理。培根、笛卡儿的求学问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是破除旧学说，破除尊圣崇经的传统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方法，是近代的方法。牛顿、伽里略、哈维等人在物理学、天文学、化学方面的发明、发现便奠定了近代科学文明的理论基础。严复用这一套科学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理学、考据学、科举制度、八股文。他认为理学包括王阳明的心学是师心自用，强物就我，不问客观事物真伪、变化，而只凭自己的意志想象，复述古哲圣贤道理，以期符合“三纲五常”，不离经叛道便行了，而对认识客观事物，治理国家，推动社会前进是既无用，又无实。在学术研究领域，重复旧的概念、观念，不敢创新。在文字辞章中兜圈子，视野狭小，跳不出训诂的范围，不能开拓学术领域，使人们处于冥昧之中。他批评八股文、科举制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说：“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富。破坏人才，国随贫弱。”因此，开民智，要学西方的一套科学思潮，而彻底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所学的那一套东西，旧的文化系统结构：理学、汉学、八股文都要改变，而学习西方学堂中所学的东西，如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

“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再扩大而言，便是天地二学，即天文学、地质学。以上从今天眼光来看，是自然科学。严复说：“近世斯宾塞尔言学次第，亦以名数二学为始基，而格致如力质诸科次之；再进而为天文地质，所以明宇宙之广大悠久也；再进而治生学，言动植之性情，体干之部置，于以知化工之蕃变；由此而后进以心灵之学，言因习之不同，刚条之异用；最后乃治群学，而以德行终焉。”我们看到这是近代学科的分类。严复沿着这一学科分类的思路向国人介绍西学。逻辑学他称为名学，中国古代也有名家谈名学，如公孙龙子、墨子、荀子也谈名学，而后来研究便不细致了。严复说，培根重视逻辑学：“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名学者，思议之学，而因以明其术者也”。就是说逻辑学是训练思维能力、思维方法的学问。严复翻译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两本著作，并在上海作学术报告讲授名学，以传播逻辑学。

第三，从政治观上讲，中国讲君主专制，西方讲民主。西方国家为什么富强，可用两句话概括，即：“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这两句话即提倡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最早表述。严复认为中国学西方仅仅学了点皮毛，洋务运动学西方船坚炮利，那是表面的东西，人们将西方的东西搬到中国，便走了样，橘逾淮北而为枳，是什么原因呢？从政治上来讲，其区别在于自由不自由耳。中国古圣贤不讲此词，中国人很怕听这个词，和放任、放荡联系起来，是贬义词。西方则是建

《论九真幻》，《天演论》，第69页。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3页。

《译〈天演论〉自序》，《天演论》卷首，第9页。

《原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31页。

《穆勒名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3页。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2页。

国的指导思想，严复引卢梭的话说：“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就是说，人权是天赋的，得到了自由才算完全具备了天赋，才能展示人的才能。这里说的自由指参政自由，即有平等的民主权利。由于中西文化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便表现在各个方面。严复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识。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中西对比项目多达十一条，涉及到政治、经济、接物待人、道德风尚、治学态度和方法各个方面，可见其观察的细微。

严复认为洋务派所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仅将西学作为“用”是有局限性的，西学也有它的体和用。他表述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中国是封建社会，讲等级尊卑、尊君。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讲平等、自由、尊民。

所谓自由在经济上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说理论便是强调自由贸易是经济贸易不可缺少的因素。经营工业、商业是为了资本家获利，而资本家经营所得到的利益，也增进了社会的经济利益，追求经济物质利益是对己对社会两利的事情，“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其中亦有最大公例焉，日大利所存，必具两益”。由此说明中国重仁义，西方重功利，中国讲节流，西方讲开源，国家广开财源，人民勤奋工作，求得过舒适的生活，价值观念大不一样。

政治上，自由包括保证人身自由、保护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利，以及参政的自由权利。严复对这三权都已提及。还有人民有反抗政府的权利，政府以保障、代表人民权利为原则，如果违背这一原则，人民有权反抗它。这一权利严复并未涉及。

中国如何做？严复讲理论比较全面而且透彻，在实行方面则缓和而谨慎。他强调民众智力低下，一下子不能实行民主、自由。要有一个思想启蒙过程，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漫长的，不能骤然去实行。

第一，他说改革是全局性的，要全盘考虑，不然的话，这一局部改革便会影响那一局部，就会牵动全局。他说：“一治制之立，与夫一王之兴也，其法度隆污不同，要皆如桥石然，相倚相生，更其一则全局皆变。”因此，改革要全盘规划，若枝枝节节，造成各种矛盾，反而有害无益。

第二，他强调的自由偏重个人思想自由。他希望帝王只要管政，不要管教，像西方国王一样。这样，个人思想自由便能得到保障。他说：“为思想、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所当问也。问则其治沦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他认为，中国若使“人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3页。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3页。

《导言》十四，《恕败》，《天演论》，第34页。

《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1页。

《法意》上册，第271页。

人能得其意，能申其言，须知思想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使理真事实，虽出于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这道理讲得非常深刻，在中国封建礼教笼罩之下，敢于破除迷信，认为孔教不必保，西学不是全来源于中学，圣贤之言也要怀疑，这都是石破天惊的新思维。

第三，他认为自由的本义是自主而无挂碍。他引柳宗元的一首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说这就是自由的本意。但是，自由不是无限制的，不能理解成放任、恣睢、无忌惮。他对自由下了一个定义：“自由者，凡法之所不禁，则吾皆有其得为之权利”。自由要遵守法律，法律是保障公民的自由，服从法律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就是自由。自由：“一民之所为，不必即损他人之权利也”。严复翻译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其中文题名即《群己权界论》，即对群体和个人自由的关系，说明个人自由的界限，在于不能侵犯他人的权利。他又强调国群自由。个人自由为小己自由，小己自由和国群自由相比较起来，国群自由又是最重要的。“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故前者妄言，谓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强，杜远敌之觊觎侵暴，为自存之至计也”。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反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还是首要任务，所以他不强调小己自由。

第四，从伦理观上讲，中国重“三纲五常”，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压制人的欲望。严复说：“有叩于复者曰：人道以苦乐为究竟乎？以善恶为究竟乎？应之曰：以苦乐为究竟，而善恶则以苦乐之广狭为分，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也。”苦乐属于人欲，把苦乐作为善恶的标准，人们趋乐避苦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行为，这便是对封建理学的否定。这一理论来源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

第五，从社会风习来看，西方比较重视人口的质量问题，西方青年结婚较晚，一定在事业学业上有成就，而后成家，男子结婚约三十岁左右。在教育子女方面重视全面的教育。养儿育女又考虑到经济条件的许可，节制人口。而中国有一种多子多孙为幸福的传统观念，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一是早婚，二是不考虑如何教育子女，三是存在着溺女现象和一夫多妻制。这样，人口繁衍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女子的社会地位低下，受到封建礼教的压制。他很忧虑的推测：“而吾国他日大忧，将在过庶”，并具体描写道：“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蹠于车轮马足间，辄为芒背，非虑其倾跌也，念三十年后，国民为如何众耳！”他很敏感地将人口繁多的严重问题

《译凡例》，《群己权界论》卷首，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第 9 页。

《译凡例》，《群己权界论》卷首，第 8 页。

《法意》上册，第 219 页。

《群己权界论》，第 82 页。

《法意》上册，第 360 页。

《法意》上册，第 370 页。

《导言》十八，《新反》，《天演论》，第 46 页。

《法意》上册，第 347 页。

《法意》上册，第 389 页。

提到了国人的面前。

严复在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方面，翻译了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又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他自己又著《政治讲义》介绍西方的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社会学方面，他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法》；又翻译了甄克思的《社会通论》即《社会进化简史》。连同上面已述的《天演论》、《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共称严译名著八种。这些著作的翻译为中国人民介绍西方学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所举方面和例子，或许有片面或偏激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讲，还是接触到其要害的地方。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其优秀的部分，问题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闭关自守，自满自足的状态，政治上君权高压统治，文化上儒家礼教思想的束缚，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其弱点暴露得比较突出和明显。严复说：“欧之开化，始于古学复兴之16世纪，西史谓之荷黎诺生思。自是之后，学问之事，普及庶民，格致哲学日精，而宗教神权日坠，又以印书肇行，民之事学，方古为易，文明之运，所由沛然莫之能御也。”所以，我们应当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正统的文化系统结构、理学、汉学、八股科举取士、四书五经、求知的范围、研究方法都要革新，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

他中西文化比较的着眼点在于提高国民的素质，民力、民智、民德三个方面都要提高，这样，国家才能走向富强。他提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而采取的步骤又是徐缓的，不是急骤的，因此，他不同意孙中山革命派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甚至于对康有为的政治改革运动也嫌太快了，但是，他在西学的介绍方面，无论是对维新派或革命派，都是能从中收到无穷的效益的。

严复也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他对旧学、旧法、旧文学仍有深厚的感情，对中国传统文化仍是相当尊重的。下面这段话，反映了他的文化观：“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将旧的完全除去，则新的是无法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要考虑到民族文化，民众性格，去其旧染，保存其精华的部分，才能创建民族的新文化。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对旧学仍是很有信心。吴汝纶深知中国之不可不谋新，而每忧旧学之消灭，严复说：“不然，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此其明证。

文学

严复一生译著总计有190多万字。他译书极为谨慎严肃，他所译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中国古学中并没有相应的词汇，他一方面要介绍西学，另

《法意》上册，第394页。荷黎诺生思：The Renaissance 指文艺复兴。

《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9页。

一方面又要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理解，因此，煞费苦心。如何来表达西方学科的专有名词，他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如社会学译为“群学”，政治经济学译为“计学”，逻辑学译为“名学”，《天演论》中物竞、天择、储能、效实的词汇，都是由他创立的。他为译书订了三个原则：“译事三难：信、达、雅”。信，修辞立诚，要忠实于原著。达，辞达，要将内容适当地表达，使人易懂。雅，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还要求文字雅驯，典雅。他说：“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雅。”

因此，他的译文是运用桐城派的古文，比较深奥。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是严复的老师兼好友，曾为严复《天演论》作序，说：“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知顾，民智之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者，可与言译书矣。”译西方哲理的书便要用晚周以来诸子名家的文体方能相称，方能传世。这样严复反而用古词来翻译西学，如将归纳法译为内籀法，将演绎法译为外籀法，显得更加晦涩。梁启超、黄遵宪对严复的译书虽极为赞赏和尊敬，但是，对他的文风有些意见。梁启超说严复的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他说学理邃颐的书，非以流畅锐达的文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严复听了以后，不以为然。一则说原书本来深奥，不懂专业知识，要贯通其学理本来是不容易的。二则说学理深奥的书本来不是为学童读的，不需要将文字通俗化。他认为：“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

因而仍坚持译文要雅。这其中还有一层原因。严复是学西学出身，考科举几次未中，没有功名，被视为非正途出身，在官场、学界被人们看不起，总觉得低人一头，得不到士大夫的尊重和理解。所以，他动手译西方名著，表达的文字是典雅秀丽的古文，使士大夫饱学之士也刮目相看，得到他们的认同，而且也进一步为士大夫接受西学时减少点心理障碍。所以，严复的译文，内容新颖，文字表达形式则是古色斑斓的桐城派古文，中西结合，别具一格。从今天来看，其缺点是过于深奥，年轻一代读来不易理解。于是，后来又有了这些巨著的白话文译本。

严复的诗歌受同光体江西诗派的影响，取经王安石，得清苍幽峭之旨，有自己的特色和一定的成就。陈宝琛曾记载道：“杂文散见，不自留副，仅存诗三百余首。其为学一主于诚，事无大小无所苟。虽小诗短札，皆精美，为世宝贵。而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则反为文学掩矣。”

《送沈涛园备兵淮扬》其中的两首，一是：“去年六月船南下，直北关山未解围。沧海狂流横莽莽，晨光前路远微微。相看白发盈头出，长恐青山与愿违。垂涕为君通一语，华亭千载鹤孤飞。”另一是：“尚忆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谁言后死无穷感，惭负先生远到期。得志当为天下雨，流

《译例言》，《天演论》卷首，第11页。

《天演论》卷首，第12页。

《天演论》卷首，第11页。

《吴汝纶序》，《天演论》卷首，第7页。

《与梁启超书》，《严复集》第3册，第516页。

《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2—1543页。

年已似手中蓍。春申浦口春无际，独对繁花有所思。”第一首表达了对国事艰难的忧虑，反映了知识分子苦闷、彷徨的心情。第二首回忆严复小时考福建船政学堂时的情景，沈葆楨是两江总督兼船政大臣，看到严复《大孝终身慕父母》的考卷，置冠其曹，赏识其才，期望他有远大的成就，而严复自己感到事业无甚成就，深感惭愧负疚，表达了这种流年已逝，不可挽回的心情。

对于戊戌新政运动，他是赞成支持的。维新运动失败了，他沉痛地留下了一首诗：“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诗为六君子被害有感而作，表示了对维新志士的同情和哀悼。“临河鸣犊叹”，孔子打算从卫国到晋国去见赵简子，走到黄河边上，听说赵简子杀了晋国贤大夫奚鸣犊、舜华，于是临河叹息，折回不去。这里作者把谭嗣同等人比作奚鸣犊、舜华，以孔子自比。末句勉励自己不要灰心丧气，表达了作者鲜明的政治倾向。

严复上福建船政学堂，随即留学英国，归国后仍不受重用。因为不是科举出身，他便应试考了三次，均名落孙山。1909年朝旨赐文科进士出身。他便作了一首诗。《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敢从前后论王卢。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得进士衔已经58岁了。中年热衷功名未就，老年赐得进士，心情反而冷淡了。

严复和江西诗派的诗人感情甚厚，常有诗歌相赠和答。如对陈三立，“此日耽吟咏，真成不世贤。眼看文坠地，犹说力回天。侧足吾焉托，孤芳汝自怜。寄声陈伯子，珍重为华颠。”是一种孤芳自赏的心态。又如对陈宝琛：“乡里情亲四十年，共留老眼阅桑田。已登东岱宾初日，旋向西山问玉泉。旧学圣功时娥术，小诗才语总蝉嫣。草堂人日题诗去，报道人间有地仙。”对他的国学之功底深厚，诗歌之情趣浓郁，推崇备至。他和郑孝胥是好友，相互答和的诗歌甚多。如：“江南一别今三载，书到樱花想未开。李白世人皆欲杀，陶潜吾驾固难回。诗应有子传家学，事去无端感霸才。满眼瞻乌方靡止，可能安稳卧淞隈。”陈宝琛、郑孝胥，还有陈衍都是闽人，是江西诗派闽派的代表人物。还有一首是赠林纾的。“左海畸人林畏庐，早年补柳遍西湖。数茎白发看沉陆，无限青山入画图。尽有高词媲汉始，更搜重译续虞初。饶他短后成齐俗，佩玉居然利走趋。”林纾擅长于水墨丹青，又翻译西洋小说，最后两句带有一种诙谐的幽默感，使诗歌具有另一番情趣。

1908年他作了一首《秋花次吕女士韵》。全诗是：

秋花趁暖开红紫，海棠著雨骄难起。负将尤物未吟诗，长笑成都浣花里。绿章乞荫通高，剑南先生情最真。金盘华屋荐仙骨，疏篱槿几皆前因。故山丛兰应好在，抽叶悬崖俯寒瀨。山河有人从文狸，云旗昼卷声絳繅。修门日远灵均魂。玉虬飞鸟还相群，高立无女日将暮，十二

《送沈涛园备兵淮扬》，《严复集》第2册，第364页。

《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2册，第414页。

《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严复集》第2册，第378页。

《题胡梓方诗册并寄陈散原》，《严复集》第2册，第380页。陈三立号散原。

《人日呈橘叟》，《严复集》第2册，第395页。陈宝琛号橘隐，称橘叟。

《寄苏戡》，《严复集》第2册，第385页。苏戡，郑孝胥的别号。

《赠林畏庐》，《严复集》第2册，第413页。林纾字畏庐。

巫峰空黛颦。君不见洞庭枇杷争晚翠，大雷景物饶秋丽。湖树湖烟赴暝愁，望舒窈窕回斜睇。五陵尘土倾城春，知非空谷无佳人。只怜日月不贷岁，转眼高台亦成废。女 琴渺楚山青，未必春申尚林际。

吕女士指吕碧城，安徽旌德人，1883年生，为严复的女弟子。严复评论吕碧城“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年纪虽少，见解却高，一切陈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这样一位具有才华、具有新思想的女士，就像是具有脱俗高洁的仙骨品格的海棠，不受人重视。全诗秋景明丽，意蕴丰富，用典熟练而精当。

他赠英华一诗，“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文物岂真随玉马，宪章何日布金牛？莫言天醉人原醉，欲哭声收泪不收。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英华，字 之，创办天津《大公报》，和严复是好友。这首诗是诗人内心痛苦的自白，充满了个人抑郁愤懑的情绪，成为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严复曾有一首长诗，《赠高啸桐》，其中有“岂不爱国种，薪解黄屋忧。虞渊迴日驭，欲往无轻舟。”确实，他是一位爱国志士，但是，未找到通向幸福彼岸的轻舟。

第二节 陈三立 沈曾植

本节叙述同光体诗派诗人。

同光体属于宋诗派。晚清宋诗派由程恩译、祁 藻等人提倡，到曾国藩、何绍基、郑珍等人都是循宋诗这条路子。到了同光年间，便出现同光体诗派。其代表人物有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等人。还有一人是陈衍，他写过《石遗室诗话》，对诗歌理论有所发挥，对同光体的特点也有所说明。

所谓“同光体”是指“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的一个诗派。这一诗派诗宗“三元”，即学开元时的杜甫，元和时的韩愈，元祐时的黄庭坚和苏轼。沈曾植曾戏学时语应曰：“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陈衍说：“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又咎同光以来舍唐诗不为而为宋诗。不知宋诗皆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诗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这里讲的是如何继承古代的诗歌。清朝有宗唐诗的一段时期，后来又宗宋诗。大体上，唐诗讲意境重在虚，宋诗讲事理重在实。而同光体诗派主张诗人要有学问，南宋有位诗歌评论家严羽说：“诗有别才非关学问。”陈衍不同意这种说法，说：“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提出“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主张。他们提三元说，虽然说明宋诗和唐诗有继承的关系，宋人某派是受唐人某派的影响，而其主旨在效法宋人的创新精神。他们主张“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在表现上要锤炼字词。“作意好奇”，“宁僻毋俗”，“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

《秋花次吕女士韵》，《严复集》第2册，第372页。

《与甥女何纫兰书》，《严复集》第3册，第840页。

《与甥女何纫兰书》，《严复集》第3册，第839页。

《赠英华》，《严复集》第2册，第414页。

《赠高啸桐》，《严复集》第2册，第370页。

见《石遗室诗话》，广益书店民国4年。下面所引此书不一一注明。

处”。要求能“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他们崇拜黄庭坚“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奭”的技巧。但是，他们是一批诗人，每个人的情况也不相同，所受古代诗派影响也不一样，每个人的政治经历、甚至于后来的发展也不尽相同，所以，他们虽然在艺术上力图创新，由于从古诗中推衍，并未找到诗歌发展的新出路，这一诗派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们文化根底深厚，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其诗歌确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同光体，按其地域的不同，可分三派。一派为赣派，以陈三立为代表。一派为浙派，以沈曾植为代表。一派是闽派，以郑孝胥、陈宝琛、陈衍为代表。

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官吏部主事。协助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当时，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惠康、浙江提督吴长庆之子保初齐名，称四公子。他在湖南曾推荐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陈宝箴便聘请梁来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湖南新政，他协助其父多方出力承办。戊戌变法失败，因陈宝箴推举刘光第、杨锐，被西太后责为“招引奸邪”而被处分，父子同被革职，永不叙用。他侍父亲归南昌，在西山筑晴庐“盖切忧时爱国之心，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对歔歔，不能自己。”民国以后，他绝意政治，致力诗歌写作。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8月日军占领北平，他居住旧京，已八十五岁高龄，悲愤不食而死。

他的诗学韩愈，肆力宗黄庭坚，避俗字熟字，力求生涩新奇，走的是“生涩奥衍”之路。陈衍评论他的诗：“然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而荒寒萧索之境，人所不道，写之独觉逼肖，而一出自自然，可谓能参山谷三昧者。”

下面选一首五言古诗。《江行杂感五首》：

暮出北郭门，蹴蹋万柳影。载此岁晏悲，往溯大江永。涛澜翻星芒，龙鱼戛然警。峨舫掀天飙，万怪伺俄顷，中宵灯火辉，有涕如縻纆。胶漆平生心，撼碎那复整！人国所仇耻，曾不一瞥省。猥就羈散俦，啁啾引吭颈。低屋杂瓮盎，日月留耿耿。睨之云水间，吾生固飘梗。

这首诗写于1900年冬。全诗爱国感情十分强烈。

且读他的五言律诗。

《雨晴入后园寻春》：淡沓晓风前，光阴步步妍。杂花香宿雨，新叶养晴天。波影鱼身乱，楼台鸟语圆。呼儿坐芳草，春色一相怜。

陈三立曾有“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的诗句，他退居田园，与尘世隔绝，不参与争名逐利的竞争，写的春景，雨景，透露出他平静的心境，勾画出一幅清奇淡雅图画。

他最擅长的是七律。

《正月十九日园望》：秃柳城边风散鸦，嫩晴闲护短丛芽。窥襟了半池水，挂鬓腾腾一角霞。久客情怀依破甑，新年云物入悲笳。春光

吴宗慈：《陈三立传略》，转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8—19页。

钱仲联编：《近代诗三百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1页。

陈衍编：《近代诗钞》第15册，陈三立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2页。

端与游蜂共，欲缚茅亭听煮茶。

此诗是写景，景是淡淡的，心情是宁静的，炼字锤句很讲究，有一种优美的意境。

《遣兴》：而我于今转脱然，埋愁无地诉无天。昏昏一梦更何事，落落相看有数贤。懒访溪山开画轴，偶耽醉饱放歌船。诗声尚与吟虫答，老子痴顽亦可怜！

此诗是写情，他的心情虽然是闲散的，但并不悠远超脱，总有些怨郁的心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的反映。

九日《从抱冰宫保至洪山宝通寺饯送梁芦庵兵备》：啸歌亭馆登临地，今日都成隔世寻。半壑松篁藏梵籁，十年心迹照秋阴。飘髯自冷山川气，伤足宁为郢曲吟。昨健逢辰领元老，下窥城廓万鸦沉。

杯酒初揉摇落悲，孤标离色见须眉。平生所学终能信，功罪旁人未许窥。会起卧龙襄水曲，更宜骑马习家池。采薇早晚亦归去，相忆白云无尽时。

这两首诗写于1905年。抱冰宫保是张之洞，梁节庵是梁鼎芬。全首表达了一种时世沧桑不胜悲凉的情绪。苍劲老练，情景交融，真情深切，蕴藏着丰富的人生体验。张之洞读了这诗，认为太艰深难懂。

陈三立对黄遵宪、梁启超有很深厚的感情。在湖南新政时，黄遵宪任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梁启超在湖南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戊戌变法失败后，各分东西，1902年，他有《黄公度京卿由海南入境庐寄书并附近诗感赋》：“天荒地变吾仍在，花冷山深汝奈何。万里书疑随雁鹭，几年梦欲饱蛟鼉。孤吟自媚空阶夜，残泪犹翻大海波。谁信钟声隔人境，还分新月到阿。”1922年他和梁启超在南京会晤，梁任教南京东南高师，讲学完毕，将北归，他赠诗《任公讲学白下及北还索句赠别》：“辟地贪逢隔世人，照星酒座满酸辛。旧游莫问长埋骨，大患依然有此身。开物精魂余强聒，著书岁月托孤呻。六家要指藏禅窟，待卧西山访隐沦。”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们友谊的深厚和真挚，却也反映出经过大的政治动荡之后，他的政治锐气已经消磨殆尽，只隔世旁观了。

梁启超曾有诗对陈三立加以评论：“义宁公子壮且醇，每翻陈语逾清新，啜墨咽泪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赠诗梁启超：“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梁启超则说：“竟作神州袖手人”，一字之差，微寓批评。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总理衙门章京、江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护理安徽巡抚。甲午战后，在京参加强学会，赞助新政。1898年，受张之洞之聘，主讲两湖书院史席。在任安徽布政使时，触怒朝廷权贵，辞官回到上海。民国后，曾参与张勋复辟之役，事败归上海。他学识渊博，通

《近代诗钞》第15册，第7—8页。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第236页。

《近代诗钞》第15册，陈三立卷，第22页。

《散原精舍诗集》卷上，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第33页。

《散原精舍诗别集》，第5页。

《广诗中八贤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13页。

西北南洋地理、辽、金、元史、佛典、道藏等，是著名学者，又是同光体诗派浙派代表人物。他诗学谢灵运、韩愈、李商隐、黄庭坚诸家，又继承浙江朱彝尊秀水派的传统，常以经史百家、佛典道藏、金石篆刻的奥语奇词入诗，显示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二者合一，形成了奥僻奇伟，沉郁盘硬的风格，陈衍评论他的诗说：“聱牙钩棘中，时复清言见骨，诉真，荡精灵，俊爽迈往处，正复不少。”

《懊侬曲》：“尺布亦可缝，斗粟亦可舂。依是无米炊，丈人未从容。”“东云故是鳞，西云故非爪。莫作天龙身，终生居热恼。”“勿笑五杂组，依是三眠蚕。新丝行且尽，郎衣冬不堪。”“可怜九张机，及此一丝。非依强和合，惨见争梨时。”“桐根参差生，桐心坚且苦。夜夜听西风，艰难我与汝。”

懊侬是烦闷的意思。懊侬曲是东晋吴地流传下来的乐府，一般是情歌。这里沈曾植表现宫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互相猜忌，潜伏下祸机的咏叹。此诗写于1895年，感时之作。

《失题》：寒意勒回梅蕊涩，霞光四放柳梢晴。东轩啾啾双鹤立，北乡庚庚乘雁征。驿骑寂寥书尺素，粥瓯进泪腊嘉平。暮年心事关诸舍，惆怅吴侬口数行。

《西园蜡花》：恰与江海共冷思，不将繁干恼疏枝。独来晓径香能绝，折近妆台澹未宜。净海桥西孤客梦，阜成门内上春时。天香佛供垂垂见，苦停辛故故疑。

前一首述怀，显露了一些喜悦的心情，但终究不能驱散寂寞、惆怅的情绪。后一首咏物，梅花的幽香淡雅，引发孤客的幻梦和体会京都的早春，别有一番情趣。

《谷雨后一日抵里》：端平桥外归来路，嘉会都中雒诵孙。卜筑并无三亩宅，经营空说万家村。啼莺春过柳飞絮，放鸭波柔船到门。却到故园为寄客，长怀旧德对荒墩。

急雨潇潇万树风，宦游还去别幽宫。余生怆戚人间世，疾痛长号罪衅躬。忧色下堂兢自伤，褊心誓墓愿难充。清明寒食年年在，永愧溪南袂翁。

这两首是归嘉兴故乡之作，迎面而来的是江南明媚的春光，宦游多年，回乡仍是暂住的寄客，国家多难，政局颓败，感到人世悲怆，百感交集，不觉怀念祖先养育的恩德，愧对父老乡亲。

《答石遗》：浩劫微生聚散看，空江老眼对辛酸。河山落日沧浪色，兄弟危时冗散官。肠绕蓟门通梦远，石穷溟海化禽难。江鄂渚书邮返，叠鼓鸣笳烛泪残。

《易实甫过谈》：万卷诗歌百卷书，南行落帽意何如。沙虫变化朱颜在，服食从容素女俱。日历自嘲宁自责，先生非有且非无。神仙到处成游戏，亦道长安不易居。

《近代诗三百首》，第317、318页。

《近代诗钞》第12册，沈曾植卷，第11页。

《近代诗钞》第12册，沈曾植卷，第11页。

《近代诗钞》第12册，第12页。

《近代诗钞》第12册，第18页。

露电光中最后身，镬汤热处再来人。游魂故是易家变，善哭我识唐衢真。历劫不迷云水性，他生或幻玉台春。麻姑狡狴方平笑，东海簸扬又一尘。

前一首诗是回答陈衍的，颇多感慨。后一首是和易顺鼎交谈，易顺鼎，字实甫，号哭庵，是个神童。易顺鼎感情丰富，喜哭，号哭庵，诗宗中晚唐，和樊增祥相仿。沈曾植在诗中运用了神仙传中王方平、麻姑的典故，说明沧桑变幻，人事莫测，使诗歌带有一股神仙气氛。

《晚望》：如此江山夕照明，野夫那不际承平。蜃楼海气杂莫气，鱼潮声如雨声。静夜吴船闻打鼓，昔游蜀道记初程。白头负戴难重说，四十三年枯菀情。

这首诗写上海的景色，回忆四十三年前从上海入蜀完婚的情景，当年是20多岁的青年，如今已是60多岁的白头老翁了。

沈曾植晚年寓居上海，著名史学家王国维非常敬重他，经常向他请教历史典故、音韵学、西北地理等，彼此诗歌答和，成了忘年之交。沈曾植：《伏日杂诗简静安》四首，选两首。

伏伏今年雨，湫湫后夜凉。芸生三有业，缺月一分光。象意籀重识，虫生患未央。微风蘋未起，平旦更商量。

寂寞王居士，江乡东考槃。论宜资圣证，道不变贞观。鸥鸟忘机喻，鹤枝适性安。善来寻蒋径，何处有器盘。

这首诗反映了沈曾植晚年的以适逸娱悦的心情和王国维探讨学术的乐趣。

1922年9月21日是陈三立七十大寿，沈曾植赠寿诗一首：“望望钟陵幕阜云，六朝山色接缤纷。列仙姑射冰雪杳，丈室维摩金粟芬。诗句流传十洲遍，文心不立一言云。病夫病榻神游去，未复诸公介雅勤。”10月，沈便逝世。陈三立有《哭沈乙庵翁》诗：“卧疴传句宠称觥，归序仍能腹稿成。十日死生逢绝笔，万流依倚失长城。乱离残客元同命，博大真人不可名。留咏荆轲一棹影，哀迎终古海涛声。”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又字太夷，福建闽侯人。光绪八年(1882)中举，1891年任中国驻日使馆书记官和神户领事，后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承办瓊瑁铁路。1911年入盛宣怀幕，主张铁路国有化政策。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老自居，1923年投奔溥仪，为总理内务府首府大臣。1931年“九·一八”事变，唆使溥仪到东北当日本帝国主义傀儡，次年满洲国成立，任国务总理，为国人所不齿。1935年下台，后死于长春。他是同光体诗派闽派的代表。

他的诗学谢灵运、柳宗元、孟郊、梅尧臣、王安石，最喜王安石。陈衍论诗，常以陈三立和郑孝胥相比较，说郑孝胥以幽秀，陈三立以奥奇。三立奇崛雄肆，以山谷为门户，而根极于韩愈。孝胥凄惋深秀，以柳州树骨干，润泽以半山，走的是“清苍幽峭”的路子，和陈三立崇尚“生涩奥衍”迥然不同，这是闽派与赣派风格相异之处。

《近代诗钞》第12册，沈曾植卷，第18页。

《近代诗钞》第12册，第36页。

萧艾编：《王国维诗词笺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6页。

以上两诗见蒋天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47页。

我们举他的诗为例：

《春归》：正是春归却送归，斜街长日见花飞。茶能破睡人终倦，诗与排愁事已微。三十不官宁有道，一生负气恐全非。昨宵索共红裙醉，酒洒无端欲满衣。

该诗说明他志向很高，但没有遂愿，那种忧郁的情绪在茶、酒、诗中，排遣总不能散发，是知识分子的颓废情绪的抒发。

《人日雨中》：人日梅花空满枝，闲愁细雨总如丝。临江官阁昼欲暝，隔岸楚山阴更宜。逋客偶来能自放，翔鸥已下又何之。凭栏可奈伤春目，不似红湖独往时。

这首诗写作在武昌。1899年他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办京汉铁路南段。这时梁鼎芬任两湖书院山长，陈衍任官报局总编纂，沈曾植任两湖书院史席，他们时常相遇，作诗论文，互相唱和。张之洞对他的诗也很推崇。

《广雅尚书生日以诗为寿》：莫道希文穷塞主，却教鬢秃敌清贫。垂天斗柄诸方见，入海江流半壁振。忧患老来身自扞，须髯白尽气逾新。闲鸥不为诗翁恋，浩荡烟波恐未驯。

他将张之洞比作宋朝范仲淹，又说张之洞虽然年纪老了，须髯尽白，可是忧患国难，气势很盛。末两句是表示自己的志向愿望未能实现，总有一天闲鸥是要展翅飞翔的。

《世已乱，身将老，长歌当哭，莫知我哀》：驻颜却老竟无方，被发纓冠亦太狂。归死未甘同泯泯，言愁始欲对茫茫。孤云万族身安托，落日扁舟世可忘。从此湖山换兵柄，肯教部曲识蕲王。

辛亥革命后，他以清朝遗老自居，满朝政府已被推翻，像落日扁舟一样，而他自己则孤云万族只身难以寄托了。

还有一首诗，写得更晚，遗老心情反而更加严重。

《陈叔通属题江弢叔墨迹》：……，世弃天留等可哀，黍离荆棘更能来。还从铜鞮寻残梦，早向昆明辨劫灰。吞炭漆身殊未避，触山逐日漫相猜。两朝国土虚名在，骏骨聊堪比郭隗。

此诗题目上写着：“自念生逢世乱，穷老无所就，复为此诗，后世或有悲之者。”算起来已是1923年了，但他脑子里仍要为清朝效忠卖力。

他的七言绝句写得很清秀幽峭，举两首。《题吴氏草堂》“雨后秋堂足断鸿，水边吟思入寒空。风情谁似霜林好，一夜吴霜照影红。”“水痕渐落霜渔汀，秃柳枝疏也自青。唤起吴兴张子野，共看山影压浮萍。”

同光体派的赣派还有胡朝梁，号诗庐，江西铅山人，他随陈三立学诗，是后期代表。浙派还有袁昶，字爽秋，官至太常寺卿，是后期代表人物。闽派还有林旭，福建侯官人，是戊戌政变被害的六君子之一。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又号桔隐，福建闽县人，为闽派领袖人物之一。还有李宣龚，字拔可，福建闽县人，曾从郑孝胥、陈衍学诗，为后期代表人物。这样看来，同

《近代诗钞》第13册，郑孝胥卷，第1页。

《近代诗钞》第13册，郑孝胥卷，第15页。

《近代诗钞》第13册，第16页。

《近代诗钞》第13册，第23页。

《近代诗钞》第13册，郑孝胥卷，第37页。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268页。

光体诗派这一群体在晚清诗坛颇有影响。宋诗运动的理论家陈衍强调：“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力图将性情与学力结合起来，成为“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道咸以前，由于文字狱大兴，诗人慑于文字之祸，咏吟所寄，只得模山范水，流连景光，咏史，咏物附于比兴之体，不敢显露出愤懑的情绪。同光以来，便因为时势变动，国难日逼，知识分子有改革的思想，便要将人心哀乐表达出来。显露真实的性情。陈衍说：“余生丁未造，论诗主变风，变雅，以为诗者，人心哀乐之所由写宣。有真性情者，哀乐必过人，时而赍咨涕洟，若创巨痛深之在体也。”这是一种进步。但是，戊戌变法失败，一批士大夫退下阵来，他们脱离了现实政治火热的斗争，只剩下个人的牢骚、哀怨、徘徊和惆怅，他们的诗作确也诉说着真实感情、胸怀，但是从中嗅不出时代的脉搏、社会的新鲜空气、人民群众的需求，单从古代诗歌中吸取养料，滋润诗苑，是可以开出鲜花，但是毕竟脱离了厚实的沃土，脱离了现实政治斗争。不在时代新旧斗争的旋涡里冲击，树木鲜花的生命力都是脆弱的，短暂的。宋诗运动阻碍了资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便要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梁启超便提出“诗界革命”，他们的新意境偏重于内容的创新，而不单是从古典诗歌的宝库中讨生活了。

第三节 杨文会

晚清对佛学的研究是一股缓缓流动的思潮。先进的思想家同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宋恕、章太炎都对佛学哲理深有体会。近代佛学的一位重要人物是杨文会。梁启超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杨文会。”可见杨文会的影响之大。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人。父亲朴庵，道光十七年(1837)中举，次年成进士，官部曹。杨文会10岁受读，不喜举子业，对唐宋诗词时一浏览，和朋友结交常赋诗为乐，性任侠。稍长，益复练习驰射击刺之术。16岁，娶妻苏氏，次年，太平天国起事，朴庵和全家老幼几十人，转徙徽、赣、江、浙间，往返十年，屡濒于危。居乡里，襄办团练，在徽宁佐理军事，跣足荷枪，身先士卒，日夜攻守不倦，论功则固辞不受。同治元年(1862)由江西迁居安庆，父亲去世，家庭贫困，曾国藩檄委谷米局。同治三年(1864)回乡，感时疫，病久。自此便学佛道。有一老尼授他一部《金刚经》，读后感到佛理深奥，难解，便弃置一旁。又在安徽书肆得《大乘起信论》一卷，阁置案头。病中读起信论，不解释卷，读了五遍，窥得奥旨。由是，遍求佛经，又在坊间得到《楞严经》、《维摩诘经》，反复诵读，始研索有心得，于是遍觅经论，感到经卷毁于战火，发心刻书本藏经。使能广为流传。他在江宁参加工程建筑，与真定王梅叔、邵阳魏刚已、阳湖赵惠甫、武进刘开生、岭南张浦斋、长沙曹镜初交往结识，互相讨论佛理，深究宗教渊源。他日则

《石遗室诗话》卷8。

《山与楼诗叙》，《石遗室文集·四集》。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3页。

刘开生即刘翰清，曾任出使俄罗斯参赞道员。赵惠甫即赵烈文，曾任易州直隶州。曹镜如即曹耀相，曾

重理工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刻印经籍，诵经念佛，静坐作观。所办工程，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褒奖。同治十二年（1873）屏绝世事，家居读书。后因家境窘迫，又就江宁筹防局差。在这几年内，刻经不辍，经版藏于家中。光绪元年（1875）经理汉口盐局工程，第二年，受曾纪泽之聘，襄办传忠书籍。光绪四年（1878）曾纪泽出使欧洲，他随行，到英国、法国考察政教生业甚详。精究天文、显微等学，制有天地球图，并舆图尺，以备将来测绘之需。回国后仍以刻经为事。光绪十二年（1886）春，刘瑞芬出使英国，杨文会应召随往伦敦，观察英国政治制造诸学，深明列强立国之原，三年既满，先行假归，不受褒奖。他在伦敦结识一位留学牛津大学的日本学者南条文雄，是在英专攻梵文，研究佛学哲理的，两人成为至交，相约相互交流佛经典籍。后来，得到南条文雄的帮助，从日本搜集到中国已佚的隋唐佛教典籍近三百种，杨文会择其最善者，刻印流传，这对于佛学研究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光绪二十年（1894）他同英人李提摩太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以便将佛学传播到西欧。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同锡兰的佛教居士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会晤于上海，相约复兴印度佛教。这些国际交往扩大了在中国佛教的影响。

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在南京延龄巷住所，创立“金陵刻经处”，专门负责刻印、流通各种佛经。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他在刻经处创办佛教学堂，称“祇洹精舍”，它的宗旨是冀学者兼通中西文，以为将来驰往天竺，振兴佛教之用。由李晓暎讲授国文，由苏曼殊讲授英文、梵文，他亲自讲授佛学课程，就学者20多人，日有进益，不及两年，因经费不足停办。宣统二年（1910），他在南京创办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每月开会一次，每周讲经一次，弘扬佛法，纠正和救治佛教宗教界的一些流弊。

他弘法四十多年，流通经典至百余万卷，印刷佛像至十余万张。他的刻经、办学都是开风气之先，以后在上海、北京等地成立了“佛学书局”、“佛经流通处”等机构，各地的佛学院也相继成立。他的弟子很多，许多著名学者与他探讨，切磋佛学哲理。最著名的是欧阳渐居士和太虚法师。他临终遗嘱将弘法事业传给其门人学唯识的欧阳渐。所以，杨文会是现代佛学以及现代佛学教育的奠基人。

佛学哲理

杨文会写了一篇《十宗说略》，介绍中国佛教流派，对每一宗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原始佛教由释迦牟尼所创，它的教义是讲四谛，人生是苦、集、灭、道四谛。苦谛是说人生是苦，一生都在苦中挣扎，苦海无边。集谛说明痛苦是由诸种条件合成的，探求苦的原因、根源。灭谛是人一生在流转的环境中，六道轮回，产生因果报应，人要求得灭除痛苦达到寂灭状态。道谛是找到除灭痛苦，证得涅槃正果的道路、途经、方法。就是要修行积善，解脱人间痛苦。释迦牟尼去世后，佛教又发生了分裂，形成小乘和大乘两大流派。小乘学派只承认能为佛弟子，闻佛的言教，重视戒律修行，求得自身解脱，是消极的、寂静的，比较接近原始佛教教义。大乘学派产生较晚，认为人人皈依佛，人人可成佛，立大志发宏愿归向佛，终可为佛，偏重普渡众生，致力于一切众生的解脱。大乘佛教在发展中又演化为

中观学派（空宗）和瑜伽学派（有宗）。中观学派的创始人是龙树，他认为观察事物不要落一边，要综合两边，合乎中道，因而称中道学派。他又认为万事万物是由因缘合和而生，依靠其他原因、条件而生，事物自身是不真实存在的，缘起性空，一切皆空，建立了“空宗”宇宙观。瑜伽学派创始人是世亲、无著兄弟。他们提出万物唯识所变，识有境无的主张。万物（境）是无（空），由于识能变现万物，因此，识是有。他们的学理便称为“有宗”。以上叙述的这些理论都流传到中国，相应地形成各种流派。

杨文会的《十宗略说》便是介绍中国佛教的各宗。

（一）律宗，又叫南山宗。

唐道宣住终南山创宗，故亦称南山宗。宗教讲修行，修行讲戒、定、慧。戒是戒律，定是止，坐禅，慧是理，精通哲理。杨文会说：“夫戒定慧三学，次第相须，未有不持戒而能骤得定智者”。“出世三学，以持戒为本，故首标律宗”。律学便是检束身心，使违背凡情，随顺圣道。首先是守戒律，打坐入定，思考哲理，道德高洁，心地纯净，才能悟出佛理来。他说：“近代宝华山三昧律师，专以此法轨范僧徒，师资相传，代有闻人。”唐代书法家怀素亦是律宗僧徒，近代弘一法师（李叔同）也是皈依律宗。

（二）俱舍宗，一名有宗。

世亲造《俱舍论》，全称是《阿毗达磨俱舍论》。陈文帝天嘉四年，印度高僧真缔译出。唐代玄奘到印度取经，归来重译《俱舍论》三十卷，由门人普光作记，法宝作疏，弘扬传习，遂成一宗。

（三）成实宗。

阿梨跋摩造《成实论》，姚秦弘始十三年，鸠摩罗什译出，其弟子昙影笔述，僧叡作注释，六朝传习甚众，到唐朝便渐渐衰落了。

（四）三论宗，一名性空宗。

《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是为三论。《中论》、《十二门论》是龙树著，《百论》是提婆著，这三部经典是宣传缘起性空的中观学说，为对小乘学派进行驳斥的重要著作。鸠摩罗什将此三部经典译成中文，僧生、僧肇、僧融、僧叡相继传承，唐吉藏专宗此，学术大盛。天台宗兴起，学三论便逐渐稀少了。杨文会说：“吉藏有疏，若干卷，今从日本传来，或者此宗其再兴乎？”欧阳渐说：其师杨文会“刻门论百论等，然后中观之学有籍，而三论之宗复明”。晚清黎端甫善三论，是杨文会弟子。

（五）天台宗，一名法华宗。

陈隋间有一位大师叫智。他住在浙江天台山创宗，故名天台宗。此宗以《法华经》为教义根据，又叫法华宗。这派根据印度大乘学派中观理论，反对偏执一边的看法，对事物现象的解释，不生不灭（法体）、不常不断（时间）、不一不异（空间）、不来不出（运动）、不二法门、不落二边，称为中道。他们提出性具善恶，一心三谛，一念三千。一心可以同时观察事物的空、假、中。既看到空，又看到假，还能看到此两面统一起来而观察的非空非假的中道。一念即一心，三千即整个宇宙，宇宙整体就存在于心念活动之中。他们主张定慧双修、止观并重。止，就是禅定；观，就是智慧，通过修行，暗障皆除，众善普会，大彻大悟便成佛性。

《十宗略说》，《杨仁山居士遗书》第三册。丁巳年刊本，以下相同者不一一注明。

《杨仁山居士传》，《内学杂著》下，附录。

（六）华严宗，一名贤首宗。

华严经是印度龙树所著，因依华严经立宗，故称华严宗。隋唐间创宗大师是贤首法藏阐明此宗教义，故称贤首宗。华严宗是依据印度大乘中观学派理论，讲缘起真如论，即世间一切事物待缘而起，依一定条件变化，是互相关连，互相作用。他的主要意思是本人的心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一念不觉便产生“无明”，于是出现种种妄念，堕入迷妄，只要离开种种妄念，悟此身便能成佛性。发心便能成正觉，人人都可成佛。这里面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杨文会深通华严。他自己说：“鄙人初学佛法，私淑莲池、憨山；推而上之，宗贤首、清凉，再溯其源，则宗马鸣、龙树。”按：莲池是明朝高僧，在杭州云栖寺当主持，称云栖株宏，提倡禅净合一，以持戒念佛求往生净土，为净土宗大师。憨山是明朝高僧，在庐山结庵说法，主张禅、华严、净土三宗调和，以佛学解说儒家经籍。这两位明朝高僧的思想对杨文会影响很大。贤首即唐法藏大师，清凉即唐澄观大师，这两位是华严宗的，可见杨文会是崇信真如缘起论的。欧阳渐记述：“仁山居士，学贤首，遵起信论，刻贤首起信论义记及释摩河衍论，而集志福等注以作疏，博求日韩，得贤首十疏之六，与藏内十余卷，都二十种，汇而刊之，曰贤首法集，刻玄文本论，而译论五位以笼罩一切法门。”这一段讲明乃师杨文会崇信华严宗并为此宗搜集经藏刻印流通所作的努力。

（七）慈恩宗，一名法相宗，又名唯识宗。

杨文会解释：天竺有性相二宗，性宗是前之三论，相宗是唯识论，以弥勒为初祖，无著、世亲、护法等相继弘扬，即印度大乘瑜伽学派。因宣扬一切事物唯识所变的观点，故称法相宗、唯识宗。又因创始人玄奘、窥基常住在慈恩寺，是其主持，故称慈恩宗。这派学理强调众生有五种种性。一、声闻种性，二、独觉种性，三、菩萨种性，四、不定种性，五、无种性。在世界上，讲八识，一切事物都是缘起，这缘起的缘，主要是人意识中的种种习气，即经验。一切客观现象都依存于经验，这是相宗，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眼、耳、鼻、舌、身是感觉，意是思虑分别，末那是思量（推理、判断、记忆），这七识是从哪里来的？即靠阿赖耶识，第八识。前七识的能力都是第八识给的。这一学派因为主张只有一部分有佛性，不是人人有佛性，限制了一部分人，招致了其他宗派的反对和攻击，也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又因此宗佛理比较深奥，特别繁琐，影响了它的传播和普及。

杨文会很重视唯识学的研究，并且从日本搜集到因明唯识的经卷。他在《十宗略说》中说：“参禅习教之士，苟研究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颠预佛法，侗真如，为法门之大幸矣。”“论疏流传日本，今始取回。”其弟子欧阳渐记述：仁山居士“与桂伯华书曰：‘研究因明、唯识，期必彻底为学者楷模，俾不颠预、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明末诸老，仗宗镜录，研唯识，以故相宗八要，诸多错谬。居士得唯识述记而刊之，然后圭臬不遗，奘基之研讨有路。”以上记述说明三点：一是唯识宗的经籍由日本传入，提

《与某君书》，《等不等观杂录》卷6，《杨仁山居士遗著》第9册。

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传》，《内学杂著》下，附录。

《杨仁山居士传》，《内学杂著》下，附录。

供了研究的有利条件。二是杨文会门下研究唯识的学者甚多。三是杨文会传其佛教事业于欧阳渐，他便精通唯识宗的哲理。晚清唯识宗哲理的研究，形成一个高潮。

（八）禅宗，一名心宗。

达摩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历代相传，称为禅宗。又以觉悟众生心性的本原为主旨，又称心宗。杨文会认为禅宗之宗，不属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中的第五度，而乃是第六度，以“般若”来解释“佛之心印”。梁武帝时，菩提达摩由广东到河南登封县嵩山，面壁七年。唐朝弘忍传给惠能，神秀要抢夺其衣钵，惠能潜到广东，创南禅。这一宗派讲哲理不用语言，不着文字，不讲究坐禅，不讲究诵经，直指心性，见性成佛，想通了，便达到顿悟，便成佛。佛性到处都有，连木石也有佛性。佛是什么？既不是这，又不是那，无处不在，无处不是，因此，用比喻，寓意，甚至不说话，用棒喝，教你悟出道理来。这叫“参话头”，或“参禅”，理解禅理。这种宣传没有一个凭据（如经籍），因此，流传一久，便生出许多弊病。有的人根器浅薄即以禅师自命，大言不惭，有的人一知半解，便谓超佛超祖，妄谈“般若”，招摇撞骗。杨文会认为后来“岂惟浅深不同，亦乃真伪杂出”。他在《十宗略说》中大发感慨：“慨自江河日下，后后逊于前前，即有真参真悟者，已不能如古德之精纯，何况杜撰禅和，于光影门头，稍得佳境，即以宗师自命，认贼为子，自误误人！”“故黠慧者窃其言句而转换之，相鲁者仿其规模而强效之，安得大权菩萨乘愿再来，一振颓风也哉！”他的意思是对那些大谈禅法的人要认真检验，看他们是真有禅道功底，还是只有吓唬人的谎言。

（九）密宗，一名真言宗。

印度龙树受教于金刚萨埵创教。如来佛有三身：一是释迦牟尼如来佛、一是大日如来佛、一是弥勒佛。密宗崇大日如来佛。中印度善无畏东来，南印度金刚智东来，传入瑜伽密宗，又传给不空、一行、惠果。密宗供奉大日如来，还有巫术，行法术、祈雨、治病等。日本僧慧果到唐朝留学，回到日本，将密宗传入日本，弟子有空海，称东密。印度莲花生到西藏弘法，将密宗传入西藏，称藏密。杨文会记述道：“今之学者，但持诵准提大悲等咒，至心诚恳，亦得密益。欲知其中奥妙，须阅大旦经疏释及显密、圆通、大藏秘要等便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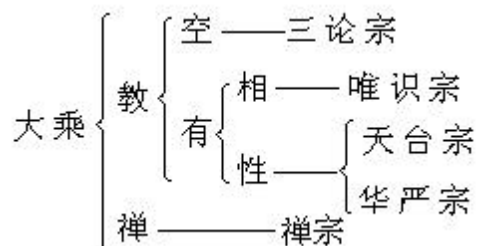
（十）净土宗，一名莲宗。

净土宗供弥勒佛，以为念佛，借助他力，便能求解脱，只要心诚，念南无阿弥陀佛，死后往生西方净土，便能得道。此法简而易行，深得大众欢迎。净土宗以普贤为初祖，后马鸣造大乘起信论，龙树造十住智度论。传入中国，慧远为初祖，结白莲社于庐山，此宗因此又名莲宗。昙鸾、道绰、善导，次第相承，宋朝有永明，明朝有莲池，这是极著名的高僧。

杨文会学理上钻研华严，践履上归心净土，教人以净土。他认为：“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此念佛往生一门，为圆顿教中捷径也”。各派只是百川异流，唯独净土宗才是大海，别开方便法门，普渡众生之法，是捷径。

杨文会在《十宗略说》的结语中说：“出世三学，以持戒为本，故首标律宗。佛转法轮，生度声闻，故次之以小乘二宗。东土学者，罗什之徒，首

称兴盛，故次以三论宗。建立教观，天台方备、贤首阐华严、慈恩弘法相，传习至今，称为教下三家。拈花一派，教外别传。灌顶一宗，金刚密授，故列于三家之后。以上各宗，专修一门，皆能证道。但根有利钝，学有浅深，其未出生死者，亟须念佛生西，以防退堕，即已登不退者，正好面觐弥陀，亲承法印，故以净土终焉。”这段结语说明他写十宗略说各宗排列顺序的原由。成实论、俱舍论属于小乘，其他各宗属于大乘，天台、华严、唯识宗称“教下三家”，禅宗称“教外别传”。就其思想体系而言，可列表如下：



律、密、净土三宗，就其思想倾向说来，律宗近于“相宗”，净、密宗近于“性宗”，都属于“有宗”。从这段结语来看，杨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

佛教传入中国，约在东汉，魏晋隋唐极盛一时，到了后来，便趋衰落，有些宗派，渐渐沉寂，晚清佛教的复兴，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晚清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侵略，内政腐败，造成国家多难，西学东渐，传统儒学在苦苦支撑局面，显得相形见绌。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各种学问，也触及佛学。封建时代崇儒，“独尊儒术”，佛学是旁门左道，儒学讲入世，佛学讲出世，到了晚清，西学冲击，打破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人们从诸子学说、佛学道教中寻找人生哲理。

西学东渐，人们发现西方对佛学的研究相当重视。西方研究佛学，包括古印度佛学（梵文）、中国佛学、日本佛学、东南亚佛学。日本佛学研究也引起西方重视。这种研究风气也影响到中国。西学东渐，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方法也输入中国、促使人民独立思考，将传统文化一一加以重新分析、认识和评价。梁启超说：“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人。”这里，梁启超将佛教看作为“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誉为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

从思想上说，中国晚清研究佛教，比较偏重佛教哲理的研究。佛教哲理中的某些内容对现实政治斗争有着借鉴意义和作用。第一、救世、救人。佛学思想，尤其是大乘教义讲究普渡众生。“佛说：‘有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舍己救人之大事惟佛教足以当之”。第二、平等、慈悲观念。平等观念源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皆如昨梦’。其立教之目的，则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已”。慈悲，就是爱人，与儒家学说中的仁，不忍之心相似。晚清思想家便将佛理中的平等、慈悲观念与西方资产阶级平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39，第 118、119 页。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39，第 118、119 页。

《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10，第 47 页。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10，第 49 页。

等、博爱观念相类比，以冲破封建等级观念。第三、不怕牺牲，勇于任事的精神，为了普渡众生，便甘心入地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宏大志愿，形成了一种人格，即自尊、无畏、奋迅、勇猛，具有大的威力，这种人格的陶冶便能使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第四、依自不依他。佛教教义自贵其心，不依他力，而靠自己努力，独立思考，摆脱一切封建礼教思想的羁绊。自己认定了的目标，则不怕牺牲地去做，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明朝张居正，晚清章太炎都说过这样类似的话。

总之，思想家、革命家、学者为了救国救民，他们从佛教哲理中吸取一些积极内容，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不为名、不为利，而为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勇猛无畏，视死如归，显示出一种刚毅精神和英雄气概。谭嗣同赴刑场时便是这种慷慨激昂的气概。

佛学哲理又可丰富传统文化。

佛学的论证方法比中国传统儒学要细致、精密得多。唯识论名相，将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包括物理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详尽论证，包括了世界观、人生观、心理学、伦理学、认识论、因果论、真理论，体系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分析十分精致缜密，有科学合理的成分。这些分析对中国先进思想家有极大启发。康有为的《大同书》，就是由佛教思想指导而写成。谭嗣同《仁学》也用华严宗、禅宗、唯识宗三宗的思想、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和儒学的今文经学构架了全书。章太炎学术思想，其佛学思想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他自述思想从儒学伸向佛学，又从佛学转回儒学，“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以后，著名哲学家熊十力曾问学于欧阳渐，他写的著作《新唯识论》是用佛学唯识论融合儒佛思想，借鉴名相分析的方法，解释哲学，推动着近代佛学的复兴。

还有因明学，是佛教中的古代逻辑学，中国古代曾有名学，《墨子》中有论述逻辑的，后来，此学不甚发达。近代人们又重视它，西方逻辑学传入，人们一面从《墨经》中发掘墨子论逻辑，一面又从佛经因明学中发掘印度传来的古逻辑学。吕征《因明纲要》、陈望道《因明学》、太虚《因明概论》和虞愚《因明学》，是研究因明学的一批重要成果。

佛学的研究在方法上也有创新。如吕征，曾向欧阳渐问学，后来卓成大家。他研究佛经，由梵文、巴利文古文字入手，将汉文、藏文相对比，用佛经的英译本、日译本，对比勘误，提出异同点，鉴别真伪，考订异乱，纠正错谬，补充缺漏，冶巴利文、梵文、汉文、藏文于一炉，回头来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籍中许多疑难问题一一考订，这样，研究便推进了一大步。吕征便是这样寻求佛典哲理演变的规律。著成《西藏佛学原论》、《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书中提出了许多创见，标志着佛学思想研究达到了成熟阶段。

综上所述，晚清佛学研究的复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动荡不定，人心思稳，谋求精神解脱的结果，是打破了“独尊儒术”局面的结果，是西学东渐，用新的研究方法整理佛经典籍的结果，从而使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分析更加丰富，是西欧佛理研究对中国推动的结果。

第七章 戊戌思潮的延续

第一节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他比康有为小15岁。他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学识渊博，在哲学、政治、经济、史学、文学、新闻、佛学方面都有煌煌巨著，一生度过了五十八个春秋，留下遗著约1400万字，著有《饮冰室合集》（包括专集和文集）。

他的祖上没有做过什么官。祖父、父亲理学传家，半耕半读，高祖墓莹在崖门，小时候，祖父每年带领他到墓上扫祭，讲宋朝被灭亡的故事，民族战争的激烈，汉人亡国的沉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梁启超17岁到广东考试，中举人。考官为内阁学士、贵州李端，赏识他的才学，便将从妹李蕙仙嫁给他，19岁完婚。他原在广州学海堂读书，对考据学刻苦钻研，颇有心得。一次，他和同学陈千秋访问康有为，康有为说八股文、考据训诂都不算学问，问他们真正的学问是什么？梁、陈回答不上来，如“冷水浇背，尽失故垒”。再次访问，康有为讲陆王心学、今文经学和史学、西学，使他心头顿时开朗，便尽弃前学，和陈千秋入万木草堂，拜康为师。康有为对梁的学术影响很大。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在首都考试的举人举行了“公车上书”的政治活动，带头签名的便是康有为、梁启超，梁启超还办《中外纪闻》，呼喊挽救民族危机，提倡变法。

1896年他到上海，办《时务报》，连续登载《变法通议》等文章，他的言论在全国尤其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人称“言论界之骄子”，又称他为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上海是人才集汇之地，又是中西文化的汇合点，他在上海接触了很多西书和新事物，成为著名的维新思想宣传家。

1897年他应聘到湖南长沙主持时务学堂，任总教习。带去的教员有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都是康门弟子，他和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徐仁铸、熊希龄等经常交往，他在课堂上提倡变法革新，宣传民权思想，使学生的思想大为振奋，湖南新政高潮的出现，梁启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梁启超的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接受新事物快，从八股到考据学、到今文经学，学术凡三变。二、善于鼓动，文字有一番魔力，笔锋常带感情。三、理论根底较浅。由于第一点，他到湖南后，吸取了黄遵宪、谭嗣同的观点，宣传民权思想，流露反满情绪，倾向地方自治，都超越出康有为思想的范围。由于第二点，他每到一地，总能掀起巨大的波浪，激荡起旋涡，形成新的思潮。由于第三点，则形成他的思想流质多变的特点。

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来源于康有为的理论，他论证君政民政相嬗替的历史规律，比康有为讲得更为具体，但是也未跳出公羊三世说的理论框架。康有为偏重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梁启超则偏重于思想方面，报纸宣传、学堂教育，都在向国人灌输新思想，想给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造提供真正的社会心理基础。他认为近代文明需要与近代国民的理性觉醒相伴而行。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到日本。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戊戌思潮的延续时期，又是辛亥革命思潮开始兴起的时期。梁启超称此时是中国的过

渡时代，政治上要从君主专制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文化上八股文要被新文体代替，经济上要从封建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他敏感地觉察到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很严峻地向人们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写成一篇一篇文章，进行探讨，古人善作万言书，他则无书不万言。《新民说》、《自由书》、《德育鉴》，洋洋洒洒，气势磅礴，充满爱国热情。他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后自成一派，想和革命派合作，成为论坛盟主。他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黄遵宪评论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

铸造国民性格的思想设计和中西文化观

梁启超在日本主要从事思想启蒙，其内容是介绍西学。他介绍培根、笛卡儿、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边沁、穆勒，瑞士的伯伦知理，德国的波伦哈克。日本近代思潮有三：一是法国的共和主义，二是英国的功利主义，三是德国的国家主义。相应地，梁启超介绍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翻译过《民约论》；福泽谕吉，被称为是日本的伏尔泰，撰写过《文明论概略》；中村正直，翻译过穆勒和斯迈尔的作品，是功利主义学说的传播者；还有一位是加藤弘之，他译过伯伦知理的《国法泛论》。实际上，西方政治思潮，从历史顺序上讲，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国家主义。但是，并不是思潮愈新便愈正确。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强调国权，反对卢梭思想，认为对国民自由不能给予太多。这一点也影响了梁启超。梁认为清政府不是要推翻它，而是加强国权，实行君主立宪，执行的仍是改良主义方针。

梁启超认为国家富强要从“民”做起。“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输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输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根据斯宾塞的观点，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国民是个体，主体民的优劣决定了客体国家的强弱盛衰。国家要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好像墙体和砖块的关系，砖块结实、平整砌出的墙体便坚固结实，相反，墙体便如土粪墙一样，一推便能倒塌。所以严复曾说：“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就是这个道理。怎样提高国民素质呢？便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也是斯宾塞的观点，严复曾逐一加以解释，梁启超在《新民说》一书中又细加论述。戊戌变法失败，他总结其经验教训，认为政治改革不能单单依靠皇帝个人，也不能靠少数几个英雄，而要靠大多数国民和国民主体意识的提高。他到了日本后，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认为首先要提高国民素质，因此，梁启超便说：“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又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他认为当今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只有整个国民智慧力量道德都赶上去才能与列强相埒。因此，他特别强调铸造国民性格成为新民。

民力、民智、民德，在其内涵和解释方面，梁启超也比严复更进了一步。

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4页。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第1页。

《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25页。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第6、2页。

民力，指国民应付现实生活中各种复杂环境的能力，包括体力、胆力、毅力等，比单纯强健的体力更丰富一些。智力指国民文化水平，求智能力，不拘束于儒学范围，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比单纯学习西学知识的内涵又要延伸一步。民德指国民在公德方面需具备国家观念、法制观念、民主自由观念，在私德方面需具备传统文化道德中的优秀品质等，比单纯具有民主观念又丰富些。

新民应当具有什么品德呢？

第一，要有国家思想。

他说：“我国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中国旧伦理讲私德居多，梁启超认为在长期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国民只知有皇帝，而没有国家思想。人们只知对皇帝尽忠，而君民关系是主子和奴仆的关系，国家是私人的财产，臣对君是愚忠，为一姓卖命。民众受国家压迫，国家兴亡，与自己无关，谁来当皇帝，民众都是被统治者，只知独善其身，知家族不知国家，外族侵略，只好顺从，历史上金、元、清都是一样逆来顺受。这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斗争。晚清外族侵略，是帝国主义侵略，民众有反抗，但是人民没有权力，这种反抗是自发的。梁启超具有爱国主义思想，说：“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螫贼。”

第二，要有权利思想、自由思想。

在中国君主制下，专制暴君多，人们权利观念淡薄。而西欧近代诸国人民立国之本是“不自由，毋宁死”，不能做奴隶，要做自由人。梁启超记载：盎格鲁撒克逊人，其独立自主之风最盛，其守纪律循秩序之念最厚，其权利之思想最强，视权利为第二生命，丝毫不肯放过。盖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感情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因此，他得出结论，政府压制人民，人民便要争自己应有的权利。

自由者，精神发生之原动力也。“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自由有政治自由、民族自由、宗教自由、生计自由。从中国来讲，政治自由即参政自由，民族自由即要求民族独立解放，还有思想自由。梁启超着重阐明：自由不是放任；个人自由不能太强调，着重的是团体自由；要注意思想自由，不要为古人之奴隶。在这方面谈得较多一些。

第三，要有冒险进取精神。

欧洲民族为什么强？这些国家涌现出许多冒险进取的人物，他列举了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的哥伦布，蹈海环游全球的葡萄牙的麦哲伦，宗教改革的日耳曼的马丁·路德，还列举了俄国彼得大帝、法国拿破仑、美国华盛顿、林肯、英国克林威尔、意大利的玛志尼，他们在创业中战胜千万重困难，体现了资本主义在战胜中世纪封建主义、开拓领土、建立市场时，人们富有的创新精神，他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和理想，凭着满腔热血和真诚，发挥无穷的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第12页。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第14页。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第40页。

智慧，成就了轰轰烈烈的伟业。这种社会心理的基础是资本主义近二、三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积累起来的。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下，封闭自守，儒家“中庸”思想，道家“与世无争，不为天下先”的思想，知足常乐、“枪打出头鸟”之类的生活经验，多从消极方面对人生进行了总结。所以常常是稍得名利，赶紧退缩，以免招灾惹祸。因而不敢冒险、怕妒忌、甘当乡愿成为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造成了怯懦、懒惰、唯唯诺诺的性格。梁启超痛恨这种性格，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第四，要有自治能力，要不断进步。

要热爱群体，自尊自立。中国千年来进步缓慢原因有五：一、大一统而绝竞争也。二、环蛮族而交通难也。三、言文分而人智局也。四、专制久而民性离也。五、学说隘而思想窒也。梁启超从根本上怀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主张要破旧立新。

《新民说》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人权宣言。他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是国民主体意识的更新。这是学习西方更深层次的发展。学习西方，先是物的船坚炮利，然后是物心相结合的民主政治制度，再次是心的政治哲学思想，最后提到国民意识的更新。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提出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伦理的觉悟。陈独秀向中国青年提出六点要求：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隐退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义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些内容和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论自由、论进步、论进取冒险、论自尊各节的论述，全有思想轨迹可寻，精神是相通的。可以说，《新民说》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和前奏。

国民性格的改铸，《新民说》偏重于公德，主要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来补充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不足。他编了一部《德育鉴》，主要采取了中国古代先哲关于伦理道德的语录，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找寻精华来熏陶国民。这里牵涉到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他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所以他的文化观：一不是全盘西化，二不是顽固不化的全盘复古。他在另一处写道：

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一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这段话表现了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热烈欢迎的态度。那么国学如何对待呢？他又有一段话说道：

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遽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

参看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1月15日。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第5页。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7，第4页。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7，第104页。

他对国学仍是很有信心，相信国学自有其价值在，而且，以西学的方法来治国学，则国学将大放异彩。梁启超本人便是这样实践的。

走向近代社会，人群交往日多，要讲社会公德。但是，公德的基础是私德，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私德，一到社会上便表现得卑劣低下，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传入中国，经这些品质低下的人一做，也会做歪了。梁启超说：“不意此久经腐败的社会，遂非文明学说所遽能移植。于是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他鉴于这种情况，便强调加强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以能胜任改造社会的重任。

《德育鉴》分六个问题，第一是辨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心术要正，这是讲动机。首先要分清楚义和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陆九渊）。“为学莫先于辨诚伪，苟不于诚上立脚，千修万修，只做得禽兽路上人”（刘蕺山）。梁启超在这里没有讲西方的功利主义学说，还是用中国传统儒学，首先是分清楚公私、义利、诚伪。一个人做事要考虑民族、国家、群体，而不是只顾个人私利。因此，他提倡知识分子要有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和坚定的信心。有些狂妄，还可改正；欺骗，犹有羞耻之心；作伪，则无药可救了。为人心诚，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条。

第二是立志。立志就是知识分子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重担子须是硬脊梁汉方担得。”（程明道）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志向实现？这便需要学习，磨砺自己的意志，不为世俗的见解所束缚，不为富贵声色所迷惑，一心一意地奔向目标。“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没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能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陆象山）追求知识是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知识分子仅仅读四书五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飞速发展，知识分子要接受新思想、新知识，提高爱国觉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第三是知本。提高自身道德的根本途径是什么？是致良知。致良知是王阳明学说的基本核心内容。梁启超认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就是要致良知，恢复人的本性。良知，人人都有，只是社会的种种遗传和感化，把良知熏染得黑漆漆的，变得昏谬不堪。要恢复良知，返回最初良知。儒学流传千百年，贱儒伪学盛行，要找寻儒学的真精神。这里有两点，一是梁启超吸取了王艮（心斋）的观点，认为良知是引导人们去苦求乐，“人心本自乐”。追求幸福快乐是人生的目的，这和边沁、穆勒功利主义思想相吻合，具有近代色彩。二是梁启超强调要独立思考，保持良知判断能力，不因循旧说，不迷信经典，不迷信权威，这样才能有创造性的思维。这种独立思考冲破了封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第127—128页。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6，第1、13页。刘蕺山（1578—1645）即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人称蕺山先生。明浙江山阴人，是黄宗羲的老师。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6，第15页。程明道即程颢。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6，第16页。陆象山即陆九渊。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6，第31页。王艮（1483—1540）字汝止，号心斋，明江苏泰州人，属王学的泰州学派。

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体现了近代个性自主的色彩。

怎样达到致良知，王门有两派，一派趋重本体者（即注重良知），以王畿（龙谿）、王艮（心斋）为代表，这派是泰州学派。另一派趋重于功夫者（即注重致知），以聂豹（双江）和罗洪先（念庵）、刘文敏（两峰）为代表，这派是江右学派。梁启超自己说：“若启超则服膺双江念庵派者”。功夫，即偏重于做，在实践上费功夫。梁启超具体阐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道理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两语，是先生所以说知行合一之宗旨也。故凡言致良知，即所以策人于行也。然则专提挈本体者，未免先生所谓闲说话矣”。那种悬空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的人是无济于事的。他说今人言爱国，不能光激昂慷慨发议论，更重要的是去行，如果知而不行，则是无希望的人，“有良知而不肯从事于致之之功，是欺其良知也。”所以，梁启超从辨术、立志、知本三段，发掘了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知行合一的学说，把它们与救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又使私德与公德联系起来。

第四是存养，第五、第六是省克和应用。存养、省克、应用各为一章，存养是在思想磨练上下功夫，省克是不断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什么错误、缺点加以改进，应用是将自己的私德在社会上运用，以自身的品德影响社会。

梁启超说具备良知，还要修证，这修证即是存养。他说：“阳明以良知喻舟之有舵，最为确切。顾舵虽具而不持，则舟亦漂泊不知所届耳。修证之功有三：曰存养，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贯，而存养为之原。”

怎样进行修证？有两派：一主静派，一主敬派。梁启超说有点类似佛教讲止观双修，止即主静。他说儒家言静，实兼有观之作用，必辅以观，然后静之用乃神。曾国藩有一对联：禽里还人，静从敬出。梁认为曾国藩是兼主敬静者，“而以敬为静之下手工夫，此其独到见处，即其得力处也”。陈白沙有云：“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陈献章是康有为最崇拜的粤东思想家，康有为曾以“主静出倪，养心不动”作为万木草堂学纲的德育条目之一。

梁启超有一段话，说：“文正（曾国藩）常自言，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故一生最提倡勉强之义，其事业亦多从此二字得来。此一般学者最适之下手法门也。习染困人，中材什九，非经一番火铁锻炼，万难自拔。刘蕺山所谓心贵乐而行惟苦，学问中人无不从苦中打出，盖谓此也。”

他为什么这样强调从苦中磨练性格？因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危机深重，封建旧习俗很浓厚，知识分子要挽救民族危机，救国救民，改变旧习俗，会遇到许多困难、曲折、打击，要有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毅力和勇气才能百炼成才。因此，他希望青年学子步入社会有此思想准备，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30 页。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36—37 页。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38 页。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46 页。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59 页。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61 页。陈白沙，名献章，字公甫，广东新会人，受学于吴康斋，明初思想家。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97 页。

培养成坚韧不拔的可贵性格。

第六讲应用。他说：“道学之应用，全在有志之士，以身为教，因以养成一世之风尚，造出所谓时代的精神者”全在于君主和士大夫的提倡。君主的提倡，士大夫的身体力行，使转移风气和陶铸一世之人成为可以实现的事业。梁启超从英雄史观出发，过分强调了伦理思想对改造社会的促进作用，明显地带有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

总的来说，梁启超在《新民说》和《德育鉴》中关于塑造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构想和设计，是将中西文化加以融合整理的一次尝试，他的宣传对推动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变革，起着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是他在政治上仍坚持改良，抵制革命，主张渐进，反对用暴力推翻清政府，实行政治制度的剧烈变革。这种政治主张使他的思想启蒙作用在政治实践中大为逊色。

史学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1901年著《中国史叙论》，1902年著《新史学》，1922年著《中国历史研究法》，1926年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对封建史学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中国历史学很发达，但是，封建旧史学只重视一个朝廷的兴衰，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而对整个社会各方面叙述很少，他说旧史学有几个弊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因此，旧史学不能使民智有益，反而成了损耗民智的工具。他将旧史学指责为“帝王家谱”、“相斫书”、“墓志铭”、“纪念碑”、“蜡人院”。集中批判了帝王中心论。在史学观点上，批判了“正统”和“春秋书法”。梁启超认为史学家争正统，无非是争君权神授，“正统”，就是“君统”，制造这种舆论来统治人民，造成民众的奴隶根性。史学家都是“陋儒”，争一家一姓的正统，甘心为君主的奴仆而已。与此相联系的是“历史书法”：“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这种褒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还是对君主是不是忠心，实际上，二千年来书法，不过是为霸者效死力而已。对君有利便为功，为善，反之则谓罪，谓恶。其结果是颠倒黑白，歪曲历史，“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因此，他认为正统应该是国统、民统代替君统，他说：“泰西之良史，皆以叙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而评判史事和人物也应用新的标准，说：“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这里，他便和封建旧史学划清了界限，建立起了资产阶级的新的史学理论体系。

他对旧史学和新史学加以界说：“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6，第101页。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26页。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第29页。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第21页。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第29页。

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学，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谍，近世史家，必探查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这就规定了历史学的意义和目的是探查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这是进化史观。此后，他对史学又立下界说谓：“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一界说，既包含了历史的意义，又包含了研究历史的目的。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要发现并阐明这历史规律是史学家的任务。他说：“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有了历史哲学，探明历史规律，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他又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后来，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表述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这一界说对史学的意义和目的概括得更为精确，他阐明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国民的资治通鉴，是爱国主义的最好教材。

梁启超运用进化论史观写了大量的著述，其学术思想方面，《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中国近代最早试图用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学术思想的一部巨著。这本著作将中国文化思想的浩繁史料理出了一个头绪，使人读了豁然开朗。钱玄同曾经回忆说：“余自童至今，最嗜小学及经学，然彼时于学术思想之变迁，实茫然无所知也。壬寅读梁任公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于是始知国学梗概。”而章太炎对此书的评论是：“真能洞见社会之沿革，种性之蕃变者。”可见此书对青年学子曾起过思想启蒙的作用。后来他又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开拓性的著作，具有重要的价值。

文学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写的是一种半文半白的通俗易懂的新文体，这种散文深受国人欢迎，青年学子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自己回忆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从他的叙述来看，新文体第一个特点便是通俗易懂，文笔流畅，纵笔所至，不受拘束，冲破了桐城派古文的义法，骈体文的韵律，能够深入浅出地描述新事物，比喻生动、

《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页。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10页。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10页。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第1页。

《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1页。

《刘申叔先生遗书，钱玄同序》，《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

《刘申叔先生遗书，钱玄同序》，《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62页。

形象，使人读后感到自然，有说服力。第二个特点是介绍新事物，新学理，不避俗字、谚语甚至外国语法，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知识覆盖面大，信息量大，用古文表达实在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他使用了不少新名词、新语汇，使人读后感到新鲜，颇受教益。第三个特点是作者热情奔放，情绪高昂，有一腔爱国热忱，笔下感情洋溢，时时慷慨陈词，有很大的鼓动性。这种文体改变了古文的拘谨，向白话文迈进了一大步，改变了文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先驱。

这样的新文体却遭到顽固派的非难和攻击。他们认为梁启超的新文体是报章文字，不避俗字俚语，显得粗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满篇文章充塞日本贩运过来的新名词，张之洞、叶德辉便极厌恶梁启超的这种文体。其实，梁启超的新文体最大的特点是去掉空谈，崇尚实际，摆脱旧文体的束缚，使古文白话化、通俗化，适应时代的要求，为广大读者所欢迎。所以，新文体自有它很强的生命力。

钱玄同 1917 年致信陈独秀，曾评论说：“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由此看出，梁启超的新文体在尔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梁启超提倡过《诗界革命》，其内容主要是要求诗歌有新意境。这里指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能反映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新理想。他推崇维新派的革新诗人有三位，即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他自己也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如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读陆放翁集》，共四首，我们录两首：“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诗中高度赞赏和评价了宋朝诗人陆游的爱国热情，而自己也有着同陆游那样的遭遇和志向。还有《爱国歌四章》，录一：“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裔我中华！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他主张诗歌与音乐相结合，以乐谱的要求写诗，爱国歌在日本横滨为大同学校谱了曲，加以演唱，声音雄强。他善于写古体诗，而且用散文的句法写入诗中，如《志未酬》：“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像这样类型的诗还有《雷庵行》、《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更是长篇古体诗，气势磅礴，奔放豪爽，风格流丽明快。

《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1号。

《读陆放翁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下），第4页。

《爱国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下），第21页。

《志未酬》，《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下），第16页。

抒发自己的心情的诗，有《澳亚归舟杂兴》四首录一：“拍拍群鸥相送迎，珊瑚湾港夕阳明。远波淡似里湖水，列岛繁于初夜星。荡胸海风和露吸，洗心天乐带涛听。此游也算人间福，敢道潮平意未平！”这首诗写于1901年，他从日本到美洲、澳洲，再从澳洲回到日本，有感于归途中在海上看到的景象，诗调明朗，色彩鲜明，情景顿挫，表达了内心的波澜。还有《自励》其中的一首：“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全诗表现了自己身居厄境仍坚持斗争的刚毅不拔精神。《次韵酬蛻庵见寄》：“阅人成世更千变，际地蟠天感百端。学道久知齐得丧，多情谁遣有悲欢。欲从屈子酬天问，却读韩非悟说难。料想黄昏倚修竹，袖罗脉脉度微寒。”蛻庵即他的好友麦孟华，同是万木草堂的同学。这首诗写得比较深沉，心情也平静，似乎参悟了人生的道理。有点学庄子超越人生的味道。

梁启超对封建官僚批评是不讲情面的，他有一首诗讽刺湖广总督张之洞。说：“二千年后刘荆州，雄镇江黄最上游。笔下高文蠹鱼矢，帐前飞将烂羊头。忍将国难供谈柄，敢与民权有夙仇。闻说魏公加九锡，似君词赋更无俦。”他讥笑张之洞的著作好像蠹鱼的屎一样无价值，将漂亮的仆人提拔为洋操统领，攻击戊戌变法志士，与民权一贯有仇恨。梁启超讽刺张之洞做极意谀颂的好文章是谁也比不上的了。全诗辛辣尖刻，鞭挞入里，显出他爱憎分明的立场。

《自励》二首的另一首，反映了他传播西学的志向和愿望。“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此诗作者以卢梭自比，甘愿一身冒众矢之的风险和打击，仍坚志不悔地向民众灌输西方新哲理启发国民的觉悟，促进民权运动。全诗表达了一种献身祖国，改造社会探求真理的理想和信念。

他很重视民歌，曾写台湾竹枝词十首，录两首：“韭菜花开心一枝，花正黄时叶正肥，愿郎摘花连叶摘，到死心头不肯离。”“绿阴阴处打槟榔，蘸得蒟酱待郎郎，愿郎到口莫嫌涩，箇中甘苦郎细尝。”学习民歌的优点，直接以口语入诗，这是梁启超维新派诗界革命的一个特点，他们肯向民歌学习，甚至直接用民歌原句入诗，对诗体的改革起着积极的作用，给古体诗带来一种民间清新的风调。

综观梁启超一生从事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可以说，最大的特色是创新，破坏旧的政治制度和旧的学术思想体系。在学术领域内，他涉及范围很广，知识渊博，政治、经济、历史、教育、伦理、宗教、文艺各方面都有精湛卓越的见解和认识。他能从儒学传统文化规范中挣脱出来，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重新审视、评价传统文化，开拓了新的领地。他又发动了“史学

《澳亚归舟杂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下），第15页。

《自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下）第16页。

《次韵酬蛻庵见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下），第25页。

《刘荆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下），第11页。

《自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下），第16页。

《台湾竹枝词》，《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下），第65页。

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使这些园地焕然一新，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他在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代世俗化，科学技术教育的普及，国民观念的更新对破除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特权思想都有极大的作用。他在用资产阶级学术方法和观点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方面是一位开拓者，也是资产阶级近代文学体系伟大工程的奠基人之一。当然，梁启超在学术上精深方面尚嫌不足，他涉及范围这么广泛，在每一方面难免有浅陋之感，这是可以理解的。梁启超自己有一段评论：“平心而论，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鲁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之陈涉。”他自谓谓新思想的陈涉，这种比喻是恰当的。作为学界前辈，梁启超的开榛辟莽之功是不可抹煞的。

第二节 李宝嘉 吴趼人 林纾

本节叙述晚清的小说。中国文化有雅、俗之分。西方叫大传统，即雅文化，小传统，即俗文化。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靠寺院和学校，集中于城市地区。小传统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在农村流传。中国有六经：诗、书、易、乐、礼、春秋，是雅文化。俗文化的特点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能够接受的作品。清初一位学者刘继庄说：“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易与礼也。”这里他将歌曲、诗经，戏曲、乐经；小说、说书，书经、春秋；祭祀鬼神、占卜，易经、礼经。两两相对，小说、戏曲、诗歌、祭神、占卜是俗文化，是雅文化六经的前身。六经是雅文化，而雅俗文化之间又有所沟通。雅文化来源于俗文化，俗文化由封建士大夫加以雅化，上升为雅文化，而且互相之间又有所渗透、影响。封建士大夫看重诗歌、散文。诗歌来源于民间，诗经有风、雅、颂，风是采风，是采自民歌民谣的，雅是士大夫的，颂是宫廷所用的颂词。后二者是雅文化。古代诗歌中也有民谣，如竹枝词。小说，曾有“小说九百，本自虞初”的话。虞初是汉武帝时的方士，他曾编写了《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已佚不传。虞初《周说》是中国小说家之祖。《汉书·艺文志》将小说也列为一家。“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说，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小说家也算一家，但不入流，不能和九家并列，也有个雅俗之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并没有将小说列为一类，宋平话、明话本、演义，史志皆不录，这是历史上封建士大夫，学者对小说的看法。他们总以为小说是“稗说”、“小道”，地位很低，不被重视。宋朝，有一部小说集子，是在宋太平兴国年编纂的，故叫《太平广记》，共五百卷，是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的总集，时间自汉至宋初，内容非常丰富。鲁迅称之为：“可谓集小说之大成”，“替我们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62页。

《广阳杂记》卷二，上海文明书局清《笔记丛刊本》。刘继庄（1648—1695），名献廷，字君实，号继庄，顺天大兴人。先世本吴人，以官太医，遂家顺天，年十九，居吴中达三十年。为万季野所推重，引参明史馆事，晚学游楚，与王船山有交往。

张衡：《西京赋》，《文选》卷2，中华书局1977年版。

留下了古小说的林藪来”。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过程极有价值。鲁迅说：这本书“盖不特稗说之渊海，且为文心之统计矣。”即是从此书可知道晋、唐小说什么方面题材较多，反映人心的爱好和社会风气。明朝的小说发达，这和城市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是很有关系的。小说、说书、戏曲三者又有密切的关系。说书人的话本加以整理，编纂便是小说，小说、话本的题材编成剧目便是戏曲。而小说又借说书人的说书和演剧者的演出，使不识字的大众百姓能听懂看懂，达到了口碑流传、家喻户晓的良好效果。明清小说最著名的有四部：《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这四部小说与戏曲、评书关系很大。评话有三国、水浒，是说大书（小书是评弹）。戏曲、京剧中有水游戏、三国戏，西游的戏剧目特别多，连台本、单本演的都有。明代又有三言二拍：《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这些是短篇小说集，也是话本和拟话本。

20世纪初，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1902年梁启超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在中国小说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早在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便介绍西欧国家的政治小说提高了国民的觉悟，说“小说为国民之魂”，在另一篇《自由书》中，他又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西欧政治小说传播到日本，日本学者也开始写政治小说的情况，如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柴东海的《佳人奇遇》、未广铁旸的《雪中梅》，这些小说是大政论家寄托书中的人物，写自己的政见，对于“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这样，就使世人改变了对小说的评价。他在文章中批评旧小说是“诲盗诲淫”，认为新小说能提高国民的觉悟与素质。

小说有一特点是通俗易懂，使广大读者都喜欢看，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体。这一点康有为、梁启超都很重视。康有为说：“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梁启超引用了乃师的这段话，引申说：“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康有为还写诗道：“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岭。”敢将小说与六经并列，这一新见解是何其大胆啊！他们都看到了俗文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31页。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8卷，第76页。

《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第35页。

《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第42页。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上海大同译书局，1897年版。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第34页。

《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康有为诗文选》（陈永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32、221页。

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辟头便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说新民要有新道德、新宗教、新风格、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这些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和转变，要靠新小说的熏陶。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既然如此，小说便不能看成“小道”，“稗言”，而应：“为文学之最上乘也”。这里，他将小说的社会效能和社会地位提高了，认为是觉世新民的一种宣传工具，有益于世道人心教化的。他用了大量篇幅批判旧小说“诲盗诲淫”，要求革新其内容。在他所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阐明其宗旨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道德者，在所必摈”。对其中的政治小说，他解释说：“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

小说为什么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梁启超解释说，从文字的特点来看，小说是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所以人们爱看。从人情的特点来看，小说是诙谐的，人们厌庄喜谐，所以爱看。人们还喜欢脱离现实环境而想历另一种境界。理想小说便导人游于他种境界，从中寻到乐趣。再一种是人们经历了许多人生的甘辛痛苦，但说不出来，写实小说则将人们的心境阅历和盘托出，彻底发露，使人至为感动。这两点都是讲小说的移情作用。

这篇文章对小说原理和理论也加以探讨。他提出小说支配人道有四种力，一是“熏”，熏是熏习，受其影响，人在读小说时好像进入了小说的具体环境之中，思想感情都受到感染。二是“浸”，熏是就空间而言，浸是就时间而言，看小说，时间一长，便上瘾，无形中操纵人的内心世界，成了习惯，长篇小说一定要从头至尾看完，作十日饮，作百日醉。三是“刺”，在熏习浸润的过程中渐渐刺激人的感情发生一种强烈的爱和憎。刺则是顿然有刺激，觉悟到什么，骤然觉得如何。四是“提”，刺是外界刺激，提是内心冲动，产生一种行动，人们与小说中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发生共鸣，化其身于书中，而现于外。这里讲小说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作为教育的工具。

类似这样的探索小说艺术本身特点和规律的文章，有夏曾佑的《小说原理》和狄葆贤的《论文学上小说的位置》两文。夏曾佑提出写作有五难，即写小人易，写君子难；写小事易，写大事难；写贫贱易，写富贵难；写实事易，写虚事难；叙实事易，叙议论难。“若欲为社会起见则甚难。盖不能不写一第一流之君子，是犯第一忌；此君子必与国家之大事有关系，是犯第二忌；谋大事者必牵涉富贵人，是犯第三忌；其事必为虚构，是犯第四忌；又不能无议论，是犯第五忌。五忌俱犯，而欲求其工，是犹航断港绝潢而至于海也”。他主张：“吾谓今日欲作小说，莫如将此生数十年所亲见、亲闻之实事，略加点化，即可成一绝妙小说”。狄葆贤提出“五种对待”来界定小说的特质和作用。这五种对待是简与繁、古与今、蓄与泄、雅与俗、实与虚。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0，第6、7页。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0，第6、7页。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0，第6、7页。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

别士（夏曾佑）：《小说原理》，《绣像小说》第3期，1903年。

别士（夏曾佑）：《小说原理》，《绣像小说》第3期，1903年。

简、古、蓄、雅、实是一端，繁、今、泄、俗、虚是另一端。两者不可得兼，五端又是有机地联系而不可分的。他说：“而所谓良小说者，即稟后五端之菁英以鸣于文坛者也。”第一、繁。小说与作文不一样，作文要求简洁，小说是觉世之文，要求“繁”，纵说，横说，推波助澜，穷其形，尽其神，不厌其烦地写，使读者目骇神夺，魂魄醉迷。这里指描写的形象具体、生动。第二、今。就是要讲现实生活中人人共习闻之事，共解知之理。第三、泄。讲的内容要透彻明白，发泄无遗，淋漓尽致。“而此术惟小说家最优为之。小说者，社会之X光线也”。这里指小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第四、俗。他引用梁启超的话，说“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

中国文字和语言分离，文字古奥，口头语言通俗，成为文体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是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小说能创造新字，是上乘，若未能达到言文完全一致，用言文参半，即半文半白也可以。这种语体文的提倡是为了推动文体革命，推动社会进步。他说：“若能百丈竿头，更进一步，剥去铅华，专以俗语提倡一世，则后此祖国思想言论之突飞，殆未可量。而此大业必自小说家而成之。”这里着眼于文体的通俗。第五、虚。人之常情是不能满足于现实生活，而想欲于他界，实现自己的理想，未来世界境界。小说需要进行艺术的想象与虚构以满足读者心理的企盼。此上这些文章都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

20世纪初新小说兴盛的原因，鲁迅曾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掎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这就是20世纪初小说发达的政治背景。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士大夫失望；义和团被镇压，下层民众失望；西太后卖国、政治腐败，使全国人民愤怒。知识分子拿起笔来揭露清政府弊政，呼唤救国，谴责小说应运而生。再就是受了西欧小说的影响，编小说杂志的人刊登了大量西欧的政治小说，他们认为西欧以及日本民主政治的开展，小说起了极大的作用。梁启超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瓶庵回忆说：“西籍东输，海内文豪，从事译述，遂乃介绍新著，裨贩短章，小说一科，顿辟异境。”这说明人们轻视小说的观念有所改变了。这一时期印刷业发展很快，给小说的出版印刷提供了方便和有利的条件。上海印刷事业更显发达，推动了小说的繁荣。

1902—1903年，出现了大量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根据阿英的统计，达到千种以上。而主要刊载小说的刊物达三十多种。其中以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杂志，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杂志，吴趼人、周桂笙主编的《月

楚卿（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7号，1903年。

楚卿（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7号，1903年。

楚卿（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7号，1903年。

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7号，1903年。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8卷，第239页。

《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第34、35页。

瓶庵：《中华小说界·发刊词》，《中华小说界》第1年，第1期（1914年）。

月小说》杂志以及黄摩西、徐念慈主编的《小说林》杂志，最负盛名，称为四大刊物，是小说创作和理论探讨的重要阵地，促成了新小说的繁荣局面。

谴责小说以四部最著名，它们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及金松岑和曾朴的《孽海花》。

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号宝凯，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他生于山东，3岁父亲去世，他的伯父翼清字念之，为山东道员，东昌府知府，他跟随伯父生活。1892年念之告老回乡，他便住常州青果巷。考中秀才后，累举不第。1896年到上海办报，曾办《指南报》、《游戏报》、《海上繁华报》，为演员写评论，还写些嬉笑怒骂的文章。1903年受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他的小说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海天鸿雪记》、《庚子国难弹词》等10多种，以《官场现形记》最为著名。曾被荐应经济特科，不赴，时以为尚。1906年去世。

《官场现形记》发表于1903年。这本书揭露清朝官场的腐败种种状况，颇为全面、深刻。上至王爷、军机大臣、中堂大人，下至府道州县官及一般佐杂，都一一加以刻画描摹。全书从一个生员通过科举考试，做得一官半职叙述起，便点出“千里为官只为财”的卑劣心理。接下来，呈现了一群豺狼虎豹般的大大小的官僚，怎样在官场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愚昧齷齪、贪污腐化，对帝国主义列强屈膝求安、媚外卖国，对人民作威作福、残酷剥削的丑恶面目。小说向人们展示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预示着封建王朝的殿堂快要倒塌了。《官场现形记·叙》的作者说：“吾辈不畏强御，不避斧钺，笔伐口诛，大声疾呼，卒伸大义于天下，使吾辈凛乎不敢犯清议。”接着作者又说，这本书是“神禹铸鼎，魑魅夜哭；温峤燃犀，魍魉避影”。意思是可使人们透明事理，看清真伪。这本书是照妖镜，将官僚的百丑图照得纤悉毕露，露出了魑魅魍魉的原形。

这部书的结构比较松散，鲁迅评论：“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就是由好多个短篇和中篇小说连串而成，有点像“香肠体”，和《儒林外史》相似。在描写上极尽讽刺之能事，有些地方夸大失实，人的性格刻画不够细腻，不够深刻。鲁迅评论说：“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篇，即千篇一律。”

吴趼人（1866—1910）原名沃尧，字茧人，后改为趼人，因居佛山镇，号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人。1882年到上海谋生，1897年先后为《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写些小品文。1903年他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投稿《新小说》杂志，在该杂志还发表过《九命奇冤》、《电术奇谈》，他曾去过日本，不久回国。1904年在汉口任《楚报》主笔，该报是美国人办的。因反对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愤然辞职，回上海参加反美爱国运动。1906年他和周桂笙分任《月月小说》总撰述和总译述，发表《劫余灰》、《上海游踪录》等小说。他性格刚毅，为人耿直，和人争论，辞锋凌

《官场现形记·叙》，《官场现形记》，世界繁华报馆1903年，原作未署名。

《官场现形记·叙》，《官场现形记》，世界繁华报馆1903年，原作未署名。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8卷，第241页。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8卷，第241页。

厉，常纵酒自放，磊落不拘。一生留下长短篇小说 30 多部。其中有《恨海》、《最近社会龌龊史》、《黑籍冤魂》、《发财秘诀》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的是上海。本书一开头便描述“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船往来，百货输转”。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而繁荣的商业中心，商人“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晷”，“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藪”。成了犯罪者逃亡所集聚的地方。上海，十里洋场，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称它为“冒险家的乐园”，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勾结官府，利用商人买办，在上海干下了罪恶的勾当，嫖、赌、贩毒、欺诈、纵乐，使上海成了罪恶的渊藪。作者以“九死一生”这个人物的经历，将 20 年来的所见所闻记述下来，揭露了清朝社会官场的黑暗，描写了大小文武官僚的卑鄙龌龊、贪财无耻、奴颜卑膝、贪生怕死的情状和洋场才子、斗方名士胸无点墨、却到处卖弄才情、附庸风雅的丑态。本书比《官场现形记》描写的范围更要广阔一些，涉及到官场、商场、洋场。而且商场和洋场的力量还能影响和左右官场，揭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海，有许许多多的怪现象，从人物来讲，恶棍、骗子、狂徒、巡捕、强盗、讼师、烟鬼、小报文氓、江湖劣医、人口贩子、医卜星相、洋行买办，行行色色的人，作者用辛辣的笔触，大胆地刻画出洋场的众生相。上海殖民地化特别严重，社会习俗，道德风貌，发生了剧变，封建伦理道德已经不能维系旧社会秩序，道德败坏，污七八糟的现象触目皆是，预示着社会潜藏着严重的危机，统治阶级的一批掌权者已经彻底腐败了。书中写了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苟才，从他的摆阔、钻营、贪财、好色、缺德、乱伦等方面展示他污秽不堪的精神世界，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成功地说明了封建统治结构及其伦理道德已经腐朽透顶、病入膏肓。他又写了一个亦官亦商、弃官从商的人物吴继之，这个人物的经历说明了近代封建地主阶级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的这一趋势。这一趋势，作者敏锐地观察到了，而且也加以表现出来了。但是，这个吴继之的产业最后以破产而告终，这也颇有寓意在内，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造成了失败的悲剧。他的处世哲学是：“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历来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他又认为人生是一个骗局，不能说穿。“总而言之，世界上无非一个骗局。……不过他们要如此说，我们也只好如此说，万不宜揭破他；揭破他，就叫做煞风景；煞风景，就讨人嫌；处处讨了人嫌，就不能在世上混；如此而已”。吴继之的这番话把追求金钱说成是人的本性，把互相蒙骗作为处世的经验，这都是市侩的圆滑哲学。因此，吴继之也算不得正面人物。作者还写了一个清廉正直的“清官”蔡侣笙，他开仓赈灾，拯救饥民，却被朝廷革去官职，这样一个老百姓拥戴的县太爷被万恶的封建社会吞噬了。

这本书是一部社会小说，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预示了旧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第 1 页。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 14 回，第 102 页。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 86 回，第 699 页。

社会将要土崩瓦解的趋向。作者一方面揭露，另一方面却找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带有一些悲观情绪，有些问题在观察、分析上也有些偏激和错误，如认为社会腐败是由于人们思想道德的堕落，只要恢复旧道德，政治就会好起来。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作者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也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鲁迅评论说：“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虽然，作者用一个人物将全书的故事、人物、情节贯穿起来，但仍像是短篇小说汇集，像报告文学，像速写，人物品格的刻画、雕琢还是不够的。

刘鹗（1857—1909）字铁云，别署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精通算术，懂得医道，曾为河道总督吴大澂、山东巡抚张曜作幕僚，治理黄河工程，有成绩。1893年山东巡抚福润荐送总理衙门考验，以知府任用。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召赴湖北，建议借外资修建芦汉铁路与盛宣怀意见不合。至北京，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建言借外资自筑津镇铁路，为同乡京官所攻击。继为英国福公司主持山西煤矿，旋辞归。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他用低价向俄军购得所掠夺的太仓粟米，设平糶局，以赈饥民。后被人诬以私散仓粟的罪名，遣戍新疆，1909年死于乌鲁木齐。他是最早收藏甲骨文者之一，著有《铁云藏龟》。

《老残游记》初集共20回，1903年先在上海《绣像小说》杂志发表，至13回。后续登于天津《日日新闻》，后有续集，连续登载共14回，今存9回，称二集。本书以江湖医生老残为中心，用第一人称叙述其游程的所见所闻，揭露了当时封建官僚的昏庸、残暴。书中写了曹州知府玉贤、刚弼，自命为“清官”，实际上是一批急于做大官，刚愎自用，残害百姓，不惜用人血染红顶戴的刽子手。人们一般认为赃官可恨，而《老残游记》写的是清官之可恨，或尤甚于赃官。作者在第六回写老残题诗一首，专啄玉贤之事，曰：“得失沦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处处鸱鸮雨，山山虎豹风。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全书在艺术描写方面有胜过前面两本书的地方。如明湖居听书，大明湖景致，黄河破冰以及二集中游泰山，风景和人物的描写，明净清新，自然逼真，写白妞唱大鼓，那段听音乐的描摹，用了比喻，层递对比、烘托等手法，颇为精彩。作者对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和南方革命派的革命运动都抱着敌对态度，这是他思想保守的一面，这些思想在书中也有所流露。

《孽海花》的作者，前六回是金松岑起草，后面是曾朴所撰，署名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爱自由者即金松岑（1874—1947），初名懋基，改名天翮，又名天羽，自署天放楼主人。江苏吴江同里镇人。1898年荐试经济特科，辞不赴。在乡里办学校。后至上海，倡言革命，与爱国学社章太炎、邹容、吴敬恒、蔡元培交往甚密。入民国，曾任江南水利局长，晚年办苏州国学会，任光华大学校长。著有《天放楼诗集》、《天放楼文言》，曾以金一笔名撰写过《女界钟》，宣传妇女解放。翻译过日人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落花梦》，译述过《自由血》，介绍俄国虚无党活动。他是著名诗人，对同光体颇多抨击。他撰写《孽海花》是应革命形势需要而执笔的。日俄战争前夕，俄兵占领奉天，中国留学生忧虑祖国遭致瓜分之祸，组织义勇军，发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8卷，第244页。

《老残游记》第6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0页。

动拒俄运动，他应江苏省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发行的《江苏》杂志之邀，写小说。他的小说的主题是揭露帝俄侵略野心，以清廷出使俄德荷奥大臣洪钧为主角，以洪妾赛金花的故事为陪衬，将这一时期的历史大事贯穿起来，1904年金松岑将小说定名为《孽海花》，并标为“政治小说”。金松岑将小说6回稿子寄给上海小说林社的挚友曾朴商酌。曾朴认为是一好题材，但范围较窄，还可将三十年来历史容纳在内。金松岑遂将续书任务交给曾朴。曾朴（1872—1935）字孟朴，江苏常熟人。1891年中举，任内阁中书，在北京做官，同李文田、文廷式、江标、洪钧经常往来。曾朴同洪钧关系很密切，常出入洪府。曾的岳父是工部左侍郎汪鸣銮，并同翁同龢、张荫桓等人接触。1895年入同文馆学法文。1896年回到上海，与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唐才常等人结识，参加维新运动。1903年和徐念慈创办小说林书社，1907年《小说林》杂志创刊，《孽海花》有一部分就发表在此刊物上。1909年曾入两江总督端方幕。民国以后曾任江苏省议员、江苏官产处处长、财政厅厅长等。1927年在上海开设真善美书店，并发行《真善美》杂志。《孽海花》一大部分就发表在这一杂志上。他还翻译过法国小说，如雨果的《九三年》、《钟楼怪人》等。

《孽海花》全书写的时间极长，从1903年到1930年才完成。本来这书的设想是六个阶段；旧学时代、甲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革新时代、海外运动。预想拍摄晚清社会全景，歌颂革命力量，敲起末代封建社会的丧钟。金松岑和曾朴共同商量了这一构想。但是，民主革命思潮写得比较弱，显不出很大的优势，书本想写60回，而实际上写到30回，后续写5回，共35回。即使这样，这部书政治观点较激进，艺术成就也颇为突出。这本书从同治初年写到甲午战争失败，将晚清三十年的朝野轶事摄入镜头，可窥出社会全貌。书中写的是真人真事，书中人物什九可以指出真人的姓名来。当然，这种真人真事又带有艺术的夸张和传说的成分。书中写了官僚封建士大夫群体，他们的言论、社会习俗、心理状态、行为，使我们了解到晚清的士林风气、官场格局、知识分子心态、社会变动中所引起的心理效应。这本书是以洪钧和赛金花故事为主线，长线串珠，把晚清三十年大大小小的事都连结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它的场景很宏大，从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到革命派政治势力的变化、消长，从国内延伸到国外，视野宽阔、气魄宏大，京都、沪滨、柏林、莫斯科，国外思潮的影响也历历如绘，俄国虚无党的暗杀行动和民族主义民主革命思潮都有所反映。

《孽海花》在当时颇为流行。《负暄絮言》评论说：“近来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计，以《孽海花》为巨擘。”鲁迅评论此书说：“书于洪传特多恶谑，并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惟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则其所长也。”

20世纪初，翻译小说盛行。这一时期，人们认为传播西学是为了灌输知识，开通社会风气，改革社会。而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即小说影响于社会者极大，“晚近以来，莫不知小说为淪导社会之灵符。”又说：“盛矣哉其小说乎！然苟非于转移社会具龙象力，于淪智上有绝大关系者，又乌能有是！然而风尚之所由起，如译本小说者，其真社会之导师哉！一切科学、地理、

《负暄絮言》，见蒋瑞藻：《小说考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84年。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8卷，第248页。

种族、政治、风俗、艳情、义侠、侦探，吾国未有此澹智灵丹者，先以译本诱其脑筋；吾国著作家于是乎观社会之现情，审风气之趋势，起而挺笔研墨以继其后。”

翻译小说按题材内容分类，有政治小说、历史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科学小说、侠义小说等等。政治小说如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历史小说如《罗马史演义》、《东欧女豪杰》、《拿破仑外传》，冒险小说如《鲁滨逊漂流记》，侦探小说如《福尔摩斯探案》，言情小说如《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科学小说如《空中旅行》、《海底旅行》，侠义小说如《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当时翻译小说最有名的是林纾。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人。他是著名的古文家，又是画家，1899年他同王寿昌合作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不懂外语，由王寿昌口授，林纾用精炼的桐城派古文译为中文，据说他翻译速度很快，“耳受手追，声已笔止”，这和严复翻译社会科学名著，“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茶花女》是法国小仲马的作品，原是剧本，译成小说，写一个妓女和贵族公子恋爱的一场悲剧，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当时人们颇为这一哀怨凄婉的故事所感动，抛下了同情的眼泪，此书问世，轰动文坛，“不胫走万本”，“一时洛阳纸贵”。严复曾赠以：“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诗句。日本东京中国留日学生排演了《茶花女》的戏剧，很多人模仿《茶花女》的情节写中国的言情小说。

林纾的翻译小说便一发不可遏止。他曾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陈家麟、曾宗巩等人合作，翻译小说达156部。但是，由于他不懂外语，鉴别能力不强，真正的世界名著达40—50部，有些翻译只是节本，有的翻译与原著有很大差异。虽然如此，林译小说在中国晚清文学史上仍占有其重要的地位。他还翻译了《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等。

《黑奴吁天录》是美国斯士活女士的作品，原名《汤姆叔叔的小屋》。小说描述美国黑人受剥削和压迫的惨状。是时正逢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引起社会上的反抗形成爱国运动，林纾有感于此，译此书介绍给中国读者。他在此书序言中说：华工“国蓄地产而不发，民生贫薄不可自聊，始以工食于美洲，岁致羨其家。彼中精计学者患泄其银币，乃酷待华工，以绝其来。因之黄人之受虐，或加甚于黑人。”所以，这本著作问世，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争情绪。有人编成剧本，登台演出，效果强烈。

《块肉余生述》是英国著名作家迭更司的作品，原名：《大卫·科波菲尔》，这本书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小说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和各个阶层的人物。作者对贫民和儿童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感情和爱心，揭露了上层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虚伪、冷酷、自私。林纾在序言中说：“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他的意思是中国人对西欧不要盲目

世：《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中外小说林》第2年，第4期（1908年）。

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严复集》第2册，第365页。

《黑奴吁天录》序，《黑奴吁天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页。

《块肉余生述》序，《块肉余生述》，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页。

崇拜，不要自轻自贱，而是探索真理来拯救中国社会。

司考脱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新译本称《艾凡赫》。是写英国中古时期贵族反封建的斗争，富有侠义的气息，情节曲折复杂，引人入胜。

《迦茵小传》是英国哈葛德的作品，开始有包天笑、杨紫麟两人合译，称《迦茵小传》，但只是后半部，上半部原著未找到，连作者姓名也不知道。林纾译全部，书名为《迦茵小传》，此书誉为是英国的《茶花女》。哈葛德不算是世界第一流的名作家，但是，在中国却享有很大的声誉，这和中国读者的感受能力有关。

林纾的翻译小说在晚清文学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将世界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从西方小说中受到思想启蒙，成为改革社会、改革教育的教科书，激发了民族爱国主义和冒险进取的精神。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制度承认比中国先进、高明，但是对西方文学茫然无知。中国历史悠久，文学源流深厚、渊博，总认为西方文学是及不上中国的。林纾介绍西方小说力图说明西方文学家亦自有长处，他将迭更司和史记司马迁相比，说其文学修养是毫不逊色，改变了人们对西方文学的偏见。中国的著名作家曾从林译小说受到思想上、文学上的教益，培养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对林译小说特别重视，每出一部，便一定要将它买来，阅读，收藏。郭沫若说他喜欢读《迦茵小传》和《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司考脱的浪漫主义精神对他的文学影响很深，他自己承认林译小说“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老舍也从迭更司的作品中吸取了诙谐的技巧。

林纾因不懂外文，译时不忠于原著者甚多，是意译，非直译，有时候译的作品传神入妙，增添神韵，有时便添油加醋，弄巧成拙。此种笑话，可以举出不少。这是因为他译的小说，是由合作者从原著口述为白话，变成口语便有些差异，再由他用桐城派古文表达出来，意思又有些差异。然而其初创之功，终是不可淹没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成了顽固派，他反对批评孔、孟，又反对白话文，写信给蔡元培，大肆攻击陈独秀等文学革命人物。蔡元培回复他一封信，颇为客气，实际上是新旧思想交锋的一次战役。

有人对小说有一种看法，认为它是娱乐性的，用来消闲，调剂精神生活，强调游戏性质，给人一种感情上的舒适、愉快即可。于是出现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黑幕小说，陈蝶仙（天虚我生）、包天笑等人和鸳鸯蝴蝶派擅长写言情小说，风靡一时。也有一些小说写下层劳动民众，如工人、农民、渔民，成为小说中的主人翁，《渔家苦》、《买花女》、《欧战中的苦力界》，这些小说对工农大众的痛苦表示同情，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未发现他们的社会力量和反抗精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文艺上也表现得较软弱，辛亥革命后，人们以为民族革命已经成功，民族革命小说也便少了，一阵风刮过去了。上海市民多喜欢看言情小说、黑幕小说、武侠小说，于是出现了这股潮流。1915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后，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问世，才成为新文学的里程碑，标志着新小说阶段的开始。

小说是俗文学，人们原来看不起它，是“小道”，是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话题。晚清直至20世纪初，小说才被人们重视，到后来鲁迅写《中国小说

史略》，在北京大学开设一门课程，其专著成为学术研究的成果，小说也就正式登上大雅之堂了。

第三节 黄遵宪

本章第一节曾说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语焉不详。本节叙述维新派的“诗界革命”以及近世诗界三杰：黄遵宪、夏曾佑和蒋智由。

小说是俗文化，那么，相对地说，诗是雅文化。孔子将诗和乐都作为教育的必修课。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里说明了诗、乐同政治的关系。修身起于学诗，当先学诗，礼是为了立身，乐是为了成性。“不学诗，无以言”在诸侯之间的交往中，在宴会上，人们都要用言辞应对，都要用诗歌喻其志。而诗和乐又必须合乎礼治，为礼治服务。孔子又分析了诗的社会功能，提出兴观群怨说。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这是诗的四种功能，它就近来说，可以侍奉父母，远的来说，可以侍奉君上，而且从学诗中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孔子的诗教内容，有一个原则就是“中和”，怨而不怒，即协调，不要过分。齐国的晏子说：“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孔子继承了这一原则，“中和”成为儒家诗学的审美标准。孔子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经》中收录了大量的爱情诗，怨刺诗，而孔子则掌握“中和”的原则，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必须合乎礼治所允许的范围。孔子又信而好古，他对韶乐非常称赞，而对新起的音乐郑声则加以排斥，“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要“放郑声”。魏文侯听古乐昏昏欲睡，听郑声不知疲倦，而孔子则对郑声攻击不遗余力，这是音乐的新旧之争。以上讲的是儒学的诗教，它偏重于为礼治服务，偏重于教化作用。这种诗学理论有它的优点，但是如果片面强调或者理解太狭窄了，便会使诗歌的发展受到束缚和限制，甚至丧失其独立性，在审美观方面有所忽视。温柔敦厚则使文艺的战斗性受到压抑。

诗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诗经》和《楚辞》是古代诗歌的两大源流。唐朝的诗发展到极盛时期，宋朝的诗和词，留下了大量诗篇佳作。古代知识分子学习诗歌，为了考取功名。在朝廷做官，常做诗歌颂功德，献给皇上。未中举时，袖笼诗卷，请名人指点，推荐自己，以便平步青云。宴会上答和酬唱以试自己的才气，专门出集子以示风雅。总之诗歌是封建文人圈子里少不了的活动，是渲染气氛的宠物。到了清朝，诗和词仍有发展，至晚清，有各种流派，魏晋派的王闿运，复古的气味太重。江西诗派的陈三立，哀怨牢骚，消极成分较多。晚唐派的樊增祥、易顺鼎诗写得华丽，才气横溢，但歌功颂德、闲情逸致的诗占了很大比重。这里出现两个问题，一是

《论语·泰伯》，杨伯峻编著：《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论语·季氏》。

《论语·阳货》。

《昭公二十年》，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 4 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420 页。

《论语·为政》。

《论语·阳货》。

《论语·卫灵公》。

诗歌如何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新的时代精神，二是新诗歌如何继承旧的传统，而又如何突破旧的束缚，向前发展？维新派的“诗界革命”便是因考虑这两个问题而提出了新的见解。

梁启超说：“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这篇文章写于1899年。他深感诗界有严重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追模古代诗篇，写得没有个性，没有新鲜活泼的时代气息，因此，要进行“诗界革命”。

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在1894—1895年曾尝试过诗界革命，他们当时都住在北京，而且住处相距很近。他们相聚一起便讨论学术，互相争辩，也写诗。诗中突破了“独尊儒术”的局面，好用新名词，新典故。梁启超说：“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例如夏曾佑一首诗，便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壬辰在京师，广座见吾子，草草致一揖，仅足记姓氏。泊乎癸甲间，相见望衡宇。春骑醉莺花，秋灯狎图史。青霄与黄泉，上下穷其旨。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修罗举只手，阳乌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天地间，差足快吾意。夕烽从东来，孤帆共南指。再别再相见，便已十年矣。吾子尚青春，英声乃如此。嗟嗟吾党人，视此为泰否。

这首诗写于1904年，诗中回忆1894、1895年夏、谭、梁三人一起作诗论学的情景。夏曾佑深通释典，作诗时喜将佛典融入韵语，增添了涵蕴深远的风旨。这就是他们作“诗界革命”的试验阶段。梁启超回忆说：谭嗣同是“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嘉，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捃摭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慕嗜之。”这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他们的“新”，是想突破古诗的旧，但是停留在采用新名词上，思想境界还没有广阔的开拓；二是他们采用经子生僻语、佛典语、欧洲语，诚然使人有新鲜之感，但是仍是少数人能理解，真正懂得其中含义者实属不易。于此，则推广更难了。

上面谈到梁启超在1899年便呼唤中国诗界应出现像哥伦布、玛赛郎那样的人物。他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称为20世纪支那之诗王矣。”他又说：“吾虽不能诗，惟将力输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2，第189页。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上），第41页。

《赠任公》（1904年），《夏曾佑诗集校》（赵慎修），《近代文学史料》，第38页。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上），第1页。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2，第189页。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上），第40页。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2，第189页。

殆将绝。”这里他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而其内涵亦逐渐明确。一、新意境，就是要有新的内容，这新的内容便是要能反映时代风貌和现实政治生活，尤其是要具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新思想和新精神。它包括西方国家的立国精神、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为国牺牲的志气和精神、崇高的人格、雄伟的气魄。梁启超自己便说：“医未成名肱已折，法无可说舌犹存。”从梁启超的诗歌中便可看到他爱祖国、爱民众炽热的心。二新语句，就是敢于将新名词用入诗中，如日本译西书的名词。他举了郑西乡（即藻常）的一首诗：“太息神州不陆浮，浪从星海狎盟鸥。共和风月推君主，代表琴樽唱自由。物我平权皆偶国，天人团体一孤舟。此身归纳知何处，出世无机与化游。”接着他评论道：“全首皆用日本译西书之语言，共和、代表、自由、平权、团体、归纳、无机诸语皆是也”，“读之不觉拍案叫绝。”新语句还包括以散文句法入诗，如古体诗中自由抒写，不事雕琢，还有是不避俗语，民谚、民谣入诗，使之通俗化。这些多半是从形式方面突破旧诗的束缚和限制。三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这里是对传统诗歌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題，他另外的提法是：“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提法虽然不同，实质上都是一致的。即仍需要继承和运用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来表达。他一方面是反对复古，反对薄今厚古，说：“中国俗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他列举杜甫的《北征》和韩愈的《南山》，认为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嫌不足。《孔雀东南飞》长诗，也只是描写女儿情，与世运无甚影响。而黄遵宪写的《锡兰岛卧佛》，不论篇幅和内容都超过古代。另一方面，他又继承古代诗歌传统，对当时的一些诗，经常用以比古代诗人的风格，说明他们的思想流派及其所受影响。如屈原、杜甫、陆游的爱国热忱、深沉格调，白居易的讽喻，李商隐的哀艳隐曲，宋代诗人的峻拔等。

1902年开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饮冰室诗话》，“诗界革命”更加掀起高潮。1902—1904年间，《新民丛报》专辟了“诗界潮音集”一栏，刊登了新派诗500多首，作者达40多人。梁启超在《诗话》中引用了康有为、谭嗣同、黄遵宪、丘逢甲、夏曾佑、蒋智由、狄葆贤、麦孟华、杨度、桂伯华等人的诗，并加以评论，阐发诗学理论和原则。“诗界革命”的理论更加成熟，创作也获得大丰收。梁启超提倡诗和音乐结合起来，说：“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他回顾中国乐学，发达尚早。诗三百，都入乐章，楚辞招魂九歌、汉朝大风、柏梁，都能应弦赴节，到了唐代的绝句，“如云想衣裳”，“黄河远上”，莫不被诸管弦。宋词元曲，也是能伴以音乐的。“盖自明以前，文学家多通音律，而无论雅乐剧曲，大率皆由士大夫主持之，虽或衰靡，而俚俗犹不至太甚，本朝以来，则音律之学，士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2，第190—191页。

《书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韵》，《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下），第10页。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2，第190页。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2，第190页。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上），第3页。

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他追述了中国古代诗歌与音乐的结合，以及后来逐渐分离的过程。接着说：“輓近乃益甚，至于今日，而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之古玩，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虱矣”。他批评诗、词、曲都僵化了，文学家诗人对教育国民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他对当时《江苏》杂志登载的军歌、校歌大加赞扬，对上海曾志忞编的《教育唱歌集》刻本也欣喜介绍。他引用曾志忞此书的序言表示，唱歌的歌词要通俗易懂，文字浅显，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他将诗歌和音乐的结合评价为“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他亲自撰写的《爱国歌》、《黄帝四章》都曾谱成曲演唱，这也是一种试验和实践。他又说：“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这里说明词谱曲用来演唱，其词的雅俗程度如何才能恰当，也正在摸索之中。

在诗界革命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新诗派诗人，梁启超最推崇的是黄遵宪。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年轻时曾游历过烟台、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广交朋友，留心时务。1876年在烟台，结识龚易图、张荫桓、李鸿章。是年中举，为道员。何如璋出使日本，他充任使日参赞，1877年成行。到日本后，结识许多日本的士大夫和文士，诗歌酬唱。著《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1882年奉命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886年回国。居家将《日本国志》编成，共四十卷，五十余万言。1889年薛福成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黄任驻英二等参赞。次年成行。1891年《人境庐诗草》自撰序言。7月任新加坡总领事。1894年回国。张之洞任两江总督，委黄为江宁洋务局总办，办理五省堆积的教案。1896年在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筹办《时务报》，他出资一千金为开办费。1897年补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他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在南学会演讲，仿西国巡察局设立保卫局，又设课吏堂，草定章程，制定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推动湖南妇女革新运动。1898年6月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因久病未能遽就道。戊戌政变失败，黄在上海，缙骑绕黄的住宅两日，后经日本驻北京公使与朝廷交涉，袁昶的谏劝，乃得旨放归，南归家居。以后便闭门读书，在忧愤疾病中消磨了余生。

黄遵宪是一位外交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生留下的诗歌上千首。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今人编有《人境庐集外诗辑》。他在1891年《人境庐诗草·序》中提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和主张。1897年他给曾广钧的诗中说：“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自诩为新派。在1902年前后，他又和梁启超经常通信，讨论学术、政治和诗歌，发表了关于诗歌的主张。他是“诗界革命”的主将。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也常常引用他的诗歌来阐发诗学理论，对其诗推崇备至。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序》中的主张是他的诗论的总纲。文中说：“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上），第48页。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上），第48页。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上），第79页。

《酬曾重伯编修》，《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62页。

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辟经三史，逮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黄遵宪继承孔子“诗言志”，“兴观群怨”的诗教，认为诗是表达自己思想、志向、情感的，不要专门模仿古人，而要反映时代的新面貌。他曾说：“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他便希望诗歌能起教育国民的作用。所以他要求“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要将“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他晚年也说：“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必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他日，用之于他人。”那就是说，诗外有事，要体现时代性，时代精神，诗中有人，要体现作者个性，表达诗人的真情实感，独立人格。这样，才算是创新诗界。这里强调的是思想内容，即诗歌的思想性。

如何来表现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一是复古人比兴之体。比是“借物以托情”，兴是“触物以起情”，《诗经》中用比兴手法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诗歌甚多。他说：“诗可言志，其体宜于文，其音通于乐，其感人也深。晋宋以后，词人浅薄狭隘，失比兴之义，无兴观群怨之旨，均不足学。”他还坚持诗要发挥教化的作用，不要单纯舞文弄墨，玩弄华丽的词藻。二是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这里指的是骈体和散文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诗歌讲究对仗工整、词藻华美、声韵和谐。然而这种表现方式显得呆板。间用单行之笔，则能达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效果。三是取离骚乐府之神而不袭其貌。黄遵宪提出遗貌取神，意在继承其反映现实生活这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诗歌要能批评清廷腐败无能，表现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精神，这实际上是继承了离骚、乐府的讽喻精神。四是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就是将散文的做法，运用到诗歌中，伸缩离合即打破诗歌形式的固定格式，加以错综变化，充分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因此，可用长短句，不一定五言、七言，一直到底，韵也不用限制得那么严格，可以转换，就是一种比较自由化的诗。这里强调的是表现手法，即诗歌的艺术性。

在诗歌取材、叙事、炼格方面，黄遵宪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取材，古代的经史子集，都可运用，事名物名都可借用来表现新的思想内容。而将新思想内容用旧的词汇表达出来是需要化费一番筛选功夫的，他在这方面也有过许多尝试。叙事，所用的语言，有雅有俗，雅俗兼采。官书、会典是雅驯的文字，方言民谚是通俗的语言，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分离，使通文者少。他考察西欧各国语言文字合一，则人民学习文明要快得多，所以，他主张文字语言合一，在诗歌中民谚、方言也不妨运用。他重视民歌民谚，大胆地运用到诗歌中去，这是封建士大夫所不屑闻、不屑道的，而他却为诗歌开辟了新园地。炼格，即铸炼风格，是指继承古代优秀诗人的风格，铸炼诸家之长，

《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卷首，第3页。

《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249—1250页。

《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202页。

《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202页。

形成自己的风格。既要继承，又要有创造，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他的这一主张突破了晚清宗唐、宗宋、宗魏晋等各种诗派，恪守门户，拜倒古人脚下的种种束缚，能够超越古人，自创新派，开辟诗歌的新局面了。

黄遵宪的诗，大体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史诗长卷。他亲自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略战争等，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他的诗歌中都有所反映，特别是反映了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主要矛盾，歌颂了爱国将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清政府政治、军事上的腐败无能。如《冯将军歌》便歌颂了冯子材，这首长诗的结尾一段写道：“吁嗟乎，马江一败军心慑，龙州拓地贼氛压，闪闪龙旗天上翻，道咸以来无此捷。得如将军十数人，制梃能挾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邻，呜呼安得如将军。”

全诗刻画冯子材凉山大捷，虎虎如生，读来铿锵有力。他歌颂了冯子材不畏强暴，英勇杀敌的斗争精神，诗中体现了一种气势磅礴，情绪激昂的英雄气概。他还写了《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将甲午战争的重大战役都写成诗歌，读来极为悲痛。如《哀旅顺》：

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阍，红衣大将威望俨。下有深池列钜舰，晴天雷轰夜电闪。最高峰头纵远览，龙旗百丈迎风飏。长城万里此为堑，鲸鹏相摩图一瞰。昂头侧睨视眈眈，伸手欲攫终不敢。谓海可填山易撼，万鬼聚谋无此胆，一朝瓦解成劫灰，闯道敌军蹈背来。

诗中对清朝政府的误国庸臣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全诗形容旅顺地势天险，防御巩固，但是将领昏庸、愚昧、怯弱，竟然造成“一朝瓦解成劫灰”的败绩，诗中表现了作者无比的愤慨！

第二类是异国风光。他到了日本，写了《日本杂事诗》，后来整理为200首。这本诗集将日本的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都串之为诗，并加注解。这部诗集实际上是一部采风集。他说：“余虽不文，然考于书，徵之士大夫，误则又改，故非向壁揣摩之谭也。”因此，很有史料价值。1879年日本源桂阁（辉声）将黄的《日本杂事诗》初稿埋藏于墨江畔的家园中，刻石题碑，以为纪念。试举几首诗：

朝曦看到夕阳斜，流水游龙斗宝车。宴罢红云歌绛雪，东皇第一爱樱花。

铿锵鼓舞只依稀，守乐伶官记半非，弹到金猊涩河鸟，古音唯剩妃呼豨。

南蘋师法南田笔，南北禅宗合一家，偏是娥眉工淡扫，青螺烟墨写秋花。

《冯将军歌》，《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79页。

《哀旅顺》，《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653页。

《日本杂事诗·卷二》，《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158页。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134页。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145页。

《日本杂事诗·卷二》，《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150页。

滚滚黄尘掣电过，万车毂击复竿摩，白藤轿子葱灵闭，尚有人歌踏踏歌。

从这些小诗中我们看到日本的浮世绘，风情画面，而且，也可看到日本文化中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痕迹。

他写了一首《锡兰岛卧佛》，全诗长达二千多字，实为空前之奇构。梁启超对此首诗作了评价，说：“吾欲题为印度近史，欲题为佛教小史，欲题为地球宗教论，欲题为宗教政治关系说。然是固诗也，非文也。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他还写了《伦敦大雾行》、《登巴黎铁塔》、《苏彝士河》等诗，将欧洲的景色写入古诗，把异国情调和古词，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如：《今别离》四首，他写的是轮船、火车、氢气球、电报、照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等，全是欧洲新的意境，而文字是古体诗。其中第一首是：“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别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君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全诗的用韵和句意都是仿唐朝孟郊的《车遥遥》。陈三立评为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渊茂、隐恻缠绵。梁启超对他的诗评为“谓其意象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另外一首《以莲菊桃李花同供一瓶作歌》也是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新意境的巨篇，这首诗描写他住在新加坡一位潮州富豪家中，那里气候温暖，无冬无夏，杂花满树，他将莲菊桃李花同供一瓶中，诗写得华丽流畅，富有哲理，梁启超评此诗谓：“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而诗中的寓意还寄托着种族团结的思想。此诗权奇侷傥，弘丽恢张，显示了他诗歌的独特风格。

第三类为感怀抒志的诗。1896年他召梁启超到上海办《时务报》，写了《赠梁任父同年》诗六首，其一道：“列国纵横六七帝，斯文兴废五千年，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这六首诗充满了爱国热情，抒发了他救国的宏愿。1899年他仿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也写了己亥杂诗89首，是他一生历史的真实写照。其中写道：“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并函中。”他认为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变法，从君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日本明治维新国家已趋强盛，中国亦须仿之。戊戌政变失败后，他写了感事诗8首。其中最后一首曰：“太白星芒月色寒，五云缥缈望长安。忍言赤县神州祸，更觉黄人捧日难。压已真忧天梦梦，穷途并哭海漫漫，是非新旧纷无定，君看寒蝉噤众官。”众官噤若寒蝉，不敢说话，他更觉黄人捧日，中华振兴更加困难了。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153页。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上），第3页。

《今别离》，《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516页。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上），第7页。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上），第25页。

《寄梁任父同年》，《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15页。

《己亥杂诗》，《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26页。

《感事》，《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93页。

他写的最后一首诗为《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这首诗较长，其中预言将来一定是废帝制实现民主制，清朝政府的君主立宪制到底能不能实现，他也表示了怀疑，在走改良的道路或走革命的道路时，也徘徊不定，像在梦境里一样，要找寻道路，而终究未曾觅得一条通往未来幸福的途径。

第四类是怀念人物的诗。他的诗歌中写了许多人物，真可当作文化思想史的人物杂咏来看。对有些朋友是一种亲切的友情、温馨的回忆，对有些人物是品评月旦，评价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写徐仁铸的一首为：“臣罪当诛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白头元鬓哀蝉曲，减尽维摩旧带围。”徐仁铸在湖南任学政，黄遵宪为湖南按察使，两人相过从，交谊较深。

他有记王韬的诗：“走遍环球西复东，莼鲈归隐卧吴松。可怜一副伤心泪，洒尽吞花卧酒中。”有记严复的诗：“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绛纱坐帐谈名理，胜似麻姑背蚌搔。”有记夏曾佑的诗“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部善谈天，红灯夜雨围炉话，累我明朝似失眠。”记述了他和夏曾佑的友谊。

他有四首《李肃毅侯挽诗》是品评李鸿章的诗。其中一首是“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语涉讥讽。他批评李鸿章的投降媚外的外交，造成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李鸿章自己却在自嘲地说能维持二十年的“和局”。

第五类是民歌。他很重视民间山歌，加以采风并修改，成为一首首精美的小诗。如《山歌》：“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西流想无法，从今不养五更鸡。”“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街头铜鼓声声打，打着中心只说郎。”“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头依自怜。记得初来同食乳，同在阿婆怀里眠。”“第一香椽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夫容五枣子，送郎都要得郎怜。”民歌普遍用谐音、双关语，表现的是作者家乡嘉应州的风俗。

他在自己的诗中也吸取了民歌之风，如《己亥杂诗》中便有几首，其中一首是：“树静风停梦不成，枕函侧倚泪纵横，荷荷引睡施施溺，竟夕闻娘唤女声。”这首诗写作者扫墓归来夜里听见隔壁有抚儿的声音，他用古辞荷荷施施以状其声，极大地加强了诗的安装力量。

他还写过一首《都踊歌》记载的是日本西京上元节夜晚儿女成群结队、舞蹈欢歌的情景。写得温婉妍媚，回荡着百折的柔情。

关于民歌，他还写过数十首《新嫁娘诗》，还写过《军歌》24首，小学

《己亥续怀人诗》，《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56页。

《岁暮怀人诗》，《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554页。

《己亥续怀人诗》，《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56页。

《己亥综怀人诗》《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57页。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061页。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57页。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58页。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59页。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59页。

《己亥综怀人诗》，《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22页。

校学生相和歌 19 首，虽然没有收在《人境庐诗草》集子里，亦堪称佳作。今人郑振铎在评论黄遵宪的《山歌》时说：“这些山歌，确是像夏晨荷叶上的露珠似的晶莹可爱。”评价颇高。

黄遵宪的诗歌为什么会达到这样高的成就？康有为评述道：“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益动于自然，而华严随现矣。”梁启超评论道：“自其少年，稽古学道，以及中年阅历世事，暨国内外名山水，与其风俗政治形势土物。至于放废而后，忧时感事，悲愤伊郁之情，悉托之于诗。故先生之诗，阳开阴阖，千变万化，不可端倪，于古诗人中，独具境界。”黄遵宪有这样的爱国忧民的思想，又有游历国外的经历，加上他亲历戊戌政变的遭遇，以他深厚的古诗功底，将新事物、新思想熔铸于旧风格之中，便达到了新的意境。他的诗歌是从古典诗歌过渡到近代诗歌的一个必经阶段，他在寻求诗歌近代化的道路方面，有着成功的、有益的尝试。他的《日本杂事诗》为中日文化的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一段佳话。

维新派诗人还有蒋智由、夏曾佑。蒋智由（1865—1929）字观云，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人。曾参加过《新民丛报》编辑工作，被推为诗界三杰之一。他的诗好用新事、新典、新名词，宣传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在当时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如《有感》：“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诗中描写祖国山河破碎，被列强宰割，国无宁日的状况，反映了作者拯救时世的急切心情。另有一首《卢骚》：“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这首诗将卢骚、《民约论》、平等、自由的新名词直接运用于诗，自如洒脱，铿锵有力，是呼唤革命的号角。邹容在《革命军》中便将此诗最后两句加以引用，流传很广，影响甚大。他还写过一首《奴才好》，这首诗是对厚颜无耻的奴才的冷嘲热讽，成为切中时弊的一柄短匕。邹容在《革命军》中全诗加以引用。由此可见，他的诗在革命派中也起过积极作用。

夏曾佑（1861—1924）字穗卿，号别士，又号碎佛，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和梁启超、谭嗣同结识，过从甚密，对佛学哲理有精深的研究。1897年他在天津和严复、王修植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1902年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研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是试图运用进化论观点论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他的诗有对中国局势的忧虑和救亡图存的愿望，洋溢着爱国的情。如《舟过大沽望炮台二首》：“大旗明落日，雄镇拱神京。朔气三军重，平原万马轻。犀军环铁舰，元老卧长城。吹角楼船过，寒潮入夜平。登高东北望，滚滚暮涛黄。千古龙兴地，风烟隔渺茫。山河资禁旅，潮汐哭英王。日落看佳气，横天紫翠长。”此诗写作者舟过大沽口，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305 页。

《人境庐诗草·康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卷首，第 2 页。

《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164 页。

《清议报全编》。

《新民丛报》第 3 号。

《清议报》第 86 期，1901 年 7 月版。

赵慎修：《夏曾佑诗集校》，《近代文学史料》，第 21—22 页。

回忆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败绩于此的情景。全诗境界宏阔，气势雄壮，风格苍凉。

他写的《抵杭州》：“片帆摇客梦，乡语募心惊。倒屣船唇望，当头塔影迎。笋舆循古堞，鱼市沸人声。回首金门路，寒云万里横。”还有《无题》中的一首：“潞河曙色拥烟岚，风露微侵宿酒酣。一样晓风残月夜，无端回首望江南。”这两首诗淡雅清新，另具格调。

他还有《留赠方药雨》二首，诗是：“鸿飞本不为留计，竟见荒原万瓦稠。又举离觞辞旧雨，为思身世怯登楼。青山白浪驰黄海，暮雨孤灯过秀州。从此归帆好云物，分明点点入新愁。天问无灵白日徂，素筝浊酒欲何如？起看天地斜阳里，浪策兴亡作计疏。古今几回蕉鹿梦，江湖相勖计然书。河流一道窗三面，赢得他年入梦无？”这首诗包含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梁启超评为“怆往悲来，深情无限。”

与黄遵宪同享盛名的另一位爱国诗人是丘逢甲。梁启超将他评为：“诗界革命之巨子”，黄遵宪则誉他为：“此君诗真天下健者。”丘逢甲（1864—1912）又名仓海，字仙根，号仲阍，台湾苗栗县人。他是光绪进士，授职工部主事。不任仕宦，在家乡讲学。甲午战后，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他积极抵制割台，倡议组织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他任副总统兼大将军。组织义军，坚守台中，台北告急时，率军往援，在新竹苦战二十余日，战败，只得内渡。离台时曾写《离台诗》：“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诗歌沉痛、激昂，为人传诵。回广东嘉应州镇平（今蕉岭）原籍定居，创办学校，提倡新学，从事教育活动。后移居广州，任广州府中学校校长、两广方言学校校长。光绪末年，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副议长。1911 年广东光复，任都督府教育司长。1912 年 1 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推为参议员。病重回乡，逝世。他是著名的诗人，写了二千多首诗，有《岭云海日楼诗钞》传世。

他的诗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表达了对台湾的深沉怀念和谋求台湾回归祖国的坚强决心，诗中表现出悲愤苍凉的感情，流露出一股豪迈之气。

《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去年今日指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为《马关条约》签订之日，台湾割让给日本。

《元夕无月》：“满城灯市荡春烟，宝月沉沉隔海天。看到六鳌仙有泪，神山沦没已三年。”“三年此夕月无光，明月多应在故乡，欲向海天寻月去，五更飞梦渡鲲洋。”鲲洋为台湾的别称。

他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侵略中国，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在《闻胶

《近代文学史料》，第 30 页。

赵慎修：《夏曾佑诗集校》，《近代文学史料》，第 34 页。

赵慎修：《夏曾佑诗集校》，《近代文学史料》，第 45 页。依《饮冰室诗话》改动个别的词。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上），第 53 页。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上），第 24 页。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249 页。

《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第 415 页。

《岭云海日楼诗钞》，第 29 页。

《岭云海日楼诗钞》，第 57 页。

州事书感》中写道：“汉家长策重和亲，重译传经许大秦。祆届屡闻生愤火，蓬山又见起边尘。青州酒断愁难遣，黄海舟迟信未真。慷慨出门思吊古，田横岛上更何人。”这是写德国1897年借口“曹州教案”，派军队强占胶州湾，诗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丑恶罪行。《岁暮杂感》一首揭露了帝俄的侵略野心：“一曲升平泪万行，风尘戎马厄潜郎。民愁竞造黄天说，岁热如逢赤地荒。七贵五侯金穴富，白山黑水铁车忙。老生苦记文忠语，多恐中原见鹭章。”表现了作者的无穷忧虑。

他还写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怀古诗，如《铁汉楼怀古》、《凌风楼怀古》等，现举一首：“石阙苔荒一径深，悲秋怀古此登临。九州难画华夷限，万死思回天地心。南客旅愁观海大，东山云气压城阴。斜阳照起英雄恨，枯木寒鸦泪满襟。”这首诗是借缅怀古代英雄人物，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他的风景短诗写得境界优美，设色工丽，用语圆熟畅快，格调清新。《秋溪即目》：“绿减蕉阴夜有霜，园柑林柿问丹黄。扁舟坐爱秋溪晚，七曲屏山半夕阳。”“园林村舍接双堤，十里烟波一棹迷。昨日斜阳今细雨，菊花时节过秋溪。”《山村即目》：“一角西峰夕照中，断云东岭雨蒙蒙。林枫欲老柿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山田一雨稻初苏，村景宜添七月图。鸡犬惊喧官牒下，农忙时节来催租。”

南社诗人领袖柳亚子在《论诗六绝句》中写道：“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对丘逢甲（仓海）的诗作了很高的评价，肯定了他的诗的雄奇豪放的英气和炽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第四节 谭 献 朱孝臧 况周颐

晚清词学中兴。本书第一章清朝的文化系统结构中曾介绍了清朝词学的概貌。清初，出现了以宜兴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羨派。随后，便形成了朱彝尊为首的浙西派和张惠言为首的常州派。陈维崧的词沉雄俊爽，波澜壮阔，因处于明末清初，经历国难之痛，不免有粗犷叫嚣之风。朱彝尊生活在康熙盛期，以醇雅为宗，纠正阳羨派的叫嚣犷悍之风。浙西派中期有厉鹗，后期有吴锡麒，影响很大。其派的末流渐入于枯寂。张惠言的常州派强调作词需有“意”，要有比兴寄托，意内言外之旨，这样便使“词”的地位提高了，要求能发挥儒家诗教的社会功能。词家与诗家并驾齐驱，诗中所不能表达的，可以转而借词来表达。清词至此体格为之一变。常州派的后劲是谭献。光绪年间，又出现朱孝臧，他号彊村，这一词派又称为彊村派。围绕在他周围的还有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等人。人们称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况周

《岭云海日楼诗钞》，第347—348页。

《岭云海日楼诗钞》，第47页。

《潮阳东山张许二公祠为文丞相题沁园春词处旁即丞相祠也秋日过谒敬赋二律》，《岭云海日楼诗钞》，第71页。

《岭云海日楼诗钞》，第72页。

《岭云海日楼诗钞》，第133页。

《磨剑室诗词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6页。

颐为“清季四大词人”。

谭献（1832—1901）原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同治六年举人，历任歙县、全椒、合肥知县，晚年告归，从事著述。有《复堂类集》，选清代词人的词为《篋中词》六卷，续四卷，评选精审，词学界奉为圭臬。

他是常州派的后劲，继承了常州派的词学理论，词讲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诗有史诗，词也应有词史”。就是说词的反映内容要包括时代生活和个人境遇的变化，像杜甫、韩愈的诗一样，将社会时代的风貌都融入诗中。他自己处于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其时外敌侵略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因此，“感时述事”、“忧生念乱”成为他提倡词学的重点。他评论词家的词时，常用“杜诗韩笔，凌厉无前，此事自关襟抱。”“茫劫浩浩，是为词史”等词语。他又评蒋春霖的词“流别甚正，家教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他将纳兰性德、项廷纪、蒋春霖评为词坛三大家。这样的作品丰富了社会政治内容，扩大了词的容量。他对词的音乐性亦很重视，曾说：“词为诗余，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夫音有抗坠，故句有长短，声有抑扬，故韵有缓促，生今日而求乐之似，不得不有取于词矣！”他分析了音乐和诗歌密切结合的关系。谭献的词幻渺而沉郁，义隐而指远，尤长于小令。

《蝶恋花》：庭院深深人悄悄。埋怨鹦哥，错报韦郎到。压鬓钗梁金凤小，低头只是闲烦恼。花发江南年正少，红烛高楼，争抵还乡好？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

玉颊妆台人道瘦，一日风尘，一日同禁受。独掩疏栊如病酒，卷帘又是黄昏后。六曲屏前携素手。戏说分襟，真遣分襟骤。书札平安君信否？梦中颜色浑非旧。

这两首蝶恋花是写闺中思妇怀念他乡作客的情人之作，寓意很深。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云：“庭院深深阁，上半传神绝妙，下半沉痛已极，所谓情到海枯石烂时也。玉颊妆台阁，上半沉至语，殊觉哀而不怒，下半相思刻骨，寤寐潜通，顿挫沉郁，可以泣鬼神矣。”其寓意有为了追求美好理想终生不悔为之献身的意思。

朱孝臧（1857—1931）名祖谋，字古微，号讴尹，又号彊村。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清光绪九年进士，累官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1904年出任广东学政，满二岁，与总督龆龂，引疾去。归寓苏州，与在苏的郑文焯同为晚清吴中词坛的盟主。后寓居上海，以遗老终。他在京师，与王鹏运结识，受其影响，发奋作词。尝校刻唐、宋、元人词百六十余家为《彊村丛书》，又辑《湖州词徵》24卷，《国朝湖州词徵》6卷，《沧海遗音集》13卷，学者奉为宝典。又选《宋词三百首》以标宗旨。他是彊村派的首领。他的词，人们评价为跨常迈浙，凌厉踈朱，幽忧怨悱，沉抑绵邈，莫可端倪，深文而隐蔚，远旨而近言。集清季词学之大成，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篋中词》，续卷3，清光绪八年秋刻印本。

《篋中词》，卷5。

《复堂词录序》，《复堂类集》文二，清光绪间家刻本，半广丛书单行本。

龙榆生编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42—143页。

《白雨斋词话》，卷5，清光绪二十年刻印。

《鹧鸪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

野水斜桥又一时，愁心空诉故鸥知。凄迷南郭垂鞭过，清苦西峰侧帽窥。新雪涕，旧弦诗。愔愔门馆蝶来稀，红萸白菊浑无恙，只是风前有所思。

裴村是刘光第的字，刘光第，戊戌变法中受害的六君子之一。1898年8月13日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斩决，此词写于刘光第死后25天。因为时间离得很近，面对着严峻的高压政治形势，难以直写心绪，只能通过对外景的描述，将情包含其中，吊死难旧友，掩抑凄怨，将愤怒抑制在心头。辞温婉而意苍劲。

《声声慢》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味聃赋《落叶词》见示，感和。

鸣蜩颓城，吹蝶空枝，飘零人意相怜。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香沟旧题红处，拼禁花，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蝉。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天阴洞庭波阔，夜沉沉、流恨湘弦。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

这首词是专为凭吊珍妃而作，是哀悼珍妃的名篇。作于1901年，珍妃被害的第二年。全篇借落叶托兴，哀怨缠绵，透过宫廷悲剧写出了国家重大历史事件。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夔笙，号蕙风，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光绪五年举人，官内阁中书。致力于词达五十年，与王鹏运、朱孝臧切磋做词，于工持论，作《蕙风词话》，称为绝作。两江总督张之洞、端方先后延之入幕，辛亥革命后，晚居上海。

他的词学理论大要有三：一、对词的看法。将词提高为文学的正宗地位，认为词不是诗余，也不是乐府之余，而应当成为词学而独立存在，并不附丽于诗。他说：“词之为道，智者之事。酌剂乎阴阳，陶写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雅乐，别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敝矣。唐宋已还，大雅鸿逵，好而专精之，谓之词学。独造之诣，非有所附丽，若为骈枝也。曲士以诗余名词，岂通论哉！”他对常州派的“词贵有寄托”的论断也有所修正，说：“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而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他强调要用性灵去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内容。二、关于词境、词心、词骨。词境是词人所处的客观环境，吾听风雨，吾览江山，风雨江山是客观环境，平日阅历，境之穷达，这是社会环境。词心是指在客观环境的刺激下所产生的感情以及把这种情感表达出来的愿望。词骨就是词之真，真情，真景，融景入情或寓情于景，将它创造达到一种艺术境界。要求词人以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去创作词。三、关于意境。他说：“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词境以深静为至，韩持国《胡捣练令》云：‘燕子渐归春悄，帘幕垂清晓’。境至静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浅而见深。”他要求深厚穆静，用重、拙、大，以浑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172页。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173页。

《蕙风词话》卷1，惜阴堂丛书单行本民国期间刊印。

《蕙风词话》卷5。

《蕙风词话》卷1。

《蕙风词话》卷2。

雅的形象来表达深沉的情感。要写得情真理足，信手拈来，浑如天成，不要做作，做作太过，便不是好词。他的词学理论确实有深邃高卓的见解。

《苏武慢》寒夜闻角

愁入云遥，寒禁霜重，红烛泪深人倦。情高转抑，思往难回，凄咽不成清变。风际断时，迢递天涯，但闻更点。枉教人回首，少年丝竹，玉容歌管。凭作出，百绪凄凉，凄凉惟有，花冷月闲庭院。珠帘绣幕，可有人听？听也可曾肠断？除却塞鸿，遮莫城乌，替人惊惯。料南枝明日，应减红香一半。

这首词写于1889年，作于北京，深为王鹏运赞赏。全词境界深远，怨断凄凉。王国维《人间词话》评曰：“境似清真（周邦彦），集中他作，不能过之。”叶恭绰《广篋中词》评曰：“珠帘绣幕三句，乃夔翁所最得意之笔。”

《水龙吟》

声声只在街南，夜深不管人憔悴。凄凉和并，更长漏短。够人无寐。灯炮花残，香消篆冷，悄然惊起。出帘栊试望，半珪残月，更堪在，烟林外！愁入阵云天末，费商音，无端凄戾。鬓线搔短，壮怀空付，龙沙万里。莫谩伤心，家山更在，杜鹃声里。有啼鸟见我，空阶独立，下青衫泪。

此词写于1895年，这时《马关条约》已经签订，台湾绅民正在酝酿成立台湾民主国拒日。在这个背景下，作者从闻警惊起，着色外界景物，抒发内心情态，回肠九折，刻画细致。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命运的关注。

王鹏运（1848—1904），字幼遐，号半塘老人，晚号鹜翁，广西临林（今桂林）人。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同治九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内阁侍读、监察御史、礼部给事中。值谏垣十年，疏数十上，一时权贵，每被弹劾，直声震天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南归，主扬州仪董学堂，二年后病卒于苏州。鹏运殫精于词，被称为清季四大词人之首。他和况周颐都是广西临林人，叶恭绰在《广篋中词》中曾有评价：“夔笙（况周颐）与幼遐翁崛起天南，各树旗鼓。半塘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蔚为词宗；蕙风则寄兴渊微，沉思独往，足称巨匠，各有真价，固无庸为之轩轻也。”晚年删定其词为《半塘定稿》。

《八声甘州》送伯愚都护之任乌里雅苏台

是男儿，万里惯长征，临歧漫凄然。只榆关东去，沙虫猿鹤，莽莽烽烟。试问今谁健者，慷慨着先鞭？且袖平戎策，乘传行边。老去惊心鼙鼓，叹无多哀乐，换了华颠。尽雄虺琐琐，呵壁问苍天。认参差、神京乔木，愿锋车、归及中兴年。休回首、算中宵月，犹照居延。

此词写于1894年，伯愚即志锐，为甲午战争时期主战派。词为投赠之作，关系当时朝局，寓意深远。

《浪淘沙》自题《庚子秋词》后

华发对山青，客梦零星，岁寒濡响慰劳生。断尽愁肠谁会得？哀雁声声。心事共疏檠，歌断谁听？墨痕和泪渍清冰。留得悲秋残影在，分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184—185页。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185—186页。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147页。

付旗亭。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王鹏运和朱孝臧、刘福姚三人痛世运之陵夷，患气之非一日致，发愤呼叫，相对太息，相约填词，于喁唱和，成《庚子秋词》二卷，此词即写他们三人填词时的心境，悲凉哀怨，情真意切，是爱国词人忧心国事民生的佳作。词是用墨水和泪水凝聚而成，写下了深秋草木摇落的衰景，预示着清王朝已经进入穷途末路，寄托着无限的哀叹。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一字叔同，号小坡，又号大鹤山人，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隶汉军正黄旗。父瑛官陕西巡抚。光绪元年举人，官内阁中书。1898年后旅食苏州，为江苏巡抚幕僚，晚筑樵风别墅于苏州，卒葬邓尉山。他精通音律，深明管弦声数之异同，考证古代燕乐之旧谱，颇有成就。他的词体洁旨远，句妍韵美，声出金石，极命风谣，感兴微言，深美闳约。

《浣溪沙》从石楼、石壁往来邓尉山中

一半梅黄杂雨晴，虚岚浮翠带湖明，闲云高鸟共身轻。山果打头休论价，野花盈手不知名，烟峦直是画中行。

词做于1899年，写吴县光福镇南的邓尉山，这一带居民多植梅树，有“香雪海”之称。这首词萧闲淡远，格调高雅，词中有画，画中有入。

《谒金门》三首

行不得。黧地衰杨愁折。霜裂马声寒特特，雁飞关月黑。目断浮云西北。不忍思君颜色。昨日主人今日客，青山非故国。

留不得。肠断故宫秋色。瑶殿琼楼波影直，夕阳人独立。见说长安如奕，不忍问君踪迹。水驿山邮都未识。梦回何处觅？

归不得。一夜林乌头白。落月关山何处笛，马嘶还向北。鱼雁沉沉江国，不忍闻君消息。恨不奋飞生六翼。乱云愁似幂。

这三首词写于庚子年，北京遭八国联军侵占，作者在南方苏州，怀念北京，思念光绪帝的行踪。第一首“行不得”，写行，光绪帝离京西奔，马嘶特特，浮云西北，由山西到达西安，路途多涉艰险。第二首“留不得”，写故宫被占领后一片惨景，长安如奕，下棋为难，和议未成，欲归不能，留京不走也不行。第三首“归不得”，乌头未白，思念光绪帝。全组词用不忍思君颜色，不忍问君踪迹，不忍闻君消息，一层一层推进，沉郁悲凉，极度哀痛。

我们依次介绍了谭献、况周颐的词学理论，以及谭献和四大词人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况周颐的词，前者是常州派后劲，后者群体可谓之为疆村派。晚清词家有些不算哪一派，词的作品也极有名，如文廷式、沈曾植、吴梅、王国维，以及女词人吕碧城等。清词一个很大的特点，是这些词作并不是为花间樽前、歌台舞榭而作，不限于词家个人“小己”的生活，写些相思、欢会、饮宴、伤春等内容，消磨有闲的光阴，粉饰封建王朝的太平。他们多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152页。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165页。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165页。

是感触世事，关心国事，留下了大量的爱国的诗篇。这和晚清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多难，社会剧变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有关，而且也与他们的词学理论要“尊词体”，要写“词史”的宗旨有关。于是晚清重大的历史事件，成为词人歌咏的题材，凝结了他们的血和肉，谱成了可歌可泣的词史乐章。这也是政治影响词学文化的一个明显例证。

晚清词学家对词学理论比较重视，他们写出了一些作品，如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刘熙载的《艺概》、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等。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问世，则是作者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哲学来研究中国词学的作品，标志着词学理论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建树了近代的美学理论。

第八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上）

第一节 从庚子到辛亥的文化思想趋向

从庚子到辛亥，即从1900年到1911年，是晚清的最后十年。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潮成为主流。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仓惶逃到西安。京城第二次遭到列强铁蹄的蹂躏，这是中华民族蒙受的奇耻大辱。人们感到清朝气数将尽。慈禧太后回銮，脸上无光。但她仍挥霍无度，尽情享乐，欢宴各国公使，表现奴颜卑膝的媚外丑态。国家债台高筑，财政匮乏。地方督抚大臣权力增大，拥兵自重，造成内轻外重之势。全国面临着革命危机。清政府镇压旧式农民运动积累了经验，但对于新型资产阶级武装起义却束手无策。由于清政府对外投降、对内腐败，人们对清廷已极端失望。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又爆发了。甲午战争后，孙中山谋图发动广州起义，人们闻讯惊骇逃走，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叛乱。而庚子再组织起义，遭到失败，人们却扼腕叹惜，认为起义是应当做的事，这说明人们的社会心理对革命已经有了承受能力，清王朝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已经大为降低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了各种政党和团体，先后有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日知会等，展开了革命活动。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革命刊物，如《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四川》、《河南》、《醒狮》、《民报》等，这些刊物宣传西方的民主思想，主张颠覆清朝专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随着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新型知识分子群体队伍日益壮大，出现了“出国热”。20世纪初年，留学日本的只有几百人，到1906年达到8000人。他们受到西欧民主思想的熏陶，回国后又将新思想传播到各地。全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有一定的发展，工矿、商业、金融业日益繁荣，随之，全国各大城市如上海、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商业繁华、人才汇集、文娱设施增加、文化也繁兴起来，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绘图、音乐都呈现一片新的景象。

当时的文化趋向是：西方学说和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使人眼花缭乱。从拿破仑到华盛顿、从卢梭到马克思、从罗曼·罗兰夫人到苏菲亚，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都有他们的崇拜者。西方的社会科学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各种学科，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都在如饥似渴地贪婪地钻研阅读，人们开始认识到专制制度是落后的，阻碍社会历史发展的，而民主制度是先进的。有一刊物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说国民》，一开头便这样提问：“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这一回答真是石破天惊。在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竟得出了不要皇帝的断然结论，这标志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已经冲破了维新派改良主义的樊篱。

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运动开始出现。维新派提倡妇女应有受教育的权利，创办女学堂，应禁缠足，应当婚姻自主，有独立的人格。革命派则进一步认为妇女应当参加社会活动，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经济上也应独立。社会上出现了妇女杂志，妇女团体，如《中国女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等，革命派中出现了不少巾帼英豪，如秋瑾。妇女解放运动成为革命派民主革命运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思想上开始触及对旧社会习俗、社会风尚的批判和革除。跪拜礼，

相信天命，卜卦相面，抽大烟、赌博，以至于留辫子都成为议论的对象。人们提出许多新观念，如不用清朝的年号，改用黄帝纪年，不穿长袍马褂，而改着西装革履，不相信天命，自主婚姻，取消跪拜礼节等等。这些设想随着清朝复亡，民国建立，便一一实现了。

儒学出现变革。西学东渐，使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在批判君主制同时，也触及儒学，尤其是儒学中的“三纲五常”理论，打破了儒术独尊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革命派中的章太炎打出了“保存国粹”的旗帜，一面批判儒学，另一面却主张保存国学中的精粹部分，宏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与西欧外来文化抗衡。国粹主义成为西学东渐后人们对传统文化沉思的结晶。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对传统儒学重新估价，重新认识，保存它在世界文化中应有的地位。

这一时期，在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领域，文化现象呈新旧杂糅的状况。有的文艺形式其内容有新因素，而表现方式仍沿用旧的，有的形式上有所突破，而内容却停滞在原有旧的水平上。总之，这一时期是一个蜕变过程，半新半旧，不中不西，是一个变动的过渡时期，是一个痛苦地探讨新的道路的尝试时期，而其新的变革的初步完成要到 1915 年新文化运动掀起之时才能到来。

第二节 柳亚子 苏曼殊

南社是晚清的革命文学团体，成立于 1909 年苏州虎丘，取名南社，就含有反对北庭的意思。它的发起人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权，字亚卢，再更名弃疾，又号稼轩，又字亚子。后为了统一名号，便用亚子。江苏吴江黎里镇人。父亲钝斋，学养有素，母亲费漱芳，曾从名士徐山民的女儿徐凡如读书，《诗经》、《唐诗三百首》都能熟练背诵。亚子幼受母教，喜读古诗。17 岁至上海，入爱国学社，为蔡元培、章太炎弟子，始谈革命。1906 年，由高旭、陈陶遗、马君武、刘师培介绍，入同盟会，复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1909 年 11 月 13 日，和陈去病、高旭、朱少屏、姚石子等创立南社，第一次结集在苏州虎丘张公祠，到会 17 人。这一文学团体具有浓厚的反满色彩，会员多为同盟会员。第二次结集在杭州西湖，第三次结集在上海张氏味莼园。每次结集出版一部诗文集，共印了 22 集，汇为《南社丛刻》。会员后来发展到 1000 多人。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柳亚子以中国同盟会员身份为国民党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委。1927 年“四·一二”事变后，他遭迫害被搜捕，以匿于复壁得免。抗日战争时期，他流亡重庆、桂林、香港，自比为行吟泽畔的屈原。他潜心南明历史的研究，搜集了很多有关南明的史籍，并写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可惜战乱中，大量文稿失散，编写明史的愿望没有实现。1941 年“皖南事变”爆发，在香港的柳亚子，亲自撰写电文，和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发电报责问蒋介石，斥责蒋介石倒行逆施，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结果，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1945 年毛主席飞抵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他写诗赠毛主席：“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儿双源合，一笑昆仑

顶上头。”称赞毛主席“弥天大勇”。1945年10月，毛主席致信给他，其中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令人感发兴起。”对他的诗给予很高的评价。1949年2月，他应毛主席的电邀，由香港启程进入解放区，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的诗约有5000多首，有《磨剑室诗词集》。

柳亚子的思想受过西欧民主思想的熏陶，崇拜卢梭，曾将自己的名字更为“人权”，字“亚卢”，亚洲的卢梭也。1903年他写过一首长诗《放歌》，其中一段道：“我思欧人种，贤哲用斗量。私心窃景仰，二圣难颉颃。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继者斯宾塞，女界赖一匡，平权富想象，公理方翔翔。谬种辟前人，妄诞解剖详。智慧用益出，大哉言煌煌。”他曾在报刊上宣传卢梭的民约论，提倡民主主义，反对向君主乞求的君主立宪制。他在一篇文章中，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卢梭的民约论思想，最后号召读者：“诸君诸君！认定宗旨，整刷精神，除暴君，驱异族，破坏逆胡专制的政府，建设皇汉共和国的国家，那就是诸君的责任了。”他专门写了一篇《哀女界》的文章，揭露中国专制主义统治下妇女所受的种种痛苦，呼吁妇女独立解放。

他的思想又受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张煌言、夏完淳思想的影响。这也反映在他早年的诗歌里。如《题〈张苍水集〉》：共四首，选一首：“北望中原涕泪多，胡尘惨淡汉山河。盲风晦雨凄其夜，起读先生正气歌。”张煌言，号苍水，浙江鄞县人，明亡后，拥鲁王监国，以舟山为根据地，抗击清军达19年，曾和郑成功配合一度会师北伐，后为清军捕获，不屈牺牲。诗中借“胡尘惨淡汉山河”，号召抗清革命。另一首《题〈夏内史集〉》，共六首，选一首：“鸱枭革面化鸾皇，禹甸尧封旧土疆。大业未成春泄漏，横刀白眼问穹苍。”夏完淳，字存古，松江华亭人，他从14岁起便追随父亲夏允彝、老师陈子龙抗清，被害时仅17岁。“鸱枭革面”指清松江提督吴胜兆，原为明朝武官，后降清，后又举兵抗清，失败后，夏完淳亦被捕蒙难。柳亚子后来回忆说：“十八岁开始读夏存古和顾亭林的诗集。存古是明末陈子龙的学生，以神童著名，十五起兵抗满，十七岁殉国，所作都是激昂慷慨之音。”可见明末抗清诗人对他思想的影响。

1903年上海发生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被租界巡捕房监禁狱中，他写诗怀念他们：“祖国沉沦三百载，忍看民族日仇离。悲歌咤叱风云气，此是中原玛志尼。”两年后，邹容病死狱中，他写诗哭邹容。“白虹贯日英雄死，如此河山失霸才。不唱饶歌喝薤露，胡儿歌舞汉儿哀！哭君

《八月二十八日，喜逢润之来渝，三十日下午相见于曾家岩畔，赋赠一首》，《磨剑室诗词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11页。

《毛泽东致柳亚子手札》，《磨剑室诗词集》（上）卷首。

《放歌》，《磨剑室诗词集》（上）第17—18页。

弃疾：《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复报》第9期，1907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815页。

《磨剑室诗词集》（上），第22页。

《磨剑室诗词集》（上），第25页。

《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感想》，《创作的体验》，天马书店1933年。

《有怀章太炎、邹威丹两先生狱中》，《磨剑室诗词集》（上），第18页。

恶耗泪成血，赠我遗书墨未尘。私怨公仇两愁绝，几时王气划珠申？”珠申指满族。全诗异常悲愤和沉痛，也表达了他和革命党人浓厚的友情。

1907年秋瑾被清政府杀害，这件事震动了全国。他写了《吊鉴湖秋女士》七律四首。其三，四是：

饮刃匆匆别鉴湖，秋风秋雨血模糊。填平沧海怜精卫，啼断空山泣鹧鸪。马革裹尸原不负，蛾眉短命竟如何！凭君莫把沉冤说，十日扬州抵得无？

漫说天飞六月霜，珠沉玉碎不须伤。已拼侠骨成孤注，赢得英名震万方。碧血摧残酬祖国，怒潮呜咽怨钱塘，于祠岳庙中间路，留取荒坟葬女郎。”

1907年冬，柳亚子在上海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聚会，筹备结社，有诗曰：

慷慨苏菲亚，艰难布鲁东。佳人真绝世，余子亦英雄。忧患平生事，文章感慨中。相逢拼一醉，莫放酒樽空。”

诗中提到苏菲亚，是俄国民意党领导人之一。诗中提到的布鲁东，即蒲鲁东，为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诗中将苏菲亚比喻何震，布鲁东比喻刘师培，因为他们夫妇俩是相信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这首诗表达了他们聚会慨当以慷，忧患国事，从事革命鼓吹的愿望。

同年，他又写了两首诗，选其一：

啼红泣翠送年华，潦倒穷途哭酒家。梦里荒唐新甲子，樽前憔悴旧琵琶。箫心剑态愁无那，马角乌头恨未赊。便是买山归亦得，只愁清泪落天涯。全诗流露出悲怆的情调。

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成立，柳亚子即席赋诗：

寂寞湖山歌舞尽，无端豪俊又重来，天边鸿雁联群至，篱角芙蓉晚艳开。莫笑过江典午鲫，岂无横槊建安才。登高能赋寻常事，要挽银河注酒杯。

单一题目便是一完整的纪事。他特别强调三百年来社事零替以来，这是最快乐的一次结社集会了。全诗气势雄伟，风格高昂激越，是革命的呼号。

次年，南社第二次雅集，在杭州西湖，他写了一首词。

金缕曲 三月朔日，南社同人会于武林，泛舟西湖，醉而有作。

宾主东南美，集群英，哀丝豪竹，酒徒沉醉。指点湖山形胜地，剩有赵家荒垒。只此事，从何说起！王气金陵犹在否？问座中谁是青田子？微管业，付青史。大言子敬原非戏，论英雄安知非仆，狂奴未死。铁骑长驱河朔靖，勒石燕然山里，算才了平生素志。长揖功成归去日，便西湖好作逃名地。重料理，鸱夷计。

《哭威丹烈士》，《磨剑室诗词集》（上），第27页。

《磨剑室诗词集》（上），第48页。

《偕刘申叔、何志剑夫妇暨杨笃生、邓秋实、黄晦闻、陈巢南、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张聘斋酒楼小饮，约为结神之举，即席赋诗》，《磨剑室诗词集》（上），第56页。

一年以后，刘师培变节，成为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僚。柳亚子曾将刘何夫妇喻为罗兰、玛利，后来，他在诗中说：“罗兰、玛利成虚愿”《磨剑室诗词集》（上），第105页。

《将归故里，留别海上诸子》，《磨剑室诗词集》（上），第57页。

《磨剑室诗词集》（下），第1779—1780页。

词中引了一些史籍上的典故，意思是要有英雄出来，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到了民国建立，则可功成身退，隐居西湖，学范蠡灭吴，改名鸱夷子，携西施泛五湖而去。词器识明达，意志坚定而又才气发越，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而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对于诗词，柳亚子诗宗盛唐，词宗南唐、北宋。他曾声称：“余与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侏楚，而尤重布衣之诗。”后来他又回忆说：“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做旧诗的人，大概可分为三派，甲派是王闿运，乙派是郑孝胥、陈三立，丙派是樊增祥、易顺鼎。我对于这三派都表示反对，想别创一宗，由明季陈子龙、夏存古以上追唐风。……我还有一个偏见，就是以人论诗：我在辛亥革命前反对满清，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所以接近清、袁的诗人，我是不佩服的。上面所讲对于近代甲乙丙三大流派的高举叛旗，一大半是这个原因呢！”这里说得很清楚，他反对江西诗派，从政治上讲，这派人接近清王朝，情绪低沉；从艺术上讲，“刻意求艰深，病在一涩字。”不能视为正宗。他有《论诗六绝句》其中两首云：

少闻曲笔湘军志，老负虚名太史公。古色斑斓真意少，吾先无取是王翁。

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一笑嗣宗广武语：而今竖子尽成名。

前一首诗讽刺王闿运作诗专门模仿魏晋诗体，是假古董，失去真情实感。后一首批判郑孝胥、陈三立的江西诗派同光体追求清瘦枯淡的风格，是一种衰飒危苦的韵味，寂然无生趣。而樊增祥、易顺鼎的宗晚唐派，专门喜欢写艳体诗，捧角诗，实是淫乱之声，是一种封建文化的腐朽堕落之风。而清末民初，这些诗派仍占据诗坛，他便发出阮籍所言“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哀叹。

柳亚子批评江西诗派却引起了南社内部社友的不同意见，发生了争论。当时姚鹓雏、闻野鹤、朱鸳雏崇拜同光体，发生争执，双方都意气用事，说了些过火的话，伤了感情。而总的说来，这场争论其性质是诗坛保守与进步思想的争论，是有意义的。柳亚子对郑、陈、樊、易的尖锐批评，实开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民主主义者批评这批诗作的先河。

郭沫若评价柳亚子：“是一位典型的诗人，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他的诗感慨豪宕、沉郁深婉，热情奔放，独树一帜，开一代革命诗风，写了一部敢哭、敢笑、敢怒、敢骂的革命史诗。

在南社众多的社友中，有一位有名的诗僧，他就是被当时青年人誉为天才卓绝的文学家苏曼殊。苏曼殊（1884—1918）名戡，又名元瑛，亦作玄瑛。字子谷，别号曼殊，广东香山县沥溪村（今属珠海市前山镇南溪乡）人。父亲苏杰生是日本横滨英商万隆茶行的买办，与其长妾河合仙的胞妹若子私通，生下曼殊。河合仙是日本人，小时，曼殊由河合仙抚养。六岁随嫡母黄

《南社》第五集，1912年6月。

《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感想》，《创作的体验》，1933年。

《柳亚子与高天梅书》，《太平洋报》，1912年4月10日。

《磨剑室诗词集》（上），第215页。

郑逸梅编：《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0页。

氏回广东原籍。13岁因不堪忍受家人的虐待转至上海学习中英文，15岁遵父嘱随表兄林紫垣到横滨大同学校就读，其间曾潜回广东剃度出家。19岁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中国留学生部，参加青年会，开始革命活动。在此期间，结识了冯自由、陈独秀等人，并参加兴中会的活动。1903年转入振武学校学习初等陆军技术，并参加拒俄义勇队、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等活动。是年辍学，归国在苏州吴中公学任教，得知张继、陈独秀在上海办《民国日日报》，他到该报社任英文翻译。不久，又到长沙寻访故友黄兴，在明德学堂、经正学堂、湖南实业学堂任教，暗中参与华兴会的筹建。是年流浪到广东惠州再次剃度为僧。他游历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越南等国，学习梵文，体察当地僧侣生活。回国后，以僧侣生活为掩护，在上海、长沙、芜湖、杭州一带从事革命秘密活动。湘赣起义失败，避地杭州。1907年他到日本，和刘师培、何震、章太炎、陈独秀交往甚密，在《民报》、《天义》、《河南》等刊物上发表不少文章和画幅，并参加国际性组织亚洲和亲会的创建工作。回国后，在南京曾应聘在杨文会创办的 洵精舍任英文教员。1909年经陶成章推荐，到爪哇 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参加南社，应聘太平洋报社任主笔，后袁世凯窃国，他写出声讨檄文，先后在《民国》、《甲寅》、《南社》发表了大量的诗文和小说。1918年积病而卒，年仅35岁。

苏曼殊亲身参加了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的革命活动，他因有难言的身世，在家庭中受到歧视和虐待。他目睹了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蹂躏的灾难，痛恨满族贵族及其官僚的封建专制的沉重压迫。他的诗歌、小说、杂文以至于绘画都强烈地表现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主题。

他的诗别具一格，自成一家，格调清新自然，端丽隽永，尤其注重个人内心情感的抒发，不用典故，有时是白描的手法，颇有意境，寓意深沉。他写的爱情诗，缠绵悱恻，千回百转，状物则形象逼真，历历如见，写人则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1903年）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沉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这两首绝句中，秦，指沙俄帝国主义。他借鲁仲连誓不帝秦和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场景，借喻反对沙俄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诗中作者以荆轲自况，勇赴国难。

《过平户延平诞生处》（1909年）

行人遥指郑公石，沙白松青夕照边。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落碑前。

平户在日本长崎县，那里有一块郑公石，相传郑成功诞生于此。延平是郑成功的封号。作者到此地，缅怀民族英雄郑成功抗清的业绩，联想到国内革命党人遭到清廷屠杀，感到无比悲愤，情调悲痛低沉。

《耶婆提病中，末公见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旷处士》

君为塞上鸿，我是华亭鹤。遥念旷处士，对花弄春爵。良讯东海来，

《苏曼殊文集》（上），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3页。

《苏曼殊文集》（上），第35页。

中有游仙作。劝我加餐饭，规我近绰约。炎热困羁旅，南海何辽索。上国亦已芜，黄星向西落。青骊逝千里，瞻乌止谁屋？江南春已晚，淑景付冥冥。建业在何许？胡尘纷漠漠。佳人不可期，皎月照罗幕。九关日以远，肝胆竟谁托？愿得趋无生，长作投荒客。竦身上须弥，四顾无崖嶿。我马已玄黄，梵土仍寥廓。恒河去不息，悲风振林薄。袖中有短书，思寄青飞雀。远行恋俦侣，此志常落拓。

这首诗是五言古诗，写于1910年春夏之交。他在爪哇，爪哇古为耶婆提。末公是章太炎的别号，旷处士是章太炎弟子黄侃的别号，他和章太炎、黄侃在日本交往甚密，他的诗和文都向章太炎请教，章太炎写了《游仙与黄侃联句》诗，寄给他，他接到游仙诗，病中奉和。全诗表达了对祖国的眷恋，对革命事业的关心和对友人的深切怀念。同时，也反映了他陷于寂寞悲凉的困境不可自拔，流露出诗人情感上脆弱的一面。

他的诗大部分为七言绝句。一首首七绝写得像一幅幅图画那样形象逼真，性格突出。

《本事诗》：“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一个脚穿芒鞋、手托破钵的和尚，走在日本樱花遍开的便桥上，耳听着楼头吹奏《春雨》的箫声曲调，心里想着杭州西湖的浙江潮声，一个行脚游僧在飘泊流浪，是一种何等的心情啊。这首诗情景交融，烘托出一个中国和尚在暮春的日本那一种思念祖国的情绪。

他的爱情诗能向读者袒露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感情真挚、深沉，并有一层淡淡的悲哀。我们举四首如下：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禅心一任蛾眉妒，佛说原来怨是亲。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

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日日思君令人老，孤窗无语正黄昏。

生憎花发柳含烟，东海飘篷二十年。忏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

四首诗表达的是一种矛盾的心情。他的难以诉说的身世，他的个人不幸的遭遇，加上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礼俗，使他遁入空门。但是，他又有狂热的激情，他投入革命阵营成为一名热情救国的猛士，而面临着黑暗社会，专制主义的高压，只能将自己扮演成佯狂玩世的诗僧。他英勇，却又缺乏持久的韧性，他旷达，却又处处受拘束，他出世，却又摆脱不了尘世的纠缠，他追求爱情，却以躲避爱情为归宿，这些使他痛苦不能自解的矛盾，造成了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晚清社会悲剧的缩影。

他的风景诗，诗中有画，格调明快秀丽，富有意境。

《苏曼殊文集》（上），第40页。

《苏曼殊文集》（上），第21页。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苏曼殊文集》（上），第28页。

《失题》，《苏曼殊文集》（上），第28页。

《水户观梅有寄》，《苏曼殊文集》（上），第29页。

《西京步枫子韵》，《苏曼殊文集》（上），第30页。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这是1904年冬他寄寓在杭州白云禅院的情景速写。寓意环境艰苦，革命者意志更为坚强，革命活动仍在暗暗进行。

江南花草尽愁根，惹得吴娃笑语频。独有伤心驴背客，暮烟疏雨过阊门。

这是1913年他和郑咏春、郑桐荪、沈燕保住在苏州，编写《英汉辞典》时游览苏州风光留下的诗中的一首，苏州景色触发了他怀古伤今之情。

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

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竞种田。羸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

这两首诗作于1909年，地点是在日本。从诗的色彩鲜明，音响协调，可以看出诗人的心情是愉快欢畅的，农村劳动人民耕作的情景在他笔下生趣盎然。

他的创作，除了诗歌，还有小说。他写了《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其中《断鸿零雁记》是中篇小说，其他几篇是短篇小说。小说都是用文言文写成。《断鸿零雁记》是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有人评论说：“大师撰此稿时，不过自述其历史，自悲其身世耳。乃全编结构27章，以出世佛子，叙入世情关，能于悲欢离合之中，极尽波谲云诡之致，而处处实写，字字凄恻，但觉泪痕满纸，令人读之怆然。”小说描写了主人翁三郎的爱情、苦恼和悲哀以及雪梅、静子的多情，作者着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描写，凄清哀怨。全书也露出对清朝政府的不满和讥讽，如写明末思想家朱舜水抗清，东渡日本的故事，三郎在春淙亭看到壁上《捐官竹枝词》共七首，对道员、郎中、知府、知县戏谑的挖苦讽刺。《断鸿零雁记》后来还由黄嘉谟改编成戏剧，曾在厦门大学上演，由郑江涛扮演三郎。这部小说还有英、日、德、俄文译本，流传国外。德国、英国、俄国都有专门研究苏曼殊文学作品的专家。

苏曼殊懂得英文、日文、梵文，他对欧美文学作品非常喜爱和重视，对翻译界只知道林纾、严复的状况很不满意。严复翻译哲学社会科学作品，林纾并不懂得外语，他翻译的莎氏乐府并不是莎士比亚的原作，而欧美的优秀诗歌名作还无人动手翻译。他便说：“近世学人，均以泰西文学精华，尽集林严二氏故纸堆中，嗟夫，何吾国文风不竞之甚也。”他又说：“衲尝谓拜伦足以贯灵均、太白，雪莱足以合义山、长吉；而莎士比亚、弥尔顿、田尼孙以及美之郎弗芳诸子，只可与杜甫争高下。”他亲自翻译了拜伦的《去国行》、《哀希腊》、《赞大海》等名篇，又翻译了雪莱的《冬日》等等。因

《住西湖白云禅院》，《苏曼殊文集》（上），第4页。

《吴门》，《苏曼殊文集》（上），第53页。

《过蒲田》，《苏曼殊文集》（上），第34页。

《淀江道中》，《苏曼殊文集》（上），第34页。

魏秉思：《断鸿零雁记序》，《苏曼殊全集》（四），中国书店1985年，第51页。

《致高天梅》，《苏曼殊文集》（下），第516页。

这些诗歌是用四言或五言翻译的，用词古典雅致，词句修饰清章太炎斟酌改定，我们现在读起来便显得古奥难懂。他还编辑过《文学因缘》和《潮音》两书，将欧人英译汉诗和他的汉译英诗编纂成册发行，他的意图是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他介绍拜伦和雪莱说：“拜伦和雪莱是两位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同样创造性地把崇高的恋爱作为他的表达诗意的主题。……拜伦，他是个热情真挚的自由信仰者，……他赴希腊去帮助那些为自由而奋斗的爱国志士。”

《哀希腊》16首，充满了民族革命的情绪，这也是他译此诗的深刻含义。1903年他还同陈独秀翻译了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叫《惨世界》共14回。实际上，翻译只是开了一个头，是雨果《悲惨世界》全书的很小一部分。这本小说的翻译是用的白话文，通俗易懂，而且绘声绘色，颇能传达雨果塑造冉阿让的角色的神情。可是，这部小说的翻译，从第七回后半段到第十三回前半段，是翻译者离开了原作而自己创作的内容，书中人物明白（字男德）、吴齿、范桶、明顽、满周苟，是明白人难得、无耻、饭桶、冥顽、满洲狗的谐音，地名尚海是上海的谐音。书中充满了对旧世界猛烈的批判，对新世界热烈的呼唤。如主张用“狠辣的手段，破坏了这腐败的旧世界，另造一种公道的新世界。”而且提出“取来富户的财产，当分给尽力自由之人，以及穷苦的同胞”；全国的土地，应当成为全国“人民的公产，无论何人，都可以随意占有，不准一人多占土地。”书中表现了他对清朝统治集团的刻骨憎恨。

1908年他翻译印度作家瞿沙的《娑罗海滨遁迹记》。这是一部笔记小说，根据英译本转译。故事是神话，实际上是反映英帝国主义侵占印度，将印度变成殖民地，英国侵略者虐待、屠杀印度人民，印度人民几次反抗斗争的故事。其中描写英侵略者残杀印度人的惨状：“或以麻绳束之树杪，揭铳射之，而观其避丸也。或以刀剜肠，塞以败絮，而观其手舞足蹈也。或以苏支（此云尖针）钉其两目，投向潮流，而观其浮沉上下也。”由于这样惨不忍睹的酷刑，才激起了印度人民不屈的反抗。他介绍弱小民族亡国痛史，是为了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

苏曼殊还是一位画家。他的画有的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如他1907年发表在《民报》增刊《天讨》中的几幅。《猎胡图》、《岳鄂王游池州翠微亭图》、《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图》、《陈元孝题奇石壁图》、《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一看题目便知道是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是汉民族反抗异民族的故事。

他善于画山水画，画的格调萧疏淡远，近于写意画，白描山水，写象传神，有似南宋的马远和元朝的倪瓒（云林）。如《白门秋柳图》、《汾堤吊梦图》，画面上远山近柳，西湖、汾河、寂静空旷，极凄婉之致。他也善画仕女图，如《文姬图》、《葬花图》、《卧处徘徊图》等。这些画特别讲究题款，如葬花图为陈独秀题诗：“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柳烟，携锄何所事，双燕语便便。”使画增添了生机和情趣。《卧处徘徊图》题画“‘谁知卧处徘徊，谢庭风景都非旧。画堂尘掩，蓬生三径，门垂疏柳。白昼初长，清风

《〈潮音〉自序》，《苏曼殊文集》（上），第306—307页。

《悲惨世界》，《苏曼殊文集》（下），第704、739—740页。

《苏曼殊文集》（下），第766页。

《零墨》，《苏曼殊文集》（下），第464页。

自至，流年空又。看多情燕子，飞来还去，真个不堪回首。昔日娇随阿母，学拈针，临窗挑绣。斜阳楼外，熨残铜斗，线纹舒绉。蚕欲三眠，莺还百啭，落花时候。问重来应否销魂，试听江城节奏。’右录明末女子素嘉《水龙吟》一阙。绿惨红愁，一字一泪。呜呼，西风故国，衲几握管而不能下矣！”这幅图画画的是一片茂密的竹林，背景有山石，板桥，土路，流水，一位女郎在林丛中徘徊。素嘉是沈树荣，是抗清英雄沈君晦的侄孙女，他请女弟子蔡哲夫的夫人张倾城为他题词。

他写了一些杂文，有两事值得记载。一是他编了一本《岭海幽光录》，是将明末广东遗民反清斗争的故事辑录而编成。他在序言中说：“吾粤滨海之南，亡国之际，人心尚已！苦节艰贞，发扬馨烈，雄才瑰意，智勇过人。余每于残籍见之，随即抄录。古德幽光，宁容沉晦？”内容有张家玉、陈邦彦、陈子壮抗清的故事，清兵屠杀、蹂躏广东平民、妇女的惨状，以及广东人民反清的斗争，还写了屈大钧遁迹为僧，写了许多反抗清朝的诗歌的事。鲁迅曾说：晚清“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贴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苏曼殊此集的作用便是如此。二是他写的随笔散文，曾对晚清的戏剧有一个概括的评价。他是看过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话剧的演出的，及至他看东京东柳社留日学生演出的剧目和上海贾碧云、冯春航、毛韵珂所演的戏曲之后，感到比较粗糙。他评论春柳社演的剧目，“都属幼稚，无甚可观，兼时作粗劣语句，盖多浮躁少年麝入耳。今海上梨园所排新戏，俱漫衍成篇；间有动人之处，亦断章取义而已。”他比较中西戏剧说：“欧、美剧曲，多出自诗人之手；吾国风人，则仅能为歌者一人标榜，大有甘隶妆台之意。”这就成了捧角色。他对戏剧的见识是非常卓越的。从剧目的内容看，确实反映现实生活，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意义的，确能感动观众。从审美观点来看，则剧目的结构、情节、语言都比较粗糙，没有精雕细琢，而且表演方面也缺乏演员整体的通力合作。苏曼殊从文学家的眼光和艺术的审美标准对中国戏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确实是难得的珍贵的见解。

章太炎对苏曼殊评价很高，说：“广东之士，儒有简朝亮，佛有苏元瑛，可谓厉高节，抗浮云者矣。”这一评价是指他的为人，人格高尚。郑桐荪对苏曼殊也有一段评论说：“他的行为虽是落拓，却并非不羁；意志虽极冷，而心肠却是极热。”这是指他的性格及性格的矛盾。郁达夫论他的诗说：“天才是有的，灵性是有的，浪漫的气质是很丰富的，可是缺少独创性，缺少雄伟大气”，又说：“他的诗是出于定庵的己亥杂诗，而又加上一脉清新的近代味的。所以用词很纤巧，择韵很清谐，使人读下去就能感到一种快味。”

《题〈卧处徘徊图〉》，《苏曼殊文集》（上），第354页。

《苏曼殊文集》（上），第292页。

《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第318页。

《燕影剧谈》，《苏曼殊文集》（上），第325页。

《苏曼殊文集》（上），第326页。

章炳麟：《书苏元瑛事》，《苏曼殊全集》（四），第134页。

《苏曼殊文集》（上），卷首，第51页。

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苏曼殊全集》（五），第115、116页。

这是论他的诗，评价是恰当的。

第三节 谭鑫培 王瑶卿

戏曲，这又是俗文化。戏曲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全国统计达 330 多种，具有情调各异的地方色彩，又体现总体相同的民族风格。什么叫戏曲？王国维曾在考察戏曲后下一定义，谓：“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并且说：“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这一定义讲得很精确。中国的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一定有歌唱，有舞蹈，而表演一段故事，它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单纯唱，这是唱曲，北方的京韵大鼓，南方的苏州评弹。单纯舞，这是舞蹈，祭祀用的跳神。古代有一种古剧，故事情节很简单，其中穿插有杂技、武术等项表演，这也还不能算是纯正的戏剧。中国的戏剧，总是用载歌载舞的形式表演一故事，这是民族传统。西方有戏剧，和中国的不相同。舞剧，没有唱、白。话剧，没有唱、舞。歌剧，偏重唱，不讲究表演、舞蹈。中国的戏剧则具有自己的特色。戏剧，繁体字作“戲劇”篆体字作“𡗗”，从文字的源流来看，戏剧，从戈，从刀为偏旁，是使用兵器，和战争有密切的关系。《说文》说戏：“三军之偏也。”《太平御览》谓：“戏，相弄也。”两方交战过程中，挑选一支精兵从侧面向敌人进行袭击，便是偏军，这种兵不厌诈的手段，便叫戏弄。剧字《说文》解释为：“斗，相执不解也。”以上是说战争是戏剧表演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次是生产劳动，我们祖先用木棒、石器作粗笨劳动，劳动猎狩、耕种、捕鱼等，在劳动中有时一人呼喊几个简单的音节，一群人和声，边唱边劳动，情绪协调，配合默契。有时在劳动之余，高歌舞蹈表达愉快的心清。这也是戏剧的一个来源。再次是祭祀，用乐舞。刘师培曾说：“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上古时代，人们对大自然的风雨雷电、自然灾害抱着恐惧心理，巫覡成为人和鬼神沟通信息的宗教职业者，巫便歌舞，欢娱神鬼、祈福避祸。古代乐舞者“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他们的乐舞是为了祭天地、山岳星辰、祭祀祖先，在天地祖先面前追溯赫赫战功。刘师培评述乐舞的社会功能说：“盖乐舞之制，其利实蕃，大之可以振尚武之风，小之可以为养生之助，而征引往迹，杂陈古事，则又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为劝戒人民之一助”。这也成为中国戏曲的起源。

戏曲在宋元时代为鼎盛期。宋的南戏和元人的杂剧，留下来剧目很多，金院本，元杂剧剧本不下 600 至 700 部，南戏剧目不下 240 个。元末明初，各地有各种声腔的剧种，主要有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昆山腔四大声腔。而昆山腔文学典雅、曲调繁缛，深得封建士大夫的喜爱。由于昆曲的艺术魅力，使它雄据于剧坛之上，成为盟主。昆曲流传一直到清朝。优秀的剧目有汤显祖的《牡丹亭》、李渔的《风筝误》、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

《戏曲考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7 年，第 201 页。

《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 36 页。

《原戏》，《左庵外集》，卷 13，第 2 页。

《原戏》，《左庵外集》，卷 13，第 3 页。

乾隆年间，国家承平日久，财库充裕，国势日盛。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寿辰，乾隆三十六年（1771）皇太后八十寿辰，皇帝为母后做寿，召集各省伶人来京奏演。除江苏、山西、山东籍伶人外，还有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的习艺者，都麇集都下。于是“微调、鄂调、西秦腔，诸民间传讴，所谓乱弹者，亦接踵而至，京师演戏之盛，遂甲天下”。这时宫廷演出，原为昆曲、弋阳腔。弋阳腔又称京腔、高腔。昆曲称为雅部，弋腔、秦腔等称为花部。昆曲称雅部，是因为昆曲由封建士大夫文人加工修饰，润饰，辞藻华美，曲调更繁，逐渐由俗文化上升为雅文化，而老百姓欣赏起来感到了困难。乾隆、嘉庆年间，有四大声腔，即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柳为山东、河南的柳子戏，梆为陕西、甘肃的秦腔。乾隆四十五年（1780），魏长生入京演出秦腔，以《滚楼》一剧，引起轰动。魏长生，四川金堂县人，他演旦角，唱善于传情，动人倾听，表演人物栩栩如生，塑造人物性格很鲜明形象，旦角的“跷工”便是他的创造。北京的楚、滇、粤、晋籍的演员纷纷学唱梆子，向魏长生学艺。魏还到江南演唱，扬州“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可见他的艺术魅力。清朝政府曾一度禁止秦腔戏班演出，但秦腔在民间仍较流行。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寿辰，各省都组织戏班进京汇演，高朗亭率三庆徽班进京献艺。高朗亭，安徽安庆人，原籍江苏宝应，旦角，《日下看花记》载：“三庆部掌班，二簧之耆宿也。”徽班，主要是徽调，除吹腔，高拨子，二黄外，也唱昆曲，其他如柳枝腔，罗罗腔等戏曲声腔，也兼而用之。继三庆班之后，陆续在北京又出现了四喜、和春、春台等徽班，称四大徽班。四大徽班各有擅长。三庆班擅长演大轴子戏，故曰“轴子”。老生是程长庚、卢胜奎等人。四喜班曰“曲子”，旦角多，梅巧玲、时小福，他们擅长唱昆曲，以雅声取胜。和春班曰“把子”。每日亭午，必演《三国》、《水浒》诸小说，名《中轴子》，工技击者，各出其技。春台班曰“孩子”。春台班演员年轻，“诸郎之夭夭，少好咸萃焉。”登台表演，热闹非凡。所以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的口谚。

嘉庆八年（1803）小铁笛道人在《日下看花记》自序中叙述道：“有明肇始昆腔，洋洋盈耳。而弋阳、梆子、琴、柳各腔，南北繁会，笙磬同音，歌咏升平，伶工荟萃，莫盛于京华。……迩来徽部迭兴，踵事增华，人浮于剧，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这里说明了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一是花雅竞艳，昆乱并奏的局面，另一是自徽班进京，人才辈出，“联合五方之音，合为一致”，有一种融合各种声腔的趋势。徽班进京后，用汉调、徽调合奏，形成二黄、西皮两种声腔的合奏，再加上吹腔、音拨子、南梆子、四平调以及民间曲调逐渐融合、演变、发展，而成为一个完整的声腔体系，产生一个新的剧种，便是京剧。弋阳腔属于我国江南主要的声腔，梆子腔属于我国黄河以北的主要声腔。二黄来源于弋阳腔，西皮来源于梆子腔，皮黄声腔的形成及其同台合奏，标志着中国南北两大声腔的交流、汇合，也标志着中国古老的弋腔和梆子腔的革新和发展。一般地讲，二黄适于表现苍凉深沉的情感，

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上册，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第 2 页。

李斗：《扬州画舫录》，转引自《中国京剧史》上卷，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年，第 40 页。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年，第 103 页。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第 55 页。

西皮适于表现活泼昂扬的情感，反调用于悲痛时，四平调、吹腔用于轻松愉快时，南梆子用于表达少女的柔情。京剧以皮黄为主要声腔，于是，晚清便形成了昆曲、高腔、梆子、皮黄四大声腔。因此，京剧的起源可以从 1779 年四大徽班进京算起，而京剧正式形成则是 1840—1860 年，即道光、咸丰年间。

明朝朝廷管理戏曲组织的机构叫教坊司，属礼部。那时女演员占多数。乾隆五年（1740）设立南府，为内廷宫署，执掌优伶演戏之事。每逢节令、喜庆、寿诞时，南府优伶为内廷演出昆弋两腔的承应戏。南府很大，西部有戏台，在今北京第 28 中学院内，东部有厅堂，在今北京第 6 中学院内。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寿庆，下谕选送苏州籍艺人进京，称为外学，住景山。太监学艺者称为内学。乾隆时期，内外学人数各自都在千人以上。道光七年（1827）下谕将外学取消，苏州籍艺人返回原籍，南府改为升平署，属内务府。各种演出剧团到北京后，加入梨园公会，设在精忠庙（东珠市口）。政府有官员管理精忠庙事务。朝廷有演出任务，由升平署通过精忠庙下达任务，选派艺人进宫。政府规定的政策通过精忠庙贯彻。精忠庙还对艺人的生活福利加以照顾。

宫廷演出对京剧起着积极作用。民间艺人进宫演唱，技艺有很大的提高，经过观摩宫内的昆、弋剧目，自己上演的剧本也经过整理、修改，将不雅、不通的词句改得流畅明快，使俗文化逐渐雅化。南府解散后有些老艺人不愿回原籍而滞留北京，他们将技艺传授给后人，便将宫内演出的剧目，流传到民间。他们将昆曲剧本改编为乱弹，这是雅文化俗化的过程。这样，雅文化俗化，俗文化雅化，双向流动，使京剧艺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唱腔更加优美、表演更加细腻，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拥戴。

京剧演出的场所，除宫廷应承当差以外，第二种演出形式是堂会，北京的满族贵族、官宦之家，有喜庆宴请，设堂会、聘请戏班子来演出助兴。这种演出场合达官贵人士大夫阶层居多，属上层社会，名角齐集，戏码精彩，演出特别努力，赏钱也多。第三种形式是戏楼、戏园，这是舞台演出，一般老百姓都可来欣赏。第四种形式是茶园，那里可演唱，亦可清唱，也可同时演出曲艺节目，听众更广泛一些。第五种形式是跑码头，即戏班到各大城市去轮回演出，甚至中小城镇也去。这样，京剧的群众普及全国，上至朝廷皇族，中至官僚士大夫、文人学士，下至一般平民、饭夫走卒，都有喜爱者。封建士大夫、文士常在报刊上发表评论，评论剧目、表演和角色，对京剧也起着一种督促和推动的作用。

京剧的剧目是最丰富的，据今人周明泰的统计，约有 2000 多种，最常演的亦达 300 种。宫廷院本多是昆曲、高腔，经过士大夫、文士撰写改订。如《劝善金科》（目莲救母）、《升平宝筏》（唐僧取经）是张照撰写的。《鼎峙春秋》（三国演义）、《忠义璇图》（水浒传）是由周祥钰、邹金生撰写，《昭代箫韶》（北宋杨家将故事）、《封神天榜》（封神演义）是由内府永瑄聘请文人学士撰写的。徽班进京后，有些剧本就是由宫廷院本改编翻成皮黄的。如三庆班卢胜奎曾编全部《三国志》达 40 本，是参考了内廷本《鼎峙春秋》改编的。和春班俞菊笙编的《混元盒》是由内廷本《阐道除邪》改编的。王芷章说：“现行各戏剧，其不出杂剧传奇而为出于各说部者，则概多

永瑄，庆亲王允禄之孙。

取此已编为院本者而抄袭之，化雅为俗，化繁为简，能扩大取材范围，遂愈促戏剧之进展。”四大徽班的剧目分为四类，即奸、盗、邪、淫。奸：古代人物在争夺权力上勾心斗角叫奸，如《三国演义》。盗：古代绿林好汉人物的传奇故事，如《水浒传》。邪：包括神鬼戏，如《西游记》、《封神榜》。淫：凡是男女爱情的戏。京剧剧目多半来自小说，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封神榜、说唐、杨家将、说岳、施公案、彭公案、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大红袍、粉粧楼、三言二拍的短篇小说等。还有大量民间歌曲如《小放牛》、《打樱桃》、《探亲家》、《打花鼓》等等。这些剧目有劝善惩恶、辨别忠奸的道德作用，有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有鉴赏唱腔、表演的美学审美作用。

晚清画师沈蓉圃绘过“同光十三绝”的画像。同光十三绝是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他们是：程长庚、张二奎、卢胜奎、杨月楼、谭鑫培、梅巧玲、时小福、余紫云、徐小香、朱莲芬、郝兰田、刘赶三、杨鸣玉。程长庚（1811—1879）安徽潜山人，三庆班班主，精忠庙会首。唱老生，唱腔高亢沉雄，肃穆凝重，擅长演《文昭关》、《战长沙》、《举鼎观鱼》、《镇潭州》等剧。张二奎（1814—1860）浙江人，入四喜班，唱老生。实大声宏，雍容华贵，擅长唱王帽戏，如《金水桥》、《上天台》等。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称为“老生三杰”。卢胜奎（1822—1898）安徽人，他演老生，善于编剧，擅长演《盗宗卷》、《问樵闹府》和《三国志》连台本戏。杨月楼（1844—1890）安徽潜山人，文武老生，能演《恶虎村》、《长坂坡》等武戏，又会演猴戏，也能演老生戏《牧羊圈》、《打金枝》、《探母》等。谭鑫培，湖北人，演武生和老生。梅巧玲（1842—1882）江苏泰州人，演旦角，掌四喜班，能演昆曲《游园惊梦》、《小宴》，擅长演《雁门关》、《探母》中的萧太后，雍容大方，做派一时无双，还能演《盘丝洞》花旦戏。次子竹芬之子梅兰芳，为后来著名的旦角，居四大名旦之首。时小福（1846—1900）安徽人，工青衣，常唱《汾河湾》、《宇宙锋》、《彩楼配》等戏，也会演昆曲《挑帘裁衣》、《小宴》等剧。余紫云（1855—1899），湖北罗田人，入四喜部，青衣兼花旦，能演《出塞》、《祭江》等剧，《二本虹霓关》中饰丫头，托盘疾走圆场，姿态横生，北京的旦角都来观摩其台步和做功。他是余三胜之子，其子余叔岩，师事谭鑫培，后成余派著名老生。徐小香（1831—1882）苏州人，昆曲小生，兼演京剧，昆乱兼学，文武不挡，唱小生，演《群英会》的周瑜，称誉一时，还能演《罗成叫关》、《监酒令》等剧。朱莲芬，苏州人，昆曲花旦，能演《奇双会》、《活捉三郎》、《金山寺》、《思凡》等剧。郝兰田，演老旦，安徽人，擅长《吊金龟》、《徐母骂曹》、《目莲救母》等剧。刘赶三（1817—1894）天津人，演丑角，常演《群英会》的蒋干，《审头刺汤》的汤勤，演《探亲家》，率真驴上台，以是享名。杨鸣玉（1815—？）苏州人，昆曲丑角，入四喜班，善演《时迁盗甲》、《访鼠》、《荡湖船》、《活捉三郎》等剧。

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同光十三绝。按籍贯统计，安徽：5人，江苏：4人，湖北：2人，直隶：1人，浙江：1人。南方人占了绝大多数。从演员精通的专业看，大部分都是昆乱不挡，对昆曲精通，徐小香、朱莲芬、杨鸣玉原来便是昆曲小生、花旦、小丑，可见昆曲影响之大。如果说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是第一代老生演员，余紫云、梅巧玲、时小福为第一代旦角演员，那

么，第二代老生演员的代表是谭鑫培，旦角演员的代表是王瑶卿。

谭鑫培（1847—1917）原名金福，号英秀，湖北江夏（今武昌）人。父谭志道，演老旦，调门高而尖，类似一种鸟叫，湖北俗称“叫天子”，于是得一叫天儿的绰号，谭鑫培艺名“小叫天”，因此而起。自幼随父学艺，习武生和老生。1863年随父入三庆班演出，拜程长庚、余三胜为师。后跑乡班，在乡镇演出武生戏，也兼演老生，生活清苦，坚持练习武功，据记载，他“善武技，而多内功，悟空之棒，传之少林。石郎之刀，故老云实授于米祝家之祝翁者。能一箭步至檐端，飞行无滞。”可见他武功根底之深厚。1870年再回北京，入三庆班，得到程长庚的赏识，常为之配戏，仔细揣摩其唱腔，动作。又经常与俞菊笙、杨月楼同台演出，俞、杨为张二奎弟子，从中也得到不少教益。余三胜是湖北罗田人，谭鑫培师事程长庚，唱腔实宗余三胜派，多用湖广韵。当时老生三杰，程长庚是徽调，余三胜是汉调，张二奎是京调。谭鑫培在学老生剧目兼采众长，不具一格。如《镇潭州》、《状元谱》便学程长庚，而《碰碑》、《桑园寄子》、《打棍出箱》则宗法余三胜，《探母》的唱腔则宗张二奎。由于他武功好，便擅长演靠把戏，如《战长沙》、《定军山》、《阳平关》等，做功戏如《琼林宴》、《盗宗卷》、《王佐断臂》等，也很精彩。他到上海演出，效果很好。1880年程长庚去世，谭鑫培从专唱武生转而文武兼唱。1881年有一次堂会演出，戏提调排节目，让俞菊笙和谭鑫培两人同日演《挑滑车》一剧。据记载说：“菊笙下晚登场，演至挑车时，再接再厉，真有气吞丑虏，奋不顾身之概。夜间鑫培又以此剧登场，于登台守大纛旗时，指画战状，惊讶愤怒情形，一一毕露，真画工所不能到，观者无不拍掌，无一人嫌此剧之复演者。”因为俞菊笙以开打勇猛著称，谭鑫培则不在开打上争胜，而在“闹帐”，“观阵”等戏中，发挥己长，运用眼神、身段、道白和表情把高宠的大将性格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赢得观众赞赏。

他在唱腔上有不少新的创造。过去京剧老生唱腔讲究高亢沉雄，竹枝词中描述为：“时尚黄腔喊似雷”。“喊”，说明行腔缺少演唱技巧；“雷”，说明高响平直但不动听，缺乏韵味。程长庚一辈演员，唱时是用笛子随腔，所以比较庄重，谭鑫培一辈演员，使用胡琴伴奏，腔便可以比较繁复、曲折、华丽了。与谭鑫培同时代的有汪桂芬、孙菊仙，称“老生后三杰”，汪、孙都是洪亮的高嗓，但比较平直，缺乏韵味。谭鑫培的嗓子还不如汪、孙，但他讲究韵味醇厚，使调委婉细致，曲折悠扬，创造了不少花腔和巧腔，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他又吸取昆曲、汉调、梆子的老生唱法以及京剧青衣、老旦、花腔的唱腔，甚至京韵大鼓、单弦曲艺调中的某些特长，融进老生腔中，使唱腔优美而富于表现力。他的唱根据不同的角色表达不同的感情，以声带情。如《卖马》则抑郁伤感，《洪羊洞》则凄凉悲切，《战太平》则慷慨激昂。他对一些剧目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和创造。如《探母》的坐宫西皮慢板一段，老唱本有10个“我好比”，5个“只杀得”，4个“思老娘”，共30句，谭鑫培唱时，删成18句，只剩得4个“我好比”，3个“只杀得”，两个“思老娘”，原意并不缺失，全词紧凑，意义也较精辟了。又如《空城计》，老

鸣晦庐主人：《闻歌述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第1124页。

吴焘：《梨园旧话》，《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第818页。

张次溪辑：《北平梨园竹枝词荟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第1174页。

的演法在“观图”一场有大段西皮三眼，使整个戏松弛、拖沓，谭鑫培演出则将这段唱词取消，将大段唱集中到城楼上，这样“三报”，节奏紧张，使戏剧冲突激化，而诸葛亮在城楼的大段演唱，又恰当地刻画出人物的大智大勇性格。他还创造了快三眼，反西皮的二六和摇板。快三眼用于《洪羊洞》、反西皮二六用于《连营寨》哭奠一场，反西皮摇板用于《南天门》曹福冻死一场。有些剧目如《卖马》本是店主为主角，经他演唱，老生秦琼成了主角。秦琼所唱：“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的唱段，风靡一时。还有一出《搜孤救孤》，原来公孙杵臼是主角，经他演唱，老生程婴成为主角。另有一《珠帘寨》的李克用，本是武净扮演的，经谭鑫培演唱，成了老生戏，也成了他的拿手看家戏。

1890年，他被选入升平署为民籍教习，充当内廷供奉，先后选为供奉的还有孙菊仙、汪桂芬、杨月楼、王楞仙、陈德霖、余玉琴、王瑶卿等，谭鑫培的演唱技术精湛，深受慈禧的赏识，赐四品服。1900年后，谭鑫培在首都舞台独享盛名，有“有书皆作埒，无腔不学谭”的口谚。狄楚青（葆贤）曾作一诗云：“太平歌舞寻常事，几处风飏几色旗，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这首诗意在讽刺清王朝，而从另一面也可看出谭鑫培影响之大。后来人们称谭为“伶界大王”，梁启超作诗题为：“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州记轰如雷。”说明了他的声望益隆。

1917年4月，北京军阀政客为了欢宴桂系军阀陆荣廷，硬要谭鑫培参加堂会演出，谭只好带病登台，演完戏后，病情加重，5月含恨而歿。

谭鑫培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京剧艺术大师，他把京剧老生艺术提高到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他的儿子谭小培，孙子谭富英都继承了谭派，其他继起的余派（叔岩）、言派（菊朋）、马派（连良、等都继承了谭鑫培的衣钵而又各自成一派。

王瑶卿（1881—1954）原名瑞臻，字稚庭，号菊痴，江苏清江人，生长于北京。父亲家琳，又名彩琳，艺名绚云，昆曲名旦，曾和徐小香共同演出过《卖油郎独占花魁》一剧，颇负盛名。母亲郝氏，就是同光十三绝的著名老旦郝兰田的女儿。瑶卿弟凤卿，他俩从小随父学过昆曲。10岁，丧父。11岁在三庆班大下处从崇富贵学武功。12岁拜谢双寿为师学青衣，谢双寿是余紫云的师父，以善教戏著名，在谢师门下学了《祭江》、《三娘教子》、《彩楼配》、《祭塔》、《金水桥》等戏。又从杜蝶云学刀马旦，学了《扈家庄》、《穆柯寨》、《杀四门》、《珍珠烈火旗》等戏。他还曾向钱金福（著名的净二花）学过靶子戏，并且请他将其学过的武旦戏整理、加工。那时，演旦角限制极严格，青衣不能演花旦，武旦、刀马旦也不能相混。当时的青衣讲究唱工，而身段、表情动作就很不讲究，老是双手捧着肚子，举止很是拘谨。王瑶卿广拜名师，多方学艺，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深厚的功底和良好的基础。

他先搭三庆班，又入小鸿奎班演了一年。该班班主是陈丹仙。一次演出《五花洞》，由陈丹仙的儿子陈七十演真潘金莲，王瑶卿演假潘金莲，是配角。上演时，王瑶卿打扇子动作，节奏较快，动作优美，随即媚然一笑，嗓音圆润甜美，得到观众的喝采，假潘金莲成为主角。又一次名演员李紫珊（万

罗瘦公：《鞠部丛谭》，《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第793页。

《谭伶自绣像作渔翁乞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5（下），第77页。

盏灯)演头两本《虹霓关》，李演东方氏，王扮演丫头。王瑶卿请李紫珊说身段、动作，谢双寿教唱腔、念白，上演成绩很好。1896年，他搭福寿班，和许荫棠、陈德霖、黄润甫、贾洪林等名家合作，不久嗓子倒仓，一年多未登台。后一度入四喜班，仍唱青衣。1902年，重组福寿班，他和许荫棠合演《牧羊卷》、《二进宫》、《打金枝》、《探母回令》，以及8本《雁门关》、8本《儿女英雄传》、8本《混元盒》等戏。1900年，时小福去世，1904年王瑶卿进宫承差，成为“内庭供奉”，便经常和谭鑫培、田际云、余玉琴等前辈名演员合作演出，技艺大有进步。时小福的《汾河湾》是拿手好戏，他死后，无人敢唱，一次慈禧传下话来，要听这出戏。王瑶卿曾多次仔细看过时小福的表演，他便应承演出，而且将没有水袖的蓝布褶子改为有水袖的蓝绸褶子，出窑进窑，利用水袖，设计了新的身段和动作，演出后，慈禧言：“唱的不错。”

1905年王瑶卿和谭鑫培合作搭同庆班演出，谭鑫培在宫中和王瑶卿演出，王配戏，得到谭鑫培的赏识。当时有人记载：“瑶卿方在英年，力攻所习，亟欲追步云（紫云）、福（小时），而衣履便妍，天然爱好，后台中人颇重视之。故每排剧令与谭偕，如《探母》、《武家坡》、《汾河湾》、《寄子》、《搜孤》、《硃砂痣》等剧，皆与谭配。而《庆顶珠》、《宝莲灯》二出，尤为绝唱。”他们两人都是表演艺术家，都锐意改革，在演唱中琢磨人物性格，在唱腔、动作方面立意求新，王瑶卿与谭鑫培配戏，不敢有一丝松懈，因此演出时艺术上各展其长，彼此竞美，深得群众的赞赏。

他在演技方面的贡献，是将青衣、花旦、刀马旦的界限打通，又吸取了昆旦之长，对唱、打、做、念都进行了新的创造，创造出了“花衫”这一行当。这一创造是上承梅巧玲、余紫云的衣钵，下启梅兰芳、程砚秋的端倪，徐凌霄称之为“非青衣、非花旦，卓然自成一宗。”

他的唱功明丽刚健，遒劲爽脆，并善创新腔，尤以西皮见长。他的做功，善于运用水袖和步法表达人物的内心活动，《长坂坡》“跑箭”的圆场，《武家坡》“跑坡”的下场，及《福寿镜》“惊疯”的舞袖等，都有独到之处。

《长坂坡》他饰糜夫人，投井一场，赵云抢抓外帔，王在一瞬间解钮、脱袖、甩线子，然后纵身入井，其身段之美妙迅速，推为绝活。他演旗装戏，能描摹宫廷贵妇的声容仪态，细致入微。他的念白，不论是韵白，还是京白，说得自然而生动，富有生活气息。他还把十三妹的角色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造。原来演十三妹的是余玉琴，又叫余庄儿，演出时踩跷，上栏杆，用一脚勾住栏杆，转身攀弓打弹，武功之神，一时无两。而王瑶卿演十三妹改为用大脚片穿小快蛮靴登场，身穿大红战裙战袄，扎腰巾，戴风帽，背弓刀，挎弹囊，专以念白爽脆，做工细腻见长，创造出一个又英武而又妩媚的十三妹形象。直到现在，京剧《悦来店》、《能仁寺》、《弓砚缘》等剧，演十三妹都按照王瑶卿的路子。

王瑶卿40岁以后嗓子“塌中”，便决心息影舞台，专门收徒教戏。他才高艺博，又富于创造精神，加上他能发现学生的优点，因材施教，精心培养，现代京剧的著名旦角，大都出其门下，戏剧界称之为“通天教主”。他为梅兰芳说《玉堂春》、《虹霓关》、《长坂坡》，为程砚秋说《六月雪》，为

鸣晦庐主人：《闻歌述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篇，第1130页。

《京师老伶工近况》，转引自《中国京剧史》上卷，第495页。

荀慧生说《十三妹》，为尚小云说《福寿镜》。后来的王玉蓉、华慧麟、程玉菁都是他的徒弟。解放以后，谢锐青、刘秀荣也都是他的得意弟子。中国京剧院排演马彦祥改编的《柳荫记》的剧本，还有田汉改编的《白蛇传》剧本，其唱腔都是经过王瑶卿精心创造设计的。

王瑶卿是晚清一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和有卓越成就的戏曲教育家，他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经验，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有锐意进取的革新精神和大胆创造的坚韧勇气，在京剧旦角行当的表演艺术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从唱腔的琢磨、设计、改编，念白的表达人物性格，身段、舞蹈动作符合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及服装、头饰的改进，使视听效果更加符合人物个性，有助于剧情的发展，也使他塑造的妇女形象焕然一新，光照夺人，富有神采。他创造了“花衫”的行当，突破了青衣的陈规陋矩，推动了京剧旦行表演艺术的发展，以后京剧的鼎盛时期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名旦都继承了他的衣钵，不断革新创造，各自成为一派，在红氍毹上呈现出百花竞放的兴盛局面。

京剧在晚清的形成和发展，除了上述京剧演员一代一代的努力革新创造外，还有一些因素：一是京剧是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京剧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包容性，它吸取了昆曲、梆子以及其他地方剧种的优点，吸取唱腔、武打、剧目，使它们融入京剧中，使演出更为丰富和完满。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使京剧规范化，使昆曲、梆子、汉调、徽调、甚至于民间歌曲小唱，揉到京剧中以后，逐步提高。如唱腔韵白中注意“十三辙”，将地方语音（安徽的口音、湖北的口音）逐渐改变为京音，形成一种介乎湖广音和北京音之间的一种舞台语言音韵。又如将地方剧目逐渐提高，改编成为京剧剧目，加上演员精湛的表演，使这些剧目成为京剧规范化的作品。京剧面对着雅乐昆曲、俗乐梆子、汉调、徽调的挑战，加之京剧四大徽班之间又互相竞争，互相比赛，到各大城市乃至乡、镇又遇到和当地各种地方剧种的竞争，可以说，京剧是在竞争中站稳脚根，逐步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各剧种之长处，又卓然自成一家，在竞争中影响波及全国，堪称“国剧”。

二是京剧的演员有科班加以培养。科班是培养戏曲人才的学校，科班是学校，又是演出单位和团体。科班的学生学成后便登台实践，一辈一辈地传衍下去。晚清科班很多，最有名的是喜连成班。后又叫富连成班，班主叶春善，创办于1904年，一科一科按喜、富、连、盛、世，排下来，后又有元、韵、庆三科，前五科有700多人，后三科有200多人，每科都出了著名的演员，如侯喜瑞、雷喜福、马连良、于连泉、谭富英、马富禄、裘盛戎、高盛麟、李盛藻、毛世来、李世芳、谭元寿、黄元庆等。旧的科班教学极为严格，学员经常挨打，叫“打戏”。当然体罚是不足取的，但也说明训练之严格。所以我们现在说那些受过正规训练出身的叫科班出身，意即是内行。有些是业余爱好的票友，也有票友成为专业演员，叫“下海”，也有票友成了名角的。

三是编剧和评论。京剧剧目多，要经过一番改编，整理成为舞台演出本，要发掘传统剧目，要将宫廷本昆曲、高腔翻成皮黄，有的则要编新剧本，这样便出现了一批编剧家。如罗瘿公、金仲荪、齐如山、陈墨香、吴幻荪、翁偶虹等人。罗瘿公，号揆东，广东顺德人，是万木草堂康有为的弟子，在北京任邮传部郎中，是著名岭南派诗人。闲时看戏，爱好戏剧，能提携、培养演员。他为程砚秋编写过《红拂传》、《鸳鸯冢》、《青霜剑》等剧本。还

有一批琴师，如孙佐臣、梅雨田、陈彦衡、徐兰沅等，他们深通音律，由他们来设计唱腔，曲调新颖，旋律优美，使剧目增添音乐色彩。剧评也是推动戏剧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陈彦衡说：“演剧者程度，往往视观剧者目光为转移，所关亦至重也。……故观客对于演剧家贵有监督纠正之责，而非徒事赞扬称颂之能。梨园老角能享大名，得力于观客之荅磨，正自不少也。”这种剧评无异对演员水平的提高起着积极的作用。

京剧的传播靠“跑码头”，以北京为轴心，辐射到各地。奉天、天津、曲阜、济南、开封，一直到上海、杭嘉湖地区，这里说的是大中城市，小城市和偏僻县、镇，甚至乡村草台班也有京剧演唱的踪迹。京剧在全国各地播种、开花、结果。以上海为例，上海是一大商业城市，又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南北人士的聚集地，有繁荣的商业经济活动，随之而来的便有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有迅速敏捷的新闻传播媒介，有比较先进的娱乐设备，为京剧的演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上海自同治五年（1866）就有“满庭芳”戏园，丹桂茶园，后来又建起金桂轩、天仙、大观等戏园，这些戏园上演的剧目一般是梆子、徽调、皮黄同台演出，京剧同梆子、徽戏互相竞争，互相吸取长处。京剧演员带来许多传统节目，也排新戏，有连台本戏和彩灯戏如《五彩舆》、《斗牛宫》、《洛阳桥》、《大香山》等。《五彩舆》是十本连台新剧，是写明朝清官海瑞的故事。演出轰动一时，有竹枝词赞道：“一有京班百不如，昆徽杂剧概删除，门前招贴人争看，十本新排《五彩舆》。”大型彩灯戏是以神话故事为题材内容的如《斗牛宫》、《洛阳桥》和《大香山》等，剧中还穿插着表演杂技、武术、弹唱、逗乐的一些小节目，以引起观众的喜爱。

京剧在上海演出要适应当地观众的社会心理，适应南方的民情风俗，于是，逐渐形成了南派的风格，或者说“海派”的特征。京派的特征是舞台动作举止端庄，气度安详，沉重雅致，忌佻俗火爆；表演精炼集中，忌繁琐拖沓；蕴藉含蓄，忌浮薄浅露。而南派的特征是舞台动作强烈、夸张的风格，比较火爆。如武戏讲究翻跌之冲，起打之猛，做非常复杂的惊险动作，难度极大。这和北派干净稳练的风格迥然不同。在唱工上求灵活、流畅，有人形容沪人听曲，喜高嗓而不辨神韵，喜激昂而不乐镇静，明音律、能拍板眼者实不多见。在剧目上，喜欢新排剧本，花样翻新，内容有情节性和趣味性，一些传统老剧目冗长的唱段，沉闷的情节是不能叫座的，这样连台本戏，以及根据实事编排的时装戏成为最受欢迎的剧目。再有便是舞台布景装置的革新，务使舞台上光怪陆离、灯彩缤纷，以娱乐观众。以上这些特点是和上海群众的审美情趣分不开的，他们不满足于闭目凝神地听戏，而要求既动听，又耐看，要声光、舞蹈、歌唱、故事融为一体，获得视听感官上的满足。这样，促使京剧从表演、唱腔、服装、舞台布置一系列的革新，使京剧面貌焕然一新了。

上海有一批京剧演员，他们并不是上海人，有的是北方人，由于长期在上海演出，成为“海派”。如李春来、王鸿寿、汪笑侬、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冯子和、毛韵珂等等。李春来（1855—1924），直隶新城人。原是梆子演员，和俞菊笙、黄月山同时，称为武生三派。他是南派武生创始人。

《旧剧丛谈》，《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第854—853页。

《中国京剧史》上卷，第256页。

他武功精纯，腰腿矫健，动作敏捷，筋斗又猛又冲，开打势如疾风，火炽漂亮，善演短打戏，如《白水滩》、《花蝴蝶》、《狮子楼》、《四杰村》、《伐子都》、《界牌关》，都是擅长剧目。他演《花蝴蝶》能从三张桌子上翻下，空中抽拔背后之刀，而且能着厚底靴表演翻栏杆绝技。后来南派武生盖叫天等大都宗李。王鸿寿（1850—1925）艺名三麻子，安徽怀宁人，徽班出身，入太平军的戏班同春班，一面演戏，一面兼任教师，所以，能排演《铁公鸡》火烧向荣的戏，他在演戏中还遗留太平军生活中的口语，如“讲道理”等词语。他从江西巡抚德馨处看到藏有关羽的66张画像，朝夕揣摩，便创造并丰富了关羽的舞台形象，以演红生戏著称，如《战长沙》、《华容道》、《单刀会》、《白马坡》、《水淹七军》等。他又擅长演《徐策跑城》、《扫松下书》、《斩经堂》等戏，这些戏保留了徽戏高拔子的唱腔和做派。他的传人有赵如泉、林树森、夏月润等人，周信芳早期也受过他的教益。汪笑侬（1858—1918）原名德克金，满族人，生于北京。他自幼酷爱京剧，曾是票友，得过孙菊仙的指点，曾任河南太康县知县，因得罪当地巨绅，被革职。弃官后，遂“下海”，汪桂芬闻之曰：谈何容易！他便取名“汪笑侬”以自勉。他吸取了孙、汪、谭的唱腔特点，融会一炉，自成一家，唱时苍老遒劲，慷慨悲郁，而且善编新戏，如《党人碑》、《博浪锥》、《哭祖庙》、《马前泼水》、《骂王朗》、《大骂毛延寿》、《张松献地图》。这些剧目都是讽刺现实的佳作。

夏月珊、夏月润是兄弟，安徽怀宁人。夏月珊（1868—1924）习文武老生。夏月润（1878—1931）习武生，兼演红生，是谭鑫培的女婿。夏月珊老生戏擅长唱《独木关》、《定军山》、《清风亭》、《济公活佛》等，夏月润武生戏擅长唱《冀州城》、《花蝴蝶》、《恶虎村》等，红生戏能演《过五关》、《走麦城》。武生宗李春来，红生宗王鸿寿，而且在武戏方面还受过岳父谭鑫培的传授和指点，《挑滑车》、《长坂坡》、《连营寨》等戏也很拿手，武功根底很深厚，风格勇猛。1904年夏月珊编排时装京剧《黑籍冤魂》，写一个富翁的儿子，抽鸦片，弄得娇妻和儿子死亡，亲生女儿沦落妓院当妓女，财产化尽，自己拉黄包车当乞丐，最后悲惨而死。此剧夏月珊扮演主角，从英俊少年到蓬头垢面的烟鬼，剧中戏词掺杂了不少上海方言。全剧规劝世人千万不要抽鸦片，效果良好。这本剧原是京剧时装戏，后来文明新剧也演，还拍成了电影，说明改良京剧剧本和话剧剧本以及电影剧本都有相近的地方。

1908年夏月珊、夏月润和潘月樵合资在上海南市十六铺建筑了一个新型的大剧场，叫新舞台。这一戏馆是夏月珊亲自到日本去，通过日本著名歌舞伎演员市川左团次的介绍，约请日本布景师和木匠同回上海，设计布置新式舞台布景。戏院仿日本剧院建筑，有两层楼，有地下室，建一大转盘，舞台可以转动。舞台形式是镜框式的月牙形。上海从茶园式的带柱方台演变到半月形的舞台，便是从新舞台开始的。夏月珊聘请了张聿光为舞台美术师，请他为舞台设计并制作软片布景，能根据剧情需要画出公堂、厅堂、庙宇、园林有形象有色彩的软片布景，演出时很受群众欢迎。舞台还有灯光设备，演出时特别豁亮，使演员在台上演出艺术效果发挥得很好。

新舞台建立后，夏月珊组班演了时装京剧、改良京剧，剧目据统计约50种以上。有《新茶花》、《潘烈士投海》、《拿破仑趣史》、《越南亡国惨》、《玫瑰花》、《黑奴吁天录》、《血泪碑》、《恨海》，演员有潘月樵、毛

韵珂、冯子和等。

综上所述，我们从上海京剧演员的状况可以看出几个特点：一、他们有些演员原是梆子演员，如李春来、毛韵珂、潘月樵，在演出中逐步转为演京剧，有些演员原来是徽剧演员如王鸿寿，他转为京剧演员后还保留了徽调剧目，在京剧演唱中加以改编和提高，这也与上海京剧、徽戏、梆子戏三种剧种同台演出的历史背景有关。二、他们敢于开风气之先，上演一大批时装京剧，这是由于社会风气、时代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上海先进知识分子创办了《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呼唤戏剧改良，要求戏剧能起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的作用。他们写了《金谷香》、《拿破仑》等剧本，《金谷香》是写志士万福华在金谷香西菜馆枪击卖国贼广西巡抚王之春的事迹，《拿破仑》是写法国拿破仑的故事，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还有是王钟声、曾孝谷、任天知、刘艺舟、欧阳予倩，他们从事文明新剧运动，从日本将新剧带到上海在剧场演出，也使京剧界受到影响。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建造仿日式的彩型大剧场，也使京剧演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剧场也以演改良京剧为号召。总之，西方文化扣京剧的大门，使京剧更富于时代色彩。三、他们在表演风格上比较灵活、多样，敢于吸收西方戏剧中的优点杂糅到京剧中，在时装戏中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这一社会风气也感染了北方的京剧演员。孙菊仙在上海也演过《潘烈士投海》。梅兰芳民国初年首次到上海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他接触到夏月珊、夏月润的新舞台，看过他们演出的节目，还结识了欧阳予倩等人，便准备将京剧表演讽世警俗的新戏搬上舞台。他回到北京，陆续排演了《孽海波澜》、《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童女斩蛇》等时装京剧。这也是他观摩上海新剧在北京产生的巨大影响。年轻的周信芳（艺名麒麟童），他在民国初年，也演新编京剧，《宋教仁》、《王莽篡位》，都是鞭挞袁世凯卖国称帝罪行的剧目，和刘艺舟在武汉上演的《皇帝梦》遥遥相应。五四时期，他又演《学拳打金刚》，抨击卖国贼曹汝霖等。麒派后来成为海派老生的重要派别，享誉大江南北，影响波及全国。

京剧在其形成期，从南方到北方，从民间到宫廷，进行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地方各种剧种的互相渗透，雅俗文化的杂糅。在各剧种的竞争中，京剧在首都站稳了脚跟，形成京剧新的剧种，这就完成了第一次文化大循环。接着，京剧在其发展期，又从北方到南方，从首都到各大城市，又经过南北文化的交流，中西文化的渗透、雅俗文化的杂糅，京剧改进了剧场，有了灯光转台装置，有了舞台美术布景，有了讲究的服饰和细腻的化妆，这一切物质条件的改善使京剧表演增添了光彩，提供了广阔的发挥才气的天地。时代政治的浪潮冲击着京剧，京剧上演时装京剧和西洋剧目，京剧的内容从帝王将相、神仙鬼怪、才子佳人跳跃到反帝、反封建、反对暴君、歌颂民族英雄、革命志士。这样，京剧完成了第二次文化大循环。就在这种文化的流动和良性循环中，京剧以它贴近群众，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反映悠久的传统文化，满足群众审美情趣，而有着无限的生命力，在一代又一代演员的演出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艺术，流派纷呈，百花竞放，争奇斗艳，形成了一个鼎盛的局面。民国以后，京剧更进入一个繁荣的黄金时代。

第四节 李叔同 欧阳予倩

如果说，京剧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剧种，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中，那么，话剧是受欧风美雨的影响的产物，受着西方文化的熏陶。它的创始时期可从1907年算起，延伸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近代话剧的起源，最早应是上海。上海外国人兴建的剧院里曾上演过西方的剧目，先用英语或法语演的。另一是学校。1899年上海的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曾演过话剧。一些中学的恳亲会、校庆会上，也曾演出过一些短剧。再次，便是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1907年他们曾组织一个社团，叫春柳社。主持人是李息霜、曾孝谷，社务分美术、文学、音乐、戏剧四部，戏剧方面有三次演出。一次是年初演《茶花女》，李息霜演茶花女、曾孝谷演亚猛的父亲、唐肯演亚猛、孙宗文演配唐。日本戏剧家松居松翁看了演出，对李息霜的演技大加赞赏。6月，又演出《黑奴吁天录》，这个剧分五幕，演员较多。庄云石饰汤姆，曾孝谷饰意里赛，谢抗白饰哲而治，李息霜饰爱密柳，欧阳予倩饰小乔治和女黑奴丑。这是中国话剧第一个创作的剧本（《茶花女》初演时只演了第三幕，并不完整）。冬天，又演出了两个独幕剧，其中一个名《生相怜》，由李息霜饰一西洋少女，曾孝谷饰他的父亲。另一个独幕剧叫《画家与其妹》，由李涛痕饰画家，欧阳予倩饰其妹。1908年冬春柳社以申酉会的名义演了短幕剧，其中一个叫《鸣不平》，欧阳予倩扮一西洋妇人，演出比较成功。1909年初夏，申酉会上演《热血》，这是法国浪漫派作家萨都的作品，日本田口菊町译为日本新派戏剧本。申酉会上演时加以改动，将五幕剧改成四幕剧。欧阳予倩、曾孝谷、吴我尊、谢抗白四人主演。这个话剧上演后反映强烈，中国留学生给予很高的评价，黄兴等同盟会员认为此剧对革命青年是一很大的鼓舞。

下面我们介绍李叔同和欧阳予倩。

李叔同（1880—1942），天津人，原籍浙江平湖。父亲李小楼，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进士，喜王阳明心学，又信佛教禅宗。叔同幼年时喜读《史记》、《汉书》和《左传》，又学过词、篆学和刻石。年仅4岁，父亲去世，由20多岁的母亲抚养他。他对维新运动很热心，刻有“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图章。六君子惨遭杀害，他和母亲便到上海，与许幻园相酬唱，许辟其城南草堂一部分以供他母子居住，他作画、写诗、篆刻印章，21岁便印行《李庐印谱》、《李庐诗录》。1902年入南洋公学读书，是蔡元培的得意门生。1905年他去日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又进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他从黑田清辉学琴，从藤泽浅二郎学戏剧，他爱好京剧，曾扮过黄天霸。1907年组织春柳社，演《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生相怜》等剧，艺名李息霜。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主编《太平洋报》的文艺副刊和画报，首次刊出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又将苏曼殊画的“汾堤吊梦图”铸板发表于画报上。1913年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美术、音乐。此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后又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美术教师。他加入南社很早，南社社友的通讯录，由他设计并题签。1917年马一浮介绍彭逊之住杭州虎跑寺，李叔同也在那儿习静，彭忽然出家了，他大受感动，取法号“弘一”，拜悟老和尚为师，皈依佛教。1918年他剃发为僧。此前，他的妻子，儿子，日本侍妾前来劝阻未成。他皈依律宗，研究南山戒疏，云水行脚，迄无定居，到处讲经。经亨颐、刘质平、夏丐尊、穆藕初、朱稣典募款，为他在浙江上虞白马湖觅地数亩，结庐三间，为他栖息净修之所，称“晚晴山房”。他著了不少佛学著作，如《四分律解相表记》、《南山大师撰集时代略谱附修学遗事》、《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等。有人称他为重建南山律祖第十一代祖

师。他和其弟子丰子恺合画佛学书画《护生画集》。1939年他六十大寿，弟子李芳远驰书柳亚子索诗，柳亚子1940年写《旧友李息霜六秩寿诗》：“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救国心无歧。闭关谢世事，我意嫌消极。愿提铁禅杖，打杀卖国贼。”李叔同报以一偈：“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这一偈语，打破了他平素冲淡恬静的状态，义正辞严，正气凛然地表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1942年9月4日，他园寂于福建泉州。他是我国近代戏剧、话剧的创始人，他的音乐、美术、书法、佛学哲理研究都有影响。

欧阳予倩（1889—1962）原名立袁，号南杰，湖南浏阳人，祖父欧阳中鹄，号董，是清末的大儒，谭嗣同的老师，对谭嗣同的思想形成有极大影响。父亲欧阳自耘，号笠耕。欧阳予倩出身宦宦之家，书香门弟，启蒙老师是唐才常。1901年随祖父去北京看过京剧。1902年回湖南，冬赴日本入成城中学。1905年因日本承清政府之意取缔留学生而回国。1906年与刘韵秋结婚。1907年再度赴日本，入明治大学商科学习。春节期间，看李叔同演出《茶花女》，使之感动，惊奇地说：“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春，加入春柳社。6月演出《黑奴吁天录》，受到中国留学生和日本文艺界的好评。冬又上演两个独幕剧，在《画家与其妹》中扮演角色。1908年入早稻田大学文科学习。1909年在日本东京演出《热血》。在此期间，吴我尊教欧阳予倩京剧，唱青衣，演《桑园会》，欧阳饰罗敷，我尊饰秋胡。1910年回国，1912年原春柳社成员陆镜若在上海组织新剧同志会，演出《家庭恩怨记》，欧阳饰小桃红；《社会钟》，欧阳饰左巧官；《猛回头》，欧阳饰妹妹。并赴苏州、无锡、杭州演出。1913年到湖南演出《家庭恩怨记》；还排演他编的《运动力》，讽刺当时官场丑事。他组织文社，演出：《热血》、《不如归》、《社会钟》等，还编了第一个红楼话剧：《鸳鸯剑》，在剧中饰尤三姐。后来他在上海，演自编京剧：《宝蟾送酒》、《黛玉葬花》、《卧薪尝胆》、《晴雯补裘》等，也唱京剧老戏《玉堂春》、《宇宙锋》、《乌龙院》、《碑亭》等。曾向小喜禄、陈祥云、江梦花、林绍琴、吴彩霞、贾璧云学过京剧，曾和周信芳、冯春航、吴彩霞同台演出过京戏。1919年张謇在南通创办南通伶工学社，从事京剧改革教育，聘请欧阳予倩当校长。南通建立更俗剧场，革除陋习，演出新戏。梅兰芳、余叔岩、王凤卿、杨小楼、郝寿臣、罗小宝、王惠芳、程砚秋都陆续到更俗剧场演出，欧阳予倩编五幕悲剧《玉润珠园》，反映农民悲苦生活的三幕剧《长夜》以及《哀鸿泪》、《和平的血》等戏演出。张謇在更俗剧场前台辟一小厅名“梅欧阁”，并写了一副对联：“南派北派汇通处，宛陵庐陵古今人。”北派指梅兰芳，南派指欧阳予倩，对联意思是古有梅圣俞，今有梅兰芳；古有欧阳修，今有欧阳予倩。宛陵是北宋诗人梅圣俞，庐陵是和梅圣俞同时代的欧阳修。

20年代以后，他结识了田汉、应云卫、洪深，继续从事戏剧运动。他是我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家、表演家和教育家。在旧社会，唱戏的社会地位最低下、最轻贱，被人们轻视，他以一宦宦之家、书香门弟的贵公子的身份上台唱戏，遭到周围亲友和社会舆论的非议和巨大的压力，他的夫人写信劝他从日本回国，他回信说：“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下定决心选择戏剧为他

《磨剑室诗词集》上册，第867页。

秦启明：《李叔同生平活动系年》，《弘一法师李叔同书信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页。

毕生的事业，而且既演话剧，又演京剧，他后来饶有风趣地说：“我本歌场老学徒，流落风尘已五十年了。”从这自我诙谐的语句中，我们可看出他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对戏剧作出的巨大贡献。

他的学识渊博，在戏剧方面，话剧、京剧兼通，能编剧，能导演，能表演，也精通电影编导，而且对戏剧史（古代戏曲演变），对粤剧、桂剧等地方剧种也有研究。田汉曾说：“欧阳予倩同志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之间的一座典型的金桥”。他企图使话剧在中国戏剧艺术的传统基础上创造出更新的表现方式，他自己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如《桃花扇》传奇，他在1937年便改编为京剧，1939年改编为桂剧，1946年改编为话剧。解放以后，1957年又修改为三幕话剧，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桃花扇》这个剧目能在舞台上和银幕上都成为群众喜爱并且久演不衰的剧目，这里面倾注了他不少的心血。

从事初期话剧运动的还有王钟声、刘艺舟、任天知、汪优游、曾孝谷、陆镜如、郑正秋、陈大悲等人。王钟声（1881—1911）名熙普，浙江上虞人。他在上海教会学校念书，学习德语、法语。1898年到德国得来伯的西大学留学，1906年学成回国，先在湖南、广西任教，他这时已加入同盟会，在庆祝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会上讲演时，指斥清廷的立宪是假的，清廷不去，中国就无希望。广西巡抚林绍年很不满意，将他辞退。他曾经在日本和刘艺舟看过春柳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新剧，很受感动，相约要以木铎、钟声摧醒世人，刘艺舟名木铎，王熙普改艺名为钟声，从事话剧运动。王钟声认为中国要富强，就要革命，革命要宣传，其办法有二，一是办报，一是改良戏剧。因此，他投身戏剧界，主旨为了宣传革命。1907年他在上海组织春阳社，还办一通鉴学校培养新剧人才。他在9月上演了《黑奴吁天录》，剧本是自己编的。这是话剧在国内的开端。他演的剧目还有：《迦茵小传》、《猛回头》、《爱海波》、《宦海潮》、《新茶花》、《秋瑾》、《徐锡麟》、《张汶祥刺马》、《热血》等，这些戏大部分是日本转译的，有的则是直接宣传革命，讽刺和暴露统治者腐败的。他一个人活动能力很强，还和上海京剧界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同台演出，他又率团到苏州、杭州演出，而且还到天津、北京演出，在北京和刘艺舟合作过，还与京剧著名演员杨小楼、尚和玉、龚云甫和梅兰芳同台演出，很受群众欢迎。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上海同夏月珊等人参加了进攻江南制造局之战役，战斗中他无所畏惧，奋勇直前。后到天津活动起义，被直隶总督陈夔龙密令警察总办杨以德将其逮捕，并判处死刑。1911年12月3日慷慨就义。

刘艺舟（1875—1936）名霖，艺名刘木铎，湖北鄂城人。父亲是水师营炮船哨官，家境贫困，少好京剧、汉调，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结识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加入同盟会，与春柳社社友来往，看过《黑奴吁天录》十分欣赏。宣统前归国，与王钟声合演新剧，在北京加入田际云的玉成班，演唱《爱国血》、《张汶祥刺马》。1911年刘艺舟组织剧团在大连、安东、威海等地演出，适逢辛亥革命爆发，他将剧团演员武装起来，从海上攻占登州，后又联络当地民党，收复了烟台、黄县，被选举为临时大都督，后改任登黄司令。旋辞职南下，在上海，被约请在上海新舞台入夏氏剧社演出不少时装新戏，如《新茶花》等。1913年他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失败，受到迫害。

他到日本，演出托尔斯泰《复活》改编的同名新剧，又演《林冲》，是用京剧形式演唱的，引起了日本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欢迎。他回国后曾被逮捕，关押了130天，袁世凯称帝失败，才放出来。出狱后，在武汉又编排《皇帝梦》，自演袁世凯，嘲讽袁世凯老奸巨滑的丑态。此剧上演后轰动一时。他和王钟声演戏，称为言论派正生，在台上长篇言论使观众动容，潘月樵演戏也是这种作风。由于刘艺舟台上慷慨激昂地大发牢骚，抨击当政，批评尖锐，常被当地官吏警察监视，因而他发完一段言论以后，往往不等戏演完便从后门逃走。

陆镜若（1876—1915），名扶轩，江苏武进人，父亲陆尔奎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辞源》的主任。镜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学习，曾到日本俳优学校学习过，请教过日本戏剧家藤泽浅二郎，和岛村抱月、松井须磨子等在一起演过戏，还和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馆长河竹繁俊在一起，在《哈姆雷特》剧中扮演过一角色。他在1912年在上海组织新剧同志会，在春柳剧场演出，参加者有吴我尊、欧阳予倩、马绉士、吴惠仁、陆露沙、张冥飞、宋痴萍等人。这些人中间多是春柳社社友，他们演剧是严肃的，尊重春柳社的传统，他们演剧和王钟声、任天知、刘艺舟的演剧作风有所不同，反对演员在台上不依照剧本自由发挥，演戏时有比较完整的剧本，在台上没有长篇大论的演说，没有突出的噱头，使舞台形象比较整齐合理，也没有幕外戏。演的剧目有：《热血》、《不如归》、《家庭恩怨记》、《猛回头》、《社会钟》、《鸳鸯剑》、《运动力》、《鸣不平》等。这些剧目多半称赞爱国志士、见义勇为的人和江湖豪侠之流，宣扬纯洁的爱情、婚姻自由、爱人如己，反对腐败的官场、高利贷、嫌贫爱富、恃强欺弱的人，同情被压迫者，穷苦的人。剧目多是悲剧，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有的也有消极情绪。总的来说，春柳剧场的演戏讲究艺术上的完美，不自觉地走上艺术至上的道路，有的与现实政治斗争结合不紧密，有的有曲高和寡之感。陆镜若读过大量剧本和文学书籍，能编，能导，能演，致力于介绍欧洲进步的戏剧，1915年10月劳累而死。

郑正秋，广东潮州人。1913年秋组织新民新剧社，不久民鸣社、启明社相继成立，上海的新剧又呈现出活跃的局面。进化团社是以宣传革命的戏为主的，春柳剧社的戏是以反映社会问题的戏为主的，而新民社的戏是以家庭问题的戏为主。有人评论：家庭的戏，演来浅显易懂，妇孺皆知，颇多兴味，讲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容易赢得观众的欢迎。当然家庭问题也反映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是有意义的。郑正秋搬上舞台的剧目则是追求情节的复杂离奇，追求舞台效果，他们在表演艺术方面比较着力，而对于剧目的教育意义则不太顾及。上演的剧目如《空谷兰》是写英国贵族家庭的故事，还有郑正秋编的《恶家庭》、《火浣衫》、《乞丐武七》，还有用弹词改编的《珍珠塔》、《描金凤》、《三笑姻缘》，其他的剧目便是《家庭恩怨记》、《恨海》、《张汶祥刺马》、《血泪碑》这些老的剧目。郑正秋在《乞丐武七》中演武七，《武松与潘金莲》中演武大郎，《珍珠塔》中演老太太，《张汶祥刺马》中演马新贻。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话剧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向往欧美的戏剧，他们介绍萧伯纳、易卜生、罗曼·罗兰、王尔德的作品，重新肯定了戏剧的艺术地位和文学地位，否定了初期话剧的传统，也冲击了中国历史悠久传统优良的戏剧，要走一条革新的，写实的现实主义道路。五四时期

还展开了一场新剧与旧剧的激烈争论，人们正在探索中国话剧发展的道路。

第九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下）

第一节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父亲王乃誉是一商人。4岁丧母，父亲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严格，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未中，便倾向新学。甲午战争后，到上海，为《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用业余时间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从日本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上虞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扇面上所写咏史诗，赞赏其才学，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王师事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1901年王曾赴日留学，次年因病回国。1903年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1906年，罗振玉调京，在学部做官，王随之入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馆编译。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在《教育世界》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介绍德国哲学，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1908年《人间词话》问世，1912年《宋元戏曲考》问世。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对王讲：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听了罗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包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认为是“大辱”，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1925年，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工作。1927年4、5月，北伐军进抵河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于6月2日写就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便投颐和园内昆明湖自杀，结束了他遗老的生活。

综观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先是研究哲学，继而转向研究文学，再而转向研究史学，以史学的研究贡献最大。

哲学

王国维研究哲学，先是读康德的书：《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叔本华的影响。

王国维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全面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各方面的阐述都运用了叔本华的思想。他认为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以及其解脱之道。美学是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的解脱的功效。他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文，是发挥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名篇。他又写了《红楼梦评论》一文，分析曹雪芹创作的小说《红楼梦》

的悲剧意义。他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精神是展示了生活之欲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这一观一悟，写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封建文人视《红楼梦》为“诲淫”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的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了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

王国维研究哲学产生了疲惫的心态。他曾在《自序》中述说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有两大潮流：一是英国的实证主义，如洛克、休谟、斯宾塞等，即严复所宣传的一套实证论、经验论思想。另一是德国的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思想，是先验论、唯心论思想体系。王国维一方面偏爱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但是，他也曾批评过这些哲学可爱而不可信，他曾说叔本华：“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也曾受过实证论思想的熏陶，曾学过逻辑学、数学、化学、物理学，这些学问培养了他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他又不满足于科学、实证，而认为还需要探讨人生的道路、真理。这便是他认为“可信而不可爱”。于是，他在可爱与可信之间徘徊，思想常处于矛盾之中。辛亥革命后，他到日本，便弃文而从史的研究。在历史的研究中，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史学

王国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属于考古派。陈寅恪对他的学术成就曾有描述：“其学术的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猺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治学领域和治学方法有明确、清晰的说明。

第一，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

《静安文集续编》，第 21 页。

《静安文集》，光绪三十年铅印本，第 1 页。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19 页。

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他自己称这种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晚清康有为提出“六经皆伪”，后来史学界发展为疑古派，对古史抱怀疑态度。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精通语言文字音韵学，但是，他又不相信甲骨文，认为甲骨文不是真的，因此，他对这种研究甲骨文进而研究历史的方法持否定态度。王国维与疑古派不同，他认为古代传说仍有史学研究的价值，态度比较审慎。他又不同于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经学家，他们研究语言文字学是为了通经，而王国维研究语言文字学，其基本出发点在于考史。而章太炎是过分相信书本知识，连青铜器上的金文，龟甲上的卜辞都一概否定其价值，不过是治学中的一种保守思想而已。

第二，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王国维对西北地理和蒙古地区古代各游牧民族的历史进行广泛的研究，他利用汉晋木简、敦煌文献、碑文以及外国人的著述，加以比较、校勘、考证，写出了有重大贡献的论文。如他写的《流沙坠简序》，便是利用魏晋木简考证西域著名古城楼兰的位置及其兴废的论文。他写的《鬼方、昆夷、獠考》便利用了先秦两汉的文献，同时也利用了钟鼎彝器铭文的不少材料，经过比较、分析，而得出精辟的见解和论断。他写的《高昌宁朔将军曲斌造寺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唐贤力苾伽公主墓志跋》等文章，从碑文、墓志铭文考证蒙古地区古代游牧部族突厥、回鹘族的历史。他写的《萌古考》（原名《辽金时蒙古考》），是研究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以前蒙古诸部落历史的重要论著。他写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订主因亦儿坚即是纠军，搞清了金代后期纠军的情况和事迹。他还写了《鞑靼考》、《黑车子室事考》等文。他的研究方法是勤读宋、辽、金、元等汉文史籍，又参考钱大昕、徐松、张穆、何秋涛、洪钧、李文田、屠寄、丁谦、沈曾植、柯劭劻等学者的专著，还引用《蒙文元朝秘史》、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行记》，以及对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等著作进行比较、校勘、证订，然后，得出精湛的论断。

第三，宋元戏曲史的研究。王国维1907年任学部图书馆编译时便从事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陆续写出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7种专著。东渡日本后，1912年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这批著作是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给戏曲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因为，历来人们对小说和戏曲认为是民间的俗文学，“庸人乐于染指，壮夫薄而不为”。研究的人寥寥无几。王国维采用的是西方学术研究科学的严密的方法，先做分析考证，后做综合

《自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曲录自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370页。

论述。上述前7种便是分析型的考证，后一种属于综合型的巨著。他在著述时又运用了西方先进的戏剧理论和美学理论，“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在历史的考察方面，他总结说：“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借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他的这段总结，是依据一种论断，即“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始全”。用这一原则考察中国古典戏曲形成、演变、发展过程，描绘出清晰的途径和线索。在艺术审美方面，他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处，无不如是。”他运用这种审美标准对戏曲的语言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发挥。人们一致共认《宋元戏曲考》是近代古典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

综上所述，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最大贡献，便是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材料，如一、殷契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称流沙坠简）；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如西夏文、蒙文等）。这些新的发现的地下材料，王国维学贯中西，用毕生精力对之加以研究考证，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他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曾植、柯劭忞等，同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又使他在国际、国内的学术界得到了极高的声誉。

文学

王国维在1908年发表《人间词话》，是文艺批评类著作。他利用了传统的诗话形式，而论及的内容达到近代美学理论的高度，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作品。他在《人间词话》中标举了“境界说”。境，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家也运用过这些词语，如宋朝严羽的“兴趣”、清朝王士禛的“神韵”、袁枚的“性灵”诸说，但都是就风格、技巧而言，王国维则提到美学的本质论高度。他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这是总论，对五代北宋的词评价很高，其标准即有境界。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

《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

《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34页。

《戏曲考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01页。

《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6页。

《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06页。

《人间词话及评论汇编》（以下间称《人间词话》），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4页。

《人间词话》，第1页。

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境不仅指景物，也是心的感情，景与情构成文学的两个基本原素，而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这是客观与主观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这一美学理论的指导下，王国维提出了四个关系。

第一是“自然”与“理想”的关系。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

诗有写实派和理想派，写实派是将客观事物真实地描写出来，理想派是着重于虚构、主观的想象，而虚构、主观的想象又以生活现实为其基础。因此，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又邻于理想。合乎自然，是诗人对审美对象观照、反映的感受，将景物真实地描绘出来，有如诗中的“赋”，直书其事。而邻于理想，是诗人总是用自己的理想去取舍生活、剪裁生活，引譬连类，因物喻志，有如诗中的“比”、“兴”，触物以起情，索物以托情，表达诗人的一种思想感情。王国维的意思是大诗人造境、写境，难以区分，最高的境界是能反映物景以及人生（感情）的本质，而且，景情互相融合，达到浑为一体，这是最高的境界。他举了元朝马致远的《天净沙》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评价为“纯是天籁”，又评为“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这首散曲前3句18个字综合了9种事物，勾画出秋天萧瑟凄凉的傍晚景象，烘托出一个远离家乡的旅行者来。马致远的写作技巧是极高明的，真达到了“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的境界。另外，王国维对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评价极高。这首词的起句是“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尾几句是“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王国维评：“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诗人苏轼，对杨花描绘成似花非花，全神凝注，笔借“风”“雨”，一气流转，把杨花当作容器，装进去主观的想象，显露出对人生的理念，格调更为高雅。这里“我”融入了景物之中了，与物景处在有意无意之间，因此，读咏此词，有一唱三叹，寻味无穷的感觉和效果。

王国维要求观照景物能体现某种景物内在的本性，即“神理”，达到“真景物”，“理念”的真；在体现人生的感情时能反映人的内在本性的真，达到真感情，创造出独特的艺术画面，诗人“忧生”、“忧世”的理想与感情自然渗透在作品之中。自然与理想，写境与造境，写实派与理想派，合而言之，都应当达到这种境界，便是美。

第二是“入”与“出”的关系。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人间词话》，第2页。

《人间词话》，第1页。

《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11页。

《人间词话》，第26页。

《人间词话》，第24页。

《人间词话》，第16页。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诗人对于宇宙和人生，要观察、体会、了解、领悟，便要“入乎其内”，到生活中去。人人都能观察，但是，常人之眼与诗人之眼不相同，常人之眼有时看不到，看不透，或看到了说不出来，没有提炼的能力。诗人之眼则不同，他能静观，能观照，能突破自身狭隘的眼光，能出乎其外，站得更高，“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能排斥私欲、功利等障碍，能将客体的本性体察、领悟出来，这就是诗人天才的“内美”，具有这种崇高的人格和素质，才能出，故能观。同时，待物化的艺术境界，即在审美主体（作家）蕴藏形成的第二自然、第二人生和第二之我需要艺术形式、手法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在于审美主体驾驭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的能力，这种能力有高有低，这便决定作者在“出乎其外”时能否高致。因为作者心中的意象是观物、观情的辩证统一，达到最高的境界，有时稍纵即逝，是须臾之物，需用不朽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作者既要超以象外，轻视外物，能以奴仆命风月，又要重视外物，情景相融为一体，能与花鸟共忧乐。王国维评论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分北宋人颀颀者，唯一幼安耳。”这里所讲的格、情、气、韵是格调、性情、音韵、气象，四者能烘托出“境界”。因此，境界包括敏锐的观察能力，深邃的感情，能反映出鲜明生动的形象。王国维举周邦彦的《苏幕遮》咏荷的词，其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园，一一风荷举”。评说：“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另外，他举冯延己的《南乡子》咏草的词，其中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他评说：“‘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若也。”这两幅图画，通过语言、色彩、线条充分表现了荷和青草的内在的本质力量，能得荷之神理，摄春草之魂，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的心境，这便是善入善出的典型例句。

第三是“渐悟”与“顿悟”的关系。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这是《人间词话》的一段名言，王国维用晏殊、柳永、辛弃疾三首词的断句，描绘了作词的艰苦历程。同时，他又引申到成大事业、大学问方面去。这三个境界是作为诗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修养和锻炼的问题。审美主体（作者）对人和物的审美把握，形成待物化的意识客体，第二自然、第二人生以及第二之我，再将此用艺术形式表现为意识性的客体（作品），其间有一个渐悟到顿悟的过程。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人间词话》，第 25 页。

《人间词话》，第 25 页。

《人间词话》，第 19 页。

《人间词话》，第 14 页。

《人间词话》，第 9 页。

《人间词话》，第 11 页。

“西风凋碧树”，是一种烦躁的心情，诗人要观物，首先要摆脱现实的种种纷扰，破除一切我执，包括苦乐、毁誉、利害、得失，挣脱一切个人的私念，达到胸中洞然无物，才能达到观物之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时，便入定，能去体会物之内在本质的美了。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把握，审美主体（作者）有一种择一的、固执的、终身无悔的精神，在探索着事物的美。这种美必须将事物个别的、外在的、偶然的的东西跨越过去，得出普遍性的、内在的、必然的一种理念，用审美的把握塑造出美的意象，诗人在此境界的心情是平静、纯净、自然的，寻求一种自然的乐趣。一方面，这种寻求是艰辛的，使人憔悴和消瘦，同时，另一方面，这种寻求又是使作者的感情得到升华，达到完美的意境，虽然“衣带渐宽”，又是值得的，殉身无悔的。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说的是顿悟。经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苦苦寻求，作者能用最明快的语言，将事物玲珑剔透的表达出来，浑如天成。这时作者的心情达到了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的境界，获得了智慧。“众里寻他千百度”，表达了“慧”的寻求的艰辛，“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表达了智慧的顿悟。诗人在艰苦的寻求中，豁然开朗，灵感顿生，妙语连珠，境显现得光辉耀人，情表达得沁人心脾，这是极不容易获得的一种境界。在第三种境界，诗人也从自己创作的诗作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达到了精神上的愉悦。

王国维最喜欢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誉为“神秀”，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李煜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这些词都是千古绝唱。李煜表达的感情，具有一颗“赤子之心”，度越了个人身世的局限，抒发的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感情，他摆脱了个人意志、欲望、利害关系，“自由”地进入审美静观，能深窥人类和事物的内在本性，把自己强烈的主观的感情和这种客观的“静观”交织在一起，达到了人的感情和景物融合为一，他又能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把这种感情真实具体地描绘出来，完成抒情诗人的自我心理形象的塑造，因此，最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他的词最足以说明诗人确实经历了诗的三种境界，达到了最高的智慧顿悟境界。王国维评价说：“后主之词，可真所谓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李煜确有其过人的哀乐，将自己的生命和词的创作融合在一起，词具有灵慧之气。

第四是“隔”与“不隔”的关系。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

《人间词话》，第5页。

《人间词话》，第6页。

《人间词话》，第7—8页。

《人间词话》，第17页，陶：陶潜。谢：谢灵运。延年：颜延之。东坡：苏轼。山谷：黄庭坚。

王国维强调诗词要自然、真实，真事物，真感情，形象鲜明、生动，是客体事物的写照，是人类的一面镜子，生动地再现自然与人生，反映了美的本质。作品问世，读者读时，心中有感受，便是对物化的意识性客体（作品）在头脑中重现艺术境界。这种重现又有读者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经验、时代精神渗透其中，而主要的取决于艺术作品境界的深浅、有无、大小，物化的程度高低等等。王国维的所谓“不隔”，就是能真实地表达感情、形象生动地描绘景物，不多用典故，“不使隶事之物”，“不用粉饰之字”，“忌用替代词”，排斥“游词”。他对姜夔（白石）的词评价不高，主要缺点便在于“隔”。造成隔的原因，一是姜白石词中用典太多，读者读时不易理解，再是词中“雅”的程度过高，“仙”的韵趣过重，而人情味相对地减弱了，读者不能直接感受到其境界，因此，王国维评论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王国维不喜欢吴文英的词，对吴评论很低，说吴的词缺点在于“隔”。又贬谪其词“肤浅”，“枯槁”，其人“才分有限”。词虽然五光十色，不乏美丽的辞藻，但是总是嫌“假”，没有真情实意。有人评吴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王国维也取吴文英词中一语加以评价，说：“映梦窗凌乱碧”，其意相同。

综上所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虽然仍用传统诗话形式表现出来，比较简单扼要，但是，它有着许多精彩的见解，蕴有深厚的、丰富的美学理论作为基础。他的意境说，把中国传统诗话中的格调、神韵、气象、兴趣诸说，提到了西方美学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形成了中国评论诗词的美学原则和美学理论。他探讨了作者与自然，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在审美范畴的种种关系，要求格调要高，写出真景物、真感情，崇尚自然，要在“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这种理论纠正了晚清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弊病，比专讲婉柔或专讲豪放更要全面。虽然，他的美学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对人生有着悲观色彩，具体论断亦不一定都准确，但是，他的美学理论对封建主义儒家文学理论专讲“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种突破。此前，梁启超、黄遵宪致力于“诗界革命”，偏重于内容带有政治色彩，而对于诗中美的境界的艺术塑造探讨很少。近代讲美学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而且，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也贯穿到评论小说、戏剧、美术等领域，具有普遍性。因此，他的美学思想、文艺批评是有历史贡献的，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王国维的诗词数量不多，诗有192首，词有115首。后来他便致力于历史学研究。他的词是颇有功力的，他自己也很自负，樊志厚评为“真能以意境胜”，“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举例来说：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拏帷问。陌上轻雷听隐辘。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蝶恋花》）

《人间词话》，第17页。

《人间词话》，第21页。

《人间词话》，第11页。

《人间词话》，第57页。

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2页。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栏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蝶恋花》）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羹。今朝欢宴胜平时。（《浣溪沙》）

樊志厚评论王国维的词说：“君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之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王国维的词写景鲜明、逼真，言情深婉凄绝，音韵铿锵，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富有哲理，能将哲理融化于情景之中，读时觉得耐人寻味，品格高致。细细品味，真有一种美的享受。

第二节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炳麟，字枚叔，因景慕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改名绛，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9岁从外祖父朱有虔读书，听外祖父讲述明末清初顾炎武抗清的事迹，又听了吕留良门生曾静遭到清政府杀戮的故事，春秋夷夏之防的观念，深深印在他的脑子里。23岁，从俞樾在杭州诂经精舍学习。俞樾是浙江德清人，是皖派戴震的传人，著名古文经学家，做学问很严谨，对学生也很严格。章太炎在俞樾门下深造7年，打下了坚实的根底。他和宋恕（衡）、夏曾佑是好朋友，经常共同钻研学问。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上海强学会成立，章太炎从杭州寄去会费请求入会。1897年他到上海，在《时务报》发表文章，参与办报的工作。1898年他到武昌，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办《正学报》。这时，张之洞写了《劝学篇》，给章太炎看，他看到忠君思想便说：现在9世之仇还没有报，要讲忠君是很容易的，要等到革命之后。张之洞听了很不高兴，劝他离鄂。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遭到清政府的追捕，便到台湾，后到日本，曾遇见孙中山，但没有深交。后来，他又回到上海。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在上海召开国会，章太炎参加会议，并发表了演说。他认为唐才常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清朝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他当场宣言脱社，割辫与绝。而自立军失败以后，他仍遭到通缉。1902年他流亡到日本，在横滨经泰力山介绍与孙中山结识，接触了资产阶级哲学、政治学，眼界大开，组织明亡242周年纪念会，会由日本政府明令禁止，没有开成。章太炎回到上海，在蔡元培所办的爱国学社讲学，并在《苏报》上发表文章。康有为由欧美17国旅游东归，发表了《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反对革命。章太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康有为的言论，其中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词句。他又推荐邹容所写的《革命书》，称赞为“义师先声”。章、康二人的文章揭开了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序幕。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将章太炎、邹容关进了监狱，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章太炎在狱中3年，革命意志坚强不屈。1904

《王国维诗词笺校》，第145页。

《王国维诗词笺校》，第136页，第四、五句为“陌上挟丸公子笑，座中调醖丽人嬉”，此从苕本。

《人间词话》第56页。永叔：北宋欧阳修。

年在狱中和狱外联络，推动了光复会的成立。他在狱中又研读了佛教法相宗的主要典籍，这对他后来学术思想的发展，影响至深。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他在欢迎会上对东京留学生说：“兄弟戊戌以来，七次查拿，……在这困苦的盘涡里，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鼓励大家革命。他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讲学，主持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起社。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和官僚、立宪党人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组为统一党，他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拥护黎元洪、袁世凯。后来袁世凯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这时章太炎才清醒起来，他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被袁世凯软禁。袁世凯失败后，他才获释。以后他住在上海，思想趋向保守。晚年在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大声疾呼抗日，爱国情绪激烈高涨，奔走于爱国运动。1936年6月逝世于苏州。他的著作有《书》、《国故论衡》、《蓟汉微言》、《齐物论释》等。

文化思想

章太炎是晚清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又是著名的学者，人称国学大师。他在文化上倾向文化保守主义。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中出现了一个派别，即“国粹派”。1905年初，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有邓实（秋枚）、黄节（晦闻）、刘师培、黄侃、马叙伦、柳亚子、陈巢南（去病）、高旭（天梅）等人。他们创办了一个刊物：《国粹学报》，又办了一个藏书楼，藏有20万卷书籍。还办了一个出版社：神州国光社。他们办国粹学报的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这个组织是拥章太炎为领袖的，章太炎也常在《国粹学报》发表学术文章。1908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办国学讲习会，听课的学生有钱玄同、朱希祖、马裕藻、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龚宝铨、钱家治、黄侃，稍后还有汪东。章太炎在1906年演说中曾说：近日办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最要紧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这里，他说的国粹的出发点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提倡国粹，是为了使中国固有文化发扬光大，提倡爱国主义精神。国粹这个词是 Nationality，是民族性的意思。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有两派，一欧化派，一国粹派，国粹派代表人物为三宅雪岭，曾著《真善美日本人》一书，反对欧化主义，倡导国粹保存主义。中国留学生将这种思想传过来，认为中国革命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要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寻找精粹的部分加以发扬、宣传。因此，他们所提倡的国粹主义是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密切相联的，和封建顽固派的复古主义不同。封建顽固派提倡复古主义、封建儒学，“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是和维护清朝统治相联系的。而且，国粹派虽然反对全盘欧化，但是，却也并不排斥西学，他们对西学也是吸取的，主张吸收西学之长处，中西并收，兼采众长。

他们提倡“国粹”，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国学”，来熔铸“国魂”。而他们所说的“国学”，又是比儒学的范围更大些，包含儒学以外的诸子学、佛学等。儒学主要是经学，他们对于“经”的理解也同封建顽固派并不相同。章太炎说：“世人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训

说，非必睹其本真。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是故绳线联贯谓之经，簿书记事谓之专，比竹成册谓之仑。”因为古代以竹简成书，编丝缀属，便是“经”。章太炎将“经”理解为古代书籍，没有褒意。后代将经作为儒家的典籍，并且加以神圣化，是百世不变的“道”，形成了尊经崇圣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章太炎的解经，将对儒家经典的迷信和崇拜的神秘观念打破了。

他们对孔子的看法也值得一提。章太炎对孔子曾作过批评。他借日本学者的话说：“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他将孔子看为一位历史学家，和左丘明、司马迁、刘歆一样，并没有把孔子看为是教主、预言家、政治家，这样，就将孔子从神圣的高位降下来，和诸子并列。许之衡说：“余杭章氏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章太炎说，清朝统治者尊事孔子，奉行儒术，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国粹派这样评孔，便将“独尊儒术”的垄断局面打破了，于是兴起了诸子学。

章太炎赞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把六经看作古史，认为它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保存了资料。这样，就把六经是帝王统治国家万世不易的圣典的神秘色彩给冲淡了。章学诚认为“经皆官书，不宜以庶士僭拟”，因而非难杨雄和王通。章太炎批驳了章学诚的正统史观，认为庶士也可以治经，并举出历史上的一些实例，墨子有《墨经》上、下，贾谊著《容经》、韩非子《内储外储篇》，自署为经，老子的书称《道经》等，可见，“非徒官书称经”。

关于治经的目的，过去一般进步思想家都提出“通经致用”的命题，这一命题要求人们“经世”，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治理国家。章太炎提出治经的目的在于存古求真，要实事求是，不是为了适今，尚用。因为通经致用，将经典里所讲的原理原则教条化了，绝对化了，过分崇信经典中所说的“道”，便束缚了自己的思想。而且曲学干禄，为了追逐名利，迎合时尚，必然陷入实用主义，抛弃了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因此，章太炎的实事求是，存古求真的学术思想是开辟了研究国学的途径，标志着古典经学研究的终结。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这就是说，他保存国粹，是为了激发人们民族自尊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其内容则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哲学

章太炎说：“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他认为“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革命者必须有高尚的道德节操。他企图建立一种新宗教，这

《文学总略》，《国故论衡》卷中，浙江图书馆校刊 1919 年，第 60—61 页。

《订孔》，《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 179 页。

《读 国粹学报 感言》，《国粹学报》第 6 期。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 195 页。

《原经》，《国故论衡》卷中，第 63 页。

《原经》，《国故论衡》卷中，第 64 页。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 276 页。

《革命之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 313 页。

就是佛教的理论。他对于佛教偏重于哲理的研究和教义的探讨，而对迷信的部分则认为是杂质，是需要以摧陷廓清之力予以删除的。他早期的哲学思想是唯物论和进化论，翻阅《视天论》、《菌说》、《原人》、《原变》等文章，都可以看到他坚持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论和进化论的观点。不过，在解释自然界生物发展的动因时，说成是精神力量。他对鸟卵具有保护色否定了上帝的创造，而却解释为鸟思护其卵、积精专思，所谓“以思自造”也。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为他后来转向主观唯心主义作了思想准备。1903年到1906年，他在狱中读了大量佛学典籍，有《涅槃》、《维摩诘起信论》、《瑜伽师地论》、《因明论》、《唯识论》、《华严》、《楞伽》等经典。他说，读了慈氏、世亲的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就是说，佛教哲理的思维方法和他治古文经学的考证方法有相通之处。他又遍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康德的先验论、休谟的“感觉就是一切”、贝克莱和马赫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叔本华的“世界就是我的表象”、费希特的“世界的本原就是自我创造一切”等等，他都拿来和唯识论相比拟，建立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他说：“康德所说的‘十二范畴’，纯是‘相分’的道理。索宾霍尔（叔本华）所说‘世界成立全由意思盲动’，也就是‘十二缘生’的道理。”于是，他到日本东京主编《民报》期间，发表了一批论哲学和宗教的文章，如：《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大乘佛教缘起说》、《四惑论》等等，还发表了《答铁铮》、《答梦庵》等讨论佛教问题的书信。他的佛教哲理主要讲的是法相宗的唯识论。

（一）本体论。按照法相宗唯识论的理论，世间客观的事物，主观的生命都是阿赖耶识显现出来的影象，都是虚妄的。宇宙的本原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叫“藏识”，“种子”，它能积累经验，叫“第八识”。“第七识”叫“末那识”，它有恒审思量的功能。第一识到第六识叫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前五识是感觉，知色、声、香、味、触。第六识是区别一切现象，加以思量，故称意识。前七识一概由第八识生出，由于识的活动，现象世界如人体身心、饮食器具、大地山河等，才被构造出来。章太炎根据万法唯心的原理，要破除“损减执”和“增益执”的道理。所谓“损减执”，指对客观和主观加以区别，把客观世界看成是物质的存在，是实有，把主观意识看成是物质派生的精神现象。所谓“增益执”，是指人的意识之外，还有一个不依赖意识而独立存在实体。章太炎第一步，破“我执”，误把主观的我当作实有。他说：“此识是真，此我是幻，执此幻者，以为本体，是第一倒见也。”因为说有我，那是一种“我见”，一种偏见，因为“所谓我者，舍阿赖耶识而外，更无他物”。第二步，破“法执”，误把客观的世界事物当为实有。人们说物质，可以分得很细，但是人们忘记了所谓客观事物现象都是“缘起”的，由于缘起，是因为识的认识能力（见分）才显现了认识的对象（相分）。“然则此力，此五尘者，依于何事而能显现？亦曰心之相分，依于见分而能显现耳。此心是真，此质是幻，执此幻者，以为本体，是第二倒见也”。第三步，破对神的崇拜。他认为人们相信神是为了保存自我，祈福神祇，对神产生一种敬畏恐惧心理，不确立自尊心理，而求之于虚无的神

《薊汉微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34页。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4页。

灵。“此心是真，此神是幻，执此幻者，以为本体，是第三倒见也”。他坚持：“境缘心生，心仗境起，若无境在，心亦不生”。“种子识者，即阿赖耶。凡起心时，皆是意识，而非阿赖耶识。然此意识，要有种子，若无种子，当意识不起时，识已断灭。后时何能再起”。他又说：“今有器世间，可众生依止之所，本由众生，眼翳见病所成，都非实有。”总的来说，他的论证是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意识决定物质，客观事物并非实有，主观生命亦非实有，唯有阿赖耶识是实有，这是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他用这种论证要求人们“自贵其心”，“自尊无畏”，“依自不依他”，能够“不顾利害，蹈死如饴”，“勇猛无畏”。有了这种思想便可以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他鉴于近世道德沦丧，政治腐败，“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他在另一处又说，佛教的伦理是“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所以，他的本意是想以唯识论的佛教思想作为革命道德的哲学理论基础，为政治服务。

（二）人性论。章太炎写了一篇文章，叫《俱分进化论》，意思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从道德上讲，善进化，恶也进化，即是善恶俱进。他这个论点的理论基础也从唯识论加以分析：按照唯识论的原理，阿赖耶识是藏识，是种子，是无复无记的，复，即熏染，记，即记性，标志善恶。在作用时，藏识通过末那识思量，末那识便有复无记，受了熏染。藏识通过意识便有记（善恶）了，随着生物进化，人类社会进化，阿赖耶识积累经验，善恶便杂糅其中。“是故阿赖耶识，亦有善恶种子，伏藏其间，如清流水，杂有鱼草等物。”人之所好，有真、善、美，从道德角度看，真，半是善性，半是无记。善是善德，有记。美是无记，不包含善恶。希腊古代思想家在论及人的本性时谈到真善美，缺少了恶。恶起源于好胜心，好胜，凡为追求五欲财产权位名誉而起竞争者，即好胜。好胜起于我执，名我慢心，我慢就是恃己的意思要超过别人的一种烦恼。由好胜起我慢心，导致为恶。这样，人们互相争夺，就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中的多数人而言，必是善恶俱进。

章太炎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发达，知识丰富，物质生产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贫富悬殊，道德败坏，人们更加痛苦，人与人之间虚伪奸诈，诲淫诲盗，穷奢极欲，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号称“文明”，实际上进行着兽性的屠杀，因此，他得出了善恶俱分进化的结论。当然，他没有探讨其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仅从种子、我慢、好胜的心理去解释则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三）五无论。对于未来社会的描述，章太炎以悲观主义的思想、虚无主义的思想，描绘了一个五无世界。那是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

《建立宗教论》，《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23页。以下《章氏丛书》简略。

《五无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3，第49页。

《答铁铮》，《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2，第58、59页。

《建立宗教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3，第29页。

《答梦庵》，《章太炎证论选集》上册，第395页。

《俱分进化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2，第81页。

无世界的世界。第一是无政府。他受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认为国家是群污之府，政府是万恶之源，有了国家，便互相争斗，个人受到约束。应当实行共产，钱币都投到大山谷中，军器、刀剑统统毁掉，断绝相争相斗的心理。没有政府，没有国家，语言文字达到统一，人类更是平等。但是人们所居住的地区不一样，造成温润的地区视为乐土，苦寒的地区受到煎熬。因此，第二是无聚落。苦寒地区的人与温润地区的人，每岁迭相迁移，不致于产生掠抢杀害的事。第三是无人类。色、食、性也，人的本性表现出来是淫与杀，人为万物之元恶，人们好胜心强，争杀起来，引起战乱。因此，有高明之士证明人生本来便是无意义的，出家当和尚，断绝生育，以致人类灭绝。第四是无众生。根据佛教的轮回学说，世界众生，莫不辗转于六道之中。六道即天道（神）、人道（人）、阿修罗道、饿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众生（动物）像车轮旋转一样，只要有物种，“新生之种，渐为原人，久更浸淫，而今之社会，今之国家，又且复见”。一物尚存，流转真如还会演化成人类。因此，连众生也要灭绝。第五无世界。世界本是空虚，因此，客观世界也随之寂灭，佛家便称之涅槃。得道。“涅槃者，纯无而不与少有相杂之谓，质言则世界消灭是也。”

“五无”思想是章太炎的一种大彻大悟的思想，他对人生的看法极为消极，极为悲观。严复认为社会进化，人们追求快乐、幸福，人们会过得更美满、更幸福。康有为认为社会进化，在科学技术发达的基础上，人们会达到大同世界，过着神仙一样的超脱凡俗的快乐生活。独有章太炎认为社会进化，科技发达，人们善恶俱进，苦乐并存，若苦若乐，终之为苦一也。不必去追求快乐，他举例说：“人求进化，必事气机。欲事气机，必先穿求石炭，而人之所需，本不在此，与其自苦于地窟之中，以求后乐，曷若樵苏耕获鼓腹而游矣。”他看到日本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一面经济猛进，另一面大批失业，青年妇女命运悲惨，道德败坏，小生产破产，官场贿赂公行，商场互相倾轧，于是，他产生了忧虑和不安，想回到庄子所说的樵苏耕获的生活中去，做一个精神自由的隐者。

当然，“五无”世界也不是一下子便能达到，总要百年之后。现实生活中，章太炎则仍在主编《民报》，大谈民族主义，谈排满思想，谈民权主义，研究议会到底能不能代表民意，谈民生主义，谈农民的土地问题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都是“俗”事。理论上，探求佛都哲理，这是“真”。他曾说：“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转俗成真”是指从儒家的古文经学的研究进入佛教的唯识论领域，“回真向俗”，是指佛理的研究并没有出家，出世，仍在探讨现实生活中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这些俗事，还在为革命事务操劳。

历史学

章太炎特别重视历史学。他认为历史学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兴衰。他曾

《五无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3，第48页。

《四惑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3，第65页。

《四惑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3，第67页。

《蒟汉微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36页。

说：“国无史，则人离本。”“史亡则国性灭，人无宗主，沦为裔夷。”他又说：“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列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萌不植。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州灭支那而毁其历史。”但是，一个民族国家如有久远的历史，要消灭它是很难的。“国之有史久远，则灭亡之难。自秦氏以迄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搢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今国性不堕。”

学习历史就是要人们增强民族自尊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他说：“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载之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他针对当时有人鼓吹全盘欧化，看不起中国固有文化的思想，便说要学习历史，学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如果学了祖国的历史，便会增强人们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爱国心。他说：“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之心，必定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

对于历史学的这种社会功能，章太炎一生不懈地宣传，直到晚年，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他又反复讲学习历史的重要意义。1933年他说：“史之有关国本者至大。秦灭六国，取六国之史悉焚之。朝鲜亡后，日人秘其史籍，不使韩人寓目，以今日中国情形观之，人不悦学，史传束阁，设天降丧乱，重罹外族入寇之祸，则不待新国教育三十年，汉祖唐宗必已无人能知，而百年之后，炎黄裔胄，决可尽化为异族矣。”隔了两年，他又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方今天方荐瘥，载胥及溺，诸夏陆危，不知胡底。……今则封豕长蛇之逞其毒者，乃千百倍于往日，如我学人，废经不习，忘民族之大闲，则必沦胥以尽，终为俘虏而已矣。”封豕长蛇之逞其毒即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

史学家撰写历史，其职责是什么？章太炎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记传见之。”他在另一篇文章上说要人们知道“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知古今进化之轨而已”。这就是说要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说：“盖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也。”

《春秋故言·检论》，《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2页。

《哀焚书·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23页。

《原经》，《国故论衡》卷中，第71页。

《答铁铮》，《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2，第60页。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

《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1卷，第2期。

《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63页。

《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第13号。

《哀清史·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29页。

《哀清史·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30页。

他很强调历史学家要“熔冶哲理”，作“抽象之原论”。他用这一标准检验中国古代史籍，并不满意，认为许多著作缺乏抽象思维，他逐一评价了司马迁、班固、孔颖达、陈寿、郑樵、马端临、杜佑等人的著述，认为有的有归纳法，加以分类，有的有演绎法，加以评点，但是，都嫌太简单了一些。因此，他认为现今的历史学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古经史籍是史料，要用新思想将古史籍贯穿起来，作出新的解释，这才是史著。

章太炎认为古籍史书，有些是史料汇编，有些是流水帐簿，有些是相斫书。这还都不能算撰述。要像西方社会学那样，有动社会学，静社会学，静以藏往，动以知来，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都加以考察研究，便能达到“知来”的目的。章太炎读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书籍，有的是日本学者转述的。如德国那特轻的《政治学》、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美国吉丁斯的《社会学原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原理》、中西牛郎的《支那文明史论》、田口卯吉《中国文明小史》、百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等书。在这些书籍中，传播了西欧新史学派的观点，即斯宾塞、巴克尔认为历史偏重政治与军事的记载是不够的，应当扩展到人类整个文化生活，如文字、语言、经济、艺术、风俗、道德、法律等。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和德国拉姆普罗希特的《德国史》，便是新史学的作品。美国的吉丁斯是心理分析派，巴克尔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原理》有一章便讨论地理环境的作用。这些观点和论断对章太炎有深刻的影响。他便说：“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又说：“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这里他便希望史家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说等对中国历史文化各个方面加以深入研究，“审端经隧，决导神思。”

史学家写作的态度应是十分认真而严肃的。章太炎说：“学名国粹，当研精覃思，钩发沉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斯乃形名相称，若徒摭旧语，或张大其说，以自文盈辞满幅，又何贵哉！实事求是之学，虑非可临时卒辨。”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擅长音韵、训诂、考证，他认为：史学的考证固然是极重要的，但是，还要追求更高的层次，就是用新思想、新学理“熔冶”史料，得出新的论断。他把“六艺夷于古史”，即将六经降为古史，从中研究“上世社会汗隆之迹”“明进化”，“审因革”。用此科学的严谨的治学方法求历史的“是”，即历史真实的本来面目。他反对康有为用今文经学寻求古代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借题发挥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主观主义的治史方法。他认为那种“我注六经”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哀清史·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29、328页。

《哀清史·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31页。

《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第13号。

《哀清史·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31页。

《哀清史·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32页。

《再与人论国学书》，《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2，第43页。

《清儒·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59页。

他很重视进化史观。他读了夏曾佑编撰的《中国古代史》（原名《中学历史教科书》），认为这本教科书写得也算好了，但是，他仍不太满意，认为需要更广泛地研究，他说：“大概历史中间最重要的几件，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辞的变迁，都在志和杂传里头。”他也很重视地理环境对历史、学术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学术的研究要注意三个因素，“地齐、政俗、材性。”地齐就是地理环境与学术成因的关系。古代赵、齐、楚的地区环境造成了各该地区的文化特色，清代吴派、皖派的文士的风习也和其地区的特点有关。

章太炎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有很多成果，贡献最大。他撰述的《书》、《国故论衡》等书，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形成近代的诸子学。他将孔子和先秦诸子放在平等地位加以分析，对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和韩非子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有许多深刻的认识、卓越的见解。他对古代学术思想史的演变、特点、规律都有探讨对清代学术思想也有综论，也有人物专论，对后世的研究有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刘师培也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如《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等，他还写了《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对古史研究有许多情义。他们两人，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史称“二叔”，他们对古代学术思想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学术思想的革新时代。由于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刘师培这批学者的研究，才使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趋势，理出头绪，使人略知梗概。章太炎是用新学理和新方法进行学术思想研究的开拓者。

语言文字学

章太炎精通小学，在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又读了西方语言学通论和社会学原理方面的书籍，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突破了古学的框架。汉学家相信苍颉造字的传说，熟读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说文解字》是以字形、字音、字义三个方面加以解释文字的。首先是字形。而且，汉学家将文字的诠释作为解释儒家经典的一种工具。文字考订是为了明经通道。而章太炎在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在《书》中写了《订文》和《方言》两篇。在《订文》篇中，他认为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是随着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文字之盈歉，则卜其世之盛衰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语言文字的丰富发展或干涩退化，关系着社会的盛衰。他考察英国，语言很发达，无虑六万言，言各成义不相陵越。这是因为英国社会交往频繁，商业发达，语言文字的表达运用愈来愈繁杂，语言便愈来愈丰富。他认为南宋以来，中国的语言文字有萎缩和僵化的现象，因之，中国古老的语言文字需要不断改革，使其发展。在《方言》篇中，他将中国方言分为十种，逐一讨论了每种方言地区的特点，他在探讨中国语言如何逐步统一的问题。他写了《小学答

《常识与教育》，《教育今语杂志》第2册（1910年）。

《原学·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33页。

参看《清儒·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57页。

参看钱玄同为《刘申叔先生遗书》所写的序，《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1936年出版。

《订文第二十五·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207页。

问》、《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上卷等一系列专著，进一步研究语言文字问题。

他认为先有语言，然后有文字。他说：“文字初兴，本以代声气，乃其功用有胜于言者，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坳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成面，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因此，他对汉学家只重字形，而对语言音韵忽视很不满意。他说：“言形体者，始说文，言故训者，始尔雅，言音韵者，始声类，三者偏废，则小学失官。”他强调音韵：“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以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此。”他说：“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这里，他把汉族语言文字作为民族社会进步、文化历史发展的必要条件。

他总结了三百年来古音学的发展，对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等人的研究成果评论说：“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他定古韵为 23 部，并为各韵定了音值，又确定古代声母（称为纽）为 21 个，确定了纽目表。这些成果都是集乾嘉小学之大成，并且超越了前人。他写了一部《文始》，这是一部汉字语源学的创始著作。这部著作作用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对许慎《说文解字》中九千多字的源头进行了理论的解释，使之对这些字的演变的历程大体得到清晰的了解。他又写了一部《新方言》，通过各地方言的比较研究，以今音证古音，参伍考验，以穷其声转之原。刘师培为其书写的序中说：“夫言以足志，言通则情达，情达则志同。异日统一民言，以悬群众，必将有取于斯编矣。”这就是说编撰者的目的还是要想使各地方言趋向形成统一的民族语言。

1908 年，留法的中国留学生在《新世纪》刊物发表文章，主张废汉文而以万国新语代替之，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种主张。章太炎写了《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这一文章引起了一场争论。万国新语，今通称世界语。章太炎说：“万国新语者，本以欧洲为准，取其最普通易晓者，糅合以成一种，于他洲未有所取也。”他分析了中国文字的特点，与语言的关系，汉民族几千年来已经运用习惯，而用拼音文字世界语来代替，是不可能的事，也是不必要的。这里，他讨论到地方方言如何统一的问题时说：“各省语虽小异，其根柢固大同。若为便俗致用计者，习效官音，虑非难事。”他又用古文篆籀经省的字形，制定了 58 个注音符号，纽文（声母）为 36，韵文（韵母）为 22，上纽下韵，相切成音。注音符号，从儿童入学时便学习，这样逐步达到语音的统一和标准化。这些建议都是积极的、有益的。后来，辛亥革

《文学总略》，《国故论衡》卷中，第 61 页。

《小学略说》，《国故论衡》卷上，第 3 页。

《小学略说》，《国故论衡》卷上，第 3 页。

《小学略说》，《国故论衡》卷上，第 3 页。

《小学略说》，《国故论衡》卷上，第 3 页。

《新方言序》，《左庵外集》第 17 卷，隆福寺修绀堂藏版，第 2 页。

《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 2，第 23 页。

《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太炎文录初编》卷 2，第 26 页。

命后，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他的弟子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许寿裳等，建议采用他制定的注音符号，得到全会一致赞同，注音符号在中国运用了几十年，为语音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

以上我们概述了章太炎对经学的认识以及他在哲学、史学、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成就。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对传统文化自身价值的重视。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学习西学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一部分人，尤其是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多醉心欧化，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三纲五常”伦理道德为核心，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而西方文化是近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因此，人们在比较中西文化时，对西方文化肯定其优点多，对中国固有文化，指出其缺点多，形成一种单向的学习西方的倾向。从器物上，中国不如西方，从政治制度上，中国不如西方，从思想学理方面，中国也不如西方。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便有此种趋向。20世纪初，“国粹派”的认识便产生了变化。他们不是封建顽固派，他们保存和提倡国粹不是维护“三纲五常”和君主专制制度，他们不是恋旧怀古，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的思想是激进的、进步的。然而，在文化上，他们发现传统文化的自身价值，他们对文化的民族性特别重视，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重新改铸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精华部分，以此内容增强国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他们认为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可以并行而不悖，不是一个代替另一个，而是两种文化双向交流，中国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在此基础上，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整合西方文化成为一种新文化，这是一种新的思路。这一新思路反对了民族虚无主义，适应了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要求。中国文化必须走民族化的道路，这是一种深邃的见解。

另一点是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正在进行着从传统儒学向近代学科的自觉转变。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邓实等人，他们各有师承。章太炎是皖派戴震的传人俞樾的弟子，刘师培是扬州学派三代注释《左传》的刘文淇的曾孙，黄节和邓实是岭南学派朱次琦的传人简朝亮的门人，他们受过传统文化和儒学的长期熏陶，在学术方法上受过严格的训练，在经学方面都有坚实和深厚的功底。他们又受到西学的影响，读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诸如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语言学方面的书籍。他们运用西方近代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得出了许多新鲜的论点，如他们把孔子的神圣外衣剥落下来，使孔子俗化，历史化，他们又把六经降到史料的位置上，他们又研究诸子学，扩展了学术研究领域，他们把经学中的各种学问分离而独立出来形成一门一门的学科。这些努力是自觉地将传统儒学向近代学科的转变，因此，章太炎写出了《书》、《国故论衡》、《新方言》等专著，刘师培写出了《国学发微》、《国学教科书》、《古政原始论》等论著，他们是传统学术到近代的各门学科建立的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是传统学术向近代化学科体系转换的中坚力量。

第三节 鲁迅

鲁迅（1881—1936），姓周，初名樟寿，字豫山，后改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学名树人，1918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时，署名鲁迅，浙江绍兴人。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任内阁中书，光

绪十三年（1893）祖父因科场作弊案入狱，坐牢8年。父亲伯宜，为秀才，得了重病，母亲鲁瑞，绍兴安头桥村人，略通文字。家境逐渐败落，受到乡亲邻里的嘲笑和冷眼。周树人在这几年中，为了医治父亲的病，经常出入于药店和当铺之间，遍尝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滋味，看透了上层社会人间的虚伪和欺诈。他又随母亲到外婆家暂住，接触乡村的农民，和农民的孩子建立了深切的感情。光绪二十二年（1896）父亲去世。因家道中落，便放弃了考科举的正途。光绪二十四年（1898）到南京入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次年转到矿务铁路学堂，学习格致、地学、金石学、德文等科课程，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先到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这一时期，他在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参加爱国排满的革命活动。光绪三十年（1904）入仙台医科专门学校，他后来回忆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的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当时，留日学生一般都学政治、法律、警官、理工等科目，学医的极少，他却选定了学医。有一次，在上细菌课时，课前放映时事影片，画面上映出日俄战争时一个体格强壮的中国人，被日军指为俄国侦探，绑起来砍头示众，而围观的祖国同胞却麻木不仁。他看到这种情景深受刺激，便觉悟到要拯救中国，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改变他们的精神才是第一要着。于是，他便决然弃医从文。他从仙台医专回到东京，和许寿裳等人提倡文艺运动。1907年他准备办一文艺杂志，叫《新生》，但未成功。他阅读《民报》，并写了一些论文，1908年在东京每星期日到《民报》社去听章太炎讲文字学，并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章。又出版《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介绍俄国文学和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1909年他回国到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化学教员。1910年任绍兴府中学堂学监兼生理学教员，辑录唐朝以前古代小说，后编辑为《古小说钩沉》、又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等。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周树人到南京任教育部部员，不久教育部迁北京，他任教育部佥事。1918年他发表的《狂人日记》，是文学革命的第一声春雷。他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编委会，任编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他在北方曾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1926年在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鲁迅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职。血的教训轰毁了他的进化论思想。同年10月到达上海，一直到1936年，他在上海从事著述、翻译、编辑革命刊物，参加各种革命社会活动。他参加创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他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群众组织，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他宣传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杂文，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和其他反动文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他成为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本书只探讨鲁迅辛亥革命前的文化思想。

哲学

鲁迅的自然观，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写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两篇论文，前一篇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后一篇论述了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探讨了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与人生的关系。鲁迅说，从单细胞微生物，一直到人类，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靠的是物种自身的发展、淘汰、争存，在不断的变化中产生了新的物种。“上自单么，近迄人类，会成一统，征信历然。”

鲁迅转而论证科学，什么叫科学？他说：“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晚清以来，人们对西方科学的认识比较浮浅，先是以为西方科学表现为船坚炮利，洋务派认为西方制造之精，在于测算格致之学，测算格致便是声光化电诸学的综合，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停留在技术科学的层面。严复开始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方法，培根的归纳法。他又将社会科学介绍给中国读者。近代的科学观念由鲁迅的解释始使人有了明确清晰的概念。

鲁迅继而介绍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他说西方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科学的发展受到压抑，事物的发展是在矛盾中前进的，他运用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叙述基督教和科学发展两者的关系说：“由是观之，可知人间教育诸科，每不即于中道，甲张则乙弛，乙盛则甲衰，迭代往来，无有纪极。”而这种矛盾对立的双方在斗争发展过程中呈螺旋式地运动状态。“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这种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西方科学的发展得力于科学方法。鲁迅介绍了培根的归纳法，归纳法叫内籀法，完全是证实，经验，由经验得出原理。但是，“内籀之具足者，不为人所能，其所成就，亦无逾于实历；就实历而探新理，且更进而窥宇宙之大法，学者难之。”这里，便需要运用演绎法（外籀法），后有笛卡儿，“故其哲理，盖全本外籀而成，扩而用之，即以驭科学”。鲁迅总结说：“二术俱用，真理始昭，而科学之有今日，亦实以会有二术而为之者故。”

鲁迅进一步探讨科学的社会功能，他认为科学能促进社会经济实业的进步，又能增强国力，抵御外侮；还能改变社会风气，促进文化思想的变革，还能增进人类幸福的生活。

他总结说：“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

这就是说科学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繁荣。但是，也不能偏，精神思想方面亦需顾及，若果只崇科学，人生便更归于枯寂，美上的感情消失了，明敏的思想迟钝了，因此，他用一段很辩证的话结束《科学史教篇》。这段话说：

《人之历史·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56页。

《科学史教篇·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67页。

《科学史教篇·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70—171页。

《科学史教篇·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71页。

《科学史教篇·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74页。

《科学史教篇·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74页。

《科学史教篇·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74页。

《科学史教篇·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78页。

“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狄斯丕尔，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凡此者，皆所以改人性之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

历史

鲁迅对晚清八十多年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历史进行了反思。清朝的改革历经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派，洋务派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在国内创建了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派遣留学生出国，办洋务学堂，严复和鲁迅便是受洋务派所办的洋务学堂的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第二阶段是维新派，维新派包括早期改良派提出成立宪国会，经济上发展实业，使国家富强，政治上要求君主立宪，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第三阶段是革命派，革命派学习法国大革命，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他们宣传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这一思潮已经兴起。鲁迅所在的日本东京正处于革命思潮汹涌澎湃之时。他参照了欧洲百年来政治历史的发展趋势，认为19世纪后半叶，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勃兴是反对宗教的统治。一方面，打破了封建门第等级制度，要求自由平等。另一方面，打破了宗教神学垄断的局面，思想自由，百花齐放，学术勃兴。19世纪后叶人们发现专重物质有它的弊病，因此，便“非物质，重个人”。什么是个人主义？鲁迅说：“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人们对个人主义这个名词并不理解，甚至于听了便害怕，以为个人主义便是利己而损人。这有点与自由一词传入中国，人们对这一概念理解为自由妄为，不能接受相似。鲁迅解释说：“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他认为人要有自尊，要有个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这是政治上平等自由的前提。

接着他便介绍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对于人的看法。斯蒂纳“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叔本华“曰意为世界之本体也”，“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尼采“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他提倡的超人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还有一位是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以上诸人都以“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他还提到丹麦哲人契开迦尔，谓“发挥个性，为至高的道德”，又提到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所著的《国民公敌》，“谓有人宝有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

《科学史教篇·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78页。

《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85页。

《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85页。

《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86页。

《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86页。

《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87页。

《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88页。

《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90页。

《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87页。

归总来看，是“赖夫勇猛无畏之人，独立自疆，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者也。”他们有自尊，有个性，有独立的见解，是排斥社会世俗的舆论和旧的社会风气，是勇猛无畏的改革者，新风气的倡导者。鲁迅认为欧洲 19 世纪后叶的弊病是：人们只顾客观世界，而对主观的内面精神置之不顾，其严重后果是“林林众生为物欲来蔽，社会惟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于是，在哲学界出现了提倡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思想家。20 世纪的新精神是立人，“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肤浅平庸之事物哉？”鲁迅对八十多年来中国学习西方寻求真理致力于政治改革的经验，着眼点在于国民性的改造，怎样提高国民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来适应时代的特点，社会发展的需要。维新派呼唤黄金黑铁，立宪国会，革命派宣传民主政治，实现共和国方案，鲁迅则更深一层，参照西欧 19 世纪后叶的弊病，20 世纪的新精神，提出提高国民的自觉，使国民有个性，有自尊，有独立思考能力，这样才能扫除奴隶性，才能冲破封建主义的旧思想体系，去创造新社会、新国家。中华民族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任务，“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因此，不能眼光浅短，以为全盘西化，用欧洲的物质便能救中国，欧人善贾，我们也学会经商，欧洲有铁路矿事，我们也开矿修路，欧人立宪，我们也学立宪国会，这一切仍是光看物质，遗其精神，我们仍要从“立人”抓起。这和章太炎的思想也有一脉相承之处。鲁迅盼望有“不和众器，独具我见之士”，能够担负起改造国民性的重任。

我们这里需要对尼采的思想加以说明。尼采是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思想家。他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继承了唯意志论，由悲观厌世走向痛恨人类，崇拜天才走向崇拜超人，并将世界看作权力意志的表现。他要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他对人民群众轻蔑仇恨，称群众为贱氓，他认为世界是强者压迫、兼并、统治弱者，强者靠权力获胜。他是贵族阶级的代表，认为战争是合理的。而鲁迅崇拜的是尼采的理想主义和个性主义，尼采的对旧传统的轻蔑，以及他对人类的虚伪、欺诈、浅薄的鞭挞，是鲁迅用来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尼采的思想在西欧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起着反动的作用。而尼采思想在中国却因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成为先进的中国人用来反对封建主义的偶像、囿俗、舆论的思想武器，起着进步的作用。因此，鲁迅主张“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是运用了尼采的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其目的是针对那些洋务派、维新派用“物质”来扼杀精神，用众数来约束少数，而致力于唤起民众，做思想启蒙的工作。

鲁迅对尼采的思想的选择是有分寸的。尼采对群众采取蔑视态度，鲁迅对农民是同情的，对农民的疾苦和情感有深切的 understanding，他对中国广大农民的

《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88 页。

《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89 页。

《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93 页。

《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92 页。

《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92 页。

《文化偏至论·坟》，《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181 页。

愚昧落后状态，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要求农民从奴隶变为独立的人。其次，鲁迅对尼采的歌颂强者，认为弱者是恶的观点亦不赞同，他赞成拜伦援助弱小民族的思想。说“尼佞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则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好恶至不同，特图强则一而已。”这里的“此则”是指拜伦。再次，尼采论证战争的合理性，把战争理解为征服、并吞、践踏弱者。鲁迅对此并不同意，他认为“嗜杀戮攻夺，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兽性之爱国也”。指责帝国主义侵略者是兽性发作，他在这里则倾向于托尔斯泰的泛爱主义，和平主义。说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思想家鲁迅具有冷静的头脑。

中国面临着两大敌人，一是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一是封建主义专制君主制的统治。对外来说，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人说，中国会不会像帝国主义那样侵略别人呢？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曾创黄祸说，说黄种人有朝一日强盛会威胁欧洲云云。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鲁迅解释“夫吾华土之苦于强暴，亦已久矣”，既然如此，中国反侵略当是自卫性质，“而今之后，所当有利兵坚盾，环卫其身，毋俾封豕长蛇，荐食上国；然此则所以自卫而已，非效侵略之行，非恃以侵略人也。”他说，托尔斯泰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其声震动人们的心曲，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文明之邦，酷爱和平，“凡所自诩，乃在文明之光华美大，而不借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天下鲜有。”

因此，对友好邻邦都抱着相互支持和关心的态度，“凡有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受侵略的国家，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自省力。对内来说，几千年的专制制度造成了人民的愚昧和顺从。这就需要有先路前驱的健者来做辟启廓清的艰巨工作。有些极“左”的人见到人们处于宗教迷信的笼罩下，便主张捣毁庙宇，禁止赛神，嘲笑神话，毁掉家庙、社稷。鲁迅认为这是一种极为愚蠢的暴主似的行为和主张。他认为民众相信宗教迷信，这需要用科学，用文明进化进行长期耐心的宣传和教育，并不能一种法令将其禁止和灭绝。中国的广大农村，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他们文化程度较低，他们不安于物质的生活，则必然有形而上的需求，产生一种宗教信仰，使人心有所依托，这是文化的本源。崇拜家族、社稷，效果极大，不可轻视。譬如赛神，“农人耕稼，岁几无休时，递得余闲，则有报赛，举酒自劳，洁牲酬神，精神体质，两愉悦也。”这成了一种风俗习惯，有它的合理性。至于神话是“太古之民，神思如是”。譬如说“龙”，是吾古民神思所创造，例以动物学，则既自白其愚矣，……抑国民有是，非特无足愧怍已也，神思美富，益可自扬。”鲁迅对神话，赛神、祭祀祖宗、社稷，对待中华民族自古流传下来的民俗风情，采取尊重的态度，加以科学的解释。他认为毁庙、干犯农民宗教信仰，甚至强迫别人信奉什么，这是暴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12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10页。

《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245页。

《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246页。

《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245页。

《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247页。

《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242页。

《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243页。

主行为，是愚蠢、可笑，“创天下古今未闻之事”。

文学

鲁迅提出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即中国传统文学缺少一种什么精神？他写了一篇《摩罗诗力说》，介绍西欧进步的文艺思潮。摩罗是梵语，意即天魔，西欧人称撒旦，是恶魔的意思，魔鬼派诗人则是有反抗精神的诗人，他们“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他们的作品“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因此，他们的诗歌的声音是最雄杰伟美的。他们的呐喊和反抗的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所缺少的。鲁迅说文明古国的文学史一开始有慷慨激昂动人的诗歌，久而久之，便沦入平和，渐渐地诗坛便是一片萧条的景象，诗坛如此，则古国也便逐渐衰亡。他举了印度为例。谈到中国，亦有此忧。中国的诗教是温柔敦厚，诗言志，诗三百首，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即没有个性。翻检中国古代诗卷，第一类是“颂祝主义，悦媚豪古之作”，这类是歌功颂德的作品。第二类是“心应虫鸟，情感林泉”的咏叹诗。第三类是“悲慨世事，感怀前贤”的感怀诗。第四类是屈原的《离骚》，可归为放言诗，虽然发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也属于芳菲凄恻之音。以上的诗篇都有一个总的倾向是代圣人立言，文以载道，都符合圣道，都不敢触动封建王朝，不能听到反抗挑战的声音。鲁迅作了四语评价说：“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终究没有发展为呐喊和反抗的声音。为什么会这样？与中国政治有关。“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撓”。老子的《道德经》的基本精神也是如此。“老子书五千言，要在不撓人心；以不撓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这样世界便安宁太平了。

人类进化的历史表明，和平在人间是不能实现的。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平静，而实际上人类的生存、发展是无时无刻不在武健勇烈的抗拒斗争中开拓推进的。而“诗人，撓人心者也”，“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矣。”平和的局面破坏了，人道便发扬起来了。而中国“无有为沉痛著大之声，撓其后人，使之兴起。”

这里，鲁迅解释什么是美？“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美的本质是超功利的，并非致用。他在另一处说：“主美者以为美术目的，即在美术，其于他事，更无关

《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243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97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97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00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99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99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00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01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02—203页。

系。”这便是文学上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主张的。他说美术有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想，三曰美化，“美术云者，即用思想以美化天物之谓。”他强调“神思”，即发挥想象力达到理想境界。美的社会功能就是“涵养吾人之神思”。我们欣赏美术作品，便受到熏陶，使人气质受到影响。鲁迅打了一个比方：“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我们欣赏美术作品好像在大海中游泳，大海本身波涛汹涌，并没有授人以格言教训，而人在游泳之后元气体力陡增，这便是效果。而且科学知识给人的启迪和艺术作品并不相同，科学知识靠推理，艺术作品靠直觉，直接能感受到人生的哲理，能接触到人生的真理的隐密幽深之处。这是美术供人享乐功用的一方面。

美术还有主用者的一派。“顾有据群学见地以观诗者，其为说复异：要在文章与道德相关。”这一派认为美术可以辅翼道德。“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时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这便是文学上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鲁迅的审美观将这两方面都顾及，较全面地看待艺术的社会功能。他的这种审美观决定了他提倡呐喊和反抗的文学。这里他强调的是美的壮美的一面。

既然中国文学史上不提倡呐喊反抗的文学，那么，只有到外国文学中去寻找，“别求新声于异邦”。他向国人介绍了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克拉甸斯奇，匈牙利的裴多菲。他们都是精神界的伟人，人群的骄子，他们共同的性格和特点是“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他们“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反观中国，文坛一片寂寞，鲁迅殷切地盼望中国出现一批精神界的战士，像西欧的魔罗诗人那样用震撼旧社会的巨涛，冲破中国文坛的萧条、荒寒的局面，期待中国响起新声。

为了唤醒民众，鲁迅便从事翻译外国小说。1909年3月，他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合作译《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在日本东京出版，7月又出版第二册。小说搜集了英、美、法、俄、波兰、丹麦、波斯尼亚、芬兰8个国家，作家10人，作品16篇，共印了1500册，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出售，销售情况不太好，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

关于翻译外国小说的动机，鲁迅说：“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要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他们搜集的内容是俄国作家暴露黑

《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273页。

《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272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03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03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04页。

《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273—274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97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32页。

《摩罗诗力说·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233页。

《序》，《域外小说集》卷首，岳麓书社旧译重刊本1986年，第1页。

暗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以及东欧被压迫弱小民族反抗和叫喊的小说。他们认为这些作家是同劳动大众同一命运的，而且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这些作品特别容易引起中国青年读者的共鸣。他说：“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

鲁迅翻译了俄国迦尔洵的《四日》。他还翻译了俄国安特烈夫的《谩》（今译《谎言》）。全篇小说是写一个狂人的心理状态，狂人自疑，以至杀人，认为人生是一个大谎言。狂人最后痛苦地呼喊：“救救我吧！救救我吧！”鲁迅很推崇安特烈夫的作品，认为他将19世纪末俄国人的心情烦闷与生活的暗淡都描述出来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的作品也许是受此作品的影响。他曾说，《狂人日记》的产生：“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的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可见，他是借鉴了外国文学作品的。

鲁迅为《域外小说集》作序说：“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然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可以说，编译者是忠于原著风格的，但是，当时还是用文言来翻译小说，因此，仍有诘屈聱牙和艰涩生硬之处，难为大众所接受。不过，读了《域外小说集》，能使人在作品所反映的痛苦和斗争中得到启迪，终能沉思和奋起。

当代文学家冯至评论说：“我们不能不认为它是采取进步而严肃的态度介绍欧洲文学最早的第一燕。只可惜这只燕子来的时候太早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冰封雪冻的冬天。”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十分重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他经常和朋友讨论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生？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鲁迅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派的排满民主活动，而他更进一层思考，排满胜利以后，如何治国？他认为第一要著是要立人，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他提倡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鼓吹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他介绍西方呐喊和反抗的文学作品，都是为了改造社会，为现实政治而斗争。他提倡的科学和个性解放、独立人格的追求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讨论的热点。他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那样从天上偷来火种给人类，给中国荒寒孤寂的大地带来了光和热。他将西方呐喊和反抗的声音介绍过来，传播开去，而又进一步揭露国民性的弱点，他的创作小说的材料，“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辛辣的杂文，像匕首，像投枪，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坚决撕去旧社会的假面。这使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一员“精神界战士”。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用他最彻底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和崭新的艺术形式，从事创作实践，写出了像《狂人日记》那样的短篇小说，成为五四新文学特别是新小说的奠基作品。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392页。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393页。

《旧序》，《域外小说集》卷首，第5页。

张国庆：《后记》，《域外小说集》卷尾，第2页。

参看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393页。

结语 晚清文化思想发展的若干问题

我们用九章的篇幅大体勾画出晚清文化的轮廓。文中以晚清各个时期为纬，以晚清文化的各种现象为经，把主要代表人物放在经纬纵横的坐标上，借以说明他们在晚清文化中所占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当然，这种描述方法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有些问题还不能分析透彻。这里，就晚清文化思想发展的若干问题，稍加剖析，以为结论。

（一）新旧思想的斗争和更替

晚清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动引起了文化表述思想的激烈斗争。封建社会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大体上可表述为：一、封闭式自满自足的思维方式。严格地区分夷夏，所谓夷夏之辨，认为华夏文化是优越的，外来民族是夷文化，是落后、低下、粗俗的，认为华夏文化应当广被四海，以夏变夷，有一种民族文化的优越感，造成妄自尊大、自满自足的心理。二、尊君崇尚封建伦理的思维方式。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人们怀着崇敬恐惧的心理，盲目崇拜皇权。三、尊圣崇经的思维方式。圣是孔子，经是儒家的经典，包括四书五经，人们以经书的知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经文只准解释，不准怀疑。非圣无法。人们养成了从经书中找现成答案而轻视自然实验和社会实践。四、亘古不变的天道哲理思维。人们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奉天而法古”，贵古而贱今，《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也只是局部的变，这就养成了人们墨守成规，循规蹈矩，居静思安的心理习惯。这四点，夷夏观是思想的外壳，尊君论是思想的核心，尊圣崇经是思想内核中深层的结构，也即尊君论的理论基础，亘古不变的天道观是政治哲学，是君权论的指导思想。晚清社会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封建思想遭到严重的冲击，新旧思想的斗争便激烈起来，集中表现在上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动摇。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看到中国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他们的枪炮轮船比我们优越，他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冯桂芬在19世纪60年代更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除了外国船坚炮利这一条外，还有：“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建议。康有为在上海租界和香港看到外国人管理市政井井有条，便认为不能将外国以夷狄视之。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成为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中国人环顾世界，了解到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有三种类型，一君主制，二君民共主制，三民主共和制。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认为民主共和制并不适合于中国，而对君主立宪制则赞口不绝。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显出了它的许多弊病，他们希望中国能实行有议会制度的君民共主制。但是，他们对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其实质尚未辨明。康有为竭力推荐光绪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制，说：“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不然的话，一旦掀起农民运动的风暴，“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康有为大谈“民本

《原叙》，《海国图志》卷首。

《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卷下，第9页。

《进呈法国革命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09页。

《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03页。

君末”的思想，与传统的尊君思想正好相反。严复宣传斯宾塞的国家有机体说，认为皇帝亦是国民的一分子，当皇帝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打破了君主的神圣性。谭嗣同要冲破封建伦理纲常的网罗，认为男女是社会的精华，应当男女平等。这些思想对尊君崇尚封建伦理思想是猛烈的抨击。严复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中国来，是晚清哲学界一次深刻的革命，它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严复宣传外国比中国文化优越之处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法则屈私以为公。”前者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后者反对独裁，提倡民主政治。科学知识能破除对皇帝的崇拜，譬如严复说哥白尼的日心说原理，说明地球是一行星，围绕太阳循轨旋转，无所谓上下。易经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尊地卑，引申到人类社会便是尊卑上下，君臣父子夫妻各有其分，如果相信哥白尼日心说，则一切上下尊卑贵贱之说的立论根据都不能成立，所以西方便盛行自由平等之说。这是科学原理直接动摇了封建尊卑贵贱观念的一例。康有为提出“六经皆伪”思想，对儒家经典具有一种大胆的怀疑精神，破除了对经书的迷信。章太炎又提出“六经皆史”观点，他把经书只看成是历史史料，并不是君主制的理论信条。

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比康有为更进了一步，他要求推翻清王朝，改良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他总结革命经验说：“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他们仍宣传进化论，不过，将进化论和革命联系起来，邹容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他们宣传天赋人权论，三权分立说，共和国方案。《国民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开宗明义问答：“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这一认识水平比维新派提高了一大步。

新旧思想的斗争带有极大的政治色彩，新与旧也是相对的。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思想起着在浓厚的封建思想笼罩下，开辟学习西方的途径的进步作用。这是60年代。到了1898年，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时，和冯桂芬所提内容含义相同，但这时张之洞是为了抵制维新派的民权观，反对实行君主立宪的变法运动，其思想便起着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

（二）西学东渐的思想轨迹

西学东渐，通过自然科学书籍的传入，人们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接触西方的天文学、地质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这里包括牛顿的力学，哥白尼的日心说，康德的星云说等，还有便是培根、笛卡儿的科学思想方法论的介绍。这是第一阶段。李善兰、华蘅芳为主要介绍者。

第二阶段是介绍以政治学为主的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及其书籍。严复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又介绍卢骚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洛克的政府论，穆勒的论自由，边沁、穆勒的功利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2页。

参看：《政治讲义·自叙》，《严复集》第5册，第1241页。

《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4页。

《革命军》，《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中华书局1983年，第470页。

《说国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59年，第72页。

《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第8页。

主义，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穆勒的逻辑学，斯宾塞的社会学。严复自己撰写了一部《政治讲义》，介绍西方的政治学。

第三阶段是介绍以德国思想家为主的西方哲学思想。这里包括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费希特、施蒂纳、尼采的思想，他们都是德国人。王国维、章太炎、鲁迅都介绍过德国哲学家的思想。

从西学东渐的思想轨迹来看，其顺序是先自然科学、技术学科，其次社会科学，再次是哲学，还有便是文学，文学作品有法国、英国的，如大仲马、小仲马的作品，莎士比亚、王尔德、狄更斯、司各特、雪莱、拜伦、哥德的作品，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美国、俄国的较少。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顺序是和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有关，先是表层，技术、器械；后是政治制度，中层次；再次是人生哲理，深层次。中国人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的，中国文化是精神的。西方诗歌、小说、戏剧是后来的传播者为使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学风貌而译，说明西方国家人民精神文明方面的生活也是很丰富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结构的变动

清朝官方提倡程朱理学，学术是提倡考据学，形成乾嘉学派。到了晚清理学空谈性理，汉学考证繁琐，其弊病已甚明显，加上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要起来挽救民族危机，提出治国方案，宋学、汉学都无裨益于政治，传统文化内部结构便发生了变化。

一是今文经学的兴起。今文经学东汉时便衰落沉寂了。乾隆朝庄存与提倡今文经学，研究经书中微言大义，下传刘逢禄，刘又传给龚自珍、魏源。后来出了个四川井研的廖平，受王闿运的传授，廖平写了《辟刘篇》、《知圣篇》，这两篇文章对康有为影响很大。康有为巧妙地将今文经学思想从学术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为改革政治制度制造舆论，将公羊三世说同西方进化论思想巧妙地结合起来。历史是变动的、革新的，与正统“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立异，与西方的进化论思想趋同。

二是明末遗民的思想复活。明末清初，天崩地解，明亡，满族入关，社会大变动，大战乱，人们经历了火与血的历史锻炼，黄宗羲、顾彦林、王夫之、歆元等人总结了历史经验，得出：一、空谈误国，提倡实学，经世致用。二、抨击君主制，天下非一人私产。三、强调群体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四、变革哲学观念，辩论道器、人欲天理、仁义功利等范畴。五、排满思想。这些思想一直被压抑，二百年无人问津。晚清时局类似明末，民族危机，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大变动、大战乱，都逼迫人们追求真理，人们又开始读他们的书。这一批明末下层士大夫中儒学进步思想代表着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中市民阶级利益，维新派便吸取了他们思想中的一、二、三、四点，革命派吸收了他们思想中的一、五点，加以发挥。民间进步思想与正统传统文化思想立异，民间进步思想中的反君主专制又与西方民主思想趋同。

三是王学的余韵。王学是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清朝初年便被压抑下去，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又提倡心学，发挥致良知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王学思想奋发凡民的志气，人人可以为圣人，盐贩、樵夫、陶工，都可以悟出真理，成为圣贤。王阳明提倡独立思考，这一思想和西方笛卡儿观点相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加藤弘之都提倡王学，阳明学在日本思想启蒙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梁启超有鉴于此，特纂编《德育鉴》一书用王学作为铸造现代国民人格的依据。王学与程朱理学是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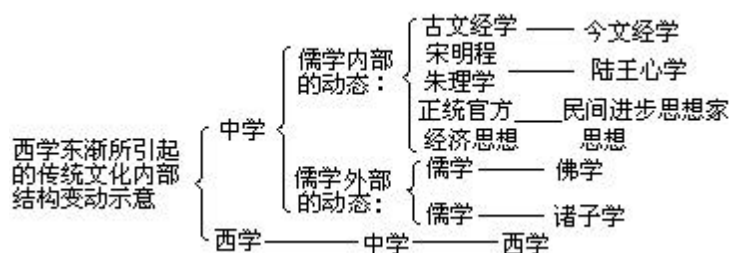
异，与西方培养独立人格思想是趋同。

四是佛学哲理研究兴趣的浓厚。佛学在晚清异军独起，人们喜欢它、研究它。士大夫知识分子把它的哲理作为文化热点。杨文会提倡佛学，一大批著名学者景从，他们将消极出世思想转为积极的入世思想，英勇无畏，承担责任，拯救人类，以成正果。他们鼓吹慈悲思想，平等思想，无君无父，破除三纲，与正统传统儒学立异，与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趋同。

五是诸子学的兴起。诸子学的兴起实际上是打破了“独尊儒术”的垄断局面，他们研究墨子的科学思想，逻辑学思想，与西学中的光学、力学、逻辑学相比较，有其相通之处。人们研究老子、庄子对人生的超脱态度，审美心理，与西学中的美学原理相比较。人们研究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研究韩非的法家思想，与西学的唯物主义、法学观念相比较。人们研究管子的商业管理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相比较。总之，一方面，人们将儒、墨、道、法放在平等的地位来研究，重新发现墨、道、法家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人们有意识地将其诸子思想和西方国家思想家思想相比较，使政治、伦理、军事、实业等思想的研究更加扩展了领域，更加深了认识。

今文经学、王学、佛学的兴起是晚清文化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我们发现，传统文化内部结构的变化有着立异和趋同的两个方面，立异，都是对正统的传统文化的立异；趋同，都是对西学中某种思想的趋同，这种变动便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反映了社会发展对文化的需求。可列表如下：



（四）儒学在晚清文化中的地位和历史命运

孔子的学说称为儒学，儒家的经籍是六经，经学是解释、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的一门学问。什么叫经？班固释经为常，是不可改变的永恒的道理。孔广森解释为经天之义，说六经大义如日经天。这样儒家典籍便神圣化了。经书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柱石，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精神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原则。经书中所阐明的思想有权威性，不能随意解释，更不能反对。韩愈曾说：“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康有为疑经，他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提出“六经皆伪”，敢于疑经，便是非圣。他说孔子是改革派，不是保守派，孔子崇拜尧舜、文武周公是“托古改制”，其实质是改革政治。而且托古是古代思想家常用的方法，如老子托黄帝，墨子托大禹，许行托神农，孔子托尧舜也便不奇怪了。康有为的本意是借孔子是改革派，重新解释经书中的微言大义，来为他自己进行变法制造舆论。但是，他没有料到这种怀疑精神使孔子的权威神圣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原来孔子也像老子、墨子、许行一样托古改制，他把孔子和诸子放到了同等的地位。疑经非圣这是顽固派给予康有为的一条罪名。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著作确实给人们一种思想解放，人们从经书和孔子的正统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章太炎从古文经学家立场，对“经”作了另一番解释，认

为广义地讲，古代书籍都可称经。因此，打破了经书的神圣概念。章太炎又继承了章学诚的观点主张——六经皆史。在他看来，六经不过是历史史料，孔子是编纂者，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把孔子说成是历史学家，便和正统思想家把孔子作为政治家、哲学家，把经书作为万世的教科书，大不相同。这也降低了孔子和经书的地位。

邓实把儒学区分为君学和国学。君学是为了维护君主制的，国学则是民族文化的精粹部分。章太炎把国学的精粹概括为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他们把传统文化研究领域扩大了，不是“独尊儒术”，而是将先秦诸子平等地看待，因此，兴起了诸子学。

儒学和经学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是晚清儒学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儒学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古代研究学问并不分科目，哲学、史学、文学、伦理、教育、逻辑，都包括在经学中。晚清儒学的一个现象是近代学科从儒学中独立出来，自成体系。这里是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哲学主要是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章太炎的《书》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分析，尤其对明清学术思想史的分析 and 评价，都极有价值。史学有龚自珍、梁启超、章太炎的史学理论，夏曾佑写了《中国古代史》，刘师培写了《中国历史教科书》。后两本历史著作是运用历史进化论观点，阐明人类社会进化的道理，用以开发民智，和封建传统教育的读本根本不同。伦理学方面有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德育鉴》，章太炎的革命道德说，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和刘师培的《伦理教科书》。语言文字学有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有关的文章、《新方言》，刘师培的《中国文字流弊论》、《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还有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等讲语法的专著。逻辑学则有章太炎对墨子的逻辑，西方的逻辑学，印度佛教的因明学三者的比较研究。文学则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

第三个特点是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儒学。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书》以及刘师培的《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都可算这一类著作。

儒家思想在晚清分为两派，一派将儒学视为宗教，即孔教，康有为、陈焕章在辛亥革命后还成立孔教会，还祭天祀孔，大开历史的倒车。另一派将儒学视为学术，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剥去它神秘的外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儒学在晚清政治斗争的气氛下，有人利用它，有人攻击它，而儒学本身自有它的价值，引起了后人激烈的争论和重新估价。

（五）地区文化的特点及其影响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么大的地区，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且各具特点。中国分为南与北，南方接近沿海，沿海大城市晚清开辟为商埠，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沿海首当其冲，这些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现代化的交通促使信息传递很迅速，因此，文化比较新颖、丰富、繁荣。北方属于内地，偏远地区仍以自然经济为主，交通闭塞，信息传播迟缓，人们相信理学，保存固有文化，封建旧习俗较多。北京是清王朝的首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封建正统思想极为浓厚，维护王权，宣扬“三纲五常”，新思想的传播便遭到极大的阻碍，动不动就禁书毁版，禁止异端邪说横行，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南方又分巴蜀、湖湘、江浙皖赣、粤闽地区，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和地理环境有关，也和这一地区的文化源流有关，又同这一地区孕

育出来的人才有关。粤闽地区靠中央政府极远，可谓“天高皇帝远”，正统思想有影响，但束缚较松散，民情性格开朗热情，富有想象力，加上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播，掠收新事物、新思想便快，他们是西学的传播者。将西学传播出去，影响湖湘，远及江浙。江浙皖赣地区，江苏民情温雅颖敏，浙江民情勤劳敏捷，耐于吃苦，江浙一带专业钻研精神较强，汉学在这一地区相当发达，出现许多学者，西学传播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对这地区影响较大，出现了不少科学家、工程师。上海是一个文化圈，五方杂处，人才汇集，文化出版事业发达，信息传递极快，各种人才都在这舞台上表演，施展才能，而这里的成果、信息又会很快遍传各地。日本东京留学生在外国也及时将新思想传播到上海，再由上海传播到各地。湖湘、巴蜀属于内地，湖湘是理学影响较深的地区，思想保守，民情则强悍性拗，勇武果敢，百折不挠，他们从封建正统文化思想的包围中冲出去，接受新文化、新思想。

各地区文化思想又相互影响。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在北京是好友，浙江文化、湖南文化、福建文化各具特色，又具有共同点。王闿运到四川讲学，四川形成蜀学，廖平是他的得意弟子，廖平的思想又影响康有为。湖湘——巴蜀——粤闽，思想流传便有这一联系。梁启超到湖南时务学堂讲学，“公车上书”时广东举人联络湖南举人，都表现了湖湘文化与粤闽文化的联系。章太炎原和维新派为伍，共办《时务报》，后来又独立为革命派，章太炎、蔡元培、鲁迅、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这批光复会的成员形成革命派浙江的团体，他们的文化是具有特色的。

有些文化现象需要细加解释，地理环境不是决定的因素，但是，对文化确是有着影响。文艺，文学形成南北不同的风格，各种因素中，地理环境的因素我们研究得还是很不够的。本书所涉及到的只是极肤浅的见解而已。

（六）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区别和互相渗透

封建社会，雅文化属于宫廷、上层官僚、士大夫、文人雅士的诵读作品。俗文化则属于下层民众所喜爱，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晚清文苑，诗歌是古体，追慕魏晋、晚唐、北宋的诗，复古气味浓，典故多，做着做着就没有什么生气了。维新派提倡诗界革命，革命派南社的诗带着革命的气息，内容是新的，形式仍是古体，没有突破，文章徘徊于骈体文和散文之间。梁启超创造了不文不白，半文半白的报章体文章。晚一些时候，刊物上出现了白话文，林獬的《中国白话报》、陈独秀编的《安徽俗话报》都属于这一类。他们运用白话文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宣传，开启民智，使民众容易接受，喜见乐闻。小说和戏剧是俗文化。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发现了它们的价值，提高了它们的地位，强调它们的社会功能，俗文化的风行代表着晚清社会世俗化的总趋势。梁启超说新小说可以培养新民、新道德、新风俗，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要将旧小说诲盗诲淫的作用改变为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陈独秀说唱戏的“可算得是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于是，小说和戏剧的内容以反映现实社会的矛盾为主，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雅文化的俗化，表现在有人将昆曲、高腔的宫廷秘本翻为皮簧，使广大群众能看懂，所喜爱。俗文化雅化，表现在文人学士将粗糙的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7页。

三爱：《论戏曲》，《安徽俗话报》第11期。又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57页。

皮簧民间剧本，加工、润色、改编、提高，使剧目和表演规范化。昆曲独占剧坛几百年，由于它太雅，脱离广大群众，渐渐呈衰退趋势。京剧由于它来自民间，吸收各剧种之长，赢得群众喜爱，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程度，则日显繁荣，几有席卷全国之势头。晚清的俗文化流行是时代的特色，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不可缺少的文化样式。当然俗文化的发展也有个将粗陋、色情、低级趣味的东西加以汰除的过程，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使艺术作品千锤百炼成为精品，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七）晚清文化的特点和总趋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晚清文化的特征：第一，它是动态的，处于不断变化流动的状态中。这就说明封建文化独占垄断地位的局面已被打破了。第二，这种变动是缓慢的，经过一个渐变过程，新旧并存，中西混杂，南北交流，雅俗渗透，一下子谁也没法吞没谁，造成了极为复杂的局面。鲁迅说：“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

第三，晚清文化的趋向是朝构建新文化的方向发展。晚清文化具有过渡的性质，这一变动正在进行中，构建新文化的任务业经提出，稍有变化，却未完成。到了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陈独秀等人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他们“崇拜李吴，排斥林陈”。就是崇拜李伯元、吴趼人的暴露旧社会的小说，排斥林纾的古文和江西诗派陈三立的诗歌。他们“神圣施曹，土芥归方”，就是将施耐庵的水浒，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两部小说推为神圣的巨著，而将归有光和方苞桐城派的散文贬为土芥。他们说“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就是把桐城派的散文和文选派的骈体文都责为谬种妖孽。他们批评易顺鼎和樊增祥的诗文是烂污笔墨，斯文奴隶，丧却人格，半钱不值。他们还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向孔圣人开火。这种种都是晚清文化的延伸，或说是晚清文化的终结，新文化的开始。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表现都可以从晚清文化中找到源流，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斗争是晚清文化思想斗争的延续和决战。我们从这里寻找到了晚清文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衔接点。本书限于探究晚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只能是前瞻，指出其性质而已。

《随感录五十四·热风》，《鲁迅全集》第1卷，第416、417页。

王敬轩（钱玄同的化名）：《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第4卷，第3号。